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David Harvey

[美] 大卫 · 哈维 著

王钦 译

▼

新自由主义简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

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David Harvey

上架建议：历史/经济

ISBN 978-7-5327-5091-7

9 787532 750917 >

定价：32.00 元

易文网：www. ewen. cc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新自由主义简史

David Harvey
[美] 大卫·哈维 著
王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自由主义简史 / [美] 哈维(Harvey, D.)著;王钦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2
书名原文: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ISBN 978-7-5327-5091-7

Ⅰ. ①新… Ⅱ. ①哈… ②王… Ⅲ. 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 Ⅳ. ①F091.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265 号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Copyright © David Harvey,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0-118 号

新自由主义简史

[美] 大卫·哈维 著

王 钦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96,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5091-7/F·192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致　谢

图4.1，4.3，4.4和5.1承蒙Guilford出版社允许转引，引自P. Dicken，*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Edition，2003。

图1.3承蒙MIT Press Journals允许转引，引自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88，'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8：1 (February，2003)。

图5.2承蒙J. Perloff允许转引，引自Wu，X and Perloff，J，*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over Time: Reasons for Rising Inequality*. CUDARE Working Papers 977。

图1.6承蒙Verso出版社允许转引，引自R. Pollin，*Contours of Descent*，2003。

图1.4，1.7，1.8，1.9和7.1承蒙杜梅内尔与列维允许转引，见网址http：//www.cebremap.ens.fr/levy。

图1.2，1.5和6.2承蒙出版商允许转引，引自*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y 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translated by Derek Jeff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opyright. 200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图4.2承蒙Blackwell出版社允许转引，引自S. Corbridge，*Debt and Development*，1993。

目　录

图表与表格列表　001

致谢　001

导论　001

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　006

第二章　建立赞同　046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　074

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　100

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137

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75

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　211

参考文献　238

索引　250

译后记　285

图表与表格列表

（标注页码为本书边码）

图表

图 1.1： 1970 年代经济危机： 美国和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情况，1960—1987 *14*

图 1.2： 1970 年代的财产滑坡： 美国收入最高的 1%人口所持资产份额，1922—1998 *17*

图 1.3： 阶级权力的恢复： 美国、英国和法国收入最高的 0.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1913—1998 *17*

图 1.4： 美国财富和收入的集中： 行政总裁薪资与美国平均工资的关系，1970—2003；最富裕家庭的财产份额，1982—2002 *18*

图 1.5： “沃尔克休克法”： 美国和法国的实际利率波动，1960—2001 *24*

图 1.6： 对劳工的打击： 美国实际工资与生产力，1960—2000 *25*

图 1.7： 上层阶级税收起义： 美国收入最高与最低人群的税率，1913—2003 *26*

图 1.8： 从境外榨取盈余： 美国的国内和国外收益率，1960—2002 *30*

图 1.9： 流入美国的贡金： 从世界其他地区所获利润和资本收益

与国内利润的关系 *30*

图4.1：全球境外直接投资版图，2000 *91*

图4.2：1982—1985年国际债务危机 *96*

图4.3：2000年墨西哥主要马圭拉部门的就业情况 *103*

图4.4：韩国走向海外：境外直接投资，2000 *108*

图5.1：1980年代中国向外国投资开放地形图 *130*

图5.2：中国收入日益不平等：农村与城市，1985—2000 *142*

图6.1：每年和每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速率，1960—2003 *155*

图6.2：金融资本霸权：美国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资本净值和利润率，1960—2001 *157*

图7.1：美国在全球资本和所有权流动上的衰退地位，1960—2002：美国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和外资所有所占份额 *191*

表格

表5.1：资产流入测量：外国贷款、海外直接投资、契约联盟，1979—2002 *123*

表5.2：变化中的中国就业结构，1980—2002 *128*

导　论

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 1978—1980 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1978 年，在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共产党管制的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朝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邓小平规定的道路是：以史上罕有的持续发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内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力中心。而在太平洋彼岸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一个相对陌生的人物（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 1979 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货币政策。美联储此后不计后果地（尤其是失业问题）遏制通货膨胀。大西洋对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 1979 年 5 月当选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接着，1980 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以其待人接物的个人魅力，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其手段则是通过支持沃尔克在美联储的行动，加之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配合，以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业松绑，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解放金融能量。上述震源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而这些推动力的传播和反响看来要使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些广泛而深远的转变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

2 是，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通常被归在“全球化”一词下——借助什么手段方式从旧的结构内部迸发出来。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所采用的理论都是长期存在于话语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们把这些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主流理论(尽管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努力)。里根复苏的共和党内非主流传统要回溯到1960年代初的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邓小平看到了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和影响力的高涨，力图调动市场社会主义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沃尔克和撒切尔均以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学说而受人瞩目，他们把这种学说转化为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学说——其起源、兴起和意义。①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integrity)，还必须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组织和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

---

① S. George,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Twenty Years of Elite Economics a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for Structural Change', in W. Bello, N. Bullard, and K. Malhotra (eds.), *Global Finance: New Thinking on Regulating Capital Markets* (London: Zed Books, 2000) 27 - 35; G. Duménil and D. Lévy,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trans. D. Jeff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 Peck,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3 (2004), 392 - 405; J. Peck and A. Tickell,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3 (2002), 380 - 404; P. Treanor, 'Neoliberalism: Origins, Theory, Definition', http://web.inter.nl.net/users/Paul.Treanor/neoliberalism.html.

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价格),同时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此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大学和许多“智囊团”)、媒体、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财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

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①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
4 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求(致使有些人声称诞生了一种新的“信息社会”)。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②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我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已有探讨。③

虽然如今对于全球性转型及其后果已经能给出多种总体解释，但人们在总体上却疏忽了一点(这也是本书想要填补的漏洞)：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无人问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这个故事将给出一种框架，用以确认和建构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

---

① Treanor, ‘Neoliberalism’.

② 参见哈维：《后现代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译者

③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J.-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66.

我从最近几次与 Gerard Duménil，Sam Gindin，Leo Panitch 的对谈中获益良多。而一直以来给我帮助的人则包括 Masao Miyoshi，Giovanni Arrighi，Patrick Bond，Cindi Katz，Neil Smith，Bertell Ollman，Maria Kaika 和 Erik Swyngedouw。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于 2001 年 11 月在柏林举办的新自由主义研讨会引发了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我要感谢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主任 Bill Kelly 以及我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兴趣和支持(首先是人类学规划项目的同事和学生)。当然，他们都不负文责。

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

5 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是“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此而言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类理想确实是引人注目并有说服力的。他们认为，这些价值不仅受到法西斯主义、权威主义、共产主义的威胁，还受到一切政府干预形式的威胁，因为这些干预以集体判断取代了个人的自由选择。

关于尊严和个人自由的种种概念本身就有力而吸引人。此类理想促使冷战结束前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异见分子发起运动。1968年席卷世界的学生运动——从巴黎和芝加哥，到曼谷和墨西哥城——部分源于追求更多的言论自由和个人选择自由。总体而言，这些理想吸引的是每个将自己为自己做决定视若圭臬的人。

长期嵌于美国传统内的自由理念在近些年扮演着显赫的角色。“9·11”被许多人直接解释为对于自由理念的攻击。布什总统在“9·11”周年纪念时写道：“一个愈益自由的和平世界能为美国人带来长远利益，并体现一贯的美国理想，团结美国的盟

友。”他总结说：“人性掌握了这样一种机遇，让自由战胜其所有顽固的敌人”，而“美国愿意肩负为此伟大使命冲锋陷阵的任务”。这些话很快被纳入美国国防策略文件。布什后来还说：“自由是上帝给世上每个男人女人带来的礼物”，并加上一句：“我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有义务推动自由的传播”。①

在为针对伊拉克实施先发打击辩护的所有其他理由都被证明是徒劳之后，总统便寻求自由理念的帮助：给伊拉克带去的自由本身就足以证明战争的合法性。伊拉克自由了，而这才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此设想的“自由”是何种自由呢？因为，正如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②很久以前就睿智地指出的，“自由是匹好马，但关键看它向何处去。”③那么，伊拉克人民能指望拜武力所赐的自由之马带他们去向何处呢？

布什政府在2003年9月19日给出了回答，时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负责人的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颁布了四项法令，包括“国营企业完全私有化，外国公司对伊拉克企业的完全所有权，外资盈利交还本国……伊拉克银行开放由外国管理，给外国公司国民待遇……清除绝大多数贸易壁垒”。④这些法令应用于所有经济领域，包括公共服务、

---

① G. W. Bush,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13 Apr.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20.html.

② 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批评家，著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译者

③ Matthew Arnold 引文出自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8), 118。

④ A.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Plan for Iraq (and Beyond)', *Left Turn Magazine*, 12 (Feb./Mar. 2004), 27－32.

传媒、制造业、服务业、运输业、金融业和建造业。只有石油除外(大概是因为石油作为偿付战争费用的税收来源这一特殊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劳动市场受到了严格管理。主要部门的罢工被有效禁止,而成立工会的权利也被限制。同时,一种相当倒退的“单一税制”(这是美国保守党一直以来呼吁实行的雄心勃勃的税制改革计划)也被强制实施。

有些人指出,上述法令触犯了日内瓦和海牙公约,因为占领国的任务是保护被占领国的资产,而不是变卖它们。①一些伊拉克人强烈反对将这种被伦敦《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称为
7 “资本主义梦想”的政制硬塞给伊拉克的做法。美国指派的临时管理当局的一位成员激烈批评这种强行实施“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做法,称之为“置历史于不顾的错误逻辑”。②虽然布雷默的法规由占领国强行实施或许是不合法的,然而,若通过一个“主权自治”(sovereign)政府批准,这些法令则可以变成合法的。由美国指派的过渡政府在2004年6月末接管伊拉克并宣告“自治”。但这个政府所有的权力仅仅是批准既有的法律。在移交权力之前,布雷默增加了许多法律,具体到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规则的细枝末节(规定的细节包括版权法和知识产权),表示希望这些制度安排可以“具有自身的生命和活力”,从而不会被轻易推翻。③

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布雷默勾勒的种种举措都是必要而充

① N. Klein, 'Of Course the White House Fears Free Elections in Iraq', *Guardian*, 24 Jan. 2004, 18.

② T. Crampton, 'Iraqi Official Urges Caution on Imposing Free Market', *New York Times*, 14 Oct. 2003, C5.

③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29.

分的，这样才能创造财富并因此改善人民的生活。市场和贸易的自由保障个人自由，这一前提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特征，并长期以来在美国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姿态上占据主导地位。①美国试图借助武力强加给伊拉克的显然是这样一种国家机器，其根本任务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我把这种国家机器称为*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企业利益、跨国公司的利益、金融资本的利益。简言之，布雷默引领伊拉克人把自由之马骑到新自由主义的畜栏里。

值得提醒的是，第一次新自由主义国家形态的实验是在智利，发生在1973年皮诺切特(Pinochet)的“小9·11”政变之后(正好是布雷默宣布建立伊拉克政权前三十年零一天)。反对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民选政府的政变由国内经济精英推动，他们感到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倾向会危及他们。这次政变得到美国企业、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支持。政变暴力镇压了一切左翼社会运动和组织，取缔了各种形式的民众组织(包括贫民区的社区卫生中心)。劳动力市场从管理或制度约束(如工会)中“解放”出来。但是该如何复苏停滞的经济？之前在拉丁美洲发展经济时占据主导的进口替代政策(通过财政援助或关税保护促进民族企业)已经声名狼藉，尤其是在智利，这些措施在那里从未奏效。随着全球经济萧条的到来，人们吁求一种新的途径。

一批以“芝加哥帮”(the Chicago boys)著称于世的经济学家

① G. 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 2002, A3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可参下述网址：www.whitehouse.gov/nsc/nss。

（因为他们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关系密切）被召集起来帮助重建智利经济。他们被选拔的过程很有趣。美国自1950年代起便资助智利经济学家，让他们到芝加哥大学进行培训，这项目是为平衡拉丁美洲左翼势力的冷战计划中的一部分。在芝大受到培训的经济学家逐渐在圣地亚哥的天主教私立大学占据主导。1970年代初期，经济精英通过一个名为“星期一俱乐部”（the Monday Club）的团体组织起来，反对阿连德政府，并与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工作关系，由研究机构资助他们的工作。在皮诺切特政治上的对手、凯恩斯主义者古斯塔夫·雷将军（General Gustavo Leigh）于1975年被逐出政府后，皮诺切特将这些经济学家引入政府，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贷款。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工作的过程中，这些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论重组了智利的经济结构。他们中断了国有化进程并将公共财产私有化、开放自然资源（水产业、木材等等）给私人开采且对剥削不加管制（在很多情况下对当地居民的要求置之不理）、将社会保险私有化、促进国外直接投资和更自由的贸易。这保障了外国公司有权将其在智利的获利转回本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取代了进口替代型发展。保留给国家的仅有部分是主要资源铜（正如伊拉克的石油）。这被证明对国家财政预算的稳定非常关键，因为铜收入完全流入国库。智利经济在增长率、资本积累、外资的高盈利率等方面的快速复苏只是昙花一现。它在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上就出了大问题。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出于更为实际的目的而非意识形态考虑，诸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实施。所有这些，包括实用主义在内，为随后（撒切尔领导的）英国和（里根领导的）美国在1980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外围地区进行的残酷实验

9

随后成为中心地区政策规划的样本(正如根据布雷默法令在伊拉克实验“单一税制”)，这并非第一次。①

两次如此明显的对于国家机器的类似重建，发生在如此不同的时间和如此不同的地区，却都是在美国的强制性影响下进行，这一事实表明：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迅速增加，背后都藏着美帝国主义的利爪。虽然这一点无疑是过去三十年的情况，但绝不是事情的全部，智利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国内部分就表明了这一点。况且，并不是美国迫使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走上新自由主义先驱的道路。也不是美国迫使中国在1978年制定一条自由化之路。1980年代的印度和1990年代初的瑞典部分地向新自由主义化迈进，原因也不能简单归到美帝国主义头上。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舞台上不均衡的地理发展显然已成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包含了多重决定因素(multiple determinations)而不是一些骚动和混乱。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又是什么力量使之在全球资本主义内部占据如此霸权地位?

为什么有新自由主义转向?

二战后，重新设计国家形式和重新建构国际关系，都旨在防止再次出现1930年代的灾难状况，当时的大萧条极大威胁到资本主义秩序。这些重建同时要防止一度导致战争的国家间地缘政治

① M. Fourcade-Gourinchas and S. Babb,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Paths to Neoliberalism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2002), 542 - 549; J. Valdez, *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 Luder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Divestiture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ase of Chil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93), 98 - 121.

冲突再次出现。为确保国内和平稳定，资本家和劳工之间就必须做出某种阶级妥协。当时这一思想的最佳再现或许是两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查尔斯·林伯隆(Charles Lindblom)——出版于1953年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他们指出，传统形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国家、市场和民主制度之间的恰当融合，以确保和平、包容、幸福和稳定。①在国际层面，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建立了一种新型世界秩序，而多种机构——诸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建立则是为了稳定国际关系。在由美元以固定价格兑换黄金所确立的固定汇率体系下，商品的自由贸易得到鼓励。固定汇率与必须受到控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无法兼容，但要想使美元发挥全球储备货币的职能，美国就不得不允许美元超出国界自由流动。这一体系借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伞而存在，仅有苏联和冷战限制了它的全球扩张。

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出现了多种社会民主制国家、基督教民主国家以及统制国家(dirigiste state)。美国自己转向了自由民主国家形式，而日本在美国的严密监视下建立了名义上民主、实则高度官僚化的国家机器，负责看管国家的重建。上述各种国家形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同意，国家应该关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民福利，而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国家力量应该按照市场过程进行自由配置，或在必要时介入甚或取代市场过程以进行干预。一般被冠以“凯恩斯主义”(Keynesian)之名的财政和货币政

① R. Dahl and C. Lindblom, *Politics, Economy and Welfare: Planning and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es* (New York: Harper, 1953).

策被广泛用来抑制经济周期、确保合理的充分就业。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大体上得到支持，被认为是国内和平稳定的主要保障。国家积极干预产业政策，通过建立种种福利体系(医疗卫生、教育等等)为社会工资制定标准。

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如今通常被称为“镶嵌型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以表明市场进程和企业公司活动处于社会和政治约束的网络之中，处于监管的环境之中——这种网络和环境有时限制了，但更多情况下是引导了经济和产业策略。①政府主导型计划以及有些情况下重要部门归国家所有(煤、铁、汽车)，都并不罕见(例如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新自由主义计划则要使资本从这些约束中“脱嵌”出来。

1950 年代与 1960 年代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镶嵌型自由主义产生了高经济增长率。②这要部分归功于美国的慷慨，它时刻准备好面对国际收支赤字，并准备好把所有过剩产品收入自身。这一体系的好处包括扩大出口市场(最明显的是对日本，但也不均衡地遍布南美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但是试图将“发展”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努力却受到很大阻碍。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非洲而言，镶嵌型自由主义还属于白日梦。1980 年以后朝向新自由主义化的发展也未能给他们落后的状况带来实质改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分配的政治(包括对工人阶级工会力量进行某种程度的政治整合与对劳资双方谈判的支持)、对资本自

① S.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M.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P. Armstrong, A. Glynn, and J.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Long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由流动的控制(特别是通过资本控制实行某种程度的金融抑制)、扩大公共支出和福利国家建设、经济领域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及某种程度的发展计划——这些都与较高的增长率携手并进。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周期得到成功控制。干预型国家的一系列活动促成了一种社会和道德的经济(有时由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所支持)。实际上，国家成了一个把阶级关系内在化的较劲场所。工人阶级的组织(诸如工会和左翼政党)在国家机器内部发挥了切实的影响。

12

到1960年代末，镶嵌型自由主义在国际和国内经济领域都面临垮台。资本积累的严重危机的信号随处可见，各地的失业和通胀现象此起彼伏，宣告一次波及全球、几乎持续了整个1970年代的“滞胀”即将到来。各国的财政危机(例如，英国1975—1976年不得不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造成税收大幅下滑，社会支出急速增长。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再奏效了。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及欧佩克(OPEC)1973年的石油禁运令之前，由黄金储备支撑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便岌岌可危。资本借以穿越国界流动的缝隙，给固定汇率体系带来很大压力。美元已在世界上泛滥，而贮藏在欧洲银行里的美元并不受美国控制。因此，固定汇率在1971年被放弃了。黄金不再充当国际货币的金属基础；汇率能够浮动，尝试控制浮动的努力马上就告失败。曾经至少在1945年之后为发达资本主义带来高增长率的镶嵌型自由主义显然穷途末路，不再奏效了。为克服危机，人们就需要找到某种替代性方案。

一种方案是通过社团主义的种种策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包括在必要时借助节俭手段、收入政策，甚至工资和价格控制，以限制劳工的期望和群众运动)。这种方案受到欧洲社会

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并且希望在像共产主义治下的意大利“红色波隆纳”（Red Bologna）等地开展创新性的治理实验，希望葡萄牙在法西斯主义倒台后经历革命性转型，希望向更开放的市场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方向发展——特别是意大利（在贝林格［Berlinguer］①的领导下）和西班牙（在卡里略［Carrillo］②的影响下），或希望斯堪的纳维亚稳固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传统能够得到扩展。左翼在上述方案下集合了相当多的民众力量，几乎在意大利执掌大权，事实上也在葡萄牙、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获得了国家权力，同时也在斯堪的纳维亚维持了权力。甚至在美国，一个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也在1970年代初批准了一系列调控改革措施（由共和党主席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签署，他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管理方方面面的事务，从环境保护到工作安全、卫生、公民权和消费者保护。③但是，左翼未能超越传统社会民主式的和社团主义式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在1970年代中期被证明与资本积累的要求不符。结果就是双方辩论的激化：一方是支持社会民主和中央计划的人（这些人掌权时通常以试图限制他们自己选民的热情而告终——这么做往往有其实用主义的理由——就像英国工党的情况），另一方是那些关心解放企业和商业权力与重建市场自由的利益集团。到1970年代中期，后者的利益走到前台。但是，使资本积累重新活跃起来的那些条件是如何被恢

13

① Enrico Berlinguer（1922－1984），意大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和理论家之一。——译者

② Solares Carrillo（1915－　），西班牙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之一。——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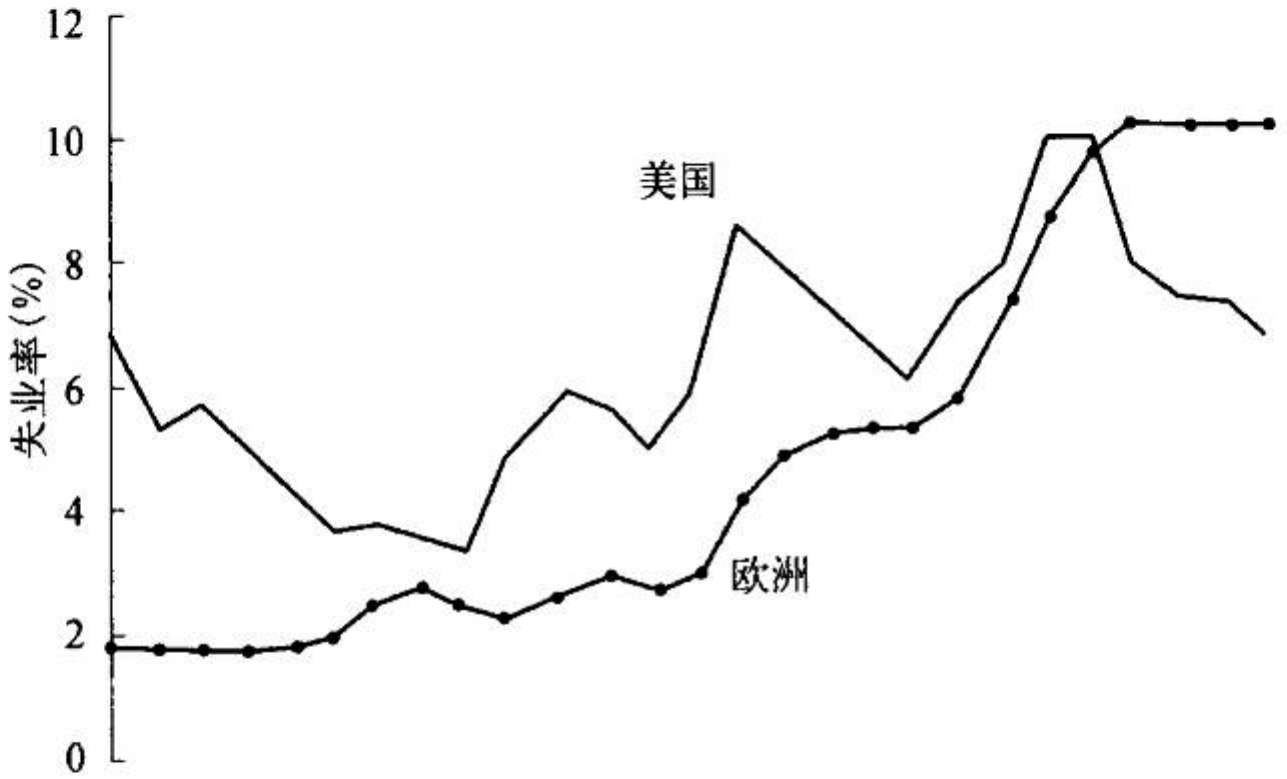
③ G. Eley,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复的呢?

新自由主义如何以及为何以唯一方案的胜利者姿态出现,是我们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回过头看,似乎这个方案既显而易见又势所必至,但我觉得公平点说的话,当时没有人确切知道或有把握说何种方案可行、如何操作。资本主义世界在磕磕绊绊走向新自由主义化的方案之时,经历了一系列迂回曲折的过程和混乱的经验,只有当1990年代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共识”表述出来以后,这些过程和经验才真正汇聚成一种新的正统。那个时候,克林顿(Clinton)和布莱尔(Blair)都能轻易颠倒尼克松早前的话,说一句“我们现在都是新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不均衡的地理发展,以及它时常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形态之间呈现有偏向的不平衡运用,都证明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尝试性特征,并证明各种政治力量、历史传统和现有制度安排都以复杂的方式表明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如何以及为何会真的发生。

14 然而,在这一过渡期中有一项因素值得特别关注。每个人都因失业率上升和快速通胀而受到了1970年代资本积累危机的影响(图1.1)。不满情绪广泛蔓延,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和城市社会运动的结合似乎隐约暗示着一种社会主义替代性方案的

15 出现,以取代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社会妥协——这种妥协在战后曾成功地为资本积累打下基础。在欧洲许多地方,甚至在美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开始发展壮大(如果不是开始夺权的话),群众力量激烈要求大规模的改革和政府干预。这一回,所有经济精英与统治阶级都感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威胁,不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像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例如,瑞典提出了“雷恩-梅德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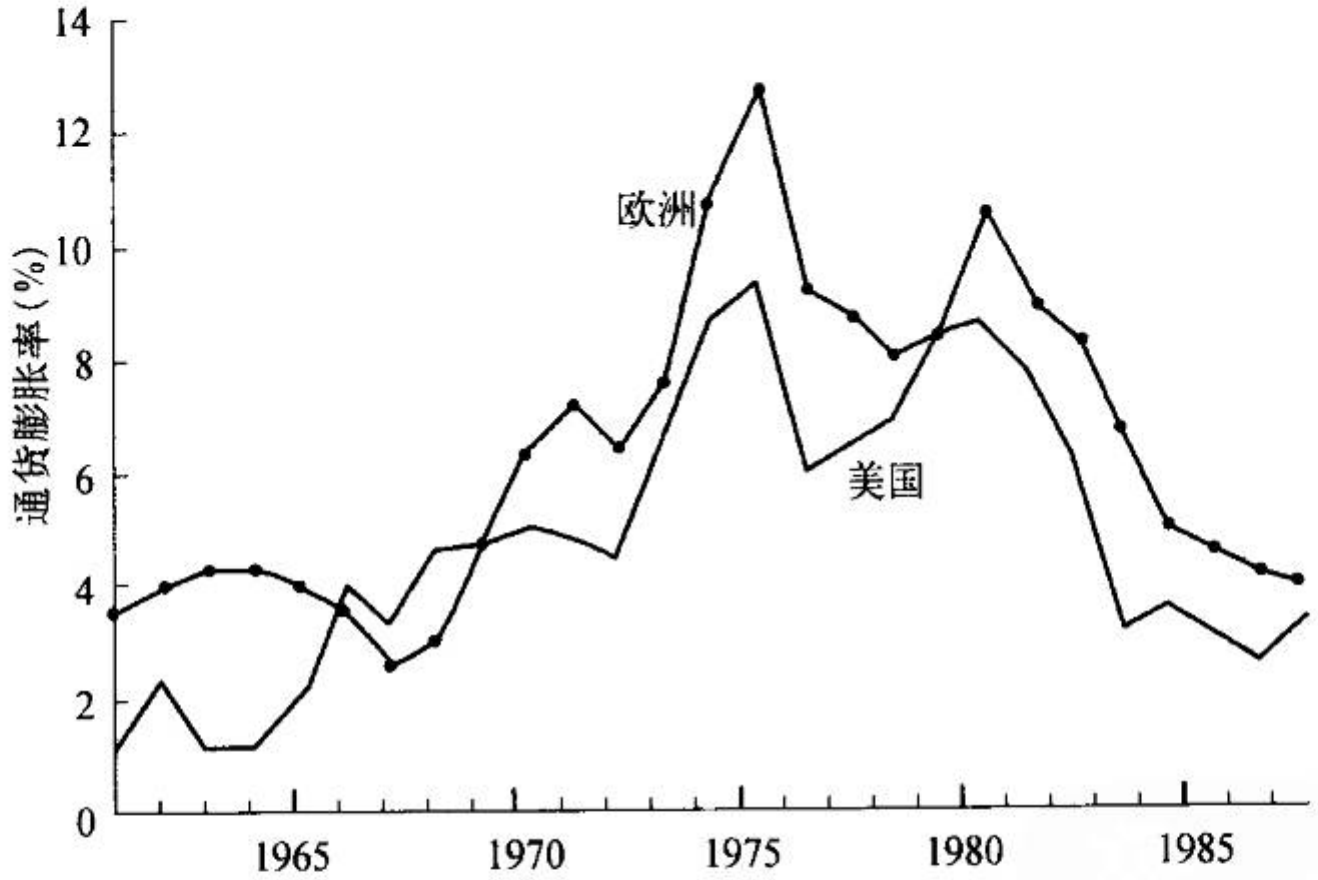


图 1.1：1970 年代经济危机：美国和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情况，1960—1987

来源：哈维：《后现代的状况》

计划”（Rehn-Meidner plan），逐步收购企业主拥有的股份，并逐步将国家转为工人民主制或集体所有民主制。但除此之外，对统治精英和统治阶级地位的经济威胁也愈加明显。几乎所有国家在战后安排上都有一个特点，即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受到限制，而劳工则在经济馅饼上分得很大一块。例如，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从战前占国民收入的16%跌落到二战结束时的8%不到，这个水平几乎保持了三十年。经济增长稳定的时候，这种限制似乎无伤大雅。在一个越来越大的馅饼上占有稳定的份额，这是一回事。但是，当经济发展在1970年代崩溃、实际利率呈负增长、股息和利润少得可怜时，各地的上层阶级都感到了威胁。在美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对财富（与收入相对）的控制在整个二十世纪都保持了相对稳定（图1.2）。但在1970年代这一控制却随着资产价值（股份、地产、储蓄）的下跌而迅速跳水。上层阶级不得不做出决断以保护自己免于政治和经济的失利。

智利政变和阿根廷的军事接管——两者由国内得到美国支持的上层阶级推动——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智利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证明，复苏资本积累所得的好处在强制私有化过程下发生了非常大的偏差。国家和统治精英——还有境外投资者——在起初都过得非常好。事实上，再分配效果和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的必然特征，亦是整个计划的结构性因素。杜梅内尔（Gérard Duménil）和列维（Dominique Lévy）经过仔细重组数据后总结说，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1970年代后期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开始迅速上升，在二十世纪末达到了15%（现刚接近于他们在二战前所占的份额）。美国收入最高的0.1%人口，其收入从1978年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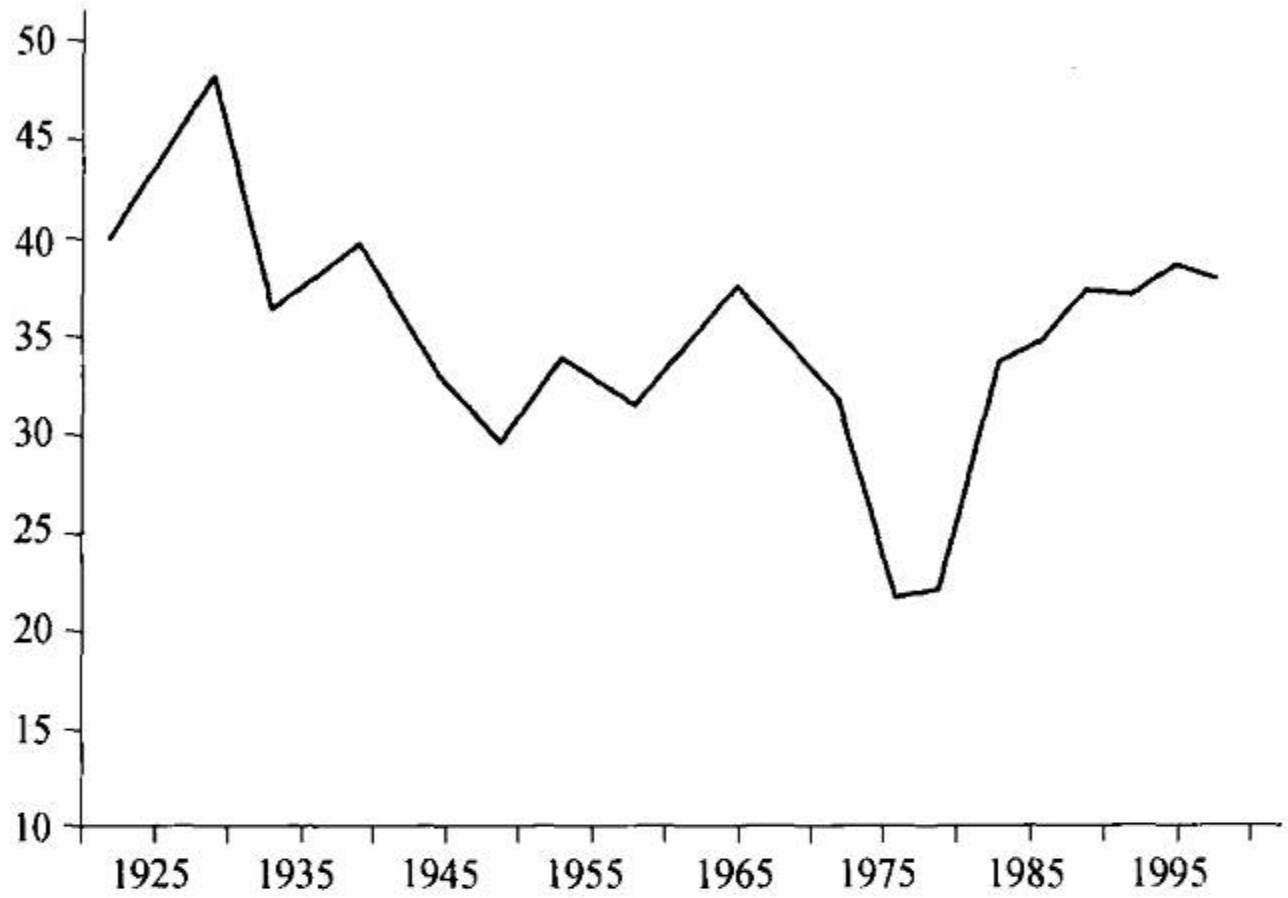


图 1.2：1970 年代的财产滑坡：美国收入最高的 1% 人口所持资产份额，1922—1998

来源：杜梅内尔和列维：《资本的复苏》

国民收入的2%上升到1999 年的6%以上，而工人与行政总裁的平均收入比率则从 1970 年的 30 ：1 上升到了 2000 年的将近500 ：1（图1.3 与1.4）。几乎可以肯定，随着布什政府的税收改革开始生效，收入和财富集中到社会上层阶级的现象将逐步上升，因为遗产税（一项针对富人的税收）正在被逐步取消，加在投资收益和资本收益头上的税收也正在减少，但针对工资薪水的税收则维持原状。① 17

① G. Duménil and D. Lévy, 'Neoliberal Dynamics: Towards A New Phase?', in K. van der Pijl, L. Assassi, and D. Wigan (eds.), *Global Regulation: Managing Crises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1 - 63. 亦见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T. Piketty and E.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 - 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2003), 1 -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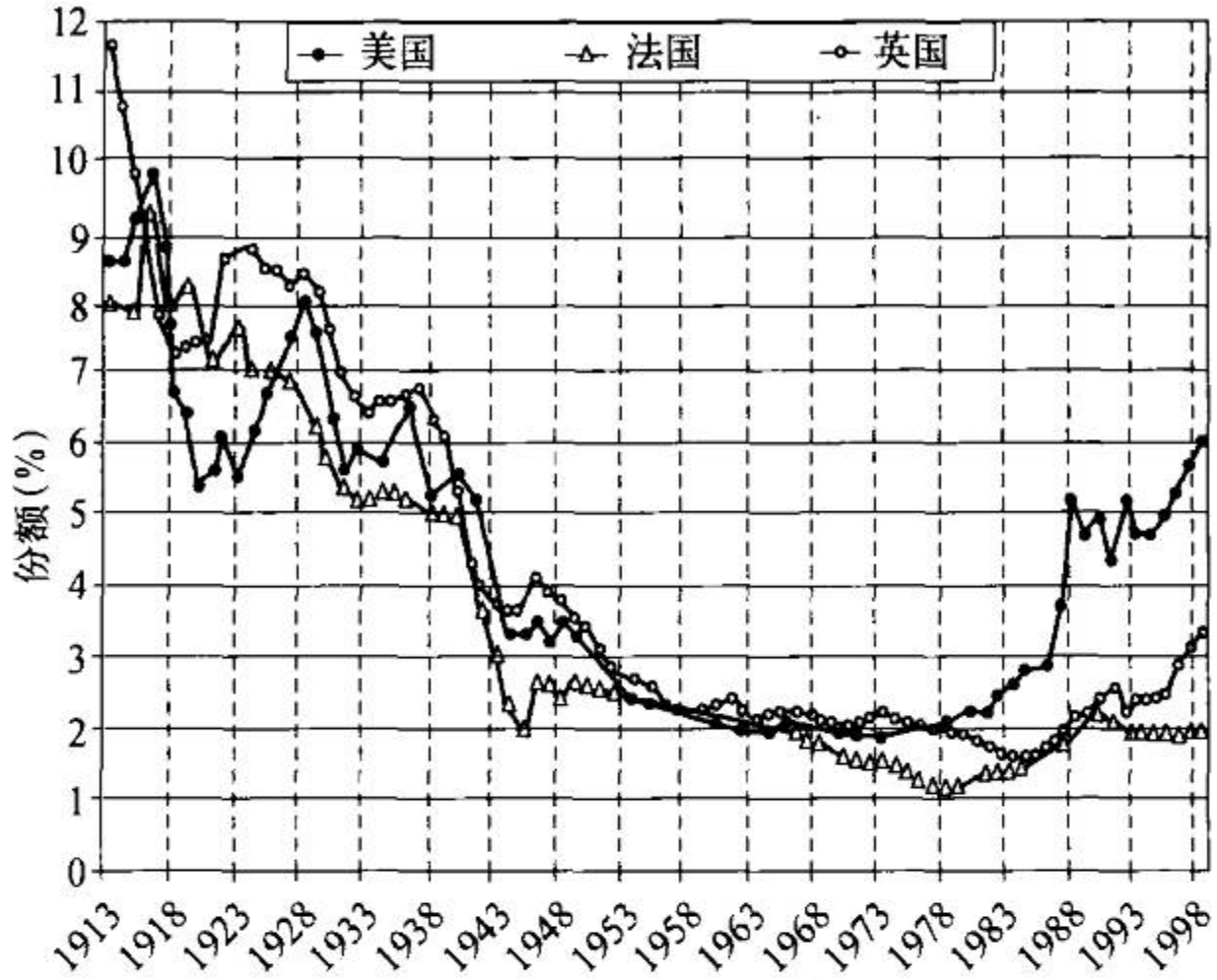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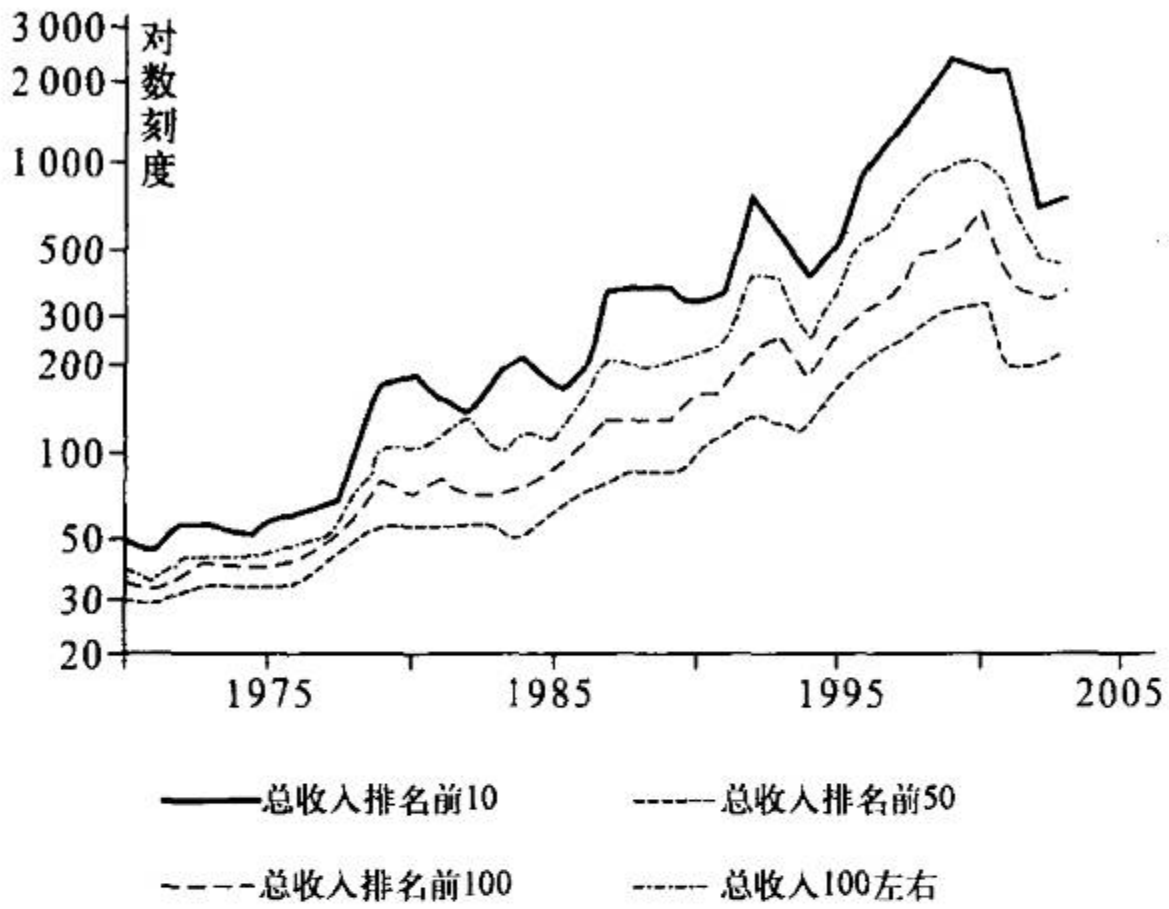


图 1.3：阶级权力的恢复：美国、英国和法国收入最高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1913—1998

来源：不平等与美国民主研究组：《日益不平等时代下的美国民主》

在这方面美国不是特例：英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的份额从1982年起翻了一倍，从6.5%到13%。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财富和权力都出现了惊人的集中现象。俄罗斯在199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后，出现了一个规模虽小却非常强势的寡头集团。中国在开始自由市场导向的实践后，极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也开始产生。墨西哥1992年后的私有化浪潮使一小撮人（例如卡洛斯·斯里姆［Carlos Slim］①）几乎一夜之间登上福布斯世界富人榜。就全球来说，“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在社会不平等方面呈现出

① Carlos Slim(1940－)，墨西哥商人，掌控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许多电子公司。——译者



前三条曲线显示行政总裁们依据其薪资等级(第10、50、100)所得的上升。另一条曲线(------)对应的是100位更高薪资的行政总裁的平均所得。注意，1 000表示平均工资的1 000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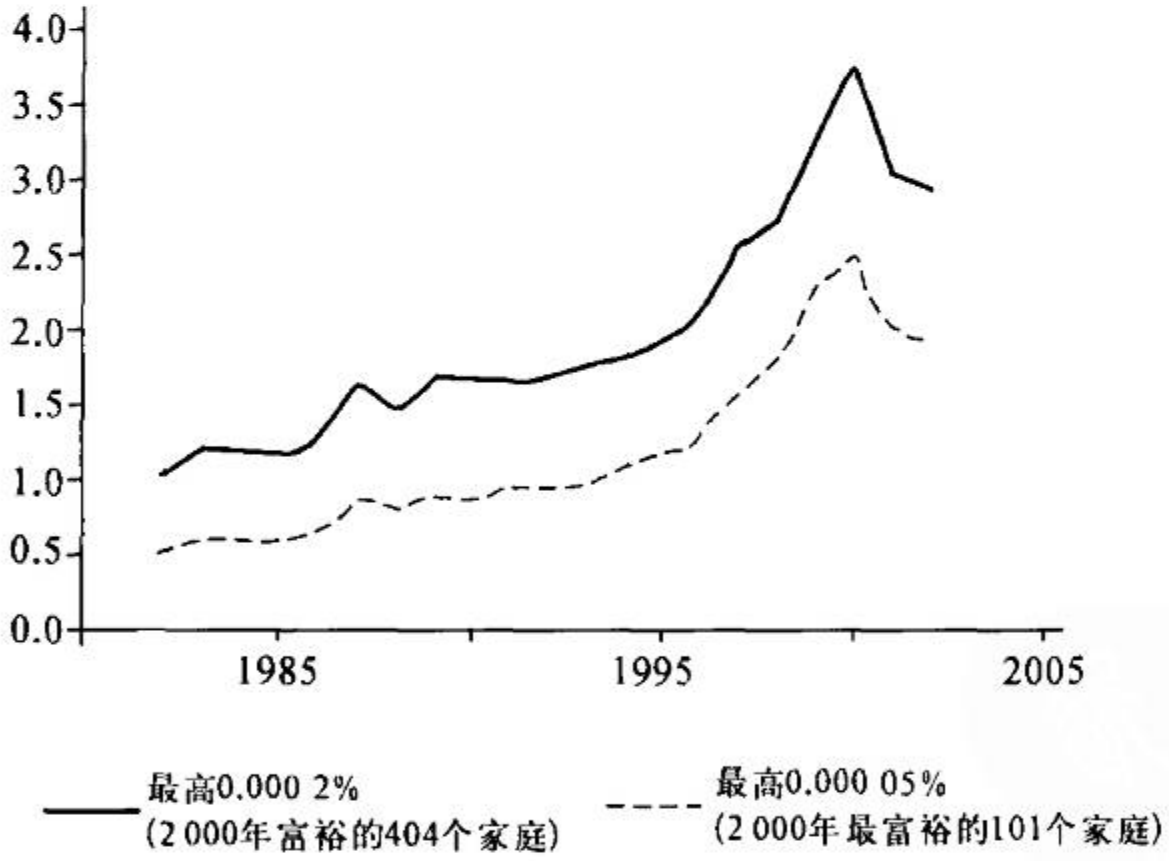


图 1.4：美国财富和收入的集中：行政总裁薪资与美国平均工资的关系，1970—2003；最富裕家庭的财产份额，1982—2002

来源：杜梅内尔和列维：《新自由主义收入趋势》

急剧增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诸国也在1980年代后呈现出巨大的不平等”，而“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与生活在
19 最贫穷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比，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上升到1997年的74：1”。①尽管这一趋势存在例外(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仍然将收入不平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像法国那样——见图1.3)，这一证据有力表明新自由主义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精英力量的恢复或重建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将新自由主义化解释为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接下来，我将表明上述两个目标中，后一方面实际上占据主导。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在重新激活全球资本积累方面并不非常奏效，但这一过程却在恢复、或某些情况下(如在俄罗斯和中国)创造经济精英的权力方面，卓有成效。我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论述在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证明任何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此外，这一证据表明，在新自由主义原则与恢复或维持精英权力相冲突的时候，这些原则就会被抛弃或歪曲至不被承认的地步。这当然不是要否认理念的力量，即其能够扮演推动历史和地理发生变化的力量。但是，上述方面的确显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力量和新自由主义化的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着创造性张力，而那些具体实践在过去三十年内已经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

---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危机的潜在方案，以及一项疗治资本主义疾病的方案，长期以来就潜伏于公共政策中。一个由热情鼓吹者所组成的排外小团体——主要包括学院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围绕著名的奥地利政治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聚集起来，于1947年创建了(他们在瑞士度假村首次碰面后命名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其中知名人物包括米塞斯［Ludvig von Mises］、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甚至一度包括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这一学社的成立宣言如下：

文明的核心价值岌岌可危。在地球上广大地区，维系人性尊严和自由的核心条件已告阙如。在其他地区，这些条件正受到来自政策发展趋势的不断威胁。个体和自发性团体的位置正逐步被专制权力的扩张所瓦解。甚至最值得珍视的西方人的财富——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受到了一些信条的威胁(这些信条处在非主流位置上时，要求宽容的特权)，它们试图建立起一个权力立场，借以压制和抹去所有与己见不合的观点。

本学社认为，上述发展过程受到两方面推动，一方面是一种否认一切绝对道德标准的历史观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那些质疑法律规则之可取性的理论的发展。本学社进一步认为，上述发展过程的助长，也源于人们丧失了对私有权和竞

> 争市场的信念；因为，没有这些制度所带来的权力分散和创新精神，就很难设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障自由。①

这个集团的成员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在传统欧洲的用法上），因为他们根本上信奉个人自由的理想。新自由主义的标签表明，他们支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则，后者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归功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②、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③、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④的著作)，取代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古典理论。但是，学社成员也同意亚当·斯密的看法，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调动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诸如贪吃、贪婪、对财富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激烈反对政府干预理论，诸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论——后者在1930年代应对大萧条时曾居显赫地位。二战后许多政策制定者到
21 凯恩斯理论那里寻求指引，帮助他们设法控制经济周期和衰退。新自由主义者甚至更激烈地反对国家中央计划的理论，诸如奥斯卡·兰格⑤(Oscar Lange)提出的那些接近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利益集团势力的卷入(像工会、环境保护主义

---

① 见网址 http：//www.montpelerin.org/aboutmps.html。

② 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当代经济学的创立者。——译者

③ 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译者

④ Leon Walras(1834－1910)，法国数学经济学家。——译者

⑤ Oscar Lange(1904－1965)，波兰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译者

者或贸易游说集团），政府决策必然在政治上有所偏袒。政府有关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决策注定错误，因为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无法与市场信号所包含的信息对称。

正如一些论者指出，这种理论框架并不完全自洽。①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严密性并非严丝合缝地与其政治上的个人自由理念相合，而其对一切政府力量的不信任前提，也与如下要求不合：要求一个强大且在必要时具强制性的政府，保护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企业自由。在法律面前将企业规定为个人，这一法律伎俩使铭刻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铜牌上的约翰·洛克菲勒信条显得颇为反讽，上面第一条写着“个人价值至上”。我们将会看到，新自由主义立场所产生的大量矛盾使得逐步开展的新自由主义实践（面对如垄断权力和市场失败等事件）变得走样，离貌似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相去甚远。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考察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

写过像《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等重要著作的哈耶克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为理念而进行的斗争至关重要，这场不仅针对马克思主义而且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和凯恩斯干预主义的斗争，可能要花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获胜。朝圣山学社获得了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一个由那些心底里反对一切形式政府干预和管制，甚至反对国际主义的富人和企业领导所组成的力量集团，力图组织起来反对一种他们视之为寻求混合经济的新兴共识。由于担心二战期间与苏联的联合以 22

① 睿智的评论见 H. J. Chang, *Globalis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London: Zed Books, 2003)。但正如 Peck 的‘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指出，新自由主义经常吸收其他因素到自身框架之内，因此很难将其视之为一种“纯粹”的理论。

及美国内部建立起来的指令型经济可能会在战后政治格局中破产，他们准备将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完全纳入到新自由主义智囊中，以保护和提升自己的权力。但在1970年代的艰难岁月到来之前，这一运动一直处在政策和学界影响力的边缘。直到那个时候，这一运动开始位居中心舞台，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诞生了各种资金雄厚的智囊团（均衍生自朝圣山学社，诸如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in London］和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in Washington］）；这一运动在学界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特别是在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导的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理论由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受到学界的尊敬。这一特殊奖项尽管披上了诺贝尔奖的光环，却和其他奖项不同，它是受到瑞典的银行界精英牢牢掌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在其货币主义的面具下）开始在许多政策领域发挥实际影响。例如，在卡特总统任期内，经济松绑就成为解决整个1970年代美国周期性滞胀的方案之一。但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层面调节公共政策的新经济正统，其地位的巩固始于1979年的美国和英国。

此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政策当选英国首相。受到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他是一位非常活跃而忠实的政论家，且和经济事务所这个新自由主义机构有密切关系——的影响，撒切尔夫人承认必须抛弃凯恩斯主义，并且同意货币主义的“供给学说”（supply-side）方案对于解决1970年代困扰英国经济的滞胀非常关键。她认识到这几乎意味着财政和
23 社会政策方面的革命，并立即签署了一项决议，处理1945年后在英国巩固起来的社会民主国家的机构和政治道路。这就意味着对抗工会力量、攻击一切阻碍竞争性活力的社会团结形式（诸如那些

通过市政管理体现的形式，包括许多员工及其社团的力量）、撤销或免去福利国家的义务、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包括社会住房）、降低税收、鼓励创业积极性、创造良好的商业氛围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特别是日本的投资）。她的著名宣言是："没有社会，只有个体的男人或女人"——后面还加一句："以及他们的家庭"。所有形式的社会团结都要因个人主义、私有权、个人责任和家庭价值的理由而瓦解。这种从撒切尔夫人的修辞技巧中流露出的意识形态攻击冷酷无情。①她说："经济是手段，但目的是为了改变灵魂。"她的确做到了，尽管全然不是靠完整和全面的手段——且不提政治上的代价。

1979 年 10 月，卡特（Carter）总统在任时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保罗·沃尔克对美国货币政策进行大幅度改革。②长期以来在美国自由民主国家奉行的"新政"（New Deal）原则——广泛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充分就业为根本目标——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旨在不惜以带来就业问题为代价而遏制通胀的政策。在 1970 年代通胀达到两位数时曾呈现负增长的实际利率，通过联邦储备的法令而呈正增长。（图 1.5）名义利率在一夜间上升，并在一系列震荡后于 1981 年 7 月稳定在 20%左右。由此开始了"漫长而严重的经济衰退期，在美国造成工人失业、工会分裂，债务国濒临破产，开启了漫长的结构性调整的时代"。③

后来被人们称为"沃尔克休克法"的手段必须被视作一项必要

---

① 关于撒切尔夫人走向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前前后后，见 D. Yergin and J.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② L. Panitch and S. Gindin,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in *The Empire Reloaded: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London: Merlin Press, 2005) 46 - 81.

③ D. Henwood, *After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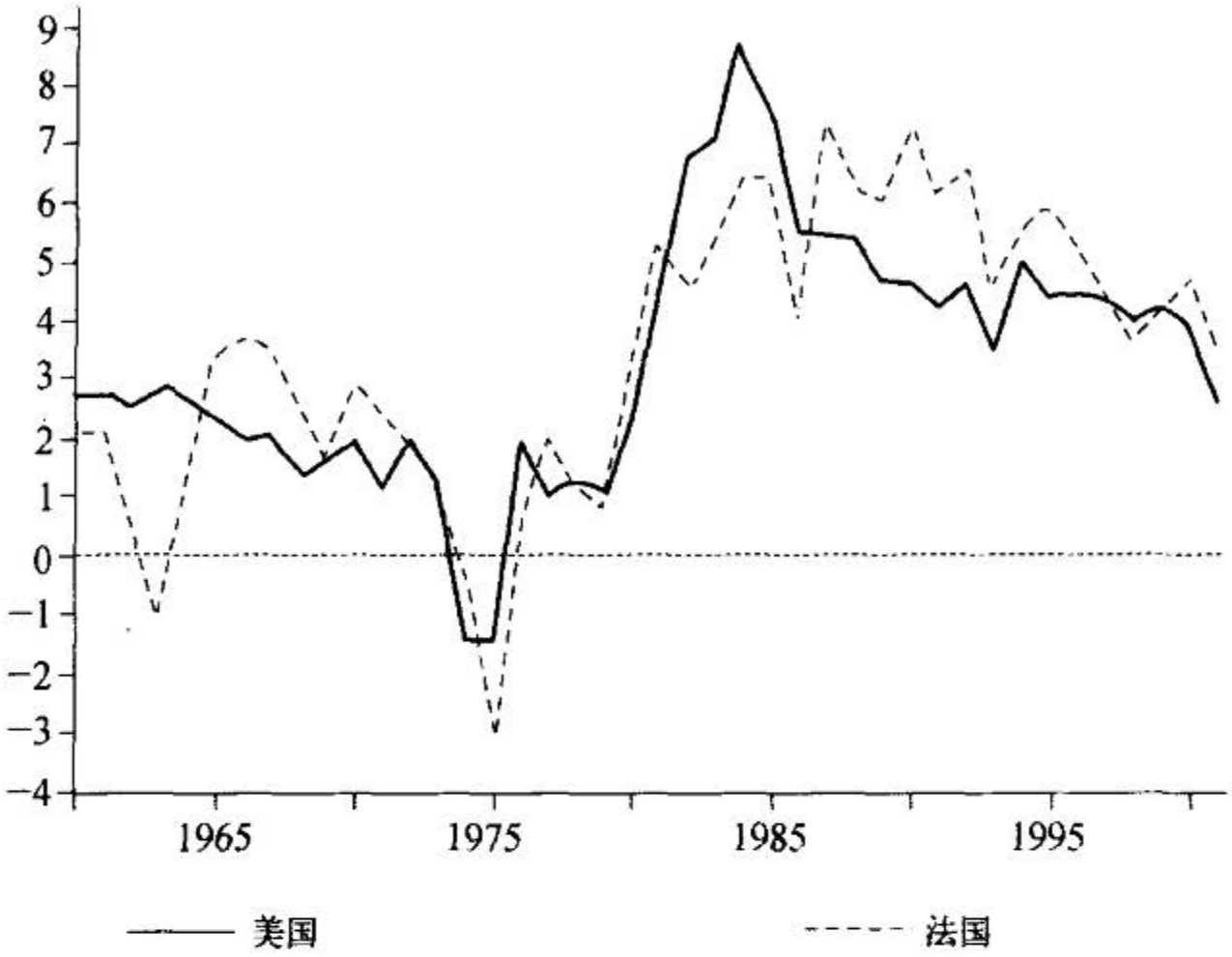


图 1.5：“沃尔克休克法”：美国和法国的
实际利率波动，1960—2001

来源：杜梅内尔和列维：《资本的复苏》

24 但不充分的新自由主义化条件。一些中央银行长期强调反通胀财政责任，并采取了许多更接近于货币主义而非凯恩斯主义正统的政策。就西德的情况来说，此举源于对 1920 年代摧毁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通胀失控（为此后法西斯主义抬头埋下伏笔）记忆犹新，以及对二战结束时发生的同等破坏力的通胀记忆犹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致力于反对产生过多债务，并推动了（如果不是规定了）附属国的财政控制和预算节制。但在所有上述情况中，这种货币主义均与下述方案齐头并进：认可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政治上奉行建设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因此，新自由主义转向不仅依靠采纳货币主义，而且依靠政府在其他许多领域实施政策。

里根在 1980 年与卡特的竞争中胜出，这一胜利非常关键——虽然卡特已经谨慎地向（航空和运输业）松绑方向迈出，以作为应

对滞胀危机的部分方案。里根的参谋们相信沃尔克的货币主义“药方”对于医治病态和停滞的经济很管用。沃尔克得到支持并再次被任命为联邦储备局主席。里根政府接着便凭借进一步松绑、税收减免、攻击工会与员工势力，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在1981年一次漫长而激烈的罢工中，里根彻底压制了航运管理组织(PATCO)。这表明在沃尔克引起的经济衰退造成高失业率(10%或更高)的同时，有组织的劳工势力受到了全面打击。但是PATCO不仅是一个常规工会：它是一个白领工会，具有技术员工组织的特点。因此，它是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工会主义的标志。劳工状况由此受到重创——下述事实是很好的说明：联邦最低工资由1980年与贫困线持平，到1990年降低至贫困线以下30%。由此开始了实际工资水平严重下跌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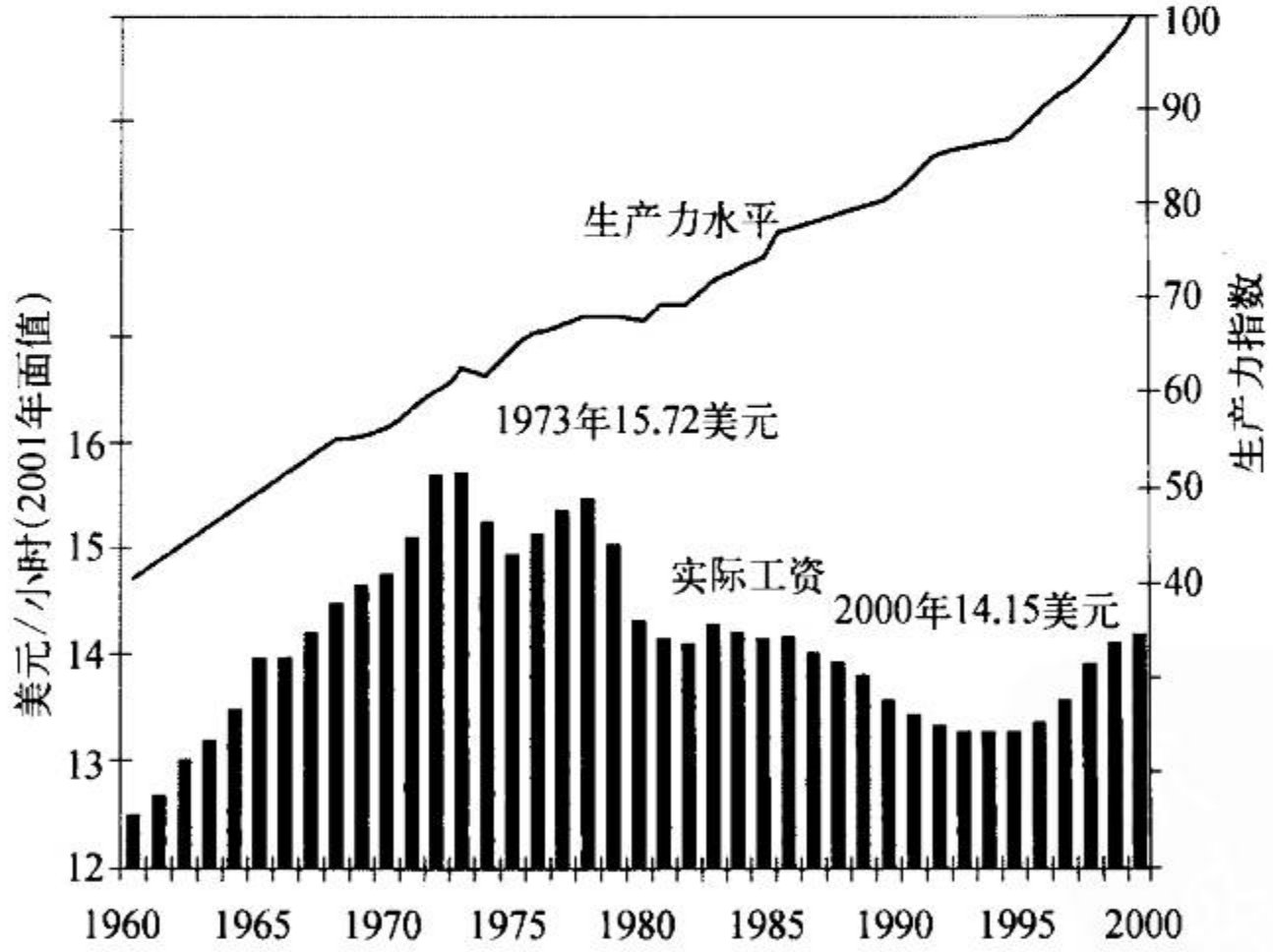


图1.6：对劳工的打击：美国实际工资与生产力,1960—2000

来源：波林(Pollin)：《衰落的轮廓》

里根在诸如环境管理、工作安全、卫生医疗等事务上对权力部门的任命，将对抗大政府的战役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航空、电信到金融，一切领域的松绑为强大的企业利润打开了不受管束的市场自由新天地。投资赋税的减免有效帮助资本从具有工会组织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向未形成工会且不设管制的南部和西部地区转移。金融资本愈加向海外进发，寻找高额收益率。在国内进行去工业化而把生产移到国外，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意识形态上被描绘为促进竞争与创新的市场，成为巩固垄断权力的工具。企业税收得到大幅裁减，而最高个人税率在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税收减免”中由70%降至28%(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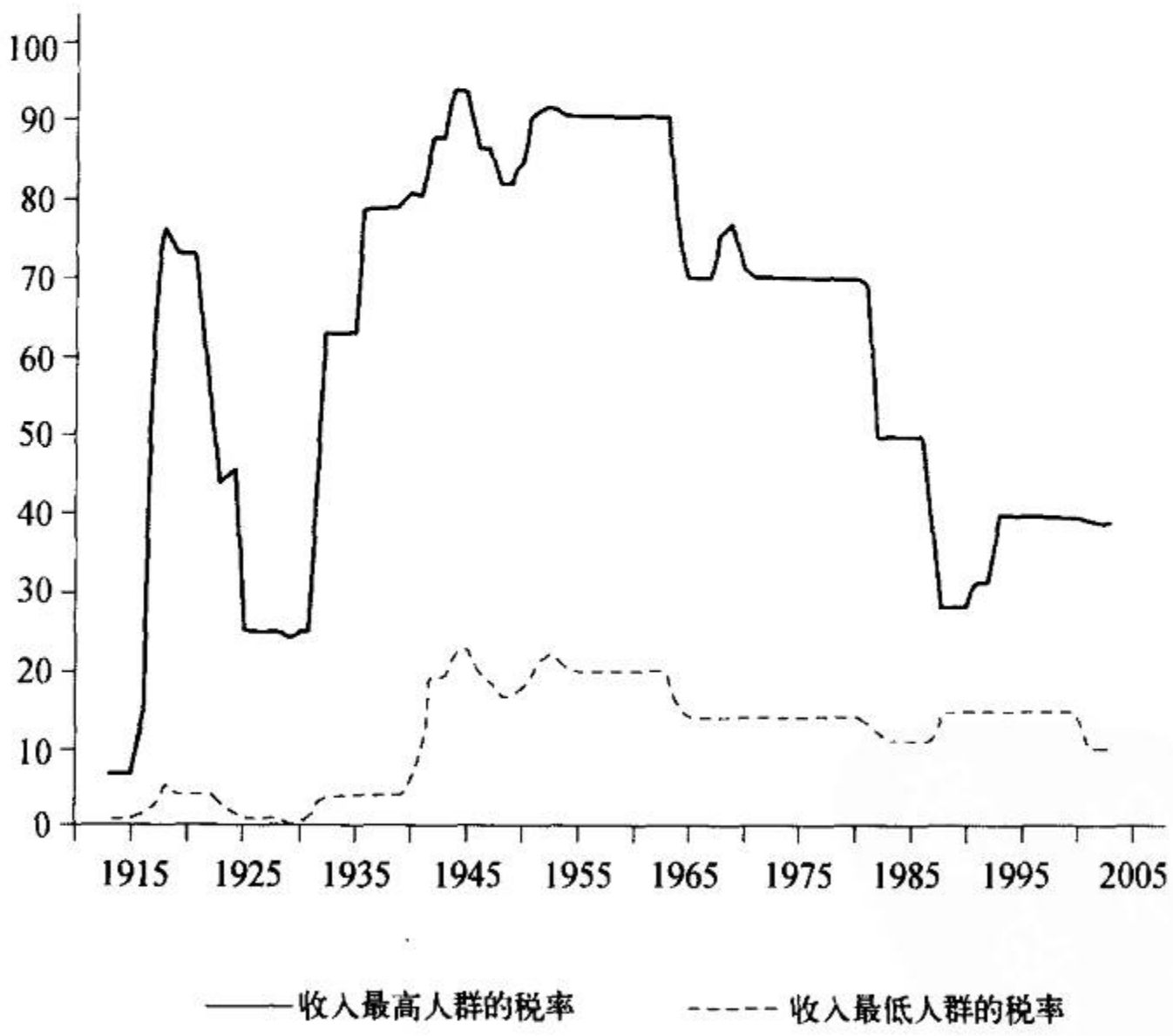


图1.7：上层阶级税收起义：美国收入最高与最低人群的税率,1913—2003

来源：杜梅内尔与列维：《新自由主义收入趋势》

由此开始的重要转折，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进一步重建上层阶级的经济力量。

然而，还有一个随之而来的转折也推动了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化浪潮。欧佩克石油价格随着1973年石油禁运令而飙升，致使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布扎比等石油生产国获得了大量财力。 27
我们如今从英国情报报告了解到，美国曾在1973年积极筹备对上述国家发动战争，以恢复石油流通、压低石油价格。我们还知道，大概迫于美国的军事压力(如果不是公开威胁的话)，沙特阿拉伯当时同意通过纽约投资银行回收其全部石油美元。①这些银行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动用大量所需基金以寻求获利渠道。考虑到1970年代中期衰颓的经济状况和低收益率，在美国国内进行选择并不理想，更有利可图的机遇应该到海外寻找。政府看起来是最安全的投资，因为按照花旗银行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的著名说法，政府不可能移动或消失。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又资金匮乏、急于借贷。然而，还需要的一个条件是为贷款确保开放的通道和相当安全的环境。纽约投资银行求助于美国的帝国主义传统，为新的投资机遇创造空间并保护境外业务。

美国的帝国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并在某种程度上自视为与其他帝国主义传统——英国、法国、荷兰及其他欧洲势力——针锋相对。②虽然美国在19世纪末也曾进行过一些无关大局的殖民征

---

① L. Alvarez, 'Britain Says U. S. Planned to Seize Oil in '73 Crisis', *New York Times*, 4 Jan. 2004, A6. 关于通过美国回收石油美元的沙特协议，见 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20。

② 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N.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N. Smith, *The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服，它却在二十世纪发展出一种没有殖民地且更为开放的帝国主义体系。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尼加拉瓜，当时美国部署海军保护其利益，但却卷入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由桑地诺(Sandino)[①]领导的游击队叛乱斗争中。此事的最终解决是靠找一名当地的铁腕人物——在这次事件中是苏穆萨(Somoza)——并给他和他的家庭以及亲密盟友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便他们能镇压或笼络反对者，为自己积累相当数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要始终保持本国对美国资本业务的开放和支持，在必要时也应推动美国在本国和在整个地区中(尼加拉瓜事件中是中美洲)的利益。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坚持的全球去殖民化运动迫使欧洲势力放弃殖民政策，上述模式得以开展。例如，中央情报局于1953年在伊朗策划政变推翻民选的穆萨迪克(Mosaddeq)政府，并让伊朗国王上台，后者和美国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石油合约(并且没有将资金返还给先前由穆萨迪克政府收归国有的英国企业)。伊朗国王还成为中东石油地区主要的美国利益看管人。

许多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国家在战后都是通过此类手段受到美国统治。这成为应对共产主义起义和革命威胁的办法，但却使得美国采取一种反民主(甚至更显然的是反大众、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从而越来越和镇压性军事专政和独裁政府结盟(最明显的当属拉丁美洲各处)。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中的故事充斥着这类事件罪恶而不光彩的细节。在与国

① Augusto César Sandino(1893－1934)，尼加拉瓜抗美游击队领袖。——译者

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利益因此变得不是更加稳固，而是更加脆弱了。虽然收买本地统治精英轻而易举，但对反对者或社会民主运动（诸如智利的阿连德）的镇压，却使美国和这样一段漫长的历史勾连起来：在暗中反对发展中国家的大众运动。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通过纽约投资银行回收的剩余基金得以撒向世界各地。1973 年以前，多数美国境外投资都属于直接投资，主要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原材料资源（石油、矿产、原料、农业产品）的开采或特殊市场（电信、汽车业等等）的培育。纽约投资银行此前一直活跃于国际范围，但 1973 年以后它们变得更加活跃，尽管更加注重给外国政府以资金贷款。①这要求国际信贷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而美国政府则开始积极地促进和支持此项 1970 年代的全球政策。由于急需信贷，发展中国家被鼓励大量借贷，尽管利率却是对纽约银行家有利。②然而，由于贷款以美元结算，美元利率的些微上调（且不说大幅上升）就将轻易使孱弱的国家还不起贷款。纽约投资银行因此将面临严重损失。

第一例重大的此类事件发生于墨西哥，后者在 1982—1984 年效法沃尔克休克法，致使本国无力还贷。里根政府上任第一年曾严肃考虑过撤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但后来找到办法联合美国国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通过延缓债务偿还期限来解决困难——条件是墨西哥要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斯蒂格

① Panitch and Gindin,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② 1980 年代许多次债务危机的详细情况，见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利茨(Stiglitz)①所指的将凯恩斯主义一切影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清除”后(发生于1982年),上述办法成为标准处理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此后成了传播和执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统的中心。为回报债务偿还期限的调整举措,债务国被要求施行制度改革,包括削减福利开支、更灵活的劳动市场法律和私有化。就此发明了“结构性调整”。墨西哥是首批被拖入全世界正在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的国家之一。②

然而,墨西哥的例子表明在自由主义实践和新自由主义实践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在前者那里,债权人承担错误投资决策的损失;而在后者那里,债务人受到政府和国际力量的压迫,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不管这将给当地人民的生计和福利带来多大影响。如果此举要求将资产以极低价格甩卖给外国公司,那也只能顺其自然。事实上,这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并不相符。正如杜梅内尔和列维所表明的,此举结果之一是使得美国资本家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能够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高额收益率(图1.8和1.9)。③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或上层阶级
30 的权力重建,凭借国际流动和结构性调整实践,从世界其他地区成功榨取了大量盈余。

---

① Joseph Stiglitz(1943–),美国经济学家,曾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

② J.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③ G. Duménil and D. Lévy, 'The Economics of U.S. Imperi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1/4 (2004), 657–6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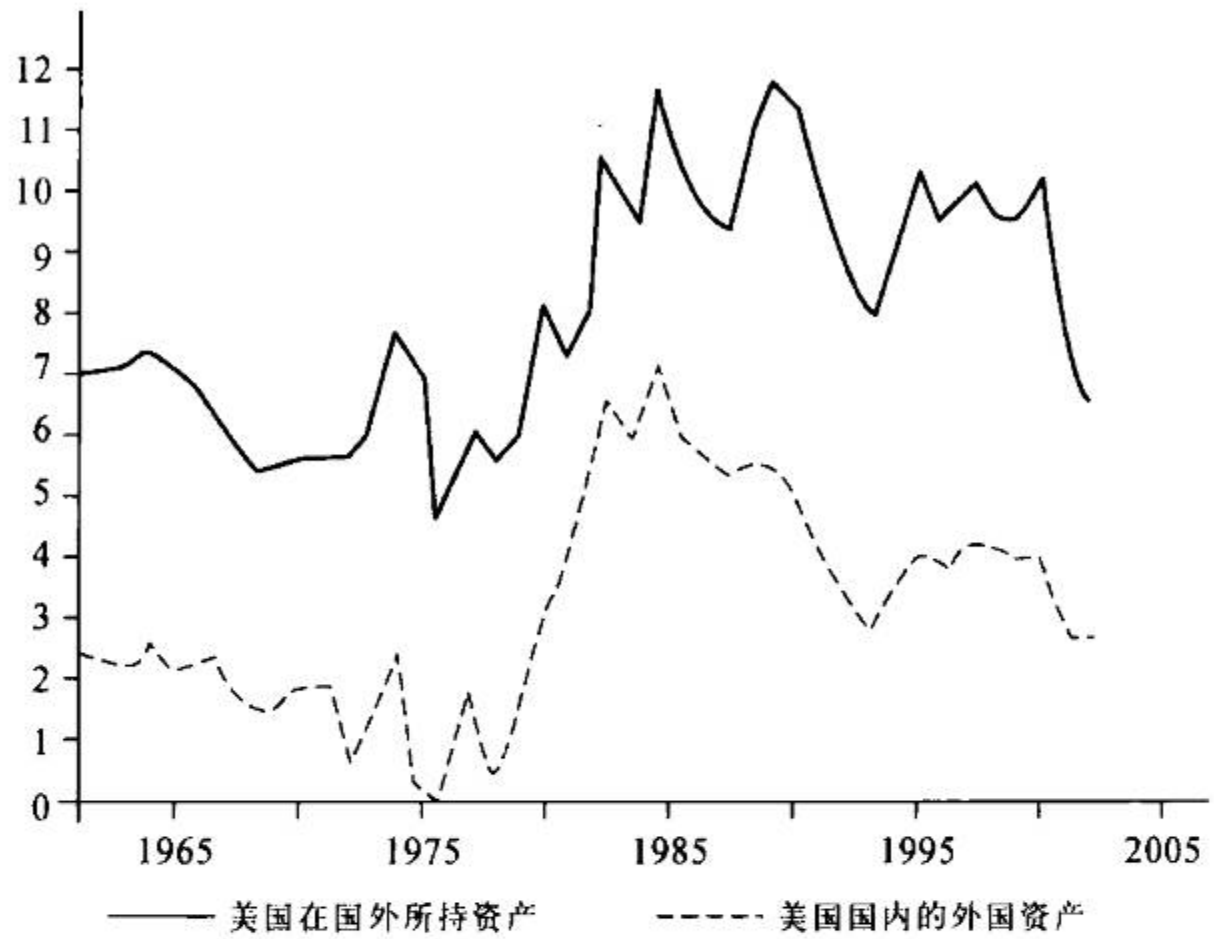


图1.8：从境外榨取盈余：美国的国内和国外收益率,1960—2002

来源：杜梅内尔和列维：《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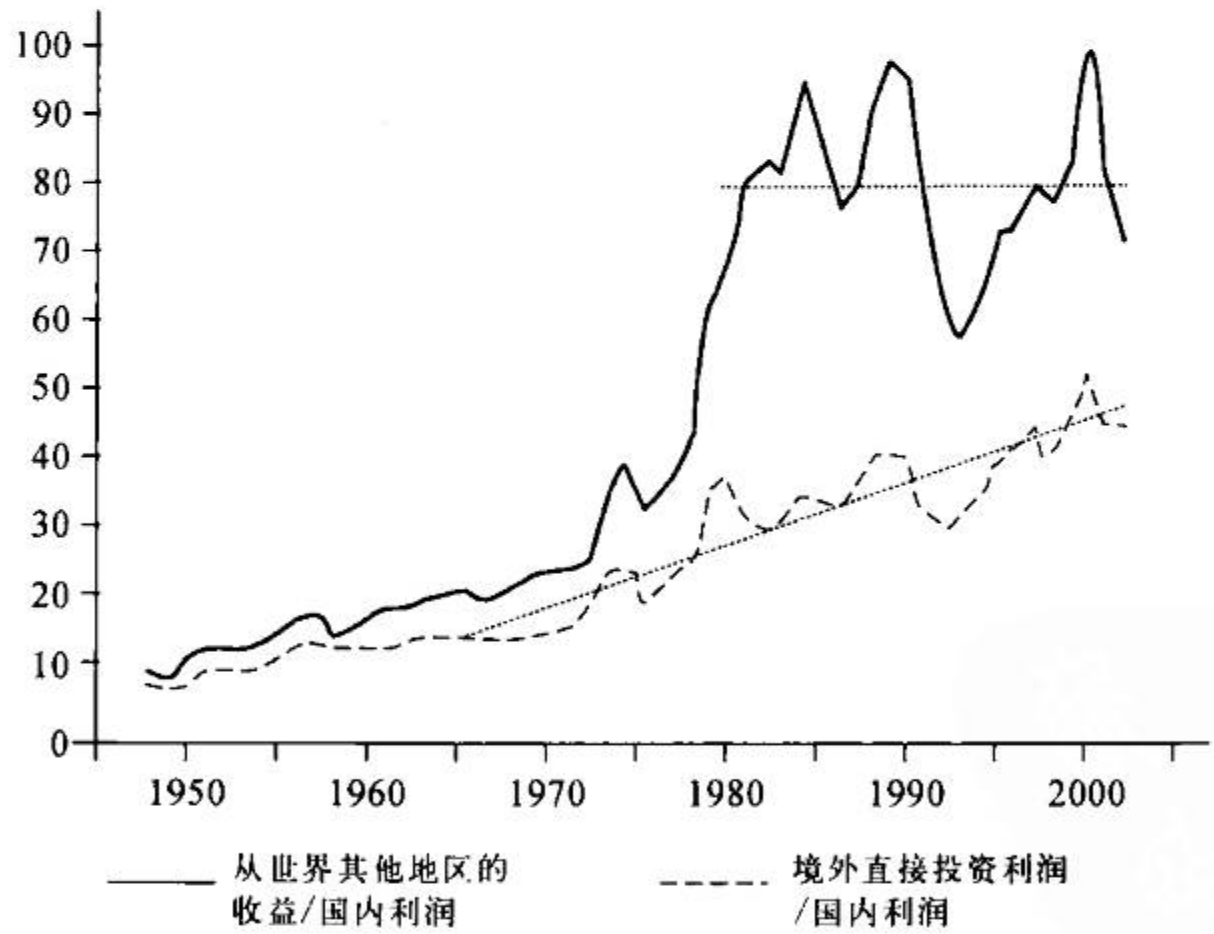


图 1.9：流入美国的贡金：从世界其他地区所获利润和资本收益与国内利润的关系

来源：杜梅内尔和列维：《新自由主义的动力：迈向新的阶段？》

阶级力量的意义

31 但是，这里所谓的“阶级”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总是有些模棱两可(有些人甚至会说可疑)。无论如何，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已经重新定义了这个概念。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新自由主义化是阶级力量重建的工具，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认出隐藏在背后的阶级力量以及那些借此获益的阶级力量。但是，当“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的时候，这个工作就很难进行。在有些情况下，“传统”的社会阶层能够依附于一个稳定的权力基础(通常靠家庭和血缘建立起来)；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与新自由主义化共同进行的，是对上层阶级构成因素的重构。例如，撒切尔夫人打击了英国一些根深蒂固的阶级力量形式。她反对在伦敦的军事、法律和经济精英中、以及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占据主导的贵族传统，而与鲁莽的企业家和新兴的富人站在同一阵营。她支持这个新生的企业家阶级，通常也受到后者的支持(诸如理查德·布兰森 [Richard Branson] ①、罗德·汉森 [Lord Hanson] ②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她自己的保守党中的传统派对此感到惊讶。在美国，金融家和大企业行政总裁的新生力量和重要性，以及一些崭新部门(诸如计算机、网络、媒体和零售业)所迸发的巨大活力，深刻改变了上层阶级经济力量的核心。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带来了阶级力量的重建，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恢复到同一批人那里。

---

① Richard Branson(1950-)，英国著名企业维珍(Virgin)的创始人。——译者

② Lord Hanson(1922-2004)，英国实业家。——译者

但是，正如美国和英国的对比所示，“阶级”在不同地方的意义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美国）甚至被认为毫无意义。此外，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了以阶级认同的形成与重构方式进行划分的强烈趋势。例如，在印尼、马来群岛和菲律宾，经济力量开始极大地聚集到一些属于少数民族的华侨手里，而获得经济力量的模式也与澳大利亚或美国非常不同（这种模式注重贸易活动并进行市场垄断①）。而俄罗斯七大寡头的兴起，则源于前苏联解体后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环境格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一些总的趋势。首先是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两者照惯例相互分离——的特权进行融合，方式是给予行政总裁们（管理者）以优先认股权（所有权凭证）。于是，股票市值而非生产活动成为经济活动的指示灯；此后随着安然（Enron）等公司的垮台变得越加明显的是，此类活动产生的投机诱惑开始泛滥猖獗。第二个趋势是急剧减小以下两者的历史沟壑：一方是为获取股息和利润的货币资本，另一方是寻求获利的生产、制造业和商业资本。这一分离在过去不同时期制造了金融家、生产者和商人之间的冲突。例如，1960 年代的英国政府政策首先迎合伦敦市金融家们的要求，经常损害国内制造商的利益；在美国，1960 年代金融家和制造企业的冲突也时有发生。1970 年代，许多这类冲突要么消失了，要么转变为新的形式。大公司开始越来越往金融上靠拢，甚至在从事生产时——如汽车部门那样——也是如此。自 1980 年左右以来，企业报告生产损失由金融业务弥补的情况已很常见（通过信贷和保险业务在汇率波动和

① A.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提供了许多例子。

期货市场方面进行投机)。部门合并以新的方式结合生产、制造、房产和金融利润,以产生多样的联合企业。当美国钢铁公司将名字改为美国钢铁马拉松(USX)的时候(购买坚挺的保险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詹姆斯·罗德里克(James Roderick)针对“X是什么?”这个问题,给出了简洁明了的答案:“X代表钱。”①

所有这些都和金融世界强烈迸发的活力和能量有关。随着金融活力日益挣脱那些迄今对其进行限制的管理束缚和壁垒,这种活力便能迅速发展,最终无远弗及。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浪潮不仅生产出高度复杂的全球互联网络,还生产出各种建立在证券化、衍生品和形形色色期货交易基础上的金融市场。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后者从此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如兰迪·马丁(Randy Martin)所说——日常生活。②这一过程还使全球交易关系发生剧烈波动。无疑存在着一股从生产过程转向金融领域的势头。从制造能力上获得的收益不再必然意味着人均收入的上升,但是向金融服务领域的集中却肯定能提升人均收入。因此,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例如由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华尔街在与缅因街③的冲突中占得上风;于是非常有可能的是,华尔街春风得意的时候美国其他部分(以及世界其他部分)却过得糟糕。而数年来——尤其是1990年代——情况就是这样。

33

---

① 引自 Harvey,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58。

② R. Marti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Daily Lif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Main Street 是与 Wall Street 相对的词,通常是商铺和零售商聚集的小市镇,也有“迈因街”、“商业街”、“民生街”的译法。——译者

1960 年代经常被人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到了 1990 年代，这个口号变成了“对华尔街有利就行了”。

所以，随着新自由主义而抬头的阶级力量的根本核心之一，便体现在下述人群那里：企业董事会的关键成员和行政总裁以及那些围绕在这一资本主义活动的闺房周围的金融、法律、技术机器的领导人。①然而，资本实际拥有者（股东）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除非他们能获得充分的投票权益以影响公司政策。有时，行政总裁及其金融参谋的操作可从持股人那里攫取数百万资产。投机获益也使得在短时期内聚集大量财富变得可能（例如巴菲特和索罗斯）。

但是我们不能把“上层阶级”这个概念仅仅局限于这群人身上。贸易关系的新型结构以及创业机遇的涌现，已经使新的阶级形成过程得以浮出地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新型经济部门能快速产生财富（像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新型市场关系打开了种种贱买贵卖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事实上通过种种方式建立财产以进行垄断市场的话——比如，使产业横向延伸（如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向全球扩展的媒体帝国），或使产业多样化分散到各个商业领域，向后延伸到资源开采和生产、向前则从贸易基地延伸到金融服务、地产开发和零售业。在这一过程中，与国家权力的特殊关系也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印尼的两个与苏哈托（Suharto）关系密切的商业集团既维护苏哈托家庭的财产利益，也借助它们与国家机器的关系囤积巨额财富。其中的一个——三林集团（Salim Group）——到

① 例如，杜梅内尔和列维很喜欢用这个排他性定义。

1997 年时“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侨所有的联合企业，拥有二百亿美元资产和近五百家公司”。卡洛斯·斯里姆(Carlos Slim)①以较小的投资公司起家，却已掌控了墨西哥新兴私有化的电信系统，并迅速将其打造为巨型联合公司帝国，不仅占据了墨西哥经济的巨大份额，其获利途径还扩展至美国零售业(电路城 [Circuit City] 和邦诺书店 [Barns and Noble])和拉丁美洲。②在美国，随着沃尔玛一跃成为零售业霸主且融合进中国生产线和世界各地零售店，沃顿家庭也获得了巨额财富。尽管这些活动与金融世界有明显关系，那种不仅能积累大量个人财富而且能控制许多经济部门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却使得这一小撮人拥有了影响政治进程的巨大经济力量。不奇怪，1996 年时最富裕的三百五十八个人的资本净值“相当于世界最贫穷的 45% 人口(二十三亿)的收入之和”。更糟糕的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二百个人在 1998 年之前的四年里资本净值翻了一番，超过一万亿美元。[当时] 最富裕的三位亿万富翁的资产超过了最不发达国家及它们的六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之和”。③

然而，在这个剧烈的阶级关系重组过程中，还有一项难题有待考察。这个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是，这一新的阶级形态应该被视作具有跨国性质，还是仍然该理解为建立在民族国家边界之内？④我自己的立场如下。统治阶级限制自己的业务领域并忠于

---

① Carlos Slim(1940－)，墨西哥电信巨头。——译者

② Chua, *World on Fire*.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3.

④ W. Robinson,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对这方面有出色论述。

某个民族国家，这种情况已经被渲染得太过了。美国资产阶级对抗英国、法国、德国或韩国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向来没什么意义。国际关系从来非常重要，尤其是通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的关系，但也包括起码回溯到十九世纪（如果不是更久的话）以来通过跨国联系形成的关系。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这些跨国联系无疑得到了加深和扩展，承认这些联系至关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阶级中的先驱人物不依附于某些国家机器以寻求利益和保护。他们具体依附在哪里固然重要，但这和他们追求的资本主义活动一样不稳定。默多克可能在澳大利亚起家，然后把注意力转向英国，最终在美国获得公民身份（行程表当然是很快的）。他并没有超越或自外于特殊国家权力之上，但同时他通过他的媒体却对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他的报刊在世界上拥有二百四十七位所谓的独立编辑，这些人无一例外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虽然是一笔带过，但谈论一下美国、英国或韩国的资产阶级利益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像默多克或卡洛斯·斯里姆或者三林集团的这些企业利益不仅从国家机器获益，也扶植国家机器的发展。但是，每一方都能够，而且确实，同时在不止一个国家中发挥阶级力量。

36

虽然这种位于企业、金融、贸易和开发领域的差异性私人团体并不必然合谋为一个阶级，并且，虽然他们之间时常发生冲突，但他们仍然具有某种利益上的一致，即都能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带来的好处（如今还要加上危险）。他们也能够通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类的组织进行意见交流，寻求合作并与政治要人商谈。他们对全球事务产生巨大影响，并且拥有一种普通公民所不具有的行动自由。

自由的前景

这一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形成的历史，以及朝圣山学社的理念不断被作为当代核心理念所接受的历史，如果被放在1944年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做的相反论述(就在朝圣山学社建立之前)的背景下考察，就会非常有趣。波兰尼指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自由的意义就会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他注意到存在两种自由，好的和不好的。就不好的自由方面，波兰尼列出的有“剥削他人的自由，或获得超额利润而不对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自由，阻止技术发明用于公益事业的自由，或发国难财的自由”。但是，波兰尼接着指出：“这些自由所推动的市场经济同样产生了我们所当珍视的自由：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个人选择工作的自由。”虽然我们或许会“因这些自由自身的价值而珍惜它们”——而且我们许多人也向来是这么做的——但这些自由在很大程度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这同一种经济也要为那些恶的自由负责”①。波兰尼对问题的两面性给出的回答，从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背景下看，似乎有些奇怪：

> 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开启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时代。法律上的自由和实际的自由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广泛而普遍；管理和控制不仅能为少数人争取自由，也能为所有人争取自由。自由不是作为从源头上就腐败了的特权的附属

37

①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edn.).

> 物，而是一种远远超出了政治领域狭隘界限、延伸至社会自身内部组织的时效权利。由此，老的自由和公民权利融入新的自由之中，这种新的自由产生自工业社会为所有人提供的闲暇和安全。这样一个社会能够同时承担起公正和自由。①

波兰尼指出，可惜的是向这样一种未来的过渡被自由主义乌托邦的“道德障碍”所阻(他不止一次援引哈耶克作为后一传统的典型)：

> 计划和控制受到攻击，被认为是对自由的否认。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被称为自由的核心。据称，任何建基于其他基础之上的社会都算不得叫自由社会。由管制所创造的自由被指责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贬斥为奴役的伪装。②

自由的理念由此“堕落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但是——事情往往如此——如果“没有权力和压制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强力不发挥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存在的”，那么维持这种自由

---

①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edn.). 256－258. [引文根据冯刚、刘阳译文，有所改动。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冯刚、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17页。——译者]

② Ibid. [引文根据冯刚、刘阳译文，有所改动。见卡尔·波兰尼，前揭。——译者]

主义乌托邦前景的唯一办法就是靠强力、暴力和独裁。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论调注定会为权威主义甚或十足的法西斯主义所挫。①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

波兰尼的诊断看起来与我们当今的状况特别合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制高点，借此能够看清当布什总统声称“我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有义务推动自由的传播”②时，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波兰尼的诊断也帮助解释为什么在“人性掌握了这样一种机遇，让自由战胜其所有顽固的敌人”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却变得如此独裁、压迫和反民主。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思考有多少家公司通过阻止将技术利益投放公共领域（如艾滋病药物）而牟利，从战争（如哈利伯顿公司）、饥荒和环境灾难中牟利。它唤起了一种担忧，即许多此类灾难或准灾难（军备竞赛以及应对真实和假想敌人的要求）是否暗地里其实是公司牟利之计。而且，波兰尼的诊断清楚表明为什么富人和有权者热心支持某些权利和自由概念，同时千方百计向我们推销这些概念有多万能多好。毕竟，新自由主义的自由通行了三十年，不仅使狭义的资产阶级重建权力，还产生了企业力量大量集中到能源、媒体、医药、运输甚至零售领域（比如沃尔玛）的现象。布什称之为人类进取心之顶点的市场自由，事实上不过是不加限制地将企业垄断权力和可口可乐扩张到各地的便利手段而已。依靠在媒体和政治过程中的非常影响，这一阶级（以默多克和福克斯新闻网为

①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edn.). 256 – 258.

②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see also F.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Norton, 2003).

首）利用刺激和强力劝服我们相信，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制度使我们过得比以前更好。对那些舒服地住在世外桃源（gilded ghetto）里的精英来说，这个世界好像确实更好了。波兰尼或许会说，新自由主义把权利和自由带给了那些“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而把微薄的收入留给我们其他人。那么，“我们其他人”如何就如此轻易地默许了这一事态呢？

第二章

建立赞同

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如何实现、由谁实现？在像1970年代智利
39 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答案简单粗暴，也直接而肯定：一次依靠由传统上层阶级（以及美国政府）支持的军事政变，用强力镇压一切劳工内部创立的团体和城市社会运动，以消除来自后两者的威胁。但是，1979年后通常归到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不得不通过民主手段实现。这样的大转变要想发生，需要事先在政治上建立起足够多选民的赞同。葛兰西（Gramsci）所谓的“常识”（common sense）（定义为“普遍所持的意见”）是赞同的典型基础。常识是由长期以来的文化社会化实践所建构的，这些实践通常扎根于区域或国家传统之中。这与“判断力”（good sense）不是一回事，判断力可以通过批判性地参与日常事务而建立。所以，常识有可能凭借文化偏见而极大地歪曲、模糊或掩盖真实问题。[①]文化价值和传统价值（诸如对上帝和国家的信仰，或对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看法）与恐惧（对共产主义者、移民、陌生人或“他者”的恐惧）可能被用来掩盖其他的真实。种种政治口号可能被用来掩盖藏在模糊的修辞技巧背后的具体策略。“自由”一词在美国人的常识理解中引起广泛共鸣，以至于成为一把“精英打开走向民众的大门”的钥匙，并借此为几乎任何事情提供合法性。[②]布什回过头证明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时就是这么干的。因

此，葛兰西总结道，政治问题“披上文化问题的伪装”就变得“不可解决”了。③ 为试图理解政治赞同的建构，我们必须揭示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意义。

那么，新自由主义转向是如何获得其正当性所需的民众赞同的呢？渠道多种多样。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周行于企业、媒体和构成市民社会的众多机构——诸如大学、中小学、教堂和员工组织。这种哈耶克在1947年就预想过的新自由主义在上述机构中的“长征”，加上纷纷形成的智囊团（由企业资助），以及某些媒体部门作为新自由主义喉舌、许多知识分子被召至新自由主义思考方式麾下——这些行为创造了一个支持新自由主义、视之为自由唯一保障者的舆论环境。这些活动随后通过政治党派以及最终通过国家力量而巩固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诉诸传统和文化价值显得相当重要。一项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力量恢复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计划，势必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民众支持。但是，有计划地鼓吹个人自由的尝试就能获得民众基础，并借此掩饰重建阶级力量的推动力。此外，一旦国家机器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它就能动用其种种权力——说服、任命、贿赂和威胁——来维持必要的赞成气氛以延续权力。我们会看到，撒切尔和里根对此相当拿手。

那么，新自由主义怎样如此彻底地取代了镶嵌型自由主义呢？在有些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强力（如在智利靠军事力

---

①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321－343.

② J. Rapley,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Neoliberalism's Downward Spiral* (Boulder, Col.: Lynne Reiner, 2004), 55.

③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49.

量；或靠财政力量，如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莫桑比克或菲律宾的操作)。压迫可以使人产生对如下观念的宿命论式的(甚至是绝望的)认同，即过去和现在都——如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贯主张的——“没有别的选择”。积极建立赞同的方式也各处不同。而且，许许多多反对运动的存在证明，各地的赞同经常消沉涣散。但是我们的视线必须超越这些纷繁的意识形态机制和文化机
41 制——不管它们多重要——看到日常经验的性质，从而更好地认出赞同背后的物质基础。而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透过1970年代资本主义底下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开始看到新自由主义如何穿透“常识”理解。其结果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已日益表现出来，即人们将之视作必然甚至“自然”的管理社会秩序的方式。

任何将个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运动都有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危险。例如，1968年世界性的政治动乱被要求更多个人自由的欲望所扭曲。就学生而言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受到1960年代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鼓舞，走上巴黎、柏林和曼谷街头，在墨西哥城遭到无情枪击(恰在1968年奥运会前夕)。他们要求摆脱家庭束缚、教育束缚、公司束缚、官僚体制束缚以及国家束缚。但是，68运动同样把社会正义视作首要的政治目标。

然而，个人自由的价值和社会正义并不必然相容；追求社会正义预设了社会团结和下述前提：考虑到某些更主要的、为社会平等或环境正义进行的斗争，需要压抑个体的需求和欲望。但是，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不同目标却令人不安地在68运动中混淆起来。这种张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传统左翼(拥护社会团结的有组织劳工和政治党派)和渴望个性解放的学生运动之间那种令人担忧的关系。1968年事件期间，怀疑和敌意在法国瓦解了上述两股势力(例如共产党和学生运动)，便是佐证。虽然消除这些差异并非

不可能，但很明显双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隔阂。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其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narcissistic consumerism)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比如，美国左翼长期面临的棘手麻烦，便是无法一方面确立实现社会正义需要的集体纪律，另一方面又不冒犯政治参与者表达个人自由、彻底的承认与特殊身份的要求。新自由主义不曾创造这些差异，但能轻易利用它们——如果不是煽动的话。

在1970年代初，那些寻求个人自由的人和追求社会正义的人还能为共同事业而奋斗，许多人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人们认为，强大的企业集团与干预主义政府的同盟造成了个性压迫和社会不公。越南战争很显然推动了不满情绪，但是，企业和国家的环境破坏活动、企业和国家对盲目消费主义的推动、处理社会事件和充分应对多样性方面的无能，以及通过国家规定和“传统”控制手段严厉限制个人可能性和个体行为，凡此种种都引起了广泛敌意。公民权利成了问题，性和生殖权的诸多问题也沸沸扬扬。对卷入68运动的几乎每个人来说，冒犯性的国家就是敌人，这样的国家必须改革。对此，新自由主义者会欣然同意。但是，资本主义公司、企业、市场体系同样被视为需要整治(如果不是革命性转变的话)的主要敌人——这就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凭借手操个人自由的理念、并将其转变为反对国家干预和管制，资产阶级利益有望保护甚至恢复自己的位置。新自由主义相当适合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但是，新自由主义需要实际策略的支持，即强调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不仅选择特殊产品，而且包括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和一系列文化实践的选择。新自由主义化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建构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满足

分化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就此来说，新自由主义与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冲动兼容并存，后者其实很早就蠢蠢欲动，但如今可以羽翼丰满地亮相为文化和思想的主导。而这曾经是1980年代企业和阶级精英设法应对的难题。

当时这些情况都还未明朗。左翼运动未能认识或应对(更别说
43 超越了)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内在张力。但是，我猜上层阶级许多人直觉到了这一问题，即便这些人没有读过哈耶克甚或没有听说过新自由主义理论。我将通过比较美国和英国在1970年代艰难岁月中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来表明这一点。

关于美国的情况，我想先从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1971年8月递送给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机密文件讲起。鲍威尔当时正要被尼克松升任至最高法院，他认为对美国自由企业体系的批评和反对已经过头了，“是时候(其实早就是时候了)调度美国企业的智慧、精明和资源来反对那些要摧毁它的人了”。鲍威尔指出，个体行动是不够的；他写道：“力量在于组织，在于仔细的长远规划和执行，在于不确定的年份里坚持贯彻行动，在于只有借助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达到的融资规模。”他指出，国家商会(The National Chamber)应该对主要机构——大学、中小学、媒体、出版社、法院——发起攻击，以改变人们对“企业、法律、文化和个人”的看法。美国企业不缺乏此种努力所需的资源，尤其是联合起来的时候。①

这项诉诸阶级战争的提议直接影响有多少不大好说。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商会随后将其规模从1972年大约六万家公司扩大

① J. Court, Corporateering: How Corporate Power Steals your Personal Freedom (New York: J. P. Tarcher/Putnam, 2003), 33 - 38.

到十年后的二十五万家以上。全美制造商协会(1972 年搬到华盛顿)连带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集团，用于游说国会和从事研究。美国企业促进会作为一个行政总裁们“致力为企业争取政治权力”的组织，建于 1972 年并在此后成为集体利商行为的中心。其中的企业占据着 1970 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近一半”，它们每年花费近九亿美金(当时是笔大数目)用于政治事务。像美国遗产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美国商业研究中心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囊团依靠企业支持而成立，它们撰写论文且在必要时(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情况)进行严肃的技术和经验研究和政治哲学论辩，就是为了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享有盛誉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近半数资金筹措来自在财富 500 强榜单上名列前茅的公司。由于和学界密切结合，NBER 对主流研究型大学中的经济院系和商学院的思考产生巨大影响。有了富人(诸如啤酒商约瑟夫·库尔斯 [Joseph Coors]，他后来成为里根“厨房内阁”的一员)及其基金会(如奥琳 [Olin] 基金、斯凯福 [Scaife] 基金、理查德森 [Smith Richardson] 基金、皮尤 [Pew] 慈善信托基金)拨款的雄厚资金，大量鼓吹新自由主义价值的小册子和书籍开始涌现，其中诺齐克(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或许是流传最广泛和最著名的一本。1977 年，斯凯福基金会拨款投资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的电视系列片。布莱思(Blyth)总结道：“企业界正学着成为一个阶级，并以此出发进行投资。”①

44

鲍威尔特别把大学拎出来，突出了其中的机遇和问题，因为

①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155。前一段落的信息来自布莱思著作的第五、六章，支持它的有 T.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Norton, 1985), chs, 2 and 3。

那里事实上是反企业和反国家的情绪集中地(圣巴巴拉的学生烧毁了那里的美国银行，并用沙子埋了一辆汽车以示庆祝)。但是，当时(当前也是)很多学生属于有钱有权人家，或至少是中产阶级，而在美国个人自由的价值又长期(在音乐和流行文化中)被奉为首要价值。新自由主义的主题在此能找到繁殖的肥沃土壤。鲍威尔并不支持扩大国家权力，但企业界应该“勉力培育”国家且在必要时“积极果断地”利用国家。[1]但是，到底如何利用国家力量来重塑常识理解?

面对资本积累与阶级力量的双重危机，一路应对方案产生于1970年代的城市斗争内部。纽约市财政危机颇具反讽性，资本主义重建和去工业化过程多年来瓦解了这座城市的经济基础，而快速的郊区化又使得中心城市的许多地区陷入贫困。结果是引起了1960年代以边缘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动荡，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城市危机”(美国许多城市都产生了类似的问题)。公共职务和公共供给的扩张——部分由慷慨的联邦基金资助——被视作解决方案。但是，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代初就草草宣布城市危机结束了，不顾许多财政困难还摆在眼前。虽然这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是新闻，它却是削减联邦资助的信号。随着经济衰退步伐加快，纽约市财政预算的收入和开支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由于长年肆意借款，预算已经很高)。金融机构起初打算填补缝隙，但1975年一个强势的投资银行团体(由花旗银行的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领衔)拒绝延长偿债期限，把纽约市推向了技术性破产边缘。随后的资金援助促使建立了接管这座城市预算管理的新型机构，它们首先要求用城市收入还清债务： 剩下的资金用于基本服

45

① Court, *Corporateering*, 34.

务。造成的结果是限制纽约市有力的地方协会的抱负，施行工资冻结并削减公共职务和社会供给(教育、公共医疗、运输服务)，强征使用费(学费第一次被引进纽约城市大学系统)。最后一项耻辱行为是要求地方协会将养老基金投资城市债券。于是，这些协会或者节制了自己的要求，或者面临当城市破产时失去他们养老金的前景。①

这不啻是金融机构针对纽约市民选政府的政变，而且在每一方面都和之前发生在智利的军事政变同样有效。在财政危机中，财富被重新分配到上层阶级手里。泽文(Zevin)指出，纽约危机是个征兆，表明“一种遏制通胀的新策略与一种倒退式的收人、财富、权力的再分配夹缠在一起”。纽约危机是“一场新战争中的一次早期(或许是关键性)战役”，目的是“向其他人表明发生在纽约的事情也有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②

是否卷进这次财政危害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种重建阶级力量的策略，我们不得而知。维持财政纪律的需要本身就很重要，并不像货币主义一般认为的那样，必然产生倒退式的再分配。例如，身为城市、国家和金融机构中间人的商业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不太会考虑到阶级力量的重建问题。他能“拯救”这座城市的唯一办法就是满足投资银行的需求，同时降低纽约人的生活标准。但是，阶级力量的重建几乎肯定是如沃尔

① W. Tabb, *The Long Default: New York City and the Urban Fisc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J. Freem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Life and Labor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② R. Zevin, 'New York City Crisis: First Act in a New Age of Reaction', in R. Alcalay and D. Mermelstein (eds.), *The Fiscal Crisis of American Citie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Ame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ew Yor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11－29.

特·里斯顿等投资银行家所考虑的问题，毕竟他把美国和英国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都视为共产主义。此外，重建阶级力量也肯定是福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后成为极端保守派奥琳基金的首脑)的目的。西蒙相当赞成智利的事件，因此强烈建议福特总统拒绝帮助纽约市(《纽约日报》头条标题就是“福特对我们说：去死吧”[Ford to City：Drop Dead])。他说，任何援助条款都要“具有惩罚性，整件事要具有痛苦的教训，从而没有城市或政治力量再敢走同样的道路”。①

尽管遍地都是对严厉措施的反对声音，在弗里曼看来，这些反对只能放慢“来自上面的反革命进程，而不能阻止它。不出几年，纽约劳工阶级的许多历史性成就便灰飞烟灭”。纽约市的很多社会基础设施被削减，而物质基础设施(如地铁系统)由于缺乏投资或维修变得颓败不堪。纽约的日常生活“变得十分艰苦，市民意气消沉”。市政府、地方劳工运动、纽约工人阶级被相当程度地剥夺了“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里积聚起来的力量”。②士气受挫的纽约工人阶级不情愿地接受了新的现实。

但是，纽约投资银行家们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他们牢牢把
47 握机遇，按照他们的计划重建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氛围”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利用公共资源建立起适合商业的种种基础设施(尤其是电信方面)，而商业则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津贴和税收刺激相联系。企业福利取代了人民福利。城市精英的机构被用于推销城市形象——作为文化中心和旅游目的地(发明了著名

① Tabb, *The Long Default*, 28. For Walter Wriston see T. Frank, *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New York: Doubleday, 2000), 53 - 56.

② Freem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的标语“我爱纽约”）。统治精英（时常是固执地）支持向各色国际潮流开辟文化领地。自恋式地探索自我、性、身份成为城市布尔乔亚文化的主题；受城市强势文化机构推动的艺术自由和艺术破格实际上引向了文化的新自由主义化。“癫狂的纽约”（借用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著名说法）抹去了民主纽约的集体记忆。①尽管内心有过斗争，但城市精英最终认可了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要求（包括那些性偏好和性别方面的多样化）以及日益增加的消费选择（在诸如文化产品等领域）。纽约成了后现代文化和思想实验的中心。与此同时，投资银行家对这座城市的重建还围绕着以下方面展开：金融活动、辅助设施——诸如法律设施和媒体（其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时发生的金融化过程）——以及多样化的消费主义（住宅高档化和邻里关系的“恢复”在其中扮演了显著和盈利的角色）。市政府越来越像一个企业而不是社会民主制度甚或管理性实体。在城市间展开对投资资本的竞争，将政府转变为通过公共和私人合伙进行的城市治理。城市企业日益在幕后操作，当地治理的民主和代表内容则逐步减少。②

纽约的工人阶级和移民人口再度境况堪忧，遭到1980年代大规模流行的种族歧视和强效可卡因的摧残，而后者造成许多年轻人死亡、被关押或无家可归；延续至1990年代的艾滋病肆虐则使

---

① R. Koolhaas, *Delirious New York* (New York: Monacelli Press, 1994); M. Greenberg, 'The Limits of Branding: The World Trade Center, Fiscal Crisis and the Marketing of Reco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7 (2003), 386-416.

② Tabb, *The Long Default*; On the subsequent 'selling' of New York see Greenberg, 'The Limits of Branding'; 关于城市企业精神更一般的情况，见 D. Harvey,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in id., *Spaces of Capit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 16。

得事态雪上加霜。借助暴力犯罪进行再分配成为穷人们少得可怜
48 的出路之一，当局对此的回应则是将所有贫穷和边缘的社区人口当成罪犯。受害者反遭谴责，朱利亚尼(Giuliani)则代表日益庞大的曼哈顿中产阶级富人报了仇，这些富人疲于应付自己家门口的破坏性影响。

纽约管理财政危机的方式，开辟了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实践的道路——国内是通过里根政府，而国际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下原则得以确立：当下述两方——一方是金融机构和债券持有人报酬的完整性，另一方是公民幸福——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前者。它强调政府的角色是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不是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和福利。泰伯(Tabb)总结说，1980年代里根政府的政策“仅仅是”1970年代在“纽约上演的剧本的扩充版”。①这些1970年代中期的地方成果迅速被应用到国家层面，托马斯·艾德索(Thomas Edsall，一名持续数年报道华盛顿事件的新闻记者)在1985年的说法颇有先见之明：

> 1970年代，企业界提升了其作为一个阶级行事的能力，为在立法舞台上的合作与联合着想，压抑了竞争的冲动。企业界政治策略的主导议题根本不是个别企业寻求特殊利益……而是寻求共同利益以挫败诸如消费者保护和劳动法改革的议案，并推行更有利的税收、管理和反垄断法规的执行。②

① Tabb, *The Long Default*, 15.
②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128.

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界需要政治阶级工具和民众基础。因此，他们积极推动共和党作为自己的工具。多个强力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形成是关键一步，为的是获得——如旧谚所说——“钱能买到的最好政府”。被设想为“进步”运动的1971年财政法，实际上认可了政治的财政腐败。最高法院在1976年开始做出一系列关键决定，首先就是规定企业有权无限度地向政治党派提供资金支持，政治行动委员会受到旨在保障个人（在此是企业）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保护。①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自此就能依靠团体的、富有的、职业的协会利益，同时确保两个政治党派的财政统治。PACs在1974年包含八十九家企业，而到1982年猛增到一千四百六十七家。尽管这些委员会只要其利益得到满足，就愿意同时为两个政党的现任要员提供资金支持，但他们同样有组织地偏向于支持来自右翼的挑战者。1970年代末，里根（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和威廉·西蒙（我们提到过这个人）千方百计怂恿PACs以右翼的同情为共和党候选人提供资金。②由于每个委员会规定只能给任何个人最多资助五千美元，因此迫使不同企业和行业的委员会合作努力，而这意味着结盟并不是以特殊利益为基础，而是以阶级为基础。

艾德索指出，共和党积极成为这一时期“其主导阶级的选民”的代表，这一点和民主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态度”适成对比；民主党“与社会上各种分散性集体关系密切，而这些集体——女性、黑人、劳工、老年人、西班牙裔人、城市政治组织——没有一个显得更强势”。此外，民主党人对“巨额资金”

① Court, *Corporateering*, 29－31，列出了所有1970年代的重要法律决策。

②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followed by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论述都很有力量。

的依赖使得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①尽管民主党拥有民众基础，它也不可能轻易走向反资本主义和反企业的政治道路，同时又不和强势的金融利益切断联系。

然而，共和党若想有效笼络（选举）权力，就需要有一个牢固的选民基础。共和党人差不多就是在此时试图与基督教右翼势力结盟。基督教右翼之前在政治上并不积极，但是杰瑞·法维尔（Jerry Falwell）于1978年发动的“道德多数派”政治运动却改变了一切。如今共和党有了其基督教基础。此外，它还诉诸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民族主义和他们在道德正确上感到受围困的心理（感到受围困是因为这个阶级生活在周期性经济风险状况下，并且感到，通过平权行动和其他国家规划分配的利益，很多都没他们的份）。调动这一阶级基础的积极方式可以通过宗教和文化民族主义，消极方式则是借助隐秘的（如果不是公开的）种族歧视、对同性恋的憎恶感、女性歧视。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和文化的新自由主义化，而是出在“自由主义者”身上，他们曾经利用过度的国家权力维系特殊群体（黑人、女性、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一个资金雄厚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围绕着埃尔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诺曼·波多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观察》［*Commentary*］杂志召集起来）为这些议题提供支持，拥护道德和传统价值。通过支持在经济上而非文化上进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这些人批评一批所谓“自由主义精英”的干涉主义过度行为——因此很大程度上使“自由主义”一词蒙上了阴影。结果是把人们的视线从资本主义和企业力量上移开，好像它们和产生于放任商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经济或文化问题毫无瓜葛似的。

①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235.

从此，由新保守主义者推动的大公司和保守派基督徒之间不光彩的结盟逐渐巩固起来，最终清除了共和党中的一切自由主义因素(这些因素在1960年代颇具重要性和影响力)——1990年后这一点愈发明显——并将共和党塑造成如今相对同质化的右翼选举势力。①一个社会集团被劝服要出于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理由，投票反对自己的物质、经济和阶级利益，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尽管这一点让人忧虑)最后一次。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与其用“劝服”一词，不如用“遴选”一词，因为有充分证据表明，组成“道德多数派”之核心的福音派基督徒(不超过民众中的五分之一)积极拥护大公司和共和党的联盟，视之为进一步推动他们的福音和道德计划的手段。建于1981年的国家政策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成员多属基督教保守派的秘密组织，肯定就属于上述情况，这个组织旨在“策动国家向右转”。②

另一方面，民主党却在根本上遭到分裂：它需要调解(如果不是满足的话)企业和金融利益，而同时又要做出姿态表明将改善其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民主党最终选择了前者的要求，并因此落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规定和执行的窠臼(例如福利改革方面)。③但正如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的例子所示，克林顿一开始的计划是否如此值得怀疑。面临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刺激经济发展等问题，他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削减赤字以实现低利率，而这意味着要么大幅提高税收(相当于选举上的

① T. Fran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s of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② D. Kirkpatrick, 'Club of the Most Powerful Gathers in Strictest Privacy', *New York Times*, 28 Aug. 2004, A10.

③ See J.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New York: Norton, 2003).

自杀行为），要么削减预算。如尤金（Yergin）和斯塔尼斯拉夫（Stanislaw）所说，走后一条道路“迎合了富人而背叛了他们的传统选民”；或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度是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承认的：“我们确实设法勒紧穷人的裤腰带而给富人松绑。”①事实上，社会政策照顾的是华尔街的债券持有人（很像之前纽约市的情况），结果不难预料。

由此出现的政治结构相当简单：共和党能够调用大量财政资源并调动其民众出于文化或宗教理由投票反对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民主党则由于担心冒犯资产阶级利益，无力满足其传统民众基础的物质利益（比如建立全国医疗系统）。上述不平衡使得共和党的政治霸权地位日益稳固。

为了支持沃尔克的货币主义转向、支持应对通胀问题的优先性，巩固政治转变的基础就很有必要，而里根1980年的当选只不过是这一漫长过程的第一步。艾德索当时指出，里根的政策关注的是“全面推动削减联邦管制的幅度和内容，涉及领域有产业、
52 环境、工作场所、医疗卫生和买卖双方的关系”，而主要手段是通过预算削减、松绑以及在关键位置上“任命反对管制、坚持产业导向的办事人员”。②

1930年代成立的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旨在管理工作场所中的资本家与劳工的关系，里根的任命将其变成商业松绑时限制和管理劳工权利的工具。③1983年里根用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撤

---

① Yergin and Stanislaw, *Commanding Heights*, 337;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108.

②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217.

③ 此处的论述再次倚重于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销了近40%于1970年代期间制订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商人看来对劳动者太有利了。里根认为所有管制(除了对劳工的管制)都是坏的。他下令行政管理与预算局(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对(过去和现在)一切管制规划进行彻底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无法表明管理收益明显超出成本，那么这些管理就该被废除。不仅如此，对税法的仔细修订——主要考虑投资折旧的问题——允许很多企业逃避任何税收，并将个人最高税率从78%降到28%，这些都明显反映出重建阶级力量的意图(见图1.7)。最糟糕的是，公共资产毫无阻碍地就流向了私人腰包。例如，许多医药研究领域的核心突破以前都是由全国卫生研究所与医药公司合作投资的。但在1978年，这些公司被允许享有专利权的一切好处，却不必向国家提供任何回报，确保了高度补助的产业在此后一直获利颇丰。①

但所有这一切需要劳工和劳工组织听命于新的社会秩序。如果说纽约在1975—1977年里通过规训强力的地方工会而成为这方面先驱，那么里根随后便在全国层面上采取了类似行动：他在1981年打击了航运管理组织，并向贸易工会清楚表明他们在政府的参议院中是不受欢迎的。1960年代期间企业和工会间维持的脆弱的社会契约宣告终结。随着1980年代中期失业率飙升到10%，打击一切有组织的劳工并削弱其特权和力量的时机到来了。将工业活动从有工会组织的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向无工会组织且“自由工作”(right-to-work)的南部各州转移(如果不是越出边境去墨西哥或东南亚地区的话)，成了常见现象(此举受到两方面帮助和 53

① M. Angell, *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 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推动，即对新兴投资的有利税收政策，以及重心从生产转向作为资产阶级力量中心的金融领域）。通过将之前有工会组织的核心工业区域进行去工业化（所谓“铁锈地带”），劳工被剥夺了力量。企业可以威胁关闭工厂，并在必要时甘冒——通常能成功——罢工风险（例如煤矿工业的情形）。

但是，此处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大棒政策，因为对于愿意和集体行动脱离干系的劳动者个人来说，有许多胡萝卜等着他们。自身的硬性规定和官僚结构令工会很容易受到打击；缺乏灵活性不仅对资本家来说是弊端，通常对个体劳动者而言也是弊端。主张灵活具体的劳动过程和弹性劳动时间，此类积极要求能够成为新自由主义劝服个体劳动者的说辞，尤其是说服那些被强势工会带来的垄断性利益排斥在外的劳动者。对资本家和劳工来说，劳动力市场的更多行动自由都能被奉为一项美德，而在此同样不难把新自由主义价值融入许多劳工的“常识”之中。这种积极潜能如何转化为灵活积累的高度剥削体系（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劳动分配积聚起来的所有利益都归资本家所有），是解释为什么实际工资（除 1990 年代的少数几年外）停滞或下降（图 1.6）、盈利减少的关键所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轻描淡写地认为失业总是自愿的，这种理论提出，劳动有一个“最低价位”，低于这个价位人们情愿不工作，失业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劳动的最低价位太高了。由于最低价位部分是通过福利性开支制定的（以及通过那些描述开着凯迪拉克汽车兜风的“福利大妈”故事①），新自由主义理论就推论道，克林顿对于“众所周知的福利”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必然

① “福利大妈”（welfare queen）一词是里根创造出来的，描述那些只靠政府福利过着舒适生活、不劳而获的黑人妇女。当然，事实上究竟有没有人能只凭政府福利生活并开上凯迪拉克，又是另一个问题了。——译者

成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一步。 54

上述这一切都需要有效的理论基础，因此理念的战争被推上前台。布莱思指出，被调动来支持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诸多经济理念简直是个理论大熔炉，包括了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理性预期理论（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公共选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以及不那么著名但同样重要的亚瑟·拉弗尔（Arthur Laffer）的“供给”观念——后者走得如此之远，声称税收减免起到的刺激效果会大量促进经济活动以至于能自动增加税收（里根很喜欢这个想法）。更恰当地说，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政府干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通过正确配置企业活动的刺激因素，“一项稳定的货币政策加上给优秀企业减免税收，将会产生更健康的经济”。①以《华尔街日报》为首的商业通讯吸收了这些观念，公开支持新自由主义化，并视其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必然方案；普通大众则通过像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之类的多产作家（受到智囊团基金资助）接触到这些观念，而诸如斯坦福和哈佛等名校兴办的商学院（由企业和基金会慷慨资助）在建立之初便成为新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中心。具体勾勒这些理念的传播是很困难的，但到了1990年左右，绝大多数主流研究型大学的经济院系以及商学院都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模式主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这些美国研究型大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培养许多外国人，他们把所学带回自己的国家——比如，智利和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便是受过美国训练

①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see also Frank, *One Market Under God*, particularly on the role of Gilder.

的经济学家——或带到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去。

我认为结论很清楚。“1970 年代期间，国家企业部门的政治面相，”艾德索写道，“发动了最近一次最明目张胆的追求权力的战役”。到 1980 年代初，它“已经取得了接近于 1920 繁荣年代时的影响力”。①而到了 2000 年，它已经利用那种影响力重获了其在国民财富和收入上的极大份额——这一水平自 1920 年代以来从没有出现过。

55

在英国，建立赞同的方式非常不一样。②堪萨斯州发生的事情和约克郡相当不同，文化和经济传统迥异。英国不存在什么能够调动起一个道德多数派的基督教右翼。那里的企业力量对于公开支持政治行为主义不感兴趣(企业力量对政治党派的贡献很少)，倒更乐意通过阶级和特权的网络发挥影响，这些网络长期以来将政府、学界、司法界、长期存在的文职部门(当时还保持着独立的传统)与行业和金融领袖联系在一起。政治境况也极为不同，因为工党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被人视为强大且有时相当富于战斗性的工会组织。英国因此发展出了一套美国人做梦都没想过的复杂而又无所不包的福利国家结构。经济的主导领域(煤矿、钢铁、汽车)都是国有化，而大部分住宅业属于公有部分。工党自 1930 年代起在市政治理的舞台上建立了许多重要阵地，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的伦敦郡议会是其前哨。工会运动和市政治理建立了社会团结，这一点非常明显。甚至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保守党执政时，也没有对继承下来的福利

①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107.

② S. Hall,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New York: Norton, 1988).

国家进行大幅改革。

工党政府在1960年代拒绝向越南派兵，因此避免了因参与一场名声不佳的战争而直接引起国内动荡。二战之后，英国同意放弃殖民政策(尽管不情不愿，并且有时还发生暴力冲突，以及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此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又逐步使英国(虽然也是不情愿地)卸除了相当程度上的直接性帝国主义权力。英国在1960年代从苏伊士运河东部撤出其势力，便是此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北约内部的后加入国而处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但是，英国仍然对那些过去是其帝国殖民地的区域保持着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存在，并因此经常与其他大国发生摩擦(例如像血腥的尼日利亚国内战争的情况，当时比夫拉企图从尼日利亚分离出去)。英国与其前殖民地的关系及其对后者的责任一直牵连不断，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如此。商业剥削的新殖民主义结构经常得到加固而非清除。但是，从前殖民地去向英国的移民潮却开始把帝国的种种后果以新的方式带回帝国之内。

大英帝国最重要的“遗迹”是：伦敦市继续扮演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1960年代期间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考虑到全球导向的金融资本力量日益强大，英国开始保护并巩固伦敦市的地位。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矛盾。(通过调整利率)保护金融资本，经常与国内的制造业资本发生冲突(因此刺激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结构性分化)，有时还会(通过限制信贷)限制国内市场的扩张。保持英镑稳定的努力最终破坏了英国的工业出口地位，并成为1970年代收支平衡危机的原因之一。国内的镶嵌型自由主义和以伦敦为基础、活跃于世界舞台的金融资本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伦敦市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偏向货币

主义而非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并因此形成了反对镶嵌型自由主义的坚强壁垒。

英国二战以后建立的福利国家并非人人满意。强势的批评浪潮在媒体上不绝于耳（以享有盛誉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打头阵），而这些声音越来越多地俯首听命于金融利益。个人主义、自由、解放都被描述为反抗，对立面是令人窒息的、官僚气的、无能的国家机器和压迫性的工会力量。这样的批评声音在1960年代就传遍英国，而在1970年代经济停滞的惨淡年份里更是甚嚣尘上。那时人们害怕英国正在变成“一个社团主义国家，最终落得老迈平庸”。①哈耶克所代表的思想潜流最终形成了有效的对立面，在诸多大学赢得拥趸，更重要的是主导了经济事务研究所（建于1955年）的工作，而那里也是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后成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参谋）后来在1970年代开始登上公共舞台的地方。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1974年）和亚当·斯密研究所的成立（the Adam Smith Institute，1976年），加上媒体在1970年代越来越多地倒向新自由主义化，都极大地影响了公共舆论氛围。先前兴起的一次重要的青年运动（主要是政治讽刺），以及1960年代“摇摆伦敦”风潮中率性的波普文化，都在挑战和嘲弄阶级关系网络的传统结构。个人主义和言论自由成为重要议题；而为了正视英国根深蒂固的阶级系统及其殖民遗产的复杂性，一次倾左翼的学生运动受其影响成为英国政治中的积极因素，正如68运动其他地方的情况。它对阶级特权的轻蔑态度（不管是贵族、政治家还是工会官僚的特权）为后来激进的后现代转向埋下伏笔。对政治的怀疑态度，是在为

57

① Yergin and Stanislaw, *Commanding Heights*, 92.

怀疑一切元叙事铺路。

虽然有很多因素可以促成新自由主义转向所需要的赞同，但如若没有1970年代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撒切尔夫人现象或许不可能发生，妄论成功。滞胀给所有人带来打击。1975年，通胀上升到26%，失业人数达到了一百万(图1.1)。国有化工业耗尽了国库资源，引起了国家和工会之间的矛盾。1972年与1974年，英国矿工(属国有化工业)发起了1926年以来的首次罢工。矿工总是走在英国劳工斗争的最前线，他们的工资跟不上持续的通货膨胀，也引起了社会同情。保守党政府在灯火管制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下令实行一个三天工作周，并寻求公众支持来反抗矿工。在1974年，举行了一次寻求公众支持政府立场的选举，但遭到失败，工党政府重新执政并以承诺有利于矿工的措施平息了罢工。

58

然而，获胜的代价却相当大。工党政府无力实施这些措施，也无法应对政府的财政困难。收支平衡危机与巨大的预算赤字都是问题。1975—1976年，英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贷款，它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预算费用限制，要么宣告破产并牺牲英镑的信誉，从而重创伦敦市的金融利益。英国选择了前一个方案，对福利国家预算开支的严厉削减得到贯彻执行。①工党政府开始成为其传统支持者的物质利益的对立面，但它仍然对积累和滞胀的危机毫无办法。它徒劳地试图诉诸社团主义理想——假定每个人都要牺牲掉某些东西，求得整体的利益——来掩盖诸多困难。其支持者开始公开闹事，公有部门的工人在1978年“不满之冬”发起了一系列致命的罢工。

① T. Benn, *The Benn Diaries, 1940 - 1990*, ed. R. Winstone (London: Arrow, 1996).

“医院工作人员不上班，卫生医疗不得不严格限额配置。罢工的掘墓人拒绝埋葬尸体，卡车司机也罢工了。只有商店营业员还能让运输车带着‘重要物资’穿越警戒线。英国铁路(British Rail)打出简明标语‘今天没车’……罢工的工会似乎打算让整个国家都停下来。”①主流媒体大肆攻击工会，说它们贪得无厌，一心破坏，而公众对工会的支持也一落千丈。工党政府下台，在之后一任选举中，玛格丽特·撒切尔以绝对多数取胜，其中产阶级支持者们明确要求她平息公有部门的劳工力量。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虽然不同，但两者的共同点也非常明显地
59 体现在劳工关系和应对通胀的斗争上。就后者而言，撒切尔夫人将货币政策和严格预算控制视为头等大事。高利率意味着高失业(1979—1984 年达到 10%以上，五年内英国工会联盟失去了 17%的成员)。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被削弱了。阿兰·巴德(Alan Budd)是撒切尔夫人的一名经济参谋，他后来指出“1980 年代通过缩减经济和公共开支以限制通胀的政策，是用于打击劳工的手段”。他进一步观察道，英国创造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业后备军”，结果是摧毁劳工力量并允许资本家从此可以轻易牟利。与 1981 年里根对 PATCO 的挑衅相似，撒切尔夫人在 1984 年也挑起了一次矿工罢工，她当时宣称要进行裁员和闭矿(进口煤相对便宜)。罢工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矿工虽然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同情和支持，最终还是输了。英国劳工运动的根本支撑遭到破坏。②撒切尔夫人

---

① Yergin and Stanislaw, *Commanding Heights*, 104.

② R. Brooks, ‘Maggie's Man: We Were Wrong’, *Observer*, 21 June 1992, 15; P.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Fourcade-Gourinchas and Babb,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进一步通过开放英国给外来投资和外来竞争而削弱了工会力量。外来竞争在1980年代摧毁了相当一批传统英国工业——钢铁工业(谢菲尔德)和造船业(格拉斯哥)在数年内几乎彻底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一大批工会力量。撒切尔夫人有效摧毁了本土的国有化汽车工业及其强大的工会与好斗的劳工传统，相反将英国作为日本汽车公司寻求欧洲登陆的平台。①这些都建立在未开发地区和重新招募的非工会劳工(他们将服从日本式的劳工关系)的基础上，总体结果是将英国在十年内转变为一个较低工资、相当多任劳任怨的劳动力(相比于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当撒切尔夫人离开政坛的时候，罢工活动已经降至之前水平的十分之一。她消除了通货膨胀、限制了工会势力、平息了劳工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中产阶级对她的政策的赞同。

但是，撒切尔夫人还要在其他战场上进行斗争。在不止一个地区产生了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行动——谢菲尔德、大伦敦议会(the Greater London Council，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为了实现更多的目标不得不将其废除)及利物浦(那里一半的本地议院都要受到监禁)形成了活跃的反抗中心，人们在那里寻求并践行一种新的地方性社会主义理想(包括许多新的社会运动的理想，例如在伦敦)，直到最终在1980年代中期遭到镇压。②撒切尔夫人以严厉削减中央政府对各市资助为起点，但有几个市对此的响应只是提

60

① T. Hayter and D. Harvey (eds.), *The Factory in the City* (Brighton: Mansell, 1995).

② G. Rees and J. Lambert, *Cities in Crisi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M. Harloe, C. Pickvance, and J. Urry (eds.), *Place, Policy and Politics: Do Localities Matter?*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M. Boddy and C. Fudge (eds.), *Local Socialism? Labour Councils and New Left Alternatives* (London: Macmillan, 1984).

高财产税，这就迫使她颁布法令禁止他们这样做。她诋毁进步的劳工委员会是“左派疯子”（保守党主导的媒体津津有味地挪用这个说法），借此力图通过市政财政改革强行贯彻新自由主义原则。她提出一项“人头税”——一项倒退的、不按财产而按人口计算的税收——这种税制向每个居民收税，借以控制市政开支。此举激起了巨大的政治斗争，促使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走向终结。

撒切尔夫人还着手私有化那些过去归公共所有的经济部门，这项甩卖将充盈国库并使政府摆脱将来对亏损企业承担的义务。这些国营企业不得不做好私有化准备，而这意味着将减少债务、提高效率和成本结构——但通常是靠裁员实现的。这些企业的价值评估也是为了向私人资本提供有效刺激——反对者把这个过程比做“把家里的钱送人”。有些情况下，补助金（subsidies）就隐含在这种价值评估模式背后——自来水公司、铁路，甚至汽车和钢铁工业的国营企业，都占有主要地段的高价值土地，企业价值评估过程却不会将这一点考虑在内。私有化过程与释放土地所获的投机利润携手并进。但此处的目标还在于，凭借扩大个人和企业责任的范围、鼓励更高效率、个体/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改变政治结构。英国飞机制造公司（British Aerospace）、英国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钢铁、电和煤气、石油、煤矿、自来水、公车服务、铁路，以及许多小型国家企业都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被变卖了。英国在这一方面开拓性地向人们展示如何将这一过程做得合理有序还能（对资本来
61 说）盈利。撒切尔夫人相信，一旦这些转变发生了，那么这一过程将不可逆转： 因此要快。大规模公共住房廉价卖给住户，成功加强了整个运动的正当性；十年内私房屋主数量大幅增加。这满足

了人们历来把拥有个人房地产视为工人阶级美梦的愿望，并在房产市场引进了一种新的（通常是投机的）动力，中产阶级对此颇为赞赏，他们看到自己的资产价值上升了——至少是在1990年代初房地产崩溃之前。

然而，拆除福利国家又是另一回事。这一过程进行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大学、国家官僚体制和司法系统等领域，开始时举步维艰。在这里，撒切尔夫人不得不与其核心支持者中那种根深蒂固、有时是传统的上层中产阶级心态展开斗争。撒切尔夫人竭尽全力设法全面推广个人责任的理想（例如，通过医疗卫生的私有化），减少政府职责。她没能取得迅速进展，英国公众觉得新自由主义化应该有所限制，不能样样事情都包括进去。例如，在2003年以前，还没有一个工党政府能够（不顾普遍的反对）成功将学费制度引入英国的高等教育。在所有上述领域，想要建立支持激进改革的联合赞同都被证明非常困难。对此，撒切尔夫人的内阁（及其支持者）产生了众所皆知的分裂（分为“自由派”［wets］和“保守派”［drys］），她花了几年时间挫败党派内部和媒体上的反对声音，才得以推行适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她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动一种企业精神（entrepreneurialism）的文化，并对诸如大学等机构强行实施严厉的监督、金融责任和生产力的规则，尽管这些规则与此类机构很不适应。

撒切尔夫人通过培养一个中产阶级来赢得赞同，此阶级欣然享受诸多快乐：居者有其屋、私人财产、个人主义和创业机遇的自由。随着压力和去工业化带来的工作结构急剧转型使得工人阶级凝聚力涣散，中产阶级价值开始广泛传播，甚至把那些一度坚定认同工人阶级身份的人们也囊括其中。英国对自由贸易的开放使得一种消费文化得以兴盛，而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多也给之前沉

静的英国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债务文化(debt culture)。新自由主义使得旧英国阶级结构发生转型(光谱的两端皆然)。而且,通过保持伦敦市在国际金融中的核心作用,英国日益把其经济腹地——伦敦与东南部地区——转变成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动力中心。阶级力量并没有恢复到任何传统部门那里,相反广泛集中到了全球金融业务中心之一。来自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新人作为债券与外汇交易员拥入伦敦,迅速积聚财富和权力,并将伦敦转变为世界上最奢侈的城市之一。

虽然撒切尔夫人的革命基础是在传统中产阶级内部建立的赞同(这些阶级使她赢得三届选举),整个规划——特别是其第一届政府——和美国的情况相比更受意识形态上的推动(很大程度上源于基思·约瑟夫)。虽然自己是殷实的中产阶级背景出身,撒切尔夫人还是很喜欢首相职位与工商业和金融"巨头"之间传统的密切关系。她经常寻求后者的建议,有时还讨好他们,降低有待私有化的国家资产的价值。重建阶级力量的计划——与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相对——更多是在她的政治发展中潜意识进行的。

里根和撒切尔的成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评判。①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强调如下一点,即他们采取了当时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的立场,并把这些立场变成主流。他们巩固的力量联盟与他们转化的主流成为一项遗产,后继的政治领导人对此要想扭转也困难重重。或许,最好的证明就是克林顿和布莱尔都发现自己能够腾挪的空间很小,只能按部就班地延续

① 关于撒切尔夫人未能完成其总体经济规划的几项目标,详细论述见 P.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阶级力量重建的过程，哪怕这将违背他们自己更好的直觉。一旦新自由主义深深扎根于英语世界中，它就不能否认其对于国际范围的资本主义总体运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影响和权力强加给其他地区的。正如英美的例子充分表明的那样，两国的国内环境与随后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性质都相当不同，我们进而可以推断，国内力量和国际影响与强迫在其他地区都将发挥关键作用。

里根和撒切尔抓住了手上的线索(从智利和纽约市那里)，并置身于一场旨在重建阶级力量的阶级运动的核心。他们的天赋是创造一种遗产和传统，以此将其后继的政客卷入束缚的网络中难以脱身。那些后来人(比如克林顿和布莱尔)不管乐意与否，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继续做好新自由主义化的工作。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

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地位相当清楚。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实践却以如下方式发展，即它会严重脱离理论所提供的模板。而且，国家机构、权力和职能在过去三十年内的发展显得有些混乱，并且呈现出不均衡地理发展；这些情况表明，新自由主义国家可能是一个不稳定且矛盾的政治形式。

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按照理论，新自由主义国家应该支持牢固的个人财产权、法治以及令市场和自由贸易得以自由运转的制度。[①]这些被视为保障个人自由所必需的制度安排。法律框架属于市场上的司法个体之间承担自由协商的契约义务，契约的神圣性与行动自由、言论自由、选择自由的个体权利必须受到保护。国家因此必须利用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来不惜一切维护这些自由。进一步，商业和企业(法律上被视作个人)在这一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制度框架内的运作自由也被视为根本的善。个人企业与创业精神被看成是创新和财富创造的关键，而为了鼓励技术变革，知识产权也受到保护(如通过版权)。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因此会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根据“所有船只都会随潮起而高涨”或“扩散效应”的假

设，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内和世界范围的）贫穷问题能够最好地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得到解决。

新自由主义者特别热衷寻求资产的私有化。缺乏清晰的私有产权（诸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和人类幸福的最大制度性障碍之一，圈占和分派私有产权因此被认为是抵挡所谓“公用品悲剧”（指个人倾向于不负责任地过度利用公共财产资源，如土地和水）的最好手段。先前由国家运营或管理的部门必须移交到私人领域并进行松绑（摆脱任何政府干预）。竞争——个体间的竞争、公司间的竞争、地区实体间的竞争（城市、区域、民族、地区集团）——被看作是首要美德，当然也要很好地遵守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在规则贯彻不明确或产权界定不清晰的机构，国家必须动用权力来巩固或发明市场体系（如排污权交易）。据称，私有化和松绑与竞争结合起来就能消除官僚制的繁文缛节、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改善质量、降低成本，因为这一过程不仅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而且间接减少了税收负担。新自由主义国家应当不断寻求内部的改组和新的制度安排，从而在面对全球市场的其他国家时，提升其竞争地位。

虽然市场中的人身和个体自由得到保障，每个个体却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安康负责。这一原则扩展到许多领域，包括福利、教育、医疗卫生甚至养老金（社会保障在智利和斯洛伐克已被

① Chang, *Globalisation*; B. Jessop, 'Liberalism, Neoliberalism, and Urban Governance: A State-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tipode*, 34/3 (2002), 452-472; N.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trans. P. Camiller (London: Verso, 1978); S. Clarke (ed.), *The State Debate* (London: Macmillan, 1991); S. Haggard and R. Kaufman (ed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Distributive Conflicts and th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M.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私有化，美国也存在类似提议）。个人成败被解释为出于创业精神或个人弱点等原因（诸如自己没有在教育上投入足够多，以获得足够的技术资本），而不是归在任何系统性因素上面（比方说，一般把阶级排斥归咎于资本主义）。

各个部门、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资本自由流动被认为至关重要，一切阻挡资本自由运动的壁垒（诸如关税、惩罚性税制、计划和环境控制，或其他的地方性障碍）都要拆除，除非是关系到“国家利益”（不管这个词如何定义）的关键领域。超越于商品和资本流动之上的国家主权，自觉自愿地听命于全球市场。国际竞争被视为健康有益的事情，因为它能够提高效率和生产力，降低价格，并借此控制通胀趋势。所以，各国应该共同努力协商减少壁垒，促进资本跨国界流动，尽量为全球交易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然而，是不是这种原则可以运用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却聚讼纷纭。由于所有国家都必须协作减少交易壁垒，一些与此配合的结构组织必然会涌现出来，如以 G7 著称（现在加上俄罗斯就是 G8 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国家间达成的保障法治和贸易自由的国际协议，如那些现在被包括进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于新自由主义计划在全球舞台上的活跃都至关重要。

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民主抱有极大怀疑。他们认为，多数人的治理会对个人自由和宪政自由带来潜在威胁。民主被视为奢侈品，只有在相对富足而且存在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以保障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民主才有可能。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专家和精英的统治。政府强烈偏向行政命令和司法判决，而不是民主和议会的决策。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于把央行等核心机构与民主压力隔离开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聚焦于法治与对合宪性的严

格阐释，因此冲突和对立就必须通过法院调解。任何问题的解决或补救方案都要由个体通过法律系统来寻求。

张力和矛盾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一般理论存在一些不明朗和冲突。首先，如何理解垄断权力就是一个问题。竞争通常会导致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局面，因为强势企业会排挤掉弱势企业。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理论家觉得这不是问题(他们说，这将使得效率最大化)，因为没有什么实质性壁垒阻碍竞争者的进入(这个条件一般很难实现，而国家或许因此就不得不一直在这方面下工夫)。至于所谓“自然垄断”的问题，就更棘手了。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如果存在相互竞争的电力网络、输气管道、自来水和排污系统、交驳铁路，将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供给、通道、定价上的国家调控在上述领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部分松绑或许是可能的(比如，允许竞争性生产者为同一条线路提供电力，或在同一条轨道上安排火车)，但产生牟取暴利或肆意滥用的可能性(2002 年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的情况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或产生严重混乱的可能性(像英国铁路的状况)，却真实存在。

第二个聚讼纷纭的议题是关于市场失灵。这发生于以下情况：个体或公司为逃避支付其全部成本，在市场外推脱责任(用技术用语说，这些责任被“外部化”了)。经典事例是污染问题：个人或公司为逃避成本而将有害废料倾倒入不收费的周边地区，结果肥沃的生态系统可能受到腐蚀或摧毁。在工厂中直接接触有害物质或面临物理伤害，可能会影响人的健康，甚至使得工厂中没有健康的劳工。新自由主义者虽然承认问题，有些人也同意有

限的政府干预，但其他人却主张不作为，因为治疗几乎将肯定比疾病更糟糕。但是，大多数人会同意，如果允许干预，那么这些

干预也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通过税收政策或刺激、排污交易权等等)。竞争性失败也应作类似处理。合同关系或转包合同关系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交易成本不断上升，举一个例子：对于获取投机利润而言，大型货币投机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同时成本也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当地所有相互竞争的医院都购买了相同的精密仪器却未充分利用，这样便造成成本上升。在这些情况中，通过政府计划、调控和强制协调能有效进行成本控制，但新自由主义者却再次强烈怀疑这些干预。

一般认为，市场中所有行为者都有掌握相同信息的渠道。人们不会假定存在权力或信息的不对称，以至于干扰个人出于自身考虑做出理性经济决定的能力。这一状况在实践中就算出现过，次数也很少；这便带来了许多严重后果。①市场中拥有更多信息和力量的一方可以轻易借此良机获得更多信息和相对更大的权力。此外，知识产权(版权)的建立鼓励了“寻租”行为②。那些版权持有者利用垄断权力设置垄断价格，并且，除非对方付出高昂代价，否则就阻止技术转让。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会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除非政府介入逆转这一趋势。新自由主义假定了完美的信息和一个平等的竞争平台，这看起来要么是出于天真的乌托邦设想，要么是故意混淆视听，最终为的是聚集财富并因而重建阶级力量。

---

①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为其研究赢得诺贝尔奖，他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如何影响到市场行为和结果。

② 寻租(rent seeking)指一种不具有生产性，但能给行为主体带来利益的经济行为。——译者

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变革理论依赖于竞争的强迫性力量推动寻求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组织形式，但这种推动力已经牢牢嵌入企业常识之中，以至于成了一种拜物教信仰：每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这一信念不仅存在于企业中，还存在于国家机器中(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就此而言，它产生了技术改革的独立趋势，这种强有力的趋势可能变成不稳定因素——如果不是反作用因素的话。如果各部门只关心技术创新，并创造出还没有市场的新产品和新的制造方式(新的医药产品首先被生产出来，然后再去发明新的疾病)，技术发展就可能走火入魔。此外，头脑好的非法营业者可以利用技术创新瓦解占据主导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机构；他们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根据自身的金钱利益重塑常识。因此，以下方面存在着内在关系：技术动力、不稳定、社会团结的瓦解、环境腐蚀、去工业化、时空关系的迅速变化、投机泡沫，以及资本主义在内部总体朝向危机形态发展的趋势。①

最后，新自由主义内部还包含着一些有待处理的根本性政治问题。一方面是诱人但异化的(alienating)占有性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渴望有意义的集体生活，这两方面之间产生了矛盾。虽然个体被假定为能够自由选择，他们却并未被认为能够选择去建立强大的集体组织(如工会)，而非虚弱的志愿性结合(如慈善组织)。他们绝对不该选择组织起来建立旨在强迫政府干预或消除市场的政治性党派。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的统

① 见 Harvey,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诸如联邦储备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关键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人们会想到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乌托邦故事《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初版于1626年），其中一个由睿智的长者组成的委员会安排所有重要决定。所以，面对一系列寻求集体干预的社会运动，新自由主义国家本身被迫进行（有时是镇压性的）干预，由此否认了它理应维系的自由。然而，新自由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设置一种秘密武器：国际竞争和全球化可以被用来规训各个国家内部反对新自由主义安排的运动。如果这一武器失败了，那么新自由主义国家必须求助于劝说、宣传，必要时也求助于赤裸裸的强力和政策力量，来镇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这一点恰恰是波兰尼所担心的：自由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计划，最终只能靠权威主义来维持。为了小部分人的自由，大多数人的自由将受到限制。

70

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出于两个特殊理由，我们很难描绘处于新自由主义化时代的国家总体特征。首先，与新自由主义理论规划相悖的系统性偏差不久就变得非常明显，而并非所有偏差都能归咎于已经描述过的国内矛盾。其次，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的进展动力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即它会因时因地做出迥然相异的强制调整。想要从这种摇摆动荡的历史地理状况中概括出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复合图景，毋宁是愚蠢之举。虽然如此，我认为理出几条大致线索还是

能够帮助我们把握新自由主义国家这一特殊概念。

特别有两种情况，重建阶级力量的冲动在实践中歪曲、有时甚至颠倒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一种情况出于为资本主义创造“良好的商业或投资环境”的需要。虽然有些条件可以合理地被视为“阶级中立”（如政治稳定、遵守法律以及法律的公平实施），还有一些条件却明显带有偏颇。这些偏颇尤其体现在仅仅将劳动力和环境视作商品的时候。在发生冲突时，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将站在“良好投资环境”一边，或者反对劳动者的集体权利（或生活质量），或者反对环境自身更新的能力。第二种产生偏颇的情况，源于在冲突发生时新自由主义国家典型地倾向于维护金融体系的信誉和金融机构的偿还能力，而不是维护大众幸福或环境质量。

在充满分歧且差异极大的各种国家实践中，并不总是易于察觉这些系统性偏见。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考虑扮演着重要角色。布什总统鼓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但却强征钢铁关税，为的是帮助其在俄亥俄州（Ohio）获得选举机遇（最终成功了）；外国进口产品被强加限额，为的是缓解国内的不满情绪。欧洲人一方面对农业实施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又在其他所有事情上出于社会、政治甚或美学的考虑而坚持自由贸易。政府的特殊干预偏向特别的商业利润（例如军火交易），而为了在地缘政治上的敏感地区（如中东）产生政治介入和影响，信贷被随意地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考虑到所有这些原因，新自由主义国家中那些原教旨主义者还始终坚持新自由主义教条，这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

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把理论和实践的分歧归之于过渡期的摩擦，反映出不同国家在新自由主义转向以前的不同形

态。例如，共产主义崩溃后的中欧和东欧，状况就很特殊。1990年代，这些国家以“休克疗法”为名进行的快速私有化过程，造成了影响至今的巨大压力。社会民主国家（如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或在二战后的英国）长期保持某些经济核心部门——如医疗卫生、教育、甚至住房供给——不受市场影响，因为对人民基本需要的满足不应该交由市场力量调节，也不应受到支付能力的限制。虽然玛格丽特·撒切尔改变了这一切，瑞典还是抵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要面临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压力，后者千方百计企图让国家采纳新自由主义道路。（像新加坡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这样的）发展型国家，出于非常不同的理由，依靠密切结合于国内和（通常是外国和跨国的）企业资本的公有部门和国家计划，推动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①发展型国家典型地把很多注意力放在社会和物质的基础设施上面。这意味着有更多关于（例如）教育机会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平均主义政策。比如，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被认为是在世界贸易中占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发展型国家在如下方面与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相吻合，即它们鼓励各个公司、企业、区域实体的竞争，并且接受自由贸易的法则，也依赖开放的出口市场。但是，这些国家在建设基础设施以培育良好商业环境这方面，却属于积极的干预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化因此为发展型国家创造了机会，使之有可能依靠发展新的国家干预结构（如鼓励研究和发展），提升它们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化也为阶级构成创造了条件，而随着这一阶级力量的

① P.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R.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M. Woo-Cum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壮大，它就倾向于摆脱国家权力并对其进行重新调整（例如当今的韩国），使之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前进。

随着诸多新的制度安排开始定义世界贸易规则——例如，开放资本市场如今已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条件之一——发展型国家发现自己日益陷入新自由主义的安排中。例如，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进一步将发展型国家带到标准的新自由主义实践的轨道上。而我们已经在英国的情况中看到，如果不对内进行适度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韩国最近就是在和这种压力进行斗争），对外的新自由主义姿态（例如要促进金融资本的运转）就难以为继。但是发展型国家根本不相信新自由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尤其是因为这些国家（如中国）由于没有撤空资本市场，在 1997—1998 年金融危机中损失就相对较少。①

当代关于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的实践，或许最难与新自由主义教条相匹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靠松绑来推动金融机构的扩散影响，但它们接下来常常会不惜代价地保障金融机构的信誉和偿还能力。这种努力部分是因为货币主义被当作国家政策基础（在某些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中，这么做无可厚非）——货币的信誉和稳定性是这种政策的核心要素。吊诡的是，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国家无法承受大规模财政赤字，哪怕正是金融机构本身的错误决定造成了赤字。政府不得不介入并用自认为的“良”币取代“劣”币——这解释了央行的压力，央行必须对国家货币的稳定性保持信心。国家权力经常被用来给予公司经济援助，或转移 73

① J. Henderson, 'Uneven Crises: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ast Asian Turmoil, *Economy and Society*, 28/3 (1999), 327 - 368.

财政失败；例如，1987—1988 年美国储贷危机造成纳税人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的损失，又如 1997—1998 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崩溃造成了三十五亿美元的损失。

在国际上，核心新自由主义国家在 1982 年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协调债务免除的权力；事实上，这意味着保护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免受拖欠债务的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尽其所能避免了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一实践很难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解释，因为投资者原则上应该自己承担错误。头脑更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因此相信，应该废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根执政的最初几年曾严肃考虑过这一建议，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在 1998 年又重提此事。当时摆在里根的财政部长詹姆斯·巴克尔(James Baker)面前的情况是：墨西哥政府濒临破产，而对墨西哥负有债务的纽约市主要投资银行在 1982 年又遭受严重损失。巴克尔感觉到，可以借此为体制注入新活力。他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使墨西哥进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保护纽约银行家避免债务拖欠。优先满足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需求，同时降低债权国的生活水
74 准，这种做法已经在纽约市债务危机期间施行过了。就国际范围而言，这种做法意味着从贫穷的第三世界人民那里榨取剩余，以便偿付国际银行家的债务。斯蒂格利茨讽刺道："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甚至智利这个 1975 年后实践"纯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在 1982—1983 年也受到类似牵连，结果一年里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近 14 个百分点，失业率则蹿升到 20%。"纯粹"新自由主义化不奏效，这种推论并不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考虑之内，尽管智利(还有 1983 年以后的英国)随后的实用主义调整打开了

妥协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了理论和实践的鸿沟。①

通过金融机制榨取贡金，属于老式的帝国主义活动，但却证明对于重建阶级力量助益良多——尤其是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而且并不总是要依靠一次结构调整危机。例如，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向海外借贷的时候，由于这些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以支撑借贷，这一需要就转化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投资（比方说）美国国债。贷款货币利率（如12%）和存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库中的保证金利率（如4%）之间的差别，使得净利资金流向帝国主义中心，发展中国家却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等核心国家倾向于保护金融利益，当后者从他处吸收剩余时，国家往往袖手旁观；此举促进并反映出，这些国家内部的上层阶级正围绕金融化过程巩固起来。但是，干预市场的习惯，以及在金融机构遇到麻烦时伸出援手的习惯，却与新自由主义理论不符。贷方应为自己鲁莽的投资造成的损失埋单，但国家却很大程度上帮助贷方免于损失，反倒是借方要不计社会成本负责偿清。新自由主义理论应该警告说“贷方小心”，但实际上发生的却是“借方小心”。

对于从发展中国家经济榨取剩余的能力，存在着一些限制。受到节俭措施的约束，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周期性经济停滞，其偿还债务的期望就时常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在这些条件下，某些可操控的损失看起来就很吸引人。这便是1989年“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颁布后发生的情况。②金融机构承诺降低35%未偿债

75

①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227; P.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Fourcade-Gourinchas and Babb,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② I. Vasquez, 'The Brady Plan and Market-Based Solutions to Debt Crises', *The Cato Journal*, 16/2 (online).

务作为损失，交换贴现债券（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库支持），确保剩余债务的偿还（换言之，确保债权人以六十五美分兑一美元的比率偿还债务）。到 1994 年，包括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乌拉圭在内的十八个国家同意这笔交易，这能为它们省去六百亿美元的债务。当然，希望是这次债务免除能够刺激经济恢复，从而使得剩余债务能及时还清。麻烦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注意到，所有在债务免除中尝到甜头的国家（虽然许多国家认为和那些银行所能支持的额度相比，免除的债务还太少）还被要求吞下新自由主义体制改革这颗毒药。1998 年墨西哥比索[①]危机、1998 年巴西货币危机、2001 年阿根廷经济全面崩溃，都属可以预料的后果。

最终，我们要面对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麻烦关系。在国内，新自由主义国家必然对一切约束资本积累的社会团结形式产生敌意。在镶嵌型自由主义中获得巨大力量的独立工会或其他社会运动（如大伦敦议会式的当地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得到规训（如果不是摧毁的话），而且是以个体劳动者的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为名。“弹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口号，很难说增加弹性都是不好的，特别是面对局限而死板的工会实践。所以，有些左翼改革者就强烈建议把“灵活专业化”作为出路。[②]虽然有些个别劳动者或许肯定会从中获益，但此举造成的信息和力量不对称，以及丧失简单自由的劳动力流动（尤其是跨国界流动），却将劳工置于不利地位。资本可以占用灵活专业化这一便利手段，获取更弹性的积累方式。“灵活专业化”和“弹性积累”具

76

① 比索（peso）是一些拉美国家的货币单位。——译者

② M. Piore and C. Sable,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有相当不同的含义。①大致结果是造成低工资、增加工作不稳定性、很多时候还造成利益损失和劳动保障损失。此类趋势很容易在所有那些采纳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国家中看到。考虑到对于一切形式的劳工组织和劳动者权利的暴力打击，并且考虑到对于数量众多却基本无组织的劳动力后备军的依赖(这些劳动力来自中国、印尼、印度、墨西哥、孟加拉国等地)，控制劳动力以及维持高度剥削似乎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化道路上的核心因素。正如一贯以来的情况，阶级力量的重建或形成要以劳工为代价。

正是在工作市场中人力资源减少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有关一切福利责任都移还给个人的规定，具有双重有害结果。随着国家逐步停止福利供给，并减少在医疗卫生、公立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作用(这些领域曾经对镶嵌型自由主义而言十分根本)，国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贫困潦倒。②为了强调个人责任，社会保障被大幅缩减；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于个体自己的过失，受害人经常反遭指责。

这些社会政策的主要转变背后，是治理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改变。由于新自由主义对民主持怀疑态度，那么就要找到一种方式来整合政府决策与资本积累动力，整合国家决策与那些正在重建或(如在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形成的阶级力量网络。例如，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已越来越多地造成对公私合营的依赖(这是撒切尔夫人在建立城市发展企业等“准政府机构”以促进经济发展时鼓吹的有力观念之一)。商业和企业不仅与国家密切合作，而且在批准法律生效、决定公共政策、设立规章制度等方面发挥

---

① 见 Harvey,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② V. Navarr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Inequalities: Consequences for Health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mityville, NY: Baywood, 2002).

77 强势作用(主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作用)。通过进行密切有时甚至是秘密的磋商会议，各种将商业和职业利益整合进治理过程的协商模式纷纷出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副总统切尼(Cheney)一直拒绝公开一个磋商团体的成员名单，这个团体帮助布什政府完成2002年的能源政策文件；名单里几乎肯定列有安然总裁肯内斯·雷(Kenneth Lay)①——安然公司被指责蓄意制造加利福尼亚能源危机并从中牟利，后在巨额假账丑闻曝光后破产。因此，从政府管理(独立的国家权力)到治理(更宽泛的国家构造和市民社会中的核心要素)的转变，便是在新自由主义下完成的。②这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实践和发展型国家广泛融合起来。

国家代表性地出台有利于企业的法律和规章，有时这些法规还有利于某些特殊利益——诸如能源、制药、农业综合企业，等等。在许多公私合营的情况中，尤其是在地方性层面，政府要承担大量风险而私人部门却获取大部分盈利。此外，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必要时会诉诸强制立法和治安策略(如反纠察条例)，用以驱散或镇压反对企业力量的集体组织形式。形形色色的监察和治安手段层出不穷：在美国，监禁成为对付下岗工人和边缘群体的关键政府策略。国家的强制武装被用于保护企业利益，并在必要时镇压反对者。这里所说的没有一样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吻合。新自由主义者担心特殊利益群体会败坏和颠覆国家，这种情况却最明显不过地在华盛顿发生了，那里大批企业说客(他们中有很多人利

① Kenneth Lay(1942－2006)，曾任美国安然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主席。——译者

② P. McCarney and R. Stren, *Governance on the Ground: Innovation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the Citi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Prince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3); A. Dixit, *Lawlessness and Economics: 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用了国家就业和更有利可图的企业就业之间的“旋转门”①)成功地促使立法朝有利于他们特殊利益的方向走。虽然有些国家仍然尊重文职部门保持独立传统，这一状况却在各地受到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的威胁。国家和企业力量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代议民主的一切因素受到颠覆，如果不说是被金钱的力量彻底腐蚀的话——虽然就算如此也是合法的。

由于诉诸司法的途径名义上人人平等而实际上极其昂贵(譬如个人起诉过失行为，或某国起诉美国触犯世贸组织条约——手续费可能就要耗费上百万美元，相当于某些贫穷小国的年财政预算)，结果就是天平严重向富人倾斜。司法判决的阶级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当普遍的，如果不说是必然如此的话。②因此不必惊讶，新自由主义下的主要集体行动，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得到规定和表达的——即由非选举(很多情况下是精英领导)的倡议团体谋求各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诸如消费者保护、市民权利、残疾人权利)，实质性的收获都是靠此类方式取得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NGOs 和 GROs)同样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发展壮大，使人们相信，处在国家机器之外和所谓“市民社会”的某些分散性实体之内的对抗，可以成为对抗性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力量源。③新自由主义国家成为霸权的同时，市民社会的概念(通常被认为与国家力量相对立)也成为构造对抗性政治的核心。葛兰西关于国家作

---

① “旋转门”指的是国家公务人员在离职后从事与以前职务相关的盈利活动，借助原先担任公职时的渠道和机会牟取利益。——译者

② R.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③ N. Rosenblum and R. Post (eds.),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S. Chambers and W. Kymlicka (eds.),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统一体的理念，让位于如下理念： 市民社会是反抗国家的中心，如果不是替代性方案的话。

从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新自由主义并不如某些左翼和右翼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认为国家或国家的特殊机构(如法院和治安管理)不重要。①但是，国家机构和国家实践却经历了彻底的重构(尤其是涉及强迫与赞同的平衡、资本力量与大众运动的平衡，以及一方面是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平衡、另一方面是行政权和议会民主力量的平衡)。

但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进展得并非一帆风顺；正是出于这个
79 原因，新自由主义国家似乎要么是过渡形式，要么是不稳定的政治形式。问题的核心是新自由主义宣称的公共目标(所有人的幸福生活)与其实际结果(阶级力量的重建)之间不断增大的差异。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更具体的矛盾需要考察。

1.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国家被认为应该只是设置市场运作的舞台而不进行干预；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国家又被假定要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并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竞争性实体的角色。就后一角色来说，新自由主义国家必须作为一个集体性企业来运作，而这就带来了如何确保公民忠诚的问题。民族主义当然是个很好的建议，但这与新自由主义规划极其不符。玛格丽特·撒切尔面临的就是此般困境，因为在福克兰/马岛战争中——更重要的是在反对欧洲经济整合的战役中——打出民族主义牌，她才可能再度胜选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这种情

① K.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Touchstone Press, 1996).

况屡屡发生，譬如在欧盟内部、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其中巴西和阿根廷的民族主义阻碍了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或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一方面需要靠民族主义而在世界市场上有效扮演企业和竞争性实体的角色，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阻碍了总体上的市场自由。

2. 市场施行过程中的权威主义与个人自由的理想令人不安地并置在一起。新自由主义越是偏向前一方面，它就越难维持在后一方面的正当性，也就越是揭露出其反民主的色彩。与此矛盾并行的是企业间力量关系和个人间(比如你和我)力量关系的日益失衡，如果“企业力量窃取了你的个人自由”，那么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就彻底泡汤。①对于工作环境中的个体是如此，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亦是如此。比如，保持我的健康状况是我个人选择和责任是一回事，而如果满足我在市场中需求的唯一方式，是向那些低效率、庞大且高度官僚化、还高额盈利的保险公司支付昂贵的保险费，则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这些公司有权规定新的疾病种类，来配合市场上新上市的药剂，肯定是哪里不对劲了。②在这种环境下——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当事情开始出错时，作为一项平衡各方利益的举措，维持正当性和赞同开始变得愈发困难，可能轻易就崩溃。

3. 虽然维持金融体系的信誉或许至关重要，但其中不负责任和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却产生了投机风险、金融丑闻和周期性不稳定。华尔街和近年的假账丑闻已经摧毁了信心，并给管理当局带来国际和国内的严重问题，不知道如何以及何时该介入干预。

---

① Court, *Corporateering*.

② D. Healy, *Let Them Eat Prozac: The Unhealth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Depre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4).

国际自由贸易需要为此制定全球性法规，而这就要求某种全球性治理(例如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为了避免危机，金融系统的松绑促生了再管制行为。①

4. 虽然竞争的种种德性被置于首位，事实却是在少数几个集中的多国企业内部形成越来越多的寡头垄断力量、垄断力量、跨国力量：软饮料的竞争被缩减为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竞争，能源工业被缩减为五个跨国大企业，而少数媒体巨头控制着大部分新闻信息，其中很多新闻接着就变成纯粹的宣传。

5. 在大众层面上，朝向市场自由和一切事物商品化的推动力很容易走火人魔，并造成社会不和谐。如撒切尔夫人所说，破坏一切形式的社会团结，甚至破坏社会概念本身，这一过程给社会秩序留下了巨大的口子。因而，与社会混乱作斗争并控制混乱造成的反社会行为(如犯罪、淫秽制品，或虚拟奴役他人)，变得特别困难。将“自由”化约为“企业自由”，释放了所有波兰尼认
81 为与正面自由密不可分的“负面自由”②。对此，回应必然是重建社会团结，虽然是沿着不同路线进行——因此，人们对宗教和道德方面以及新形式的联合论方面的兴趣(如围绕权利和公民身份问题)开始复苏，甚至过去的政治形式也开始复苏(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等等)。纯粹的新自由主义总是威胁着要从各种权威式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召唤出自己的复仇女神。作为达沃斯新自由主义年度集会(这个集会曾经纯粹是为

---

① W. Bello, N. Bullard, and K. Malhotra (eds.), *Global Finance: New Thinking on Regulating Speculative Markets* (London: Zed Books, 2000).

② 这里的“正面自由”和“负面自由”原文分别是 positive freedom 和 negative freedom，若译成“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容易和 Isaiah Berlin 所做著名区分混淆。故此处译成“正面自由”和“负面自由”。——译者

了庆功)的组织者，施瓦布(Schwab)和斯马亚(Smadja)早在1996年便警告过：

> 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越来越多反对经济全球化后果的势头——特别是在工业民主国之内——正在威胁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稳定，并带来破坏性影响。这些民主制国家弥漫着无助和焦虑的情绪，说明一帮新的民粹主义政客正在抬头。这股势力很容易就会变成骚乱。①

新保守主义的回应

如果新自由主义国家本身是不稳定的，那么有什么能取代它？在美国，种种迹象表明一种有特色的新保守主义可以回应这个问题。汪晖也在从理论上反思中国近年来的历史时写道：

> “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密切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名目的相互替换(甚至相互矛盾)显示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权力架构的转变。②

---

① K. Schwab and C. Smadja, cited in D. Harvey,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70.

② H. Wang,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4. [见《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载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年版，99页。——译者]

这是否预示着世界范围内更大的治理结构的重构，还有待观察。但是，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中国和新加坡等权威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如何与美国和英国等新自由主义国家日益明显的权威主义汇合起来。因此，我们就要考察新保守主义
82 如何在美国发展成一种方案，回应新自由主义国家固有的不稳定性。

像他们之前的新自由主义者一样，“新保守主义者”长期以来在大学(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芝加哥大学影响特别大)和资金雄厚的智囊团中培育他们关于社会秩序的特别观点，并借助影响力大的刊物(如《观察》)传播其观点。①美国新保守主义偏向企业力量、私人企业和阶级力量的重建；所以新保守主义在精英统治、对民主的不信任、维持市场自由等领域和新自由主义规划相当一致。但是，新保守主义离开了纯粹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在两个根本方面重塑了新自由主义实践：第一，新保守主义认为秩序是解决个人利益混乱的方案；第二，新保守主义过分强调道德感，认为这是维系政治体安全免受国内外威胁的必要社会纽带。

新保守主义关注秩序，就此而言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揭开权威主义面纱的新自由主义。但是，新保守主义还是为解决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矛盾提出了独特的办法。如果像撒切尔夫人最初所说的那样，“没有社会，只有个人”，那么个人利益的混乱最后很快便会颠覆秩序。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竞争的混乱状态、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混乱状态(个人的希望、欲望、焦虑和恐惧；个人对生

① J. Mann, *The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New York: Viking Books, 2004); S. Drury,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活方式、性偏好和取向的选择；个人自我表达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会变得越发不可收拾。这甚或将导致一切团结纽带的崩溃，把社会推向无政府状态与虚无主义的边缘。

面对这种局面，为了恢复秩序而采取某种程度的强制措施显得很有必要。所以，新保守主义强调军事化，视之为救治个人利益混乱的药方。就此而言，他们很可能夸大了国家完整和稳定所面临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或想象的威胁、国内和国外的威胁。这在美国引发了霍夫斯塔特（Hofstadter）所谓“美国政治的偏执狂风格”，美国在其中被描绘为受到来自内外敌人的围攻和威胁。①这种政治风格在美国由来已久。新保守主义并不是新东西，从二战起它便在强大的军工复合体中找到一席之地，这种军工复合体从永久军事化中获取利益。但是冷战的结束却出了一道题：还有谁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中国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开始成为两大首要的外部敌人，而国内政治异议运动（在韦科被消灭的大卫教派、促成俄克拉何马爆炸的民兵运动、罗德尼·金在洛杉矶被逮捕后引起的社会骚乱，还有1999年西雅图爆发的骚乱）则成为国内更强大的监督和治安的打击目标。最终，1990年代确实出现了来自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威胁并在“9·11”事件中达到顶点，这一威胁成为永久“反恐战争”的核心焦点，要求在国内和国外布置军事化以确保国家安全。虽然针对纽约世贸中心的两次攻击要求某些治安/军事手段对此威胁进行回应，新保守主义的上台却进行了影响深远、并且在很多人看来都做过头的回应，即在国内和国外展开广泛的军事化。②

① R.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dn.).

②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ch. 4.

新保守主义长期以来都盘旋在四周，作为反对由个人主义典型性地推动的道德放任。所以，新保守主义试图重建道德责任感，使某些更高秩序的价值占据政治体的稳定核心。这一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预言到了，后者“通过质疑干预主义经济管理模式的根本政治基础……把道德、正义和权力的议题带回(虽然是以其独特的方式)经济领域”。①新保守主义者做的事情是改变就此类问题展开讨论的“独特方式”，他们的目标是消除个人利益的混乱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而个人利益的混乱局面则根本上是由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在建构或重建主导阶级的力量方面，新保守主义并没有悖离新自由主义的议事日程。但新保守主义通过围绕一套自洽的道德价值建立赞同的氛围，从而寻求阶级力量的正当性与社会控制。由此立刻引发的问题是，何种道德标准应该占主导？例如，诉诸人权法案的自由主义体系肯定是可行的，因为毕竟人权激进主义(activism)如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所说“不仅仅是介入保护人权，而且保护道德共同体”。②在美国，“例外论”教条与市民权利行动论的悠久历史，肯定产生过许多围绕市民权利、全球饥饿、慈善参与、传教热情等议题进行的道德运动。

但是，如今成为新保守主义核心的道德价值，最好理解为出自一种建立于1970年代的特殊联盟：一方面是精英阶级与旨在重建阶级力量的商业利益之间的联盟，另一方面是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道德多数派”的联盟。那些道德价值集中于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正确、(某种福音派)基督教、家庭价值、反堕胎议题，

① Chang, *Globalisation*, 31.

② M. Kaldor,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1999), 130.

以及对抗新的社会运动——诸如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平权行动、环境保护主义。虽然此种结盟在里根任内主要是策略性的，但在克林顿任期间的国内动荡，却使得道德价值论辩提升为小布什的共和党议程的首要考虑。如今，这些论辩形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道德规划核心。①

不过，如果把这种新保守主义转向视为美国的例外或独特情况，那就错了——虽然美国确实有一些别处没有的特别因素在发挥作用。在美国国内，这种道德价值主张强烈依靠诉诸国家、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等理想，而这些理想决不仅限于美国才有。而这重新将新保守主义化过程中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尖锐地带回到我们面前： 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微妙关系。原则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民族并不友好，哪怕后者能够支持强大国家的理念。如果新自由主义想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切断在镶嵌型自由主义中维系国家和民族的纽带；对于采取社团主义形式的国家（如墨西哥和法国），尤其如此。墨西哥革命制度党（the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in Mexico）长期负责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但是作为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国家和民族日益脱离，甚至相当多民族起而反对国家。当然，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持久性特征，如果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其销声匿迹，反倒有些奇怪了；实际上，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对新自由主义化的后果。右翼法西斯政党的兴起便是一例，它表达了欧洲反对外来移民的情绪。更恼人的问题是印尼经济崩溃之后族裔民族主义的抬头，造成了对当地华裔少数民族的野蛮袭击。

但是，我们已经表明，新自由主义国家需要某种民族主义来

① Fran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延续自身的存在。由于被迫在世界市场上扮演竞争性行为人的角色，而且要设法建立最好的商业环境，新自由主义国家就动用民族主义为其效力。在争夺有利地位的全球竞争中，会产生暂时的赢家和输家，而这一过程本身就可以成为民族自豪感或民族自我反省的来源，各国体育竞赛中产生的民族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在中国，为了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有利的国家地位(如果不是霸权)，在争夺过程中诉诸民族主义情绪是很明显的(就像中国为了北京奥运会而对运动员进行高强度训练)。民族主义情绪在韩国和日本也同样高涨，在两国，这一情绪可被视为救治以往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遭遇瓦解的社会团结的纽带。强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在一些旧民族国家(如法国)涌现，这些民族国家如今组成了欧盟。近来，宗教和文化民族主义为印度民族主义党(the Hindu Nationalist Party)提供了道德支撑，使后者成功在印度增加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对于伊朗革命及随后的权威主义转向而言，对道德价值的诉求并没有导致彻底放弃以市场为基础的实践，虽然伊朗革命旨在反对放任市场个人主义的堕落。类似的冲动也存在于长期持有道德优越感的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它们认为个人主义是
86 “放荡”，认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不成体统。新加坡的例子特别有启发性，它结合了市场中的新自由主义与严厉压迫性和权威性的国家力量，同时诉求基于民族主义理想的道德团结——即作为被围困的岛国状态(在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后)、儒教价值，最近还得加上独特的世界主义伦理形式，以适应新加坡近来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地位。①英国的情况特别有意思，玛格丽特·撒切尔

①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 – 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通过福克兰/马岛战争，并凭借其与欧洲的敌对姿态，诉求民族主义情绪支持她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虽然她设想的是英格兰和圣乔治的理念(将苏格兰和威尔士变成对立方)，而不是英联合王国的理念。

很明显，虽然新自由主义和某种民族主义的暧昧联系存在着危险，新保守主义强烈拥护一种国家道德目标的做法却更加危险。每个国家都准备依靠严厉强制的实践，但同时每个国家都拥护自己独特且被认为更优越的道德价值，这样一幅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相互竞争的图景并不让人放心。貌似是解决新自由主义矛盾的方案，很容易就变成新的问题。就算不是直接的权威主义(如普金 [Vladimir Putin] 在俄罗斯的行为)，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传播(虽然各地的社会形态迥然有异)也强化了下述危险，即沦为相互竞争甚或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如果这里有什么必然因素在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与其说出于所谓民族差异具有的永恒真理，不如说是出于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因此，为避免灾难性后果，就需要拒绝以新保守主义方案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的矛盾。然而，这假定了还有别的替代性方案： 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

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

新自由主义化中的运动地图

87 想要为1970年以来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勾勒一幅运动地图，相当困难。首先，许多采取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国家，都仅仅是部分转向——有的将更大的弹性引入劳动力市场，有的为金融机构松绑并支持货币主义，其他地方则推行国有部门的私有化。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开始愈发明显，紧随（前苏联解体等）危机而进行的整套改革，有可能随后又被逐步重新调整过来。而在重建或建立一个独特的上层阶级力量的斗争中，随着政治力量易手、或随着影响手段在此处或彼处削弱或加强，就会发生各种形式的扭曲和颠倒。因此，任何运动地图都将勾画出此起彼伏的不均衡地理发展，为了理解本地变化如何与更广泛的趋势相关，了解这一发展面貌就很有必要。①

国家、地区或城市之间的区域竞争——谁有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或最好的商业环境——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相对来说不重要。1970年以后，随着更多流动而开放的贸易关系体系的建立，此类竞争开始变得重要。新自由主义的总体进程因此借助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机制得到了极大推动，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迫使他人也跟随其脚步。层出不穷的创新把各个国家（日本、德国、中

国、美国）、地区（硅谷、巴伐利亚、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班加罗尔［Bangalore］、珠江三角洲、博茨瓦纳）甚或城市（波士顿、旧金山、上海、慕尼黑）带到了资本积累的前哨。可是，竞争的好处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竞争的过程却给全球资本主义带来剧烈动荡。但同样正确的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强大动力已经从一些主要中心释放出来（甚至已经被利用起来）。

很明显，英国和美国是带头人，但新自由主义转向在这两个国家中也绝不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撒切尔夫人可以成功地将社会住房和公用事业私有化，但诸如国家医疗体系和公立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核心领域，还是基本不受影响。在美国，1960 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妥协”几乎从未实现过欧洲社会民主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反对里根的声音就不那么强烈。不管怎么说，里根最关心的还是冷战。他发起了一场由财政赤字资助的军备竞赛（“军事凯恩斯主义”），以便投合其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多数选民的特殊利益。尽管这肯定与新自由主义理论不符，不断增加的联邦政府赤字还是为废除社会规划（一个新自由主义目标）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除了一堆关于如何救治经济问题的修辞，1980 年代的英国和美国都未能在经济上有很好表现，这表明新自由主义不是资本家们所期待的方案。固然，通胀率确实下降了，利率也下降了，但取得这点成绩的代价却是高失业率（里根任内美国失业率平均为 7.5%，撒切尔夫人任内英国失业率超过 10%）。削减国家福利和基础设施开支，使许多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了。总的结果是低增长与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糟糕混合。拉丁美洲在 1980 年代初受到了第一波强制新自由主义化浪潮的侵袭，对大多数人来说，结

① Peck,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果是一个经济滞胀、政治混乱的“失落十年”。

实际上，1980 年代属于日本、东亚经济“小龙”和西德，它们是全球经济的竞争动力源。它们在没有施行全盘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让人们很难辩称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是救治经济滞胀的良方。诚然，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总体
89 上奉行了货币主义路线(西德联邦银行在对抗通胀方面特别卖力)。贸易壁垒的逐步减除创造了竞争压力，最终在那些总体上抵抗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家中，甚至也产生了所谓“潜行的新自由主义化”的隐蔽过程。例如，1991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条约为欧盟内部组织广泛设置了新自由主义框架，但如果没有来自英国等奉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国家的压力，或许这一条约也是不可能的。但在西德，工会仍然强大，社会保障仍然保留，工资也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推动了西德的技术创新，并使其在1980 年代的国际竞争领域中保持领先(虽然这也导致了技术引起的失业现象)，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西德成为位居全球前列的国家。在日本，独立工会力量弱小或根本不存在，劳动力剥削率很高，但国家对技术改革的投资以及企业和银行的紧密关系(这种安排同样在西德很合适)，在 1980 年代产生出惊人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其出口产品由英国和美国埋单。因此，1980 年代此类增长并不依赖于新自由主义化，除了以下微不足道的一点： 全球贸易和市场更大的开放性提供了一个环境，在其中，日本、西德和东亚“小龙”出口导向的成功故事能够更轻易地在升温的国际竞争中延续下去。到 1980 年代末，那些曾经更彻底地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不难得出结论认为，西德和亚洲的积累“体制”值得效仿。在亚洲，日本模式很大程度上首先被“四小龙”效仿(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接着被泰

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效仿。

然而，西德和日本的模式并未推动阶级力量的重建。1980 年代英国以及特别是美国的社会不平等加剧，而在这些地区受到遏制。尽管美国和英国的生产率很低，但劳工生活标准还是持续下降，而上层阶级则过得越来越好。例如，美国行政总裁们的薪酬，就令担任类似岗位的英国人很嫉妒。在英国，一批新的企业金融家开始聚拢大量财富。如果目标是要为上层精英重建阶级力量，那么新自由主义显然是很好的方案。因此，一个国家是否要推动新自由主义化发展，既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西德和瑞典的强大工会组织会遏制新自由主义化），也取决于资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这一程度在韩国就很大）。

90

阶级力量借以转变或重建的手段，在 1980 年代被逐渐但不均衡地得到实施，并在 1990 年代巩固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有四个方面非常关键。第一，向更开放的金融化过程转变，始于 1970 年代并于 1990 年代期间加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内，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发展迅速，但传播过程却是不均衡的（图 4.1），通常取决于哪里的商业环境更好。金融市场经历了强烈的创新浪潮以及国际范围内的经济松绑，不仅成为重要的协调手段，而且提供了获取并聚集财富的方式；它们成了重建阶级力量的首要手段。1980 年代曾经很好地为西德和日本服务的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今遭到了破坏并被企业和金融市场（证券交易所）之间日益连通的关系取代。在此，英国和美国成为获益方。1990 年代，投机土地和房地产方面的崩溃致使日本经济陷入混乱，银行部门处境堪忧。德国仓促的统一制造了诸多压力，而德国之前占有的技术优势也丧失了，使其为了生存便必须破坏自身的社会民主传统。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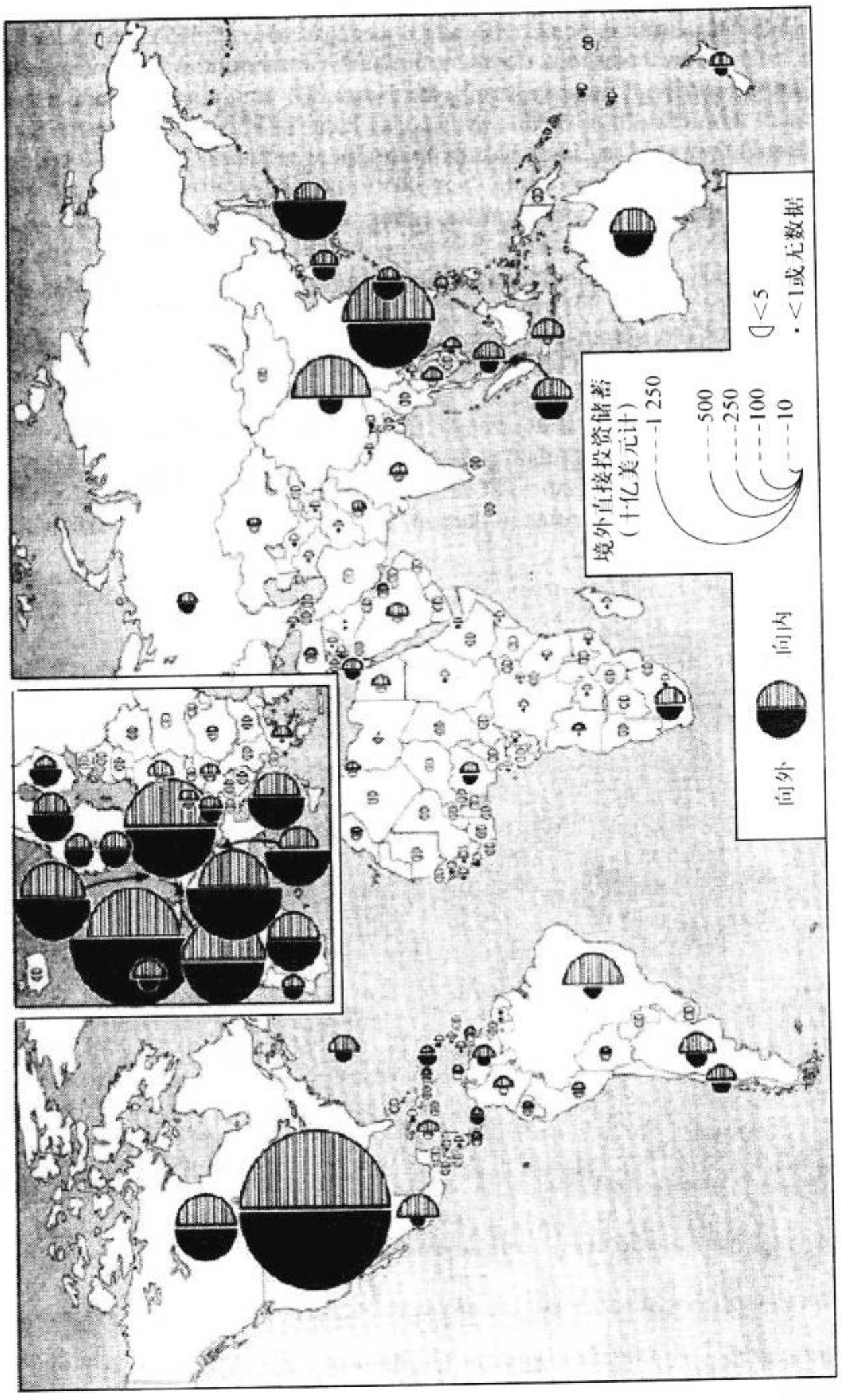


图 4.1：全球境外直接投资版图，2000

来源：迪肯（Dicken）：《全球转变》

第二，资本日益增加在地理上的流动。这要部分归功于平常但关键的一个事实：运输和交通成本的迅速降低。而种种人为壁垒——诸如关税、外汇控制，甚至包括边境等待时间（欧洲撤销等待时间的举措带来巨大影响）——的逐步减少，也为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提供了便利。虽然有着巨大的不平衡（例如，日本市场仍受到保护），总体趋势是借助种种国际协议——其中以1995年生效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当时一年内有超过一百个国家签署了协议）为代表——推动贸易协议朝标准化方向发展。对（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资本流动更加开放，给所有国家施加了压力，要求各国看管好商业环境的质量，这是决定各国在竞争中胜利的关键条件。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新自由主义化程度作为衡量良好商业环境的尺度，使得各个国家被迫逐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①

第三，克林顿任期内，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三位一体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能够劝说、哄骗与强迫（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行的结构调整规划）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②美国还利用优先进入其庞大消费市场这根胡萝卜，劝说许多国家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进行经济改革（有时是通过双边贸易协议）。这些政策助推了美国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依靠技术革新浪潮推动所谓“新经济”的兴起，看上去美国找到了解决方案，并且其政策似乎也值得效仿，虽然充分就业目标的相对达成，是以降低工资和减少社会保障为条件的（没有健康保险的人群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福利供给的缩减（克林顿对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众所周知的福利体系"进行严厉改革)开始给美国带来利益，而把竞争压力加到那些更严格的劳动力市场上，包括大部分欧洲地
93 区(除了英国)和日本。然而，美国成功的真正秘密是它现在可以从其驻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和企业机构(同时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额收益。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贡金，铸就了美国1990年代的大量财富。(图1.8和1.9)①

最后，新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教条的全球传播，产生了极其有力的意识形态影响。早在1982年，凯恩斯主义经济已经被排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门外。198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在此受到过训练——都与新自由主义规划基本保持统一口径，强调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胀和稳定公共财政(而非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

上述方面最终在1990年代中期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中统一起来。②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被定义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日本和欧洲(更别提世界上其他地区了)被施加很大压力，要它们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因此，正是来自自由主义左派的克林顿和布莱尔，对于巩固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出力良多。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这一体制性推动力的顶点(尽管在地区性制度调整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之前欧洲签署的马斯垂克条约同样很重要)。在程序上，世界贸易组织设置了新自由主义标准和全球经济互动的规则。但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打开尽可能多的世界地区，让资本自由流动(虽然总是打着保

① Duménil and Lévy, 'The Economics of US Imperialism'.
②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护重要“国家利益”的警告条款），因为这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力量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贡金的根基。

上述任何一点都不特别吻合新自由主义理论，除了一点：强调预算限制并继续与通胀作斗争，虽然到1990年代通胀几乎不存在了。当然，总是存在种种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可避免地使得想 94
要以纯粹方式实践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企图受到干扰。虽然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的结束给帝国主义对抗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却并没有结束各个大国在地缘政治上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致命表演，尤其是在如中东等控制关键资源的地区，或者是在社会和政治动荡严重的地区(如巴尔干)。然而，这却缓解了美国有关支持日本和东亚经济的承诺，美国过去把这些地区视为冷战的前线阵地。1989年以前，美国在韩国和台湾地区扮演经济援助者角色，而它在1990年代的印尼和泰国便不是如此了。但是，甚至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之内，还是有许多要素——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G7的活动——与其说扮演新自由主义体制的角色，不如说是原生力量的中心，各个力量群体或力量群体的联合借此追求特殊利益。新自由主义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批评从未停止。许多协议已准备介入干预货币市场，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就意在人为调低美元对日元的兑换率，但接着马上有“反广场协议”(Reverse Plaza Accord)，力图将日本从1990年代的低迷状态中解救出来。这些例子表明，试图通过干预来稳定金融市场的努力已经开始了。①

金融危机既是地方性的，也是蔓延性的。1980年代的债务

① R.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危机不仅限于墨西哥境内，还影响到了全世界(见图4.2)。①而在1990年代，两次相互联系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一条不均衡新自由主义化运动的负向轨迹(negative trace)。例如，1995年袭击墨西哥的“龙舌兰风暴”几乎立即扩散，给巴西和阿根廷造成毁灭性影响，而在智利、菲律宾、泰国和波兰也能感受到余波。很难清楚解释这种扩散模式何以发生，因为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和投机预期并不必然取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不受管制的金融化过程显然引起了扩散危机的严重危险。金融家的“一窝蜂心态”(没有人希望成为货币贬值的牺牲品)可能靠自
95 身实现预期。这些活动可以采取侵略性或防御性的表现形式。
96 货币投机者迫使欧洲政府在1993年7月放宽欧洲汇率机制，这些投机者借此赚了几十亿；同年10月，乔治·索罗斯凭借打赌英国无力将英镑控制在汇率机制限度内，一个人就在两周内赚了近十亿美元。

1997年，金融危机第二波也是更大的一波浪潮始于泰国，当时房产投机市场崩溃，引起了泰铢贬值。危机首先波及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然后波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爱沙尼亚和俄罗斯受到重创，紧接着巴西经济崩溃，给阿根廷带来严重和持久的后果。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土耳其也受到了影响。似乎只有美国未受影响，虽然甚至美国也为救助一种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聘请了两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担任核心顾问)，它在意大利汇率流动时下错赌注——而付出了将近三十五亿美元。

在1997—1998年，“发展型国家”推动的整个“东亚积累制

① S. Corbridge, *Debt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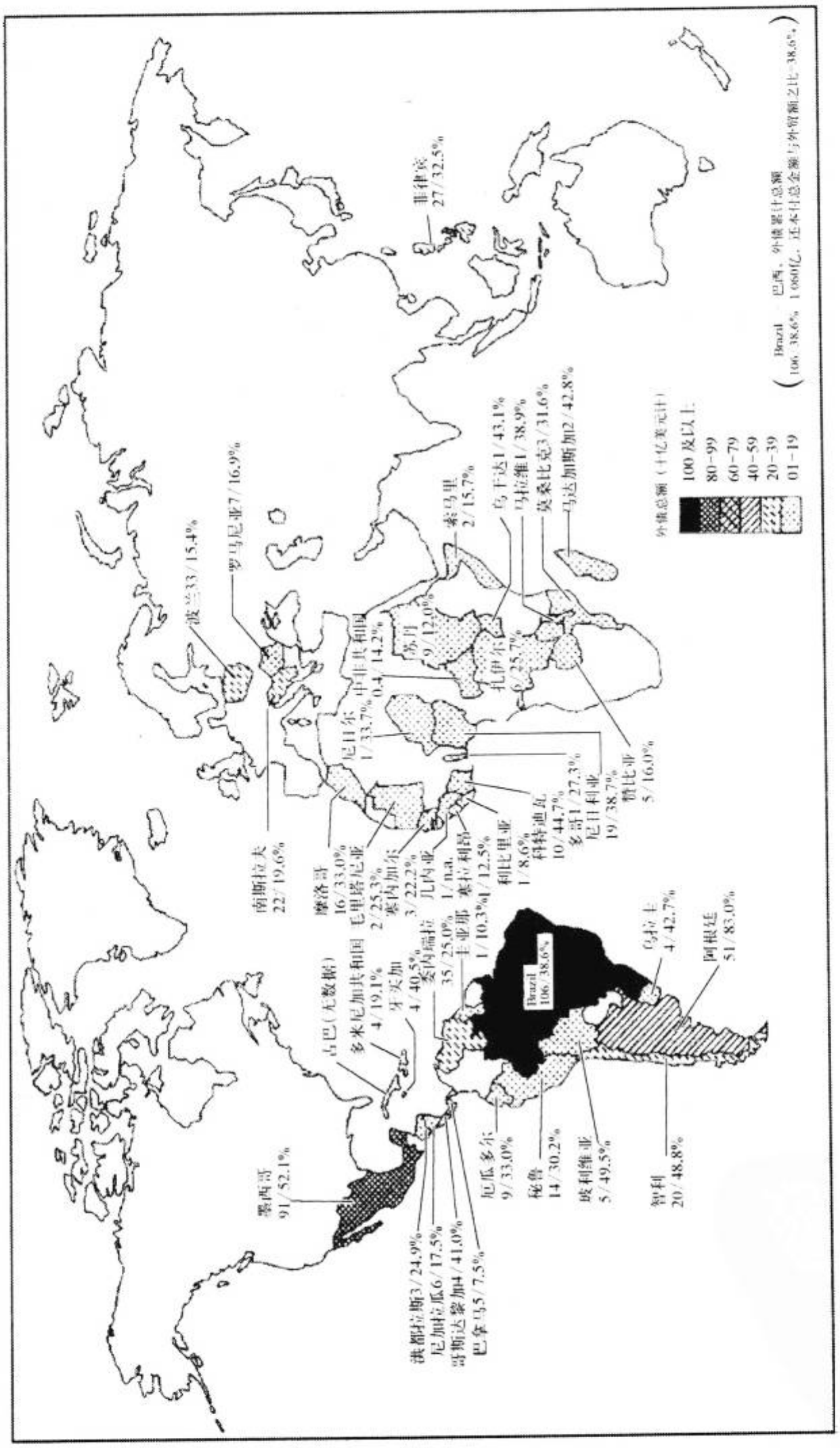


图 4.2：1982—1985 年国际债务危机

来源：科布里奇（Corbridge）：《债务与发展》

度”遭到了考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

> 随着危机的扩大，失业率飙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滑，银行关门。韩国失业率上升了四倍，泰国上升了三倍，印尼则上升了十倍。在印尼，1997 年还在工作的男性，到了 1998 年 8 月有将近 15%失去了工作，主要岛屿爪哇的城市地区经济崩溃更为严重。在韩国，城市贫民几乎翻了三倍，有近四分之一人口陷入贫困；在印尼，贫困人口也翻了一倍……1998 年，印尼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13.1 个百分点，韩国下降了 6.7 个百分点，泰国下降了 10.8 个百分点。危机过去三年后，印尼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比危机发生前低7.5%，泰国则低 2.3%。①

随着印尼国内生产总值下跌而失业率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干预，通过废除食品和煤油补助实施节俭。随之而来的骚乱和
97 暴动将“国家的社会结构撕得粉碎”。以华裔印尼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十年来一直遭到广泛谴责。虽然最富有的华裔经济精英已逃往新加坡，一波复仇浪潮还是席卷了当地的华裔少数群体，对其进行烧杀抢掠，因为族裔民族主义的情绪让人们凶神恶煞地寻找为社会崩溃负责的替罪羊。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对此次危机的标准解释是，因为有太多政府干预以及国家和商业之间的腐败关系（“裙带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是要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

①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57.
② Chua, *World on Fire*.

金组织就此行动，不计灾难性后果。对于此次危机的另一种看法是，激烈的财政松绑和未能对放任和投机的证券投机建立充分管制，是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后一种观点证据充分：那些还没有放开其资本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受到的影响远远小于那些开放了资本市场的国家，诸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此外，马来西亚忽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强制进行资本控制，结果恢复速度很快。①韩国同样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工业和财政重建的建议，也开始了快速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为什么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化，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受害者越来越得出阴谋论的答案：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初告知亚洲国家开放市场给短期活跃资本。这些国家照做了，钱流进来了，但一眨眼又流出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后说，应该提高利率、紧缩财政，由此便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受影响的国家以折本价甩卖其资产……甩卖过程由一些金融机构一手操控，正是这些金融机构拨出资本以促成危机。于是，这些银行依靠甩卖处于困境的公司或分离这些公司获取大笔资金，而它们起初引导这些钱进入这些国家时，也获得了大笔资金。②

在这种阴谋论观点背后，以纽约为基础的对冲基金的角色还基本

---

① Henderson, 'Uneven Crises';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99, 在如下见解上取得一致："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是导致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

②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29 - 130.

未得到考察。如果索罗斯和其他投机者能够下赌注认为欧洲政府
98 无力维持在汇率机制限额之内，并借此捞得数十亿，那么对冲基金为什么不能发动一场不仅针对东亚和东南亚政府，而且针对某些全球资本主义成功企业的攻击呢？毕竟对冲基金握有从银行得来的数十亿美元的融资基金，它们很容易就能否认这些政府和企业的资产折现能力。结果贡金大量流入华尔街，在美国国内储蓄利率下滑的时候促使股票市价上涨。在许多地区宣告破产之后，一波外国直接投资的浪潮涌进来，以低价位悉数收购了所有现有企业或部分企业(如大宇汽车)。斯蒂格利茨拒绝了阴谋论解释，提出一种“更简单”的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反映了西方金融共同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①但他忽略了对冲基金的作用，而且，他经常哀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副作用，却从未想过这种现象可能正是新自由主义化存在的理由。

来自前线的急函

墨西哥

从1929年到2000年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担任总统，期间革命制度党一直是墨西哥唯一的执政党派。这一政党创建了社团主义国家——这种国家能熟练地组织、拉拢、收买、必要时镇压工人中的反对运动以及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反对运动，而这些人过去是革命的基础。革命制度党追求一种国家

①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29－130.

导向型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关注进口替代型经济以及对美国的良好贸易出口。运输、能源、公共服务和某些基础工业(如钢铁)，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垄断型国家部门。1965 年开始，马圭拉规划(主要是让美国资本在墨西哥境内进行生产)控制外国资本的进入，所使用的廉价劳动力不受任何限制，既没有关税也没有加诸商品流动的限制。虽然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增长的好处也没有散布很远。墨西哥并不是镶嵌型自由主义的典型，而是某种程度上利用再分配收入来间歇性报偿一些难以控制的团体(农民、工人、中产阶级)。政府在 1968 年对学生抗议社会不平等运动的暴力镇压，留下了苦涩的遗产，威胁了革命制度党的正当性。但是，1970 年代阶级力量的平衡开始改变，经济利益集团增强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加深了与外国资本的联系。

1970 年代的全球危机严重影响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反应是想办法扩大公有部门：接管倒闭的私人企业，维持其就业来源以避免工人阶级骚乱的危险。政府企业在 1970 年到 1980 年间增加了两倍以上，员工也翻了一番。但是这些企业持续亏损，政府不得不靠借贷来资助它们。纽约银行有足够的石油美元用来投资，此刻向墨西哥伸出援手。墨西哥有很多油田，纽约银行贷款给这个国家是笔好买卖，而墨西哥的对外债务则从 1972 年的六十八亿美元上升到 1982 年的五百八十亿美元。①

接着便是沃尔克高利率政策的实施，美国的经济衰退使其减少了对墨西哥产品的进口，石油价格暴跌。墨西哥政府收入下降，还本付息的代价增加。1982 年 8 月，墨西哥宣布破产。大量

① Vasquez, 'The Brady Plan'.

资本早已外逃，预示比索进一步贬值；总统波提洛(Portillo)采取紧急措施将银行国有化。①经济精英和银行家不赞成此举，几个月后担任总统的德·拉·马德里(De la Madrid)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他选择和商界站在一起。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未必是革命制度党的政治力量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的。马德里一心改革，不太在意革命制度党的传统政治，反倒和资产阶级以及外国利益集团关系密切。詹姆斯·巴克尔(James Baker)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撮合到一起，用这种新型组合经济援助墨西哥脱离险境，但这带给他很大压力。这些机构不仅坚持预算节俭；它们还首先坚持要求大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如私有化、重新组织金融体系以符合外国利益、开放国内市场给外国资本、降低关税壁垒、建立更弹性的劳动力市场。1984 年，世界银行历史上第一次在同意贷款给一个国家的同时，还要求对方进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德·拉·马德里于是开放墨西哥给全球经济——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实施节俭计划。结果造成了釜底抽薪的影响：

> 从 1983 年到 1988 年，墨西哥人均收入每年下降 5 个百分点；劳工的实际工资价值下降了 40%到 50%；通货膨胀在 1960 年代还徘徊在 3%到 4%，1976 年后上升到 15%，有些年甚至超过了 100%……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的财政问题和国家经济调控方式的重新调整，国家在公共福利上的开支降低了。食品补助仅限于提供给最贫穷的群体，公立教育和医

① D. MacLeod, *Downsizing the State: Privatization and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Reform in Mexico*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疗卫生的质量停滞不前，甚至下滑了。①

在1985年的墨西哥城，这意味着资源“极度匮乏，对于首都的城市公用事业开支直线下降，交通方面下降了12%，饮用水方面下降了25%，医疗服务方面下降了18%，垃圾处理方面下降了26%”。②随后的犯罪浪潮使墨西哥城在十年内从一座安宁的城市变成拉丁美洲一切城市中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这是对十年前纽约城遭遇的重演，虽然这一次很多方面还要不堪。很久以后，在一次象征性事件中，墨西哥城向朱利亚尼的顾问团提供了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合同，请教他们如何应对犯罪现象。

马德里发现，摆脱债务困境的方式之一是变卖国有企业，借此偿还债务。但是，向私有化方向迈进的最初几步走得小心谨慎。私有化过程整个重构了劳动力契约，这激起了冲突。1980年代爆发了数次劳工暴动，但均被政府无情镇压。1988年，萨利纳斯(Salinas)担任总统，加大了对于有组织劳工的打击力度。几位劳工领袖被以贪污罪监禁，而更听话的新领袖被安排在革命制度党控制的核心劳工组织中。政府不止一次调度军队来打击罢工，有组织劳工的独立势力(虽然也不过如此)遭不断削弱。萨利纳斯加速了私有化过程，并把它形式化。他受过美国训练，并向受过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寻求建议。③他的经济发展规划听起来与新自由主义正统教条很接近。

101

① C. Lomnitz-Adler, 'The Depreciation of Life During Mexico City's Transition into "The Crisis" ', in J. Schneider and I. Susser (eds.), *Wounded Cities* (New York: Berg, 2004) 47 - 70.

② D. Davis, *Urban Leviathan: Mexico C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MacLeod, *Downsizing the State*, 90 - 94.

在萨利纳斯的改革规划里，进一步开放墨西哥给外国直接投资和竞争，成为核心原则之一。马圭拉规划沿着北部边境迅速扩展，成为墨西哥工业和就业结构的重中之重(图4.3)。他发起并成功完成了与美国的谈判，产生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私有化过程迅速展开，1988年到1994年间国家部门的岗位削减了一半，到2000年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到仅有二百家，而1982年这个数字还是一千一百家。①私有化的条款越来越多地鼓励外资所有。曾经在1982年匆忙国有化的银行，在1990年再度私有化。为了遵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萨利纳斯还不得不开放农村部门和农业给外国竞争。因此，他不得不打击农民力量，后者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革命制度党的关键力量之一。产生自墨西哥革命的1917年宪法保护当地居民的合法权利，并把这些权利置于合作农场体系中，使土地归集体所有和利用。1991年，萨利纳斯政府通过了一项改革法律，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合作农场土地的私有化，将它们开放给外资所有。由于合作农场为当地群体提供了集体保障的基础，政府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推卸这一保障的责任。随后的进口壁垒降低措施则带来了另一重打击，因为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这些企业很高效，但同时也高度受到补助)进口很便宜，压低了谷物及其他产品的价格，以至于只有墨西哥最高效和高产的农民能与之竞争。许多农民快要饿死，只能被迫放弃土地，挤到已经人口饱和的城市里，成为失业群体中的一
102 员；城市里，所谓的非正式经济(如沿街小贩)正迅猛发展。但是，
103 抵制合作农场改革的声音遍地都是，有些农民团体支持了1994年发生在恰帕斯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②

---

① MacLeod, *Downsizing the State*, 71.

② J. Nash, *Mayan Visions: The Quest for Autonom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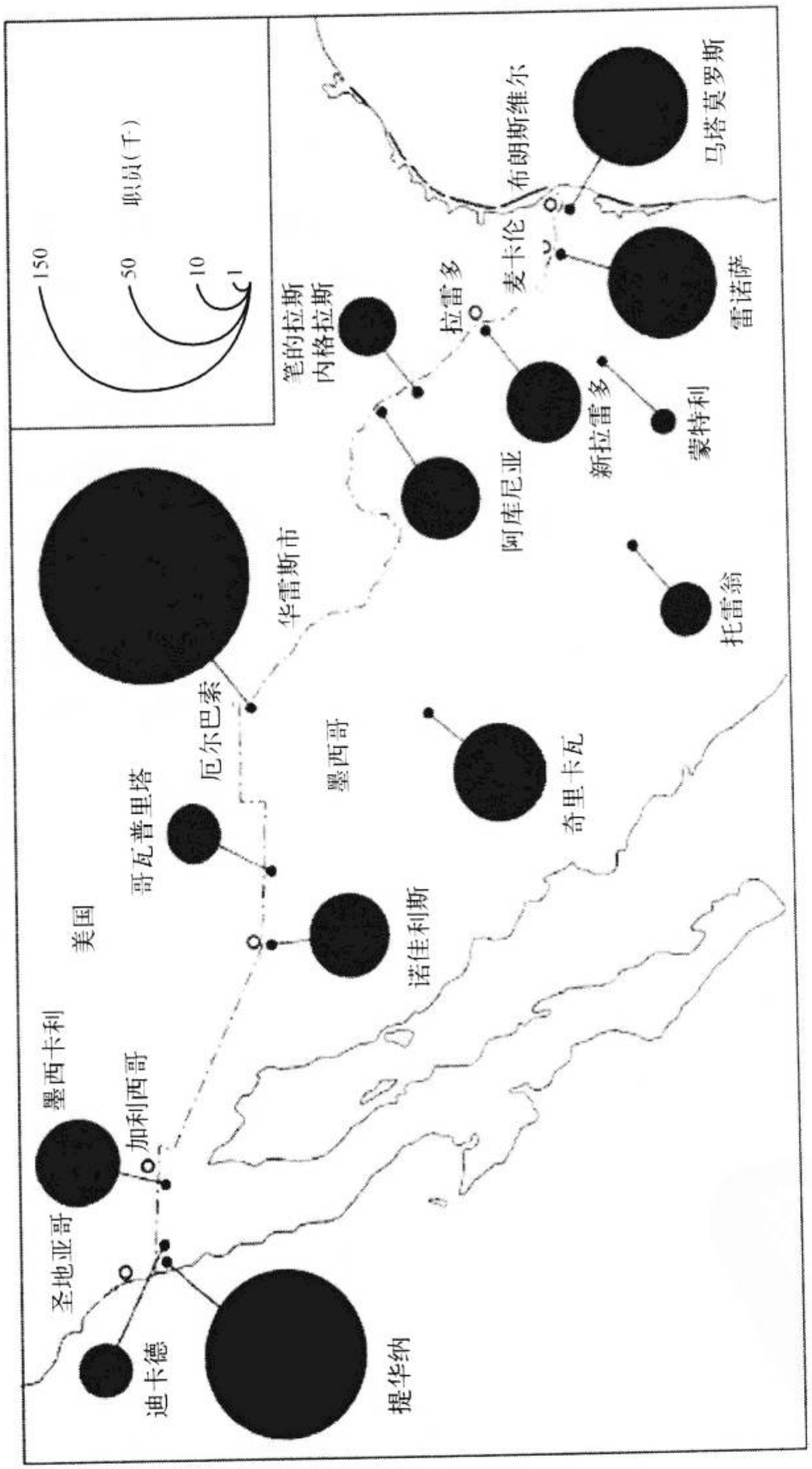


图 4.3：2000 年墨西哥主要马圭拉部门的就业情况

来源：迪肯：《全球转变》

墨西哥在1989年签署了后来被称为“布雷迪计划”的债务部分免除的协议，因此必须吞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毒药(后来证明墨西哥是自觉自愿的)——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化。结果，1995年爆发了“龙舌兰风暴”。与1982年发生的情况一样，此次事件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局提高利率所引起的。这给当时贬值的比索造成了投机压力。麻烦的是，墨西哥此前发行了美元标价的债券(称作Tesobonos)以鼓励外国投资，比索贬值后，墨西哥无法动用足够的美元兑换这些债券。美国国会拒绝提供帮助，但克林顿运用行政权提供了一份四百七十五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他担心的是驻墨西哥的美国产业会损失岗位，担心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当然也担心新自由主义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丧失正当性。随着贬值带来的顺势副作用，美国资本可以涌入并以缩水价收购各类资产。1990年，私有化的墨西哥银行中还只有一家是外资所有；到了2000年，三十家银行中有二十四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境外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从墨西哥攫取的贡金源源不断，但外国竞争也开始成为问题。在2000年以后，墨西哥丧失了大量马圭拉企业岗位，因为智利的劳动力更低廉因此也更受外国企业青睐，后者开始成为外国企业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来源。①

这一切(尤其是私有化)给墨西哥的国内财富集中带来了显著影响：

---

① J. Forero, ‘As China Gallops, Mexico Sees Factory Jobs Slip Away’, *New York Times*, 3 Sept. 2003, A3. “墨西哥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最主要的低成本工厂和出口商……目前这一地位正被中国及其数百万的廉价劳动力所取代……自2001年以来，墨西哥的三千七百个马圭拉工厂中有五百个倒闭，据墨西哥政府报告这导致丧失了二十一万八千个工作岗位。”最近报告表明，随着工厂开始更加有效和灵活，并且工厂可以借助与美国的毗邻关系确保稳定的产品运输，从而最大幅度减少零售商库存，马圭拉就业岗位正在重新恢复。See E. Malkin, ‘A Boom Along the Border’, *New York Times*, 26 Aug. 2004, W1 and W7.

> 1994 年，《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豪榜表明，墨西哥经济重建产生了二十四位亿万富翁。在这些人中，起码有十七位参与了私有化计划，收购银行、钢铁工厂、炼糖厂、旅馆和饭店、化学工厂、电信企业，并承诺在新型经济私有化部门中运营企业，诸如港口、高速公路私人收费、移动电话和长途通话。①

墨西哥最富有人卡洛斯·斯里姆在“福布斯榜”上位列第二十四名，他控制着墨西哥所有二十五家最大型公司中的四家。他的企业利益扩大到墨西哥之外，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和美国的电信巨头。他的手机业务策略已闻名遐迩：捕获并垄断高度密集和富裕的市场，而不提供服务给那些低密度和贫穷的市场。到 2005 年，墨西哥的亿万富翁数量已居世界第九位(排在沙特阿拉伯之前)。争论的焦点是，我们该把这称为阶级力量的重建还是创建更新(creation de novo)。显然，打击劳工、打击农民、打击人民生活标准，都在墨西哥奏效了。随着财富积累到墨西哥国内外的一小撮大资本家手上(这一小撮人有金融和法律权力机制的支持)，人民群众的命运明显每况愈下。

阿根廷的崩溃

诞生自军事独裁期的阿根廷背负着沉重债务，且牢牢受困于一个社团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极其腐败的治理系统。民主

① 有关卡洛斯·斯里姆的大致介绍，见 MacLeod, *Downsizing the State*, 99 - 100; Chua, *World on Fire*, 61 - 63。

化进程被证明举步维艰，但在1992年，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掌权了。梅内姆虽然是一位庇隆主义者[①]，他却开始了经济自由化过程，部分是想借此与美国搞好关系，但也是为了重建阿根廷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之前揭露出来的“肮脏战争”已使阿根廷名誉受损。梅内姆开放国家给外国贸易和资本流动，为劳动力市场引入更多弹性，将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私有化，把比索与美元挂钩，以便控制通胀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失业率上升了，工资受到自上而下的压力，虽然精英利用私有化过程大量积聚新的财富。1992年起，金钱持续涌入阿根廷，直到墨西哥“龙舌兰风暴”刮到阿根廷：

> 数周内，阿根廷银行体系损失了18%的存款。1990年下半年开始年均8%的经济增长，到1994年下半年直线衰退，国内生产总值在1994年第四季度到1996年第一季度减少了7.6%……政府的利息负担从1994年到1996年增加了50%以上。大量资本流出，外汇储备缩水。[②]

失业率蹿升到18%。虽然比索显然被估价过高，贬值(与墨西哥的情况相比)却得以避免，因为比索一直确保和美元挂钩。随后是一段以外国资本流入为基础的短暂恢复期，直到1997—1998年亚

---

① 庇隆主义(Peronismo)或称“正义主义”，是由阿根廷正义党创始人胡安·庇隆提出的政治理念，主要内容是主张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译者

② S. Sharapura, ‘What Happened in Argentina?’, *Chicago Business Online*, 28 May 2002, http://www.chibus.com/news/2002/05/28/ Worldview.

洲金融危机影响首先传播到俄罗斯，接着传到邻国巴西。这次影响加上高利率，使得国内财政陷入赤字，阿根廷比索面临无法承受的压力。国内外资本开始撤出，预示着比索的贬值。1995年到2001年9月期间，阿根廷的债务增加了一倍以上，外汇储备则迅速流失。到2000年，定期还款的债务额上升到九十五亿美元。之前曾支持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决反对比索贬值，担心会由此带来通胀后果(如之前俄罗斯和巴西的情况，斯蒂格利茨认为两国都因此面临危险后果)，以一笔六十亿美元贷款援助了阿根廷(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数目第二大的贷款)。

但就算如此，也无法遏止资金外流。2001年，阿根廷银行体系损失了17%以上的存款(一百四十五亿美元)，仅11月30日一天内，就损失了多达二十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予以紧急贷款，理由是阿根廷没有解决预算不平衡的问题。阿根廷拖欠了债务偿还，政府在12月1日把银行提款额度限制在每周二百五十美元，并管理所有超过一千美元的外汇交易。随后的骚乱造成二十七人死亡，总统德拉鲁阿(de la Rua)辞职，同时辞职的还有其经济政策设计者多明戈·卡瓦罗(Domingo Carvallo)。2002年1月6日前，新总统杜阿尔德(Duhalde)就已放弃了美元挂钩，比索由此贬值。但他还决定冻结所有超过三千美元的存款账户，并最终以对待比索的方式对待美元存储，由此将存款价值降低到之前的三分之一。购买力中有一百六十亿美元被从存户转移到银行，并通过银行转移到政治经济精英手中。结果造成了剧烈而普遍的社会不稳定，失业率攀升，收入下跌。闲置的工厂被好斗的工人占领并开始运转，人们建立了邻里团结委员会，寻求更有效的集体生存手段，失业抗议组织(piqueteros)阻碍了交通网络并围绕核

心政治需求而动员起来。①

面对蔑视银行、外国投资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众舆论，杜阿尔德之后新上任的民选总统基尔希纳(Kirchner)只能斥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拖欠八百八十亿美元的债务，并主动提出以二十五美分的美元兑换率偿还已恼羞成怒的债权人。②有意思的是，基尔希纳的经济班子并不是清一色受过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这些本土训练出身的经济学家持有“异端”观点，他们认为虽然偿还外部债务非常重要，但不应该引起阿根廷生活标准的崩溃。随着2004年的恢复迹象(尤其是在得到贬值帮助的制造业部门)，阿根廷面临的大问题是压制来自巴西和不久后来自智利——智利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后开始进入阿根廷市场——的激烈竞争。

阿根廷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的过山车体验很好地表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没什么关系。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的一位成员正确地指出，阿根廷发生的“强制通货紧缩”很恰当地被阿根廷受害者们理解为“政治精英抢劫银行”。③或者，如维特梅尔(Veltmeyer)和佩特拉斯(Petras)更喜欢说的，这是“新帝国主义”散发的恶臭：“经济掠夺、大规模不平等、经济滞胀，继而是严重而持久的大萧条和民众的大规模贫困，这一切都是阿根廷史上最大的财富集中现象的后果。”④

---

① J. Petras and H. Veltmeyer, *System in Crisis: The Dynamics of Free Market Capitalism* (London: Zed Books, 2003), 87–110.

② S. Soederberg, *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 Debt, Class, and the New Common Sense in Managing Globalis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③ J. Salerno, 'Confiscatory Deflation: The Case of Argentina', Ludwig von Mise Institute, http://www.mises.org?fullstory.aspx?control=890.

④ Petras and Veltmeyer, *System in Crisis*, 86.

韩国

经历了1950—1953年战争后，孱弱的韩国面临着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危机。韩国的经济转向一般追溯到1961年军事政变，这场政变使朴正熙(Park Chung Hee)将军上台执政。人均收入在1960年还不到一百美元，现在则超过一万二千美元。这一惊人的经济表现常被作为发展型国家能力的最好证明。然而，韩国拥有两个地缘政治优势。由于韩国处于冷战前线的位置，美国愿意为其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但不那么明显的是，韩国同日本的前殖民关系为韩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包括熟悉日本经济和军事组织策略(朴正熙受过日本军事学院[the Japanese Military Academy]训练)，以及在进入外国市场时得到日本的积极帮助。

1960年，韩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在朴正熙的专政统治下，国家开始工业化。国内资产阶级并不强大，但却决非微不足道。朴正熙在以贪污罪逮捕了主要经济领导人后，开始与他们进行协商。他改革了国家官僚体制，(效法成功的日本模式)建立了经济计划部门，并将银行国有化以掌控信贷配置。接着，他依靠新兴工业资本家们的创业活力和投资策略，鼓励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致富。①1960年代初，工业家开始以出口为导向，因为日本越来越将韩国作为海外平台，借以将自己的部分制造产品再出口到美国市场。韩国与日本的合资合营日益频繁，借此获得外国市场

① V. Chibber,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的技术和经验。韩国政府以种种方式支持这一出口导向策略：调动国内存款、奖励成功的企业，并通过便利的信贷、有利税率、物资采购、控制劳动力市场、支持进入外国(尤其美国)等等，鼓励企业并入韩国综合企业集团(*chaebols*，如现代、大宇、三星等大型综合企业)。凭借来自一项重工业发展策略(致力于钢铁、造船业、石化、电子技术、汽车和器械)的支持，几家综合企业集团转移重心并在1970中期开始在这些领域成为全球性竞争者。此外，他们也成为
108 更加富裕的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心。随着这些综合企业集团规模和资源的扩大(到1980年代中期三家综合企业集团占据国内生产品的三分之一)，综合企业集团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到1980年代中期，它们“掌握了足够的力量和影响力，能够发动一场成功的战役，目的是逐步拆除大量国家调控机制”。资产阶级已经在国际贸易领域具有稳固地位，也已获得独立的信贷手段，因此不再依靠国家，而是按自己意愿开展新自由主义化过程。①

这个版本的新自由主义化依赖于在保护自身特权利益的同时，摆脱管制控制。银行实际上被私有化了。将综合企业集团领导阶层与国家牢固绑在一起的密切且通常是腐败的力量纽带，被证明非常难以打破，而韩国银行贷款除了基于投资理由外，也同样基于政治偏好。韩国企业同样需要贸易关系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这同样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即1986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②)，以便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投资剩余资本(图4.4)。韩

① V. Chibber,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45.

② 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指1986年9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的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决定进行一场旨在全面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故命名为“乌拉圭回合”谈判。——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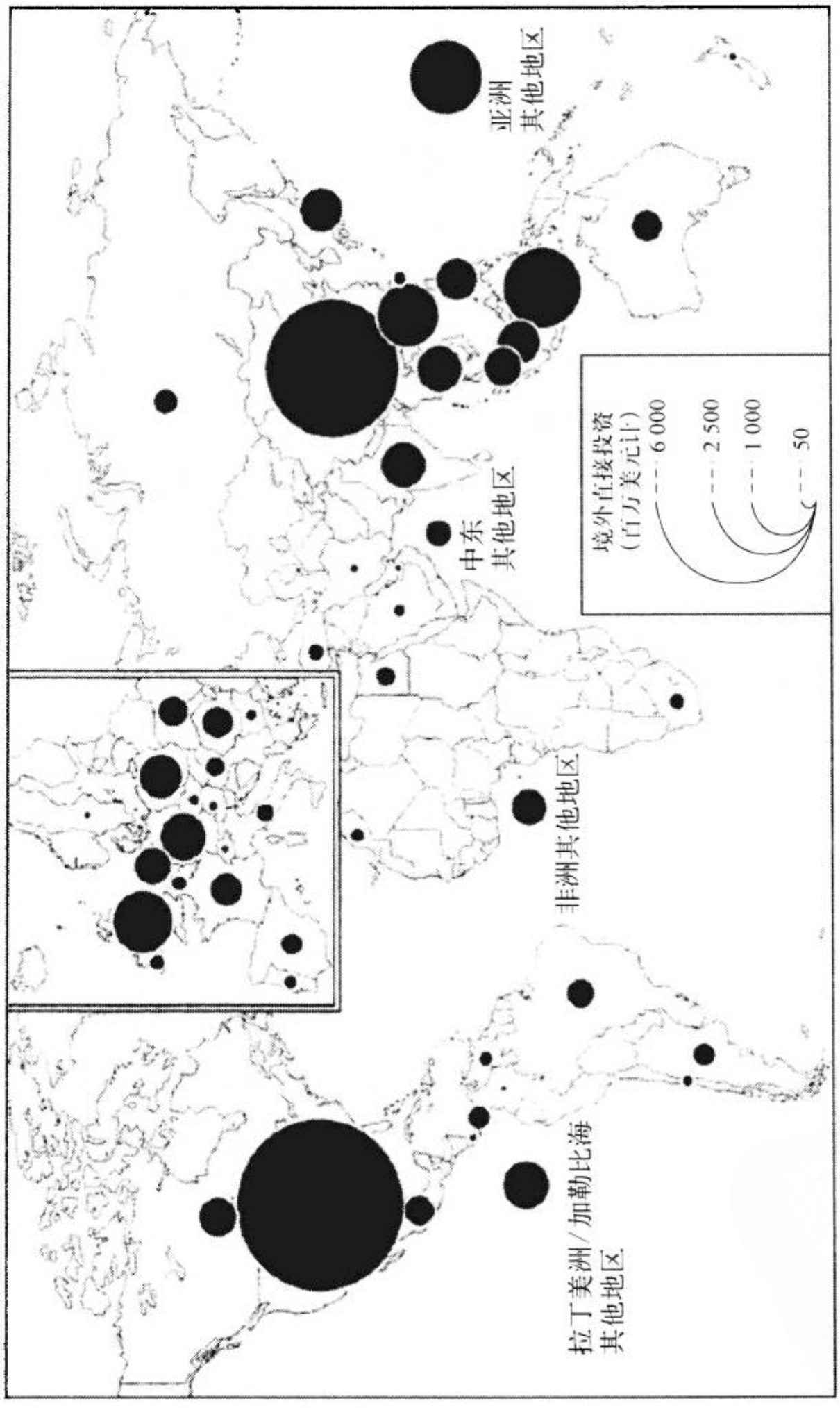


图 4.4：韩国走向海外：境外直接投资，2000

来源：迪肯：《全球转型》

国资本利用更廉价、更顺从的劳动力开拓海外生产，由此开始了不光彩的劳动活动出口，通过韩国持有的转包合同到达拉丁美洲和南美，并横跨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地区。1995 年日元升值后，日本转而在低成本地区进行海外生产，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此举连同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加剧了跨区域竞争。虽然中国刚开始时在低增值生产部门（如纺织品）领域威胁到韩国（和这一区域的其他国家），它迅速在增值链上向上移动。韩国的回应是通过直接投资将大量生产活动投放到中国；此举或许对韩国企业有利，但对国内就业并没有好处。

1980 年代末的出口增长过后，韩国工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1990 年后经历了出口市场损失和收益率暴跌。韩国综合企业集团
109 重新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外国银行贷款。韩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
110 当高，因而无法承受利率的迅速增长。①在国内，韩国也不得不应付有组织劳工的上升力量。大规模工业化也带来了大规模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这都有利于劳工组织的形成。早些年，独立工会遭到暴力镇压；但 1979 年朴正熙遇刺（凶手是其情报部长），接着是 1980 年光州市民抗议者被残忍屠杀，激起了学生、市民和工人追求民主化进程的大众运动。1987 年，这一诉求在形式上实现了。面对持续的政府镇压，工会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工资随之上涨。雇主需要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几届政府都觉得这很难做到。1995 年，民主韩国劳工联盟形成并得到法律认可，证实了不断增大的有组织劳工势力。②

---

① R. Wade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

② M. Woo-Cummings, *South Korean Anti-Americanism*,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93 (July 2003).

1990 年代期间，国家原本就日益下降的资本控制能力，被 1997—1998 年的危机进一步破坏。外国资本长期以来追求更容易地进入传统上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同时追求进一步金融自由化。在 1990 年代初，逐步开展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架构，确保了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些许成功。克林顿为支持韩国融入经合组织所开出的价格，成为金融自由化过程的强心剂。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韩国劳工已发生骚乱，针对的是综合企业集团（当时企图解雇数千名工人），并抗议政府对工会采取镇压性政策。1997 年 3 月，政府通过一项新的劳动法规，将更高程度的弹性引入劳动关系，就此默认地批准了解雇行为。①然而，许多综合企业集团拖欠疑心越来越重的外国债权人沉重债务，也拖欠国内银行大笔债务，这些银行拥有不良贷款的优势。政府在涉外事务方面地位相当不利，以至于什么都做不了。1997 年上半年，几家综合企业集团（如 Hansin 和 Hambo 钢铁公司）在受到货币危机之前宣布破产。货币危机爆发后，外国银行从韩国撤回援助，迫使更多的综合企业集团和国家自身濒临破产。②

美国找不到理由提供财政援助（冷战已经结束），反而遵照了华尔街的指令——后者出于自身特殊的收益考虑，长期以来推动金融自由化过程。斯蒂格利茨意识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正在为狭隘的华尔街金融利益做出牺牲。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韩国提高利率以保护自身通货，韩国因此使其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这迫使许多资本负债率高的企业陷入破

① M. Woo-Cummings, *South Korean Anti-Americanism*,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93 (July 2003), 5.

②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③ Ibid, 130.

产，接着马上是失业率增高、工资率下跌、更多综合企业集团破产(大宇公司已经破产，而现代也接近破产)。韩国政府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为了一笔五百五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韩国答应以开放金融服务给外资所有、允许外国企业自由运营作为交易。这些援助条款并不可信；十年后，面临迫近的债务违约，另一项协议得以形成，贷方银行重新制订韩国债务偿还期(一次“经济自救”)，而作为回报，这些银行在韩国未来收入方面具有特权地位(让人想起纽约市的解决方案)。结果，“由于大小企业纷纷破产，韩国人遭了殃，经济急剧衰退以致国民收入缩减了 7%，普通工人工资下降 10%，失业率达到近 9%”。①从中可以得出两点教训：第一，“韩国人以切肤之痛认识到，在他们陷入财政崩溃的时候，美国选择进一步牟取自身利益”；第二，美国现在完全以华尔街和金融资本来定义自身利益。②实际上，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对韩国的所作所为，正是投资银行家在 1970 年代中期对纽约市的所作所为。韩国经济随后的复苏(部分是因为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重建的建议，也是因为劳工远不那么好斗了)，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增加了流向华尔街保险柜的贡金，并借此提升了美国已经集中起来的精英阶级力量。随着外国资本趁一波合并与收购的浪潮——这股浪潮是后来被不客气地称作“秃鹰资本”(vulture capital)的海外力量推动的——涌入韩国，综合企业集团的力量被粉碎或重构。随着韩国资本转变其与国家和全球市场的关系，国内阶级结构也发生变迁。但在这背后，数据显

112

① Woo-Cummings, *South Korean Anti-Americanism*, 4.

②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30, 206 - 207.

示危机期间和过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急剧上升了。由另一轮国家对劳工和社群运动的镇压打底，劳动力市场日益“弹性化”并采取临时雇工制（这对女性尤其不利），表明一个反对穷人的阶级得以重建；而这些不过预示着即将产生通常国内外阶级力量重建时的诸种后果。

瑞典

1970 年代，西方世界大概没有哪个地方像瑞典那样，资本力量在其中受到来自民众的（democratically）巨大威胁。瑞典自 1930 年代起由社会民主党人统治，强大且集中的工会结构使得国内阶级力量保持平衡，工会在集体层面与国内资产阶级进行直接谈判，涉及工资率、利润、合同条件等等。在政治上，瑞典围绕着再分配社会主义的理想建立福利国家，部分凭借周密的福利事业实现累进税制、缩小收入不平等、减少贫困。瑞典资产阶级虽然规模小，但相当强大。与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制和统制国家不同，瑞典并没有把经济中的主导部门收归国有（除了运输和公共设施）。虽然存在许多小型企业，但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掌握在一小撮家族手里。

正如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1960 年末浮出水面的劳工骚乱引起了一波管理改革的浪潮，限制了资本的力量并把劳工势力扩展到工作场所。“雷恩—梅德纳计划”极大威胁到资产阶级，一项 20%的企业利润税将流入劳工基金，由工会把这笔资金重新投入企业。结果将是私人所有制的重要性逐步减少，而由工人代表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将建立起来。这相当于对“私人所有制的神圣性展开正面进攻”。不管收购条款多么慷慨大方，资产阶

级作为一个将要被逐步消灭的特殊阶级，还是受到了威胁。因
113 此，资产阶级反击了。①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瑞典雇主联合会(无疑是效法美国)增加了成员，大规模筹措资金，挑起了一场宣传战——反对过度管制，支持增大经济自由度，减免税赋，撤除那些(在它看来)导致经济滞胀的过多的福利国家安排。但是，当政治上中间偏右的保守党1976年上台时(这是自1930年代以来保守党第一次代替社会民主党执政)，它却未能实行雇主的提议。工会太过强大，民众未被说服。很清楚，通过关闭工厂或中止工资谈判的方式来与工会进行直接对抗，这样并不奏效；雇主们因此转而采取瓦解的办法，避免与社团主义国家的制度安排发生直接对抗。1983年，雇主们拒绝参与中央议价(central bargaining)，从此工资和利润的谈判不得不基于公司对公司的方式进行。他们成功劝说了一个工会遵照这种方式，因而严重破坏了劳工集体力量。

但是，最有效的还属雇主们发动的宣传战。他们利用自己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控制，在瑞典经济思想内部强化新自由主义。一批对瑞典政府的压迫性普遍主义和高税率政策怨声载道的知识分子和专家，都受到过一种新兴修辞术的辛勤培养，鼓吹个体解放和自由。这些争辩回荡于各个媒体，并日益占据着大众的想象。雇主们的智囊团——商业与政策研究中心(SNS)——投入大笔资金用于研究经济结构和前景(就像美国的NBER)，一次又一次地向政策精英和大众“科学地”证明，福利国家是导致经济滞胀的根本原因。②

---

①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205.
② Ibid., 238–42.

1991 年保守党政府选举上台后，开始了真正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型。但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为此做好了铺垫，他们受到越来越大 114
的压力，必须要找出经济滞胀的原因。他们部分施行了某些新自由主义规划，表明已经接受了 SNS 有说服力的分析。缺乏理念的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工会被劝服实施工资限制，以便提高利润和鼓励投资。银行的松绑(这导致了信贷配置和房产市场方面典型的投机泡沫)、最富者税收减免(这再次被认为是鼓励投资的行为)，早在 1980 年代末就发生了。(总是保守的)中央银行最终调整了自己的任务，不是保持充分就业，而是与通胀作斗争。1991 年石油价格上涨后资产价格继续上涨，等到其中的投机泡沫崩溃后，资本纷纷撤离，国内企业破产，致使瑞典政府损失惨重。人们本能地把危机责任归为福利国家无效率，而上台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对瑞典商会的计划洗耳恭听，后者建议对福利国家进行全面私有化。

布莱思认为，开出的药方和情况牛头不对马嘴。他认为问题出在“认知定势”，即没有能力想出任何其他政策方案，只能想到新自由主义教条规定的方案。“正是这种人员和思想方面的同质性，加上商业的政治化，推动这些新理念进入议事日程并最终导致瑞典自由主义的转型。”实际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低迷状态，两年内产量减少而失业率翻倍。随着政府渐渐失去公众信任，继续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另一条道路又被提了出来： 加入欧盟。这个动作“或许最好被理解为商人和保守主义者试图借助国际协力，使欧盟的经济理念和制度实现瑞典国内改革所未能完成的目标”。1993—1994 年瑞典加入欧盟，由此丧失了许多以前用于遏制失业和增加社会工资的手段。①结果，即便 1994 年社会民

①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229 - 230.

115 党重新执政，“关心缩减赤字、控制通胀、平衡预算，而非充分就业和收入平均分配”的新自由主义规划，还是“成为整体经济政策的基石”。①人们接受了退休金和福利供给的私有化，认为是势所必至。布莱思将这解释为一种“路径依赖”的情况——某种决策逻辑被之前的霸权性思想控制。嵌入型自由主义遭到腐蚀，但决没有被破坏殆尽，公众仍然广泛支持福利结构。不平等现象确实增加了，但绝没有到美国或英国那样的程度。瑞典是可以被称为“限制型新自由主义”（circumscribed neoliberalism）的例子，而其总体较好的社会状况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力量与变动

上述证据表明，不均衡发展既是某些外部霸权（如美国）的强制结果，也是多样化和创新的结果，以及国家间、地区间、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大都市治理模式之间（有时是垄断式）竞争的结果。更细致的分析表明，在具体情况中，有很多因素影响了新自由主义化的程度。大部分对于发挥作用之力量的传统分析，关注的是某种结合：一是新自由主义理念力量（这种力量在英国和智利的情况中特别强大），二是回应各种金融危机的需要（如墨西哥和韩国），三是更实际的考虑，即设法改革国家机器以提升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如法国和中国）。虽然上述因素都很重要，此类分析却没有考察过阶级力量的作用，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例如，人们甚至没有考虑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能正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哪怕有大量证据显示经济精英和金融利益集团不断插手思想

①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231－233.

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通过资助智囊团、投资培养技术官僚、出钱指使媒体。金融危机可能是由资本冲击、资本逃逸或金融投机引起的，或者，金融危机是精心设计出来协助掠夺性积累的；这些可能性被认为阴谋论色彩太重而遭到彻底排除，哪怕大量可疑迹象表明，各处货币受到协同的投机冲击。看样子，我们需要更宽广的框架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且地理上不均衡的道路。

我们必须关注环境条件和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因素在各地(从新加坡到墨西哥、莫桑比克、瑞典、英国)变化极大，所以新自由主义转向的难易程度也差别很大。南非的情况特别难以理清头绪。出于种族隔离制度崩溃后产生的希望，并且急切渴望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南非半自愿半被迫地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拥护新自由主义道路，带来的结果可以预见：经济上的隔离如今相当吻合此前的种族隔离。①具体国家内阶级力量平衡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也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考虑到有组织劳工能够维持或取得(如在韩国)强大的存在感，新自由主义化面临牢固的、有时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削弱(如英国和美国)、绕过(如瑞典)或暴力摧毁(如智利)有组织劳工的势力，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同样，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经常要靠增加商业和企业的力量、自律性、凝聚力，以及商业和企业作为一个阶级的能力，以给国家权力施压(如在美国和瑞典)。这种能力最容易通过金融机构、市场行为、资本冲击、资本逃逸而直接施展，也间接通过影响选举、游说、贿赂、贪污而施展，或者更隐秘地通过支配经济理念的力量而施展。新自由主义

① P. Bond, *Elite Transition: From Apartheid to Neoliberalism in South Africa*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id., *Against Global Apartheid: South Africa Meets the World Bank, the IMF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London: Zed Books, 2003).

能否融入一般民众的常识，各处情况不同，取决于社会团结的信
117 念力量有多大，以及集体社会责任和供给的传统有多重要。因此，支撑大众常识的文化与政治传统就能用于甄别，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社会性形式对立的个体解放和自由市场决断的理想已经在政治上被接受了。

但是，新自由主义化最有趣的一面，或许是内部动力和外部力量的复杂互动。虽然有些情况下可以合理地认为外部力量占据主导，但多数情况下两者的关系要远为复杂。在智利，说到底是上层阶级在发动政变时寻求美国帮助，也正是上层阶级把新自由主义重构作为前进道路接受下来，尽管有受过美国训练的技术官僚打底。在瑞典，正是雇主们寻求欧洲整合的途径，以稳固推行当时处于困难中的新自由主义规划。如果没有些许内部支持，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构规划中最严厉的方案，恐怕也寸步难行。有时候，似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就是内部阶级力量希望做的事情，只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负了责任。并且，有足够的成功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事例，表明美国财政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复合体并不如有时候宣称的那样无所不能。只有当内部力量结构已经减少到徒有其表，并且当内部制度安排陷入全面混乱——要么是由于崩溃（如前苏联和中欧），要么是由于国内战争（如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尼加拉瓜），或由于变质（如菲律宾），我们才能看到外部力量自由地开展新自由主义的重构过程。这些情况下成功几率也很小，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市场和法律体制，新自由主义便无法运作。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加在所有国家身上的负担——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以吸引和保留四处流动的资本——确实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但奇怪的是，新自由

主义化与良好商业环境怎么就经常被认为是同一回事，正如200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Development Report*)中写的那样？①如果新自由主义化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秩序动荡(比如印尼和阿根廷近些年的情况)，或导致国内市场增长的低迷和限制，那么也可以很容易地说，新自由主义化不是鼓励投资，而是抵制投资。②即便有时候某些新自由主义政策看重(比方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或者有时候坚决贯彻执行了金融自由化，这样做本身是否就足以吸引流动资本，却仍然不清楚。除此以外，更严重的问题是，何种资本被吸引了进来。投机潮很容易吸引证券投资资本，这好比稳固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安排很容易吸引高增值工业。吸引“秃鹰资本”(vulture capital)看起来很难算是值得进行的冒险，但(如斯蒂格利茨等批判者直率承认的)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常的成绩。

各处不同的地缘政治因素也起到了作用，韩国在冷战中身处前线位置，起初其发展主义便得到了美国保护；莫桑比克作为前线国家，却导致了一场由南非煽动的国内战争，意在瓦解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Frelimo)建立社会主义的企图。战争结果使莫桑比克负债累累，轻易就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重建的囊中之物。③中美洲、智利和其他地区受到美国支持的反革命政府，往往都产生了类似结果。甚至特殊的地理位置——如墨西哥邻近美国也特别容易受到美国的压力——也发挥着作用。美国无需再防备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无需再过度担心新自由主义重建是否会在各地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②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③ J.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90 – 106.

荡。令那些越战中效忠美国的泰国人难过的是，美国没有经济援助泰国摆脱穷困。事实上，美国和其他金融机构都乐意扮演秃鹰资本的角色。

但是，这一不均衡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历史中，一个持续的事实是普遍存在一种趋势：扩大社会不平等，并使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不管在印尼、墨西哥或英国)任由寒风摧残——节俭政策、越来越受边缘化的悲惨命运。虽然各地的社会政策缓解了这
119 股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光谱另一端的结果却十分明显。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流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贡金数量惊人。然而，更惊人的是，人们习惯把这一切视为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副作用，虽然有时是不幸的副作用。在整个过程中，以下观念始终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即这一切或许是(仅仅或许是)新自由主义化的核心。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重构，这样的现实发生在地方和跨国的层面，但尤其是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金融中心。

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1978 年 12 月，面对双重困难——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的政治不稳定以及持续数年的经济滞胀——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宣 120
布了经济改革规划。我们永远无法确认，邓小平是否始终是一位（如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所说的）“走资派”，或改革是否仅仅是一种孤注一掷，为的是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并在面临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高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的威信。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致，很难不把这视作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在智利、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其他地区，早已清晰建立了权威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兼容并存。

虽然平均主义作为中国的长远目标并没有被放弃，邓小平还是指出，要释放个人和地方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力，刺激经济增长。这样做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但最好把它理解为需要容忍的事情。在“小康”（一个理想社会的概念，其中人人安居乐业）的口号下，邓小平关注的是“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教育和国防科技现代化。改革力图引入市场力量，在内部支撑起中国经济。其理念是刺激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并希望借 121
此促进创新和发展。市场价格机制被引入，但比这更重要的是，

中央政治经济权力迅速下放到各个区域和地方。这最后一步被证明尤为精明。与北京权力中心的传统对抗得以避免，地方的积极性可以为新的社会秩序开疆拓土，创新失败很快就被忘掉了。为配合这一努力，中国还向外国贸易和海外投资开放(虽然是在严格的国家监督下)，由此终结了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孤立。此类试验起初主要限于邻近香港的广东省，与北京保持适当距离。对外开放的目标之一是购买技术转让(因此强调外国资本和中国参与者双方合资合营)，另一个目标是获取足够的外资储备以大量购买必要设备，为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①

在涉及世界市场如何运作的方面，要不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看上去与中国关系不大的转变，中国的上述改革或许不会有我们今天赋予它们的重要性，中国随后惊人的经济进展或许也不会采取如今这条道路并取得这样的成绩。1980 年代期间，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将整个世界开放给转型市场和金融力量。就此而言，这为中国乘乱进入并融合到世界市场打开了空间，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一过程是不可能的。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场，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

国 内 转 型

这样说，决非低估中国内部进行的改革运动的曲折道路。因为，中国必须认识到(某种程度上这一认识过程仍在继续)的事情

① N.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8); S.-M. Li and W.-S.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之一就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改变——阶级关系、私有权，以及所有其他制度安排，用以典型地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市场本身无法改变经济。沿着这条道路的发展并不连贯，也时常遇到紧张和危机，外来的刺激甚至是威胁当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究竟是有意识的但也是适应性的计划(如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由党派人物支持的、产生自邓小平市场改革最初设想的必然逻辑，无疑还将争论很久。① 122

可以确切地说，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这是后来1990年代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共识”强加给俄罗斯和中欧的道路，令其快速私有化——所以成功避免了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灾难。中国走了自己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或某些人更喜欢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道路，二十多年来它成功建立了一种国家操控的市场经济，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长10%)，并提高了相当多人民的生活质量。②但经济改革也造成了环境破坏、社会不平等，最终还有某种看上去令人不安的事情——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

如果不勾勒出这一转型的总体道路，要理解其中的细节是很困难的。中国政治很难探个究竟，它被党内权力斗争的秘密覆盖得层层叠叠，而这个党则旨在保持其独特和唯一的执政地位。重要决定会在党代会上得到批准，安排好每一步改革试验。然而，党不太可能轻易抵制资产阶级在内部进行的积极重建。它几乎肯

---

① 我有些倾向于后一种解释，虽然不如 Hart-Landsberg 和 Burkett 的解释那么有力，但我在此还是会广泛参考这种解释。See M. Hart-Landsberg and P.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2004; = Monthly Review, 56/3).

② L. Cao, ‘Chinese Privatization: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3/13 (2000), 13 - 62.

定要支持经济改革，以便积聚财富并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对付国内异议，更好地防卫外来入侵，并在发展日益迅速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将自己的力量辐射到周边地缘政治的
123 利益领域。经济发展被看作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此外，实际采取的发展道路似乎符合如下目标：防止中国内部形成任何稳固的资产阶级权力集团。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严重依赖(与日本和韩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截然不同)，把资产阶级所有制保持在海外(表 5.1)，因而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控制(起码就中国人来说)。①对外国证券投资设置的壁垒，有效限制了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势力。中国不愿意允许国有银行(如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之外的金融调节形式，这就令资本丧失了其面对国家权力时的重要武器。长期以来，试图在保持国有制结构不受影响的同时释放管理自主性，也类似地带有试图抑制资产阶级形成的意味。

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棘手的困境。海外华人商人的散布状态提供了关键的外部链接，而在 1997 年回归中国的香港早就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建构起来了。中国政府不得不与两方面妥协，也要与国际贸易的新自由主义规则(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中国 2001 年加入了这一组织)进行妥协。政治上的自由化要求也开始出现，与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同步产生的政治紧张，清楚表明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并不伴随人权、公民权、民主权利方面的进步。汪晖对另一波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概括说：

---

① This point is emphatically made in Y. Huang, 'Is China Playing by the Rule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92403/huang.php.

表 5.1：资产流入测量：外国贷款、海外直接投资、契约联盟，1979—2002

	总计(1 亿美元计)				总资本流入所占份额比例		
	总计	外债	海外直接投资实际流入	契约结盟	外债	海外直接投资实际流入	契约结盟
1979—1982	124.57	106.90	11.66	6.01	85.82	9.36	4.82
1983	19.81	10.65	6.36	2.80	53.76	32.10	14.13
1984	27.05	12.86	12.58	1.61	47.54	46.51	5.95
1985	46.45	26.88	16.61	2.96	57.87	35.76	6.37
1986	72.57	50.14	18.74	3.69	69.09	25.82	5.08
1987	84.52	58.05	23.14	3.33	68.68	27.38	3.94
1988	102.27	64.87	31.94	5.46	63.43	31.23	5.34
1989	100.59	62.86	33.92	3.81	62.49	33.72	3.79
1990	102.89	65.34	34.87	2.68	63.50	33.89	2.60
1991	115.55	68.88	43.66	3.01	59.61	37.78	2.60
1992	192.03	79.11	110.07	2.85	41.20	57.32	1.48
1993	389.60	111.89	275.15	2.56	28.72	70.62	0.66
1994	432.13	92.67	337.67	1.79	21.44	78.14	0.41

续 表

	总计(1亿美元计)				总资本流入所占份额比例		
	总计	外债	海外直接投资实际流入	契约结盟	外债	海外直接投资实际流入	契约结盟
1995	481.33	103.27	375.21	2.85	21.46	77.95	0.59
1996	548.04	126.69	417.26	4.09	23.12	76.14	0.75
1997	587.51	120.21	452.57	14.73	20.46	77.03	2.51
1998	579.36	110.00	454.63	14.72	18.99	78.47	2.54
1999	526.6	102.12	403.19	15.18	19.4	76.6	2.88
2000	594.5	100	407.1	17.71	16.8	68.5	2.98
2001	496.8	—	468.8	18.4	—	94.4	3.7
2002	550.1	—	527.4	21.3	—	95.9	3.87

来源：黄亚生：《中国按规矩出牌吗？》

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
汇率接近统一，从而促进了出口，对外贸易形成了竞争和自 124
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双轨制”的差价缩小；上海浦东地区
全面开放，各地开发区纷纷上马，等等。①

年迈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亲自视察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带
来了什么影响。视察后，他自己说感到非常满意。他说“致富光 125
荣”，还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整个中国都开放给市场力量和外国资本，尽管仍处于党的监督下。城市地区鼓励消费民主，从而遏止了社会动荡。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接着便加速进行，有时几乎要超出党的调控。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进程时，一切重要的事情都位于国家部门，国有企业占据经济领导部门地位。根据大多数论者的观点，这些国有企业具有相当的盈利能力，它们不仅为职工提供就业保障，还提供广泛的福利和养老金等优惠(人们所谓的“铁饭碗”或国家生活保障)。此外，还有许多地方的国有企业，受到省市或当地政府的控制。农业部门根据公社体系组织起来，大多数论者承认这种体系在生产力上落后，急需改革。福利安排和社会供给内化于每个部门，虽然分布是不均衡的。乡村居民最少受到照顾，并且户籍制度把他们和城市人口区隔开，城市人口得到许多福利和权利，而乡村人口则没有。户籍制度还成功阻止了大规模乡村迁入城市的移民潮。每个部门都被整合进一个地方性组织的政府计划体系，在其中按计划规定产量目标并分配生产投入。国有银行大体上是存款储备所，并负责提供政府预算之外的投资

① Wang, *China's New Order*, 66.

资本。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控制经济的稳固中心，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些企业给予职工的保障和利益——虽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微薄——多年来为相当部分的人民群众维持着一张社会安全网络。通过解散农业合作社，提倡个体化的“个人责任体系”，一种更开放的市场经济围绕国有企业创建起来。公社资金被用于建
126 立乡镇企业，而后者成了创业精神、弹性劳动活动、开放市场竞争的中心。起初，完全的私有部门仅限于小规模生产、贸易、服务行业，还有雇佣劳动方面的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限制渐渐放宽了)。最终，外国资本流入，在1990年代期间积聚势头强劲。外国资本一开始还被限制在合资合营领域和部分地区，但最终所向披靡——虽然分布不均衡。国有银行体系在1980年代扩大了，逐步取代中央来为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有部门提供信贷规定。这些不同的部门并不各自独立发展，乡镇企业起先从农业部门筹措资金，并为产品提供市场，或给国有企业提供调节性的生产投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资本开始进入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私有部门变得越来越重要——既是直接的(以所有者的形式)，也是间接的(以股东的形式)。国有企业变得不那么能盈利了，而它们得到的银行信贷利息却很低。随着市场部门力量和重要性的增大，整个经济朝向新自由主义结构迈进。①

那么，需要考虑的就是各个不同部门如何经历了发展。就农业而言，1980年代初农民有权在“个人责任”体系下利用公社土地。起初，农民可以按照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剩余农产品(超出公社

① D. Hale and L. Hale,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82/6 (2003), 36–53.

目标的那些数量），而不用按照国家制定的价格。到 1980 年代末，公社已经完全解体，虽然农民无法正式拥有土地，但他们可以租赁和出租土地，雇用劳动力，并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产品（双重价格体系实际上崩溃了）。结果，1978 年到 1984 年间，农村收入惊人地以每年 14%的速度增长，产量也类似地增长了。从此以后，农村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实际有所下跌（尤其是 1995 年以后），只有一小部分特选的生产领域和生产线不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城市收入在 1985 年平均只有每年八十美元，2004 年这个数字蹿升到超过一千美元，而农村收入在同一时期只是从将近五十美元上涨到将近三百美元。此外，以前在公社内部建立的集体性社会福利（虽然可能很薄弱），如今也丧失了，这意味着农民不得不面临各种开销负担：孩子上学、医疗卫生，等等。这些对大多数常驻城市人口而言不是问题，他们在 1995 年后也受到照顾：一项房产法律使城市居民获得房产所有权，他们由此可以进行房地产价值投机。根据估算，中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如今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①

农村居民被迫到他处谋生，结果许多农村移民（很多是年轻女性）涌到城市里（不合法律也没有居住权），形成了庞大的劳动力储备（一群法律地位不确定的“漂泊”人口）。中国目前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发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地方，“曾经重塑美国和现代西方世界的移民，与中国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据官方统计，有“一亿一千四百万迁移劳工暂时或永久离开农村，到城市里找工作”，政府专家“预计到 2020 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三

① J. Kahn and J. Yardley, ‘Amid China’s Boom, No Helping Hand for Young Qingming’, *New York Times*, 1 Aug. 2004, A1 and A6.

亿，并最终上升到五亿”。上海一个市就有“三百万迁移劳工；相比之下，1820 年到 1930 年期间，整个爱尔兰去向美国的移民大概也只有四百五十万人”。①这支劳动力很容易受到严重剥削，并给城市居民工资带来压力。但是，城市化步伐很难停下来，速率保持在每年约 15%。由于农村部门缺乏动力，如今人们广泛同意，不管出了什么问题，要么在城市解决，要么根本就不解决。寄回农村的汇款如今成为农村人口赖以为生的重要部分，农业部门悲惨的状况及其产生的不稳定是今天中国政府面临的极其严重的问题。②

公社解体后，此前的公社政治和行政权力移交到新建立的乡镇政府手里，后者是根据 1982 年宪法设置的。后来的立法允许这些政府占有公社的实业资产并把它们重建为乡镇企业。地方政府从中央控制解放出来后，典型地摆出了创业的姿态。农村收入刚开始大幅增长，提供了可以重新投入乡镇企业的储蓄。以当地范围为依靠，与外国资本的合资合营(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资本，或通过散布世界各地的华商)也得到广泛开展。大城市(如上海)和省区(如广东)边缘的乡镇企业特别活跃，这些城市地区都向外国投资自由开放。在改革的最初十五年里，乡镇企业成为不可思议的经济动力来源。到 1995 年，乡镇企业职工数量达一亿二千八百万人(见表 5.2)。这些企业致力于平民实验，发挥着改革奠基石的作用。③乡镇企业奏效的先例可能随后就成为国家政策的基础。

---

① J. Yardley, 'In a Tidal Wave, China's Masses Pour from Farm to City', *New York Times*, Sept. 12, 2004, Week in Review, 6.

② Kahn and Yardley, 'Amid China's Boom'.

③ C. Stevenson, *Reform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ast Lessons for Current Problems*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http: www.gwu.edu/ ~ ylowrey/stevensonc.html.

为经济大幅增长做出贡献的主要功臣，来自轻工业生产的出口消费品，由此引领中国走向一条出口工业化道路。然而，国家在1987年才最终定下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思路。

表5.2：变化中的中国就业结构，1980—2002（以百万计）

	1980	1990	1995	2000	2002
总计	423.6	647.5	680.7	720.9	737.4
城市	105.3	170.4	190.4	231.5	247.8
国家	80.2	103.5	112.6	81.0	71.6
（国有企业）	67.0	73.0	76.4	43.9	35.3
集体	24.3	35.5	31.5	15.0	11.2
混合所有	0	1.0	3.7	13.4	18.3
外资所有	0	0.7	5.1	6.4	7.6
私人所有	0.8	6.7	20.6	34	42.7
剩余	0	23.1	16.9	81.6	96.4
农村	318.4	477.1	490.3	489.3	489.6
乡镇企业	30.0	92.7	128.6	128.2	132.9
私人所有		1.1	4.7	11.4	14.1
个体经营		14.9	30.5	29.3	24.7
农民	288.4	368.4	326.4	320.4	317.9

来源：普拉萨德（Prasad）：《中国发展与融入世界经济》，表8.1

关于乡镇企业的性质，人们做出的解释五花八门。有些人用证据指出，乡镇企业就是私人企业，"除了名字不是"，这些企业剥削低廉的农村或迁移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女性——而且运营完全不受任何管制。乡镇企业工资经常相当低，也不提供任何福利或法律保护。但是，有些乡镇企业提供有限的福利和养老金，也有法律保护。在过渡期的混乱状态中，各种差别都会冒出

129

来，而这些差别经常标志着地方和区域的表现形式。①

1980 年代期间日益清晰的是，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率，大部分来源于国有企业之外的部门。在革命年代，国有企业为劳动力提供工作保障和社会保障。但在 1983 年，国有企业被允许雇用“合同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有限期的职位。②国有企业还被认可在公有制外拥有更大的管理自主性，管理者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利润，超出目标的剩余产品也可以按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市场价往往要比官方价格高出许多，由此确立了一种艰难而短命的双重价格体系。尽管有上述刺激因素，国有企业还是没能兴盛。很多国有企业陷入债务困难，不得不靠中央政府或国有银行（它们被鼓励以有利条款借贷给国有企业）支撑下去。此举后来给银行带来严重问题，因为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大幅增长。国有企业部门进一步改革势在必行。所以，1993 年国家决定“把指定的大型和中型国有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制或股份制企业”。前一种企业将拥有“二至五十名股东”，而后一种将拥有“超过五十名股东，可以公开发行证券”。一年后，一项更宽泛的企业化方案出台：除了最重要的国有企业外，其余国有企业均转为“股份基础的合作制”，所有员工名义上都有认购股份的权利。进一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转制浪潮发生于 1990 年代末，到 2002 年，国有企业仅占全部制造业就业人口的 14%，1990 年这个数字是 40%。国家最近的动作则是把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

① Hart-Landsberg and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35; Li and Tang, *China's Regions*.

② Hart-Landsberg and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38.

完全开放给外资所有。①

对于海外直接投资来说，它们在1980年代得到了各不相同的结果。起初海外直接投资被引入南方沿海四大经济特区，这些特区“起初的目标是生产出口商品，赚取外汇。它们也扮演着社会和经济实验地的角色，了解外国技术和管理方法。它们提供了一系列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包括免税期、早期利润汇款、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②但是，外国企业尝试在汽车和制造业等领域开拓中国内部市场，却并不奏效。虽然大众汽车和福特汽车(勉强)生存下来，通用汽车却在1990年代初失败了。最初的成功仅仅在几个部门清楚记录下来，这些部门出口包含着大量劳动力的商品。1990年代初，超过三分之二的海外直接投资(存活下来的商业投资甚至比这个数字更高)都是由海外华人组织的(尤其是来自香港的华人，但也有来自台湾的)。资本主义企业受到的法律保护很薄弱，致使海外华人要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付出额外费用开发非正式的地方关系和信用网络。③

随后，中国政府指定了几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给外国投资(图5.1)。1995年后，中国政府实际上把整个国家开放给任何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资。1997—1998年，席卷乡镇制造业的破产浪潮，波及主要城市中心的许多国有企业，成为一个分水岭。接下来，竞争价格机制接管了从中央向地方下放的权力，成为推动经济重构的核心步骤。结果，大量国有企业就算没有被摧毁，也受到了重创，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大量劳工怨声

---

① See ibid., and Global Policy Forum, *Newsletter* ‘China's Privatization’, http: www.globalpolicy.org.socecon/ffd/fdi/2003/1112chinaprivatization.

② Li and Tang, *China's Regions*, ch. 6.

③ Ibid., 82.

四起(见下文)，中国政府面临困境： 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就得吸收大量过剩劳动力。①中国政府不能仅仅依靠日益庞大的海外直接投资来解决问题，虽然这一手可能也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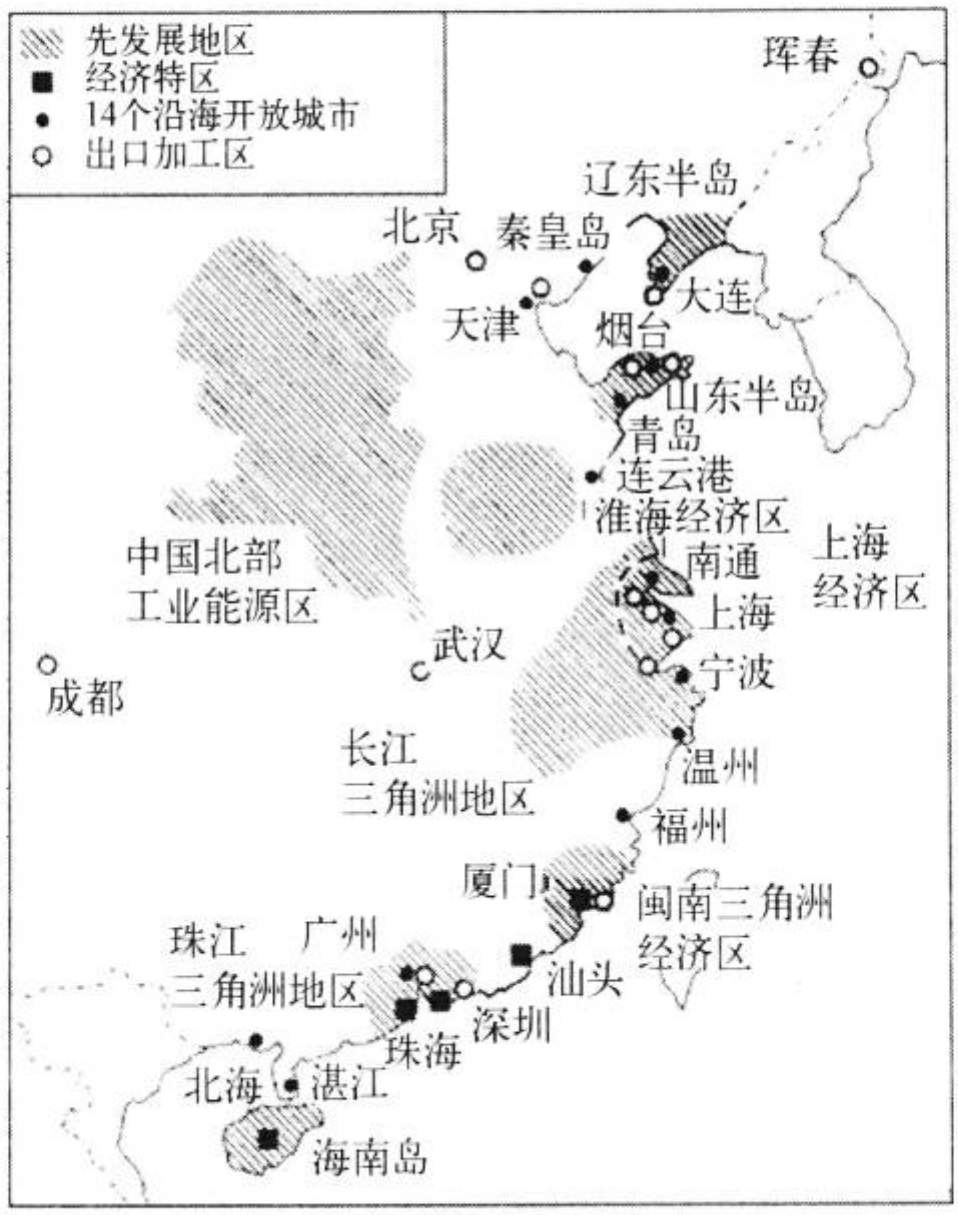


图 5.1：1980 年代中国向外国投资开放地形图

来源：迪肯：《全球转型》

131 自 1998 年起，中国人就设法通过以下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贷款投资大型工程项目，改造物质基础设施。他们正在规划一项比已然规模宏大的三峡大坝更雄心勃勃的计划(耗资至少六百亿美

① China Labor Watch, 'Mainland China Jobless Situation Grim, Minister Says', http: //www. chinalaborwatch. org/en/web/article. php? article_id = 50043, 18 Nov. 2004.

元)：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惊人的城市化速率(自1992年以来，不少于四十二个城市已扩大到超过一百万人口的规模)需要巨额的固定资本投资。主要城市建立了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和高速公路，八千五百英里的新铁路将连通内陆地区和沿海经济动力地区，包括一条上海与北京间的快速铁路以及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奥运会也正给北京带来大量投资。“中国还试图建立一个城际高速公路系统，比美国五十年前建立的更大，虽然实际上每座大城市正在建立或刚刚建成了大型新机场。”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有“超过一万五千条高速公路正在施工，将给国家增添十六万二千公里的道路，长足足绕地球赤道四周”。①这些工程远远超过美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所建的城际高速公路系统，也有潜力在未来数年内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然而，这些工程是财政赤字投资的(按照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方式)。另外，它也产生了高风险，因为如果投资不能如期收益，那么财政危机就会很快到来。

快速城市化提供了一种渠道，可以吸收大量集中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例如，毗邻香港北部的东莞在短短二十年内从一个小城镇发展为拥有七百万居民的城市。但是，“城市官员不满足于每年23%的经济发展速度。他们为一个巨大而崭新的城市添上最后一笔——他们希望吸收三十万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这将是全新中国的先驱者。”②东莞也将是所谓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之所

① J. Kahn,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13 Jan. 2003, A1 and A8; K. Bradsher, 'Chinese Builders Buy Abroad', *New York Times*, 2 Dec. 2003, W1 and W7; T. Fishman,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4 July 2004, 24 - 51.

② H. French, 'New Boomtowns Change Path of China's Growth', *New York Times*, 28 July 2004, A1 and A8.

在地(由一位华人亿万富翁建造，有七个区域分别仿造阿姆斯特丹、巴黎、罗马、威尼斯、埃及、加勒比、加利福尼亚，据说每个都建造得惟妙惟肖、难辨真假)。

这类新型城市之间总是处于激烈的城际竞争。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每座城市现在都设法尽可能多地捕捉商机，“比周围城市建造得更好，这种做法往往带来双重结果。1990年代末，方圆一百公里内建了五个国际机场，港口和桥梁也要如法炮制”。①各省市和城市都抵制中央对其投资的管制，部分是因为它们有权力出售房产开发权，从而为自己的规划筹措资金。

133 城市也成为疯狂的地产开发和房地产投机的聚集地：

> 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种“赌场心态”虏获了这个国家，各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忙不迭地资助大规模的地产开发。上流阶级的办公空间、奢侈的别墅、装潢考究的城市住宅和公寓一夜间拔地而起，不仅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如此，许多更小的省市和沿海城镇也是如此……所谓的“上海泡沫”将这个一度单调的城市改造为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大都市之一。到1995年底，上海盖了超过一千座摩天大楼，近一百家五星级宾馆，约一千三百五十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这个数字是1994年二百七十万平方英尺的五倍——而一个“烫手”的房产市场正在以超过新纽约的速度积累股本……1996年后半年泡沫破裂，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低

① K. Bradsher, ‘Big China Trade Brings Port Wa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7 Jan. 2003, 12.

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过剩。①

但是，1990 年代末强势恢复的增长势头，据说到 2004 年止，在核心城市市场中又涌现出许多建筑。②

中国基本属国家所有的银行体系，在这一切背后扮演着金融角色。1985 年后，这一部门快速扩大。例如，到 1993 年，国家银行的分支银行数量已经“从六万零七百八十五家增加到十四万三千七百九十六家，员工从九十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五名增加到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九百五十七名。储蓄同期从四千二百七十三亿人民币(折合美元五百十六亿)增加到二万三千亿人民币，总贷款从五千九百零五亿人民币增加到二万六千亿人民币”。③到那时为止，银行开支超过政府预算达五倍。大量资金被用于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银行显然“要为创造‘资产泡沫’负主要责任，尤其是在不稳定的房产领域和建筑部门”。不良贷款成为问题，最终中央政府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清除呆账”，相当于美国在 1987 年解救储蓄和贷款行业所花的资金(那次经济援助“在公共基金上花了一千二百三十八亿美元，在金融机构的辅助性存款保险金上花了二百九十一亿美元”)。例如，2003 年中国政府宣布从其外汇储备中综合转让出四百五十亿美元给两家大型政府银行，这是“不到六年内给予银行体系的数目第三大

① S. Sharma, ‘Stability Amidst Turmoil: China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sia Quarterly* (Winter 2000), www.fas.harvard.edu/~asiactr/haq/2000001/0001a006.htm.

② Hale and Hale, ‘China Takes Off’, 40.

③ H. Liu, ‘China: Banking on Bank Reform’, *Asia Times Online*, atimes.com, 1 June 2002.

的经济援助”。①尽管不良贷款资产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35%，但这个数字与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超支(overhang)与消费者债务比起来不算什么，后两者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0%。②

中国有一个方面显然是向日本学习的。教育和科技的现代化，必须伴有明确无误的研究和发展策略，既是为了军事目的也是为了民间目的。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相当大，如今甚至可以提供商业人造卫星(这令美国很愤怒)。但是从1990年代末以来，许多外国企业开始将相当数量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转到中国，微软、Oracle、摩托罗拉、西门子、IBM、英特尔在中国都设立了研究实验室，因为中国“作为技术市场越来越有重要性，也越来越复杂”，中国也有“大批技术精湛但经验不足的科学家，而中国的消费者虽然还是比较穷，但正在越来越富裕，且渴望新的技术”。③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和通用汽车等巨头在内的二百多家主要外国企业，如今都将大量研究活动放在中国。这些企业经常抱怨，认为中国本地企业非法盗版他们的技术和设计。但它们对此也无计可施，因为中国政府不愿干预；而且，如果它们过于纠缠这类事件，中国政府的权力可能给它们制造麻烦，致使其难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施展拳脚。活跃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日本和韩国在中国许多大型的“研究型城市”中投资，以期利用高新技术和廉价劳动力。整体结果是，中国更能吸引高科技部门

---

① K. Bradsher, ‘A Heated Chinese Economy Piles up Debt’, *New York Times*, 4 Sept. 2003, A1 and C4; K. Bradsher, ‘China Announces New Bailout of Big Banks’, *New York Times*, 7 Jan. 2004, C1.

② Liu, ‘China: Banking on Bank Reform’.

③ C. Buckley, ‘Let a Thousand Ideas Flower: China Is a New Hotbed of Research’, *New York Times*, 13 Sept. 2004, C1 and C4.

的经济活动。①甚至印度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发现，将经济活动投放到中国更为便宜。本地的高科技部门也在许多领域中腾飞。例如，在深圳，“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学校园，拥有许多明快光洁的石板和玻璃建筑(就算在硅谷也不落伍)，容纳了许多工程师，由他们和其他人组成的一万人的工程师团队，后来将华为建设成中国在通讯领域第一个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1990 年代末，“华为开始在亚洲、中东和俄罗斯大幅投资建立销售网络；它如今在四十个国家销售产品，价格往往要比竞争对手低三分之一”。②在个人电脑营销和生产领域，中国企业如今也表现得非常活跃。

对 外 关 系

1978 年，对外贸易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7%；但是，到了 1990 年代初，这个数字涨到 40%，并自此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在同期增加了四倍。到 200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0%以上来自海外直接投资(其中制造业占了半数)。到那时为止，中国已经成为拥有海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许多跨国公司也正从中国市场获利甚丰。通用汽车曾在 1990 年代初冒险失败，但 1990 年代末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到 2003 年报告说它在中国的利润远远高于其美国国内企业。③

看起来，似乎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一

---

① J. Warner, ‘Why the World’s Economy is Stuck on a Fast Boat to China’, *The Independent*, Jan. 24, 2004, 23.

② C. Buckley, ‘Rapid Growth of China’s Huawei Has its High-Tech Rivals on Guard’, *New York Times*, 6 Oct. 2003, C1 and C3.

③ K. Bradsher, ‘G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An Annual Goal of 1.3 Million Cars’, *New York Times*, 8 June 2004, W1 and W7.

切都出乎1978年计划之外。邓小平发出了离开毛泽东的国内自力更生政策的信号，但最初对外开放还是尝试性的，并且仅限于广东的几个经济特区。直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广东的成功试验，才接受了出口导向型发展。而只有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中央政府才全力推动向海外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开放。①例如，在1994年，通过官方汇率贬值50%，双重汇率制（官方和市场）得以废除。虽然这次贬值在国内激起了些许通胀危机，它却为贸易大幅增长和资本大规模流入铺好了道路，而后两者使中国如今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经济。至于这为新自由主义化的未来预示着什么，还有待观察，因为新自由主义化借助竞争性不均衡地理发展具有瞬息万变的特点。

邓小平策略的初步成功依赖和香港的联系。作为亚洲经济“小龙”之一，香港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动力中心。不同于这一区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纷纷采取高度的国家计划，香港在没有大规模政府指导的情况下，以一种更为混乱的企业方式进行发展。华人商人已经建立起重要的全球联络，香港在其中轻易就占据了中心。香港制造业曾经依照高强度劳动和低增值的路线发展（以纺织业为首），但到1970年代末，香港遭受了海外竞争的严重打击，劳动力也急剧短缺。隔海相望的中国广东拥有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因此，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不啻是天赐良机。香港资本抓住了这次机遇，它利用许多隐秘的联系跨越边境进入中国，调节中国已有的所有对外贸易，并利用其全球经济营销网络使中国制造的商品可以轻易流动。

---

① Z. Zhang, *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至迟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近三分之二的海外直接投资(FDI)是通过香港进入的。虽然其中部分是香港的专业经济调节，以寻求更多样的外国资本渠道，但毫无疑问的是，香港毗邻的地理位置这一偶然事实，对于中国整体上展开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例如，深圳市的城市经济开发区在1980年代初并不成功。吸引香港资本家的是农村地区新创建的乡镇企业，香港资本提供机器、生产投入和市场营销，乡镇企业从事生产。这种运营方式一旦建立，其他外来资本家也可以效仿(尤其是台湾人，主要围绕着开放后的上海)。海外直接投资的来源在1990年代期间非常多样，因为日本、韩国和美国企业开始极大程度地利用中国作为海外生产中心。

1990年代中期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对外国资本越来越有吸引力。虽然只有10%的中国人拥有一个初生且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但在超过十亿的人口中有10%，这依然是个庞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纷纷展开，为这群人提供汽车、手机、DVD、电视机、洗衣机，此外还有购物中心、高速公路、“奢侈”住宅。汽车月平均产量从1993年的二万辆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五万辆以上，此后又在2004年中一跃增加到每月近二十五万辆。一波外国投资的浪潮——从沃尔玛到麦当劳再到电脑芯片生产，无所不包——涌入中国，预示国内市场在将来的快速发展，尽管还存在制度上的不确定性，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显然还有生产过剩的危险。①

① K. Bradsher, ‘China's Factories Aim to Fill Garages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2 Nov. 2003, International Section, 8; id., ‘G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id., ‘Is China The Next Bubble?’, *New York Times*, 18 Jan. 2004, sect. 3, 1 and 4.

强烈依赖海外直接投资使中国成了一个特例，与日本或韩国相当不同。结果，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太完整，内部区域间贸易发展非常薄弱，哪怕已经在新型通讯方式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广东等省份与外国进行的贸易，远远多于它和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的贸易。在中国，资本并不会轻易地从一处流向另一处，虽然最近发生了许多合并行为，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在不同省份之间建立区域联合的尝试。①所以，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依赖仅有些许缩减，即资源配置和资本主义链接在中国内部得到改善。②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过去四年内，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这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很大关系，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纯粹动力，以及国际竞争结构的不断变化，已经使贸易关系的关键重组不可避免。在1980年代，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主要是依靠低增值产品，依靠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销售廉价纺织品、玩具、塑料制品而确立的。毛泽东的政策留给中国充分自足的能源和许多原材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
138 产国之一)，中国仅仅需要进口机器和技术，并(依靠香港的殷勤相助)获得进入市场的渠道。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中国纺织品生产的每小时工资在1990年代末维持在三十美分；相比之下，墨西哥和韩国是二点七五美元，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水平徘徊在五美元左右，而美国则要超过十美元。③然而，中国产品在最初阶段听命于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商人，后者

① K. Bradsher, 'Chinese Provinces Form Regional Power Bloc', *New York Times*, 2 June 2004, W1 and W7.

② H. Yasheng and T.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China Now Magazine*, 3 Apr. 2004, www.chinanowmag.com/business/business.htm.

③ P. Dicken,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ed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3), 332.

为中国提供全球市场的渠道并牟取巨额贸易利润，然后通过收购或投资乡镇企业或国有企业，日益实现反向企业合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企业雇用多达四万名劳工都不算稀奇。此外，低报酬使得有可能产生资本节约创新。高生产力的美国工厂使用昂贵的机械系统，但“中国工厂颠倒了这个过程，它们把资本抽出生产过程，再把更多的劳动力重新投入进去”，总共所需资本一般可以减少三分之一。“低工资和低资本投入的结合，典型地使资本收益率比美国工厂高。”①

不可思议的劳动力工资优势，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低增值生产部门领域(如纺织品)和其他低成本国家展开竞争，如墨西哥、印尼、越南和泰国。随着中国(虽然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赶超墨西哥成为美国消费品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墨西哥在短短两年内失去了二十万个工作岗位。1990 年代期间，中国开始转向高增值生产，并在电子技术和机械工具等领域与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展开竞争。这部分是因为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决定将生产移向海外，利用海外大量价廉技高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都是中国大学系统栽培出来的。起初，最大规模的企业流入来自台湾地区，据说如今有多达一百万名台湾企业家和工程师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他们占据着很大的生产力。来自韩国的企业数量也很多(见图 4.4)。韩国电子企业如今在中国有许多分支企业。例如，2003 年 9 月，三星电子宣布正在把个人电脑生产业务完全移到中国，三星此前已在中国投资了二十五亿美元，

139

① T. Hout and J. Lebretton, ‘The Real Contest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Line, 16 Sept. 2003；有趣的是，这正是马克思当年评论十九世纪英国和美国利用技术的不同方式。See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i. 371－372.

“建立了十个销售子公司，二十六个生产公司，总共雇用了四万二千人”。①日本在中国的生产外包导致日本制造业就业从1992年的一千五百七十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一千三百一十万人。日本企业同样也开始从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撤出，以重新投入中国。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甚多，以至于“一半以上的中日贸易是在日本企业之间进行的”。②正如在美国发生的情况那样，有可能企业日子过得很好，自己国家却饱受煎熬。中国给美国造成的制造业岗位减少，不如在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地那么多。中国的惊人增长——既是国内的增长，也是国际贸易地位上的增长——对应着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生产落后、出口滞胀，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周期性危机。消极竞争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后果，或许不久便会加剧。③

另一方面，中国的急剧发展也使其更依赖于外国原材料和能源的资源。2003年，中国用去了“世界煤矿产量30%，世界钢铁产量36%，水泥产量55%”。④中国从1990年的相对自足状态，变成2003年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能源企业寻求里海盆地石油的股份，并与沙特阿拉伯谈判协商以获取中东石油供应；中国对于苏丹和伊朗的能源兴趣使之在这些领域与美国关系紧张。中国战胜日本，获得了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在中国1990年代寻求新金属能源的过程中，它从澳大利亚的进口翻了四

① See Hart-Landsberg and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94 – 95; K. Brooke, ‘Korea Feeling Pressure as China Grows’, *New York Times*, 8 Jan. 2003, W1 and W7.

② J. Belson, ‘Japanese Capital and Jobs Flowing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17 Feb. 2004, C1 and C4.

③ See Forero, ‘As China Gallops’.

④ K. Bradsher, ‘China Reports Economic Growth of 9.1% in 2003’, *New York Times*, 20 Feb. 2004, W1 and W7.

倍。由于中国急需战略性金属，如铜、锡、铁矿、铂、铝等，它急切地与智利、巴西、印尼、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签订贸易协议。中国向各地寻求农业和木材进口（中国从巴西和阿根廷大规模采购大豆，给这些经济部门带来了新鲜活力），而中国对废金属的需求也很大，在这方面给出的价格全球最高。甚至美国制造业也 140
从中国对推土设备（卡特比勒公司［Caterpillar］）和涡轮机（GE）的需求中获利。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中国如今是韩国出口的首要目的国家，而在日本出口市场，中国也可以和美国比肩。贸易关系的迅速重新调整，最好地体现在台湾的事例上。2001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台湾地区出口的第一目的对象（主要是中层制造业产品），但到 2004 年底台湾地区向中国大陆的出口量已经比向美国的出口量多一倍。①

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全球影响力，有力地统治着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区域性霸主。中国并不避讳重新主张自己在这个区域的帝国传统。2004 年，阿根廷担心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会摧毁刚开始复苏的本地纺织品、鞋、皮革等产业，中国对此给出的建议是： 就让这些产业消失吧，专心做好自己给蓬勃的中国市场供应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工作就行了。阿根廷当然不会忘记，这正是英国在十九世纪殖民印度文明的方式。尽管如此，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仍使全球经济中相当一部分已上了中国的轨道。相反，中国在 2004 年发展脚步有所减缓，已经——

使得各地的商品和金融市场心神不宁。镍价格从持续十

① K. Bradsher, ‘Taiwan Watches its Economy Slip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13 Dec. 2004, C7.

> 五年的高价位上大幅下跌，铜价格也从持续八年的高价位急剧下降。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商品驱动型经济的国家也遭了殃。亚洲其他出口驱动型经济的市场也受到影响，担心中国会减少向台湾地区采购半导体、减少向韩国采购钢材、减少向泰国采购橡胶、减少向越南采购大米，还有减少向马来西亚采购锡。①

正如成功的资本积累动力都会发生的情况，会有一个时刻国内积累过剩，需要向外部输出。一种方式是购买美国债券，借此为中国产品维持活跃的市场，同时方便地将人民币与美元价值挂钩。但是，中国贸易企业在世界上一直很活跃，它们也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同样，中国企业也投资海外，确保自己在外国市场中的地位。中国电视机如今在匈牙利进行装配，确保销往欧洲市场的渠道；同时也在北卡罗来纳进行装配，确保销往美国的渠道。一家中国汽车公司计划在马来西亚组装汽车，并最终在那里建一个工厂。中国企业如今甚至在太平洋区域投资旅游业，以满足本国居民日益高涨的需求。②

但是，中国在一个方面显然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的轨道。中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要实现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就必须要么吸收、要么压制这些剩余劳动力。如果采取前一种方案，那么中国只能靠债券融资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计划和固定资本形成计

141

① W. Arnold, 'BHP Billiton Remains Upbeat Over Bet on China's Growth', *New York Times*, 8 June 2004, W1 and W7.

② M. Landler, 'Hungary Eager and Uneasy Over New Status', *New York Times*, 5 Mar. 2004, W1 and W7; K. Bradsher, 'Chinese Automaker Plans Assembly Line in Malaysia', *New York Times*, 19 Oct. 2004, W1 and W7.

划(2003 年固定资本投资增加了 25%)。潜在的危险是，有可能发生固定资本过度积累的严重危机(尤其是在建筑环境方面)。有大量迹象表明存在生产能力的过度(比如在汽车制造和电子技术方面)，而在城市投资中已经发生了暴发与亏损的循环。但是，这一切都要求中国政府偏离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像凯恩斯主义国家那样行事。这要求中国保持对资本和汇率的控制，这些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财政部的全球规则不符。虽然中国被豁免履行这些规则以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临时条件，但中国不能永远如此。随着人民币通过香港和台湾渗透到全球经济之中，要想强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变得越来越艰难。值得记取的是，让整个凯恩斯主义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条件之一，正是由于美元逃离了美国的货币监管，致使欧洲美元市场形成。①中国人很像是在复制这条道路，而他们的凯恩斯主义也相应受到了威胁。

中国银行系统处于目前债券融资的核心，它当前无法抵抗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因为其半数未偿贷款都是不良贷款。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可以运用收支顺差为银行清除麻烦。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能如此行事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美国积累收支顺差。一种独特的相互依赖关系由 142
此产生：中国——以及日本、台湾地区和其他亚洲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债券，从而美国可以方便地吸收这些国家的生产过剩。但这使得美国很容易受到亚洲中央银行家们奇思异想的影响。相反，中国经济动力却受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掣肘。

① K. Bradsher, ‘China’s Strange Hybrid Economy’, *New York Times*, 21 Dec. 2003, C5.

美国目前也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行事——巨额增加联邦赤字和消费债券，同时坚持其他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新自由主义规则。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立场，如今美国有许多强有力的声音指出，这样做可能带来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①对中国来说，这将导致从劳动力吸收的政治转向公开压制的政治。这样的策略能否奏效，关键将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自己与这些力量的关系。②

迈向阶级力量的重建？

2004 年 6 月 9 日，某位王先生在北京的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购买了一辆九十万美元的迈巴赫（Maybech）超豪华私家车。显然，此类奢侈轿车的市场相当活跃，表明“一小撮中国家庭积累了大量财富”。③至于不那么高级的私家车，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的最大市场。某些地方的某些人，不知怎么一来就变得非常有钱。

尽管中国经济或许属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列，但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图 5.2）经济发展的好处“主要让城市居民、政府和党的官员享受到了。在过去五年里，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甚至于某些研究开始不恰当

---

① Volcker's remarks are cited in P. Bond, 'US and Global Economic Volatility: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mpire Seminar, York University, Nov. 2004.

② Wang, *China's New Order*; T. Fishman, *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Scribner, 2005).

③ K. Bradsher, 'Now, a Great Leap Forward in Luxury', *New York Times*, 10 June 2004, C1 and C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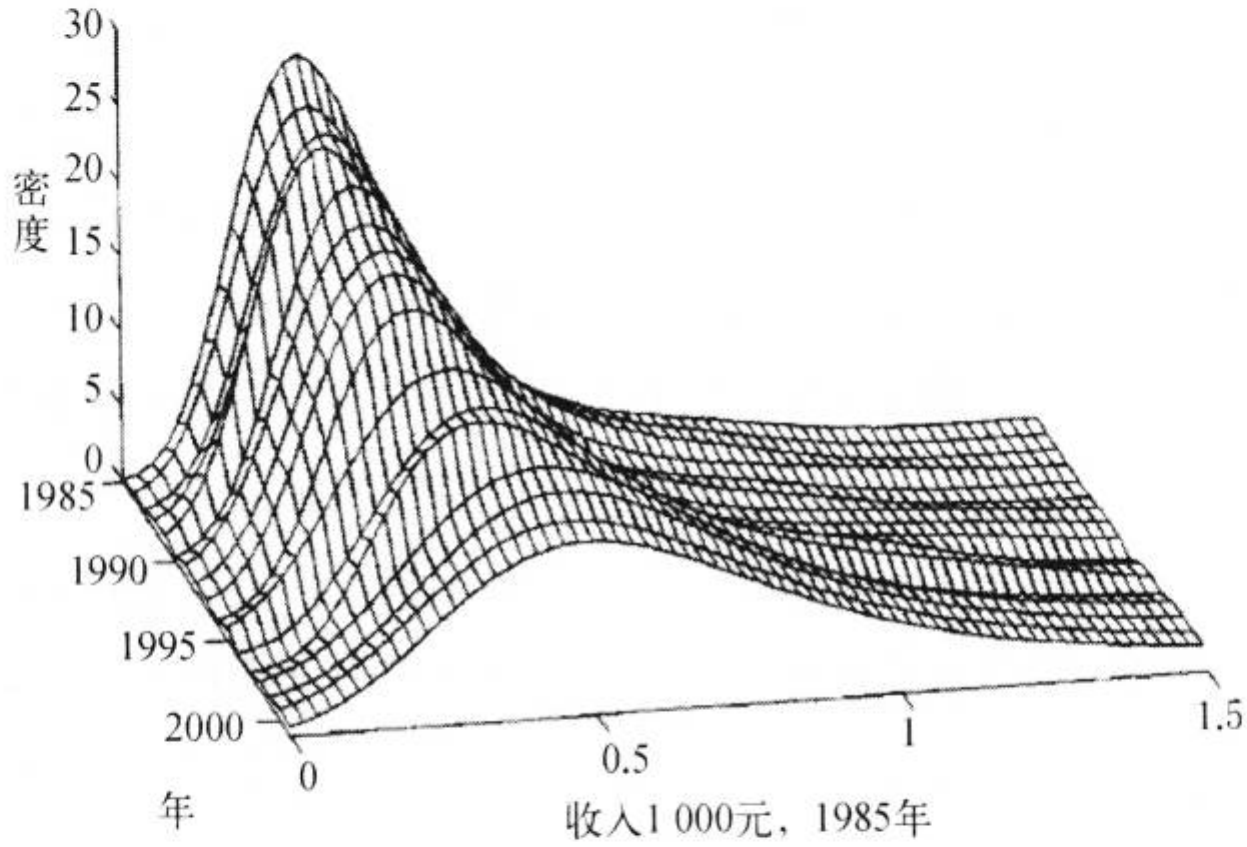


图 5.2：中国收入日益不平等：农村（上图）与城市（下图），1985—2000

来源：吴喜明与佩罗夫（Perloff）：《中国长期收入分配》

地把中国的社会分化与非洲最穷的国家作比较”。①社会不平等从未在革命年代里消除，城市和农村的差异甚至被写进法律。但
143 汪晖写道，随着改革的进行，“这一制度性不平等迅速转化为阶级和阶层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②如基尼系数等形式化的社会不平等测量方式，证实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但也最平等的社会之一，变成了持续不平等
144 的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二十年里(见图5.2)。(通过户籍制度固定下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正迅速扩大：富裕的城里人开着宝马轿车，而农村的农民一周能吃一次肉已经不错了。更需要强调的是农村和城市内部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区域不平等同样加剧了，部分南方沿海城市高速领跑，而内陆和北方“老工业区”要么经济无法发展，要么在作艰难的挣扎。③

仅仅是社会不平等加剧还无法作为阶级力量重建的确切指标。这最后一方面的证据很大程度上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证据。然而，我们可以进行一番推测，首先看一下社会最底层人民的情况。“1978年，中国有一亿二千万工人。到2000年，这个数字是二亿七千万。加上进城找到长期工作的七千万农民，中国工人阶级目前接近三亿五千万人。”在这些人中，“超过一亿人”目前受雇于非国家部门，正式说来算雇佣劳动者。④事实上，受雇于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同样处于雇佣劳

---

① X. Wu and J. Perloff,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Over Time: Reasons for Rising Inequality*, CUDARE Working Papers 97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04).

② Wang, *China's New Order*.

③ L. Wei,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0).

④ L. Shi, 'Current Conditions of China's Working Class', *China Study Group*, 3 Nov. 2003, http://www.chinastudygroup.org/index.php?action=article&type.

动者的地位。因此，中国就有一股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浪潮，出现于私有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实行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的各个阶段(包括取消国有企业的福利供给和养老金义务)。政府也“拆除”了公共服务。根据中国劳工观察组，“农村政府几乎得不到富裕地区的资助。这些政府向当地农民征税，强征无休无止的费用来修建学校、医院、道路建设，甚至治安设施。”就算国家经济增长达9%，这些落后地区的贫困依然在加剧。1998 年到 2002 年，随着国有企业规模从二十六万二千家减少到十五万九千家，二千七百万工人被打发走人。更惊人的是，过去近十年内中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净损失约一千五百万个。①由于新自由主义需要庞大、容易剥削、势力相对薄弱的劳动力，中国肯定有资格算作新自由主义经济，虽然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社会天平另一端的财富积累是更复杂的情况。似乎这一过程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贪污腐败、秘密计谋、公开攫取曾经公有的权利和资产而进行的。随着当地政府将企业股份移交管理，作为自身的重建策略，许多企业经理“通过各种方式，一夜间拥有价值数千万元人民币的股份，形成了一个新的富豪集团”。当国有企业重新结合到股份制企业时，“企业经理获得大部分股份，有时候其年收入是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的一百倍”。②青岛啤酒在 1993 年成为股份制企业，其主管不但在这家利润丰厚的企业中拥有大量股份(青岛啤酒凭借接管许多本地啤酒企业，提升了自己的全国知名度和市场垄断力量)，而且收入也相当可观。党员、政府职员、私有企业主、银行之间的特权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私有化的企业经理拥有一

① China Labor Watch, ‘Mainland China Jobless Situation Grim’.
② Shi, ‘Current Conditions of China’s Working Class’.

定数量的股份，他们或许会通过银行（或朋友）贷款收购工人手里的其余股份（有时是强迫收购，例如通过威胁停工）。由于大量银行贷款都是不良贷款，这批新企业主或者把企业拖垮（从中倒卖资产牟取个人利益），或者千方百计抵赖债务而不宣布破产（破产法在中国还不健全）。政府拿出四百五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补助被严重剥削的劳动力，并给予银行经济援助，使之填补非盈利性贷款的缺口；当政府这样做时，它很可能正从下层阶级那里将财富重新分配给上层阶级，而不是勾销错误投资。无所顾忌的经理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新兴私有企业及其资产，并利用它们来牟取个人财富。

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本地资本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凭借二十多年的合资合营，许多中国企业从技术转让中获利，并且这些企业有幸拥有大量熟练劳动力和管理技术，也具备企业雄心的旺盛精力（animal spirits），它们如今不但能在国内与外国企业竞争，在国际舞台上也能与之抗衡——并且不再仅限于低增值部
146 门。例如，目前排名世界第八的电脑制造商是1984年由一批中国科学家靠政府资助成立的；到1990年代末，它已经从批发商转变为制造商，占据中国市场的最大份额。这家企业便是联想（如今叫Lenovo），目前正与几家主要公司激烈竞争；它还接管了IMB的个人电脑生产线，以便获得更好的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这笔交易（不经意间威胁到台湾在电脑行业的地位）使IMB能够与中国软件市场建立更牢固的联系，同时也在电脑行业树立起一个业务遍布全球的巨型中国企业。①虽然国家可能在联想等公司持有股份，

① D. Barboza, 'An Unknown Giant Flexes its Muscles', *New York Times*, 4 Dec. 2004, C1 and C3; S. Lohr, 'IBM's Sale of PC Unit Is a Bridge Between Companies and Cultures', *New York Times*, 8 Dec. 2004, A1 and C4; S. Lohr, 'IBM Sought a China Partnership, Not Just a Sale', *New York Times*, 13 Dec. 2004, C1 and C6.

这些公司的管理自主性仍然可以保障其所有制和奖励系统能让公司执行官积累大量财富，就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

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在大型城市之内和城市周边，以及出口发展地区——似乎是另一种有利手段，借以将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人手里。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一无所有，土地转而为城市牟利所用，导致劳作者在农村无计谋生，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农民的补助通常仅相当于土地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土地则被政府官员转手给开发商。过去十年里，多达七千万农民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土地。例如，市镇领导经常通过与外国投资者或开发商协商决定市镇土地和资产的实际产权，这些权利随后被批准归后者私人所有，实际上是把公共利益圈给少数人。汪晖写道：在转型期的混乱中，“大量的国有财产‘合法’或非法地流入小部分私人手里”。①土地和房产市场的投机现象——尤其是在城市——相当活跃，哪怕还没有明晰的产权体系。耕地损失日益严重，1998 年中央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土地转化，直到能够实施更合理的土地使用计划。但一系列破坏已经发生了。有价值的土地被囤积起来，开发商(利用与银行的特权关系)已着手展开工作，将大量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里。甚至就小规模而言，房产投机所获的资金要比生产所获多得多。②有人正是用自己在房地产上赚的钱购买九十万美元的汽车，这个事实意味深长。

---

① Wang, *China's New Order*; J. Yardley, 'Farmers Being Moved Aside by China's Real Estate Boom', *New York Times*, 8 Dec. 2004, A1 and A16.

② C. Cartier, 'Zone Fever. The Arable Land Debate and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China's Evolving Land Use Regime and its Geographical Contradic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2001), 455 – 469; Z.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资产价值方面的投机行为(通常利用带有优惠条款的贷款)也非常重要。这种现象在大城市及其周边——例如北京、上海、深圳、广东等地——的房产领域尤其明显。盈利(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往往盈利甚丰)一般归投机者，而经济不景气时的损失则基本由银行承担。在所有这些领域(包括无法计算的暗中贪污腐败区域)，通常由党的部分领导人或政府官员进行的资产挪用已经把他们从国家力量的代理人变成独立且极为富有的商人，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新财富，必要时还可以通过香港将财富偷运至国外。

高涨的消费文化已经在主要城市中心出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又带上了特殊的性质，比如许多城市都有封闭且受到保护的富人高档住宅社区(往往带有像“贝弗里山庄”之类的名字)、富丽堂皇的特权阶级消费场所、饭店和夜总会、购物中心、主题公园。后现代文化在上海登陆并大红大紫。所有西化的标志在那里都能找到，包括社会关系的转型——年轻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做交易，打扮得花枝招展，各种文化安排(从世界小姐选美盛会到大型艺术展览)以惊人的速度将上海打造成夸张版的纽约、伦敦或巴
148 黎，甚至达到戏仿的程度。随着每个人都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投机，如今所谓的“吃青春饭”成为主流。这在性别方面造成的影响相当显著。“在沿海城市，女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好机遇，她们可以赚数目惊人的钱，也可以获得很好的职业岗位；另一方面，在制造业中赚的工资就较少，她们也可能从事地位低下的服务行业，如餐饮、家政服务、卖淫。”①

① C. Cartier, 'Symbolic City/Regions and Gendered Identity Formation in South China', *Provincial China*, 8/1 (2003), 60 - 77; Z. Zhang, 'Mediating Time: The "Rice Bowl of Youth" in Fin-de-Siècle Urban China', *Public Culture*, 12/1 (2000), 93 - 113.

积聚财富的另一项来源是过度剥削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地区来的年轻女性。中国工资水平极其低下，劳动条件也乱七八糟且剥削情况严重。更其糟糕的是拖欠工资、不履行养老金义务。李静君指出：

> 1996 年到 2001 年，在东北老工业区腹地沈阳有 23.1% 的受雇工人经历过工资拖欠，26.4%退休职工经历过养老金拖欠。全国范围内，未拿到工资的工人数量从 1993 年的二百六十万上升到 2000 年的一千四百万。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破败的老工业基地的退休和下岗职工。政府调查显示，国家近一亿迁移工人中的 72.5%遭受工资拖欠，拖欠工资总额估计约一百二十亿美元(或近一千亿人民币)。其中有 70%发生在建筑业。①

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本积累有相当部分来自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结果造成了许多地区爆发激烈的劳工抗议。虽然中国工人准备好接受长时间工作、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和低工资，以作为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代价，但拖欠工资和养老金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央政府请愿和抱怨在近几年里已经冒头，如果政府无法充分回应，民众就会采取直接行动。②2002 年，在东北城市辽阳，来自近二十家工厂的三万多名工人进行持续几天的

① S. K. Lee, ‘*Made In China: Labor as a Political Force?*’, panel statement, 2004 Mansfield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ontana, Missoula, 18 – 20 Apr. 2004.

② Ibid.; J. Yardley, ‘Chinese Appeal to Beijing to Resolve Local Complaints’, *New York Times*, 8 Mar. 2004, A3.

抗议，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示威”。在中国北部的佳木斯，一家之前雇用了一万四千人的纺织厂突然关闭后，约80%市镇人口待业，靠每周不到二十美元过活。请愿杳无音信，几个月后民众爆发了直接行动。“有些天，退休工人成排地坐在路上，阻塞了通往城镇的主要高速公路。另一些时候，成千名下岗纺织工人坐在铁轨上，扰乱了铁路运营。12月底，来自一家境况不佳的纸浆厂的工人直挺挺地躺在佳木斯唯一的飞机跑道上，阻止飞机着陆。”①公安部门数据显示，2003年“有将近三百万人参与了抗议活动”。直到最近，此类冲突通过种种方式得到成功解决：让他们保持孤立、分散、无组织，当然还有隐瞒不报。但是，最近的数据表明更广泛的冲突正在爆发。例如，在安徽省有“约一万名纺织工人和退休工人最近抗议养老金的降低、医疗保险和伤残补助的丧失”。在东莞的斯特拉(Stella)国际有限公司(一家台湾人所有的皮鞋制造商，雇用四万二千名员工)“面临这个春天愈演愈烈的罢工问题。有一刻，超过五百名狂怒的工人砸坏工厂设备，重伤一名公司经理，导致警察进入工厂并带走主要滋事者”。②

各种形式的抗议(“其中有许多带有暴力性质”)，“在最近几个月内频繁发生，举国皆然”。农村地区的土地没收所引发的骚乱和抗议也遍地都是，这些是否终将带来大规模运动，尚难预料。但是，中国共产党显然害怕秩序崩溃的危险，并正调动力量

① E. Rosenthal,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litancy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10 Mar. 2003, A8.

② E. Cody, 'Workers in China Shed Passivity: Spate of Walkouts Shakes Factories', *Washington Post*, 27 Nov. 2004, A01; A. Cheng 'Labor Unrest is Grow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nline*, Oct. 27, 2004; Yardley, 'Farmers Being Moved Aside'.

先发制人地遏制任何可能产生的社会总体运动的滋生。李静君对于政治主体性的性质做出的结论，在此值得注意。她指出，国家和迁移工人都拒绝“工人阶级”一词，也否认“阶级是建构他们集体经验的话语框架”。他们也不把自己视作“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一般所假定的契约主体、法律主体或抽象劳动主体”，具有个体法律权利。相反，他们一般会诉诸毛泽东传统的观念，即人民是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他们的 150
利益相互一致并与国家利益一致”。在这样的论述中，工人“可以做出要求国家保护的道德主张，要求国家加强对人民的领导并对他们负责”。①所以，任何大众运动的目标都是要求中央政府实践自身的革命纲领，反对外国资本家、私人利益和地方权威。

中国政府目前能否或愿意实践此类道德主张，并借此维持其正当性，还是个未知数。一位杰出的律师在为一名被控挑起罢工的工人辩护时，注意到在革命以前“中国共产党与工人站在一起，反抗资本主义剥削；而今天，中国共产党与资本家携手对抗工人”。②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意在挫败资产阶级形成，但共产党同样认可中国劳动力的大规模无产阶级化、打破“铁饭碗”、抽空社会保障、强征各种使用费、建立弹性劳动市场体制，并且认可将先前的公有资产私有化。共产党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可以在其中自由形成和运作的社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它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并缓解了很多人的贫困问题，但同时也使得大量财富积聚到社会上层精英手里。此外，党内的商界人士也在不断扩大（从 1993 年的 13.1% 上升到 2000 年为止的

① Lee, ‘Made In China’.

② 引自 Cody, ‘Workers in China Shed Passivity’; see also various issues of the *China Labor Bulletin*。

19.8%)。但是，很难说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家拥入党内，还是表明许多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权，通过种种可疑的手段成为了资本家。无论如何，这一现象告诉我们，政党和经济精英正在不断合并，而这种现象在美国已经太普遍了。另一方面，工人和党组织的联系却变得紧张。①政党结构的内部转型是否会巩固技术精英的优势——同样的技术精英曾使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朝向全面新自由主义化迈进——我们拭目以待。但也不能忽视的是，“人民大众”会试图重建自身阶级力量的独特形式。党如今似乎站在他们
151 的对立阵营，并显然准备动用垄断的手段镇压异议、强迫农民离乡、压制初生的民主化愿望和一些分配正义的愿望。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虽然“带有独特的中国特色”。然而，权威主义、民族主义诉求、某种帝国主义的复兴，这些都表明中国正以其特殊的方式与新保守主义潮流汇合，后者在美国正兴风作浪。这可不是好兆头。

① Cody, 'Workers in China'.

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2001 年后，给经历了全球经济衰退后的世界带来经济动力 152
的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反讽的是，在一个被认为由新自由主义规则统治的世界中，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方式都好似凯恩斯主义国家。美国恢复了军事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规模赤字投资，而中国利用不良银行贷款的债券资助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固定资本投资。忠实的新自由主义者无疑会提出，经济衰退表明新自由主义化还不充分或不完善，他们可以举出一系列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和华盛顿资金充足的游说集团的所作所为，经常滥用美国财政预算为自己牟取特殊利益。但是，他们的主张很难证实，而在做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他们仅仅是在步一大批著名经济理论家们的后尘，这帮理论家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照着他们教科书上的规定行事，世界就会很美好。①

但是，对于这一悖论还有一种更糟糕的解释。如果我们把下述主张搁置一旁不考虑(我认为我们必须这么做)——即认为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仅仅是错误理论走火入魔的情况(请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见谅)，或者是盲目追求错误乌托邦的事例(请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 [John Gray] ②见谅)——那么，我们剩下来要面对的就是一组紧张状态：一方面是持续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

是统治阶级力量的恢复或重建。如果我们正处在上述两个矛盾目标的十字路口，那么，当前布什政府会偏向哪一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急切地为企业和富人争取税收减免。除此以外，一次
153 全球金融危机(部分源于美国自身经济政策不当)将容许美国政府最终为自己免除一切公民福利保障的义务，只有军事和治安力量方面的义务不减反增，因为美国需要它们来镇压社会动荡并强加全球秩序。资产阶级中较为清醒的声音——他们听取保罗·沃尔克等人的警告，即将来五年内非常可能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或许会传播开来。③ 但是，对于资产阶级上层精英而言，这将意味着撤回他们在过去三十年内积累的某些特权和力量。在过去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人们会想起 1873 年或 1920 年代——每当产生类似的严酷选择时，预言往往并不准确。上层阶级固守自身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宁可粉碎整个系统也不愿让出自己的特权和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并不是对自身利益无所考虑，因为如果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像成功的破产专业律师那样，从经济崩溃中获利，而我们剩下的人则必然要遭受严重损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也会遭殃，并最终要从华尔街破窗而逃，但一般情况不是那样。他们唯一担心的是政治运动，因为可能有没收财产和革命暴动的威胁。虽然他们可以指望如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精密军事装备(多亏了军工复合体)保护他们的财富和力量，但这些军事装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伊拉克战乱，该会使他们心生疑窦。但是，统

---

①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t. 2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9), 200.

② J. Gray, *False Dawn: The Il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Press, 1998).

③ Bond, 'US and Global Economic Volatility'.

治阶级几乎很少(如果有过的话)自愿缴出自己的权力，我也看不出他们这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吊诡的是，一场强有力的社会民主与工人阶级运动，反倒比资产阶级力量自身更有可能解救资本主义。对极左人士而言，这样的结论听起来有些反革命，也并非没有强烈的私利考虑在内，因为正是普通百姓而不是上层阶级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受苦、挨饿，甚至死亡(看看印尼或阿根廷)。如果统治精英偏爱的政策是“我死了以后，管他洪水滔天”①，那么洪水相当程度上吞没的是无助的人和没有疑心的人，而精英早就准备好了逃命方舟——起码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活得很好。

新自由主义的成就

我上面写的都是推测。但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一下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地理记录，看看这副万灵药——据说它能救治目前威胁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疾病——威力究竟如何。那么，新自由主义化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刺激了资本积累？真实数据表明，简直一无所获。1960 年代，全球经济总增长率为 3.5%左右，甚至在艰难的 1970 年代这个数字也不过下降到 2.4%。但是，在随后的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增长率却分别为 1.4%和 1.1%(自 2000 年以来，增长率差不多跌到了 1%)。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化在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相当失败(见图 6.1)。②在某些地方，例如接受了新自由

① Aprés moi le déluge，语出法国皇帝路易十五(1710—1774)，也有说是出自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之口。——译者

② 两个最好的官方评估，见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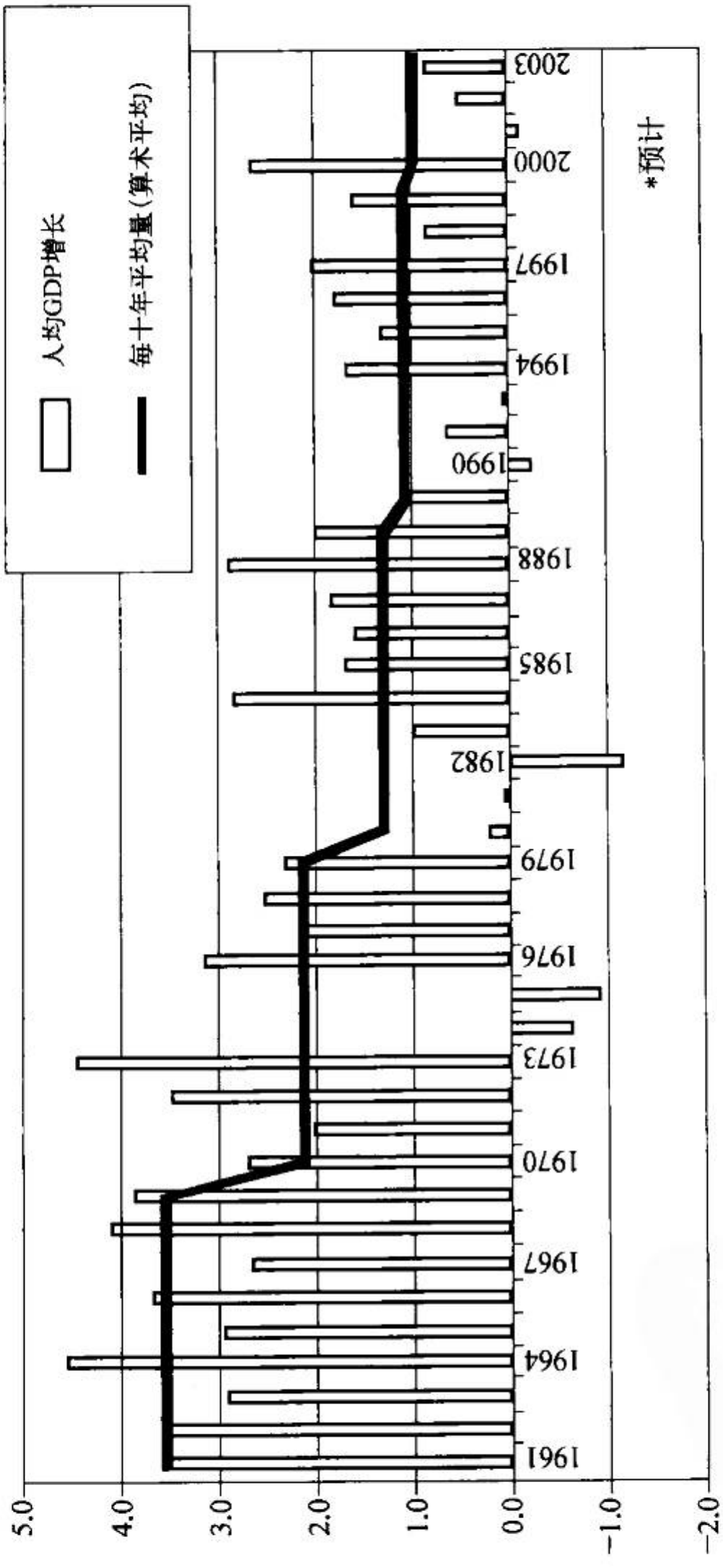


图 6.1：每年和每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速率，1960—2003

来源：全球化所涉社会问题世界委员会：《公平的全球化》

主义“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地区以及那些中欧国家，损失是灾难性的。1990 年代期间，俄罗斯人均收入每年下跌 3.5%。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导致男性预期寿命减少了五年。乌克兰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波兰经济有了显著增长，但它没有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新自由主义化要么产生滞胀（在 1980 年代的“失落十年”），要么带来短促的经济增长与随后的经济崩溃（如阿根廷）。在非洲，新自由主义根本没有带来任何积极变化。只有在东亚和东南亚（某种程度上印度如今也追随其后），新自由主义化伴随着积极的经济发展，而在这些地方，正是不太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型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经济发展（每年近 10%增长）与俄罗斯经济衰退（每年 3.5%负增长）的对比十分触目，全世界的非正式就业快速增加（调查显示，在拉丁美洲经济活跃人口中，此类就业从 1980 年代的 29%上升到 1990 年代的 44%），而几乎全球的健康水平指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等——自 1960 年代以来不增反降。然而，世界贫穷人口比例却下降了，但这几乎完全仅仅是归功于印度与中国的发展。① 新自由主义化唯一能宣称的全面成功在于缓和与控制了通货膨胀。

对比当然总是令人不快的，但对于新自由主义化而言尤其如此。例如，比起英国持续的自由主义化，局限于瑞典的新自由主义化就取得了好得多的结果。瑞典人均收入更高、通胀率更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往来账户（current account）状况更好，而且所有

① M. Weisbrot, D. Baker, E. Kraev, and J. Chen, ‘The Scorecard on Globalization 1980－2000: Its Consequenc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V. Navarro and C. Muntan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pulation Health and Well-Being* (Amityville, NY: Baywood, 2004), 91－114.

表示竞争地位和商业环境的指数也更优；生活质量指数更高。瑞典在全球人口预期寿命上位列第三，相比之下，英国仅位列第二十九。瑞典贫穷人口比例为6.3%，而英国则是15.7%；但是，瑞典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是最底层的10%人口收入的6.2倍，在英国这个数字则是13.6倍。瑞典文盲率更低，社会流动也更大。①

如果上述事实广为人知，那么赞扬新自由主义及其独特的全球化形式的声音，或许会减低很多。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通过全球化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化是“唯一出路”，并且相信它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因有二。第一，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动荡加剧，使得某些地区可以(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惊人地发展，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担。例如，如果说1980年代很大程度上属于日本、亚洲经济“小龙”和西德，而1990年代属于美国和英国，那么一些地方的“成功”恰恰遮蔽了以下事实：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化无法刺激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第二，从上层阶级角度出发，新自由主义进程而非其理论确实是巨大的成功：它要么重建了统治精英的阶级力量(如美国和某种程度的英国，见图1.3)，要么为资产阶级形成创造了条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地)。上层阶级利益集团主导着媒体的声音，他们宣传神话说那些经济上失败的国家要
157 归咎于其竞争力不够(因而需要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他们宣称，某一地区内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是必要的，这样才能鼓励创业冒险与创新，带来竞争力量并刺激经济。如果底层阶级条件恶劣，那是因为他们出于个人或文化原因而未能提高自己的技能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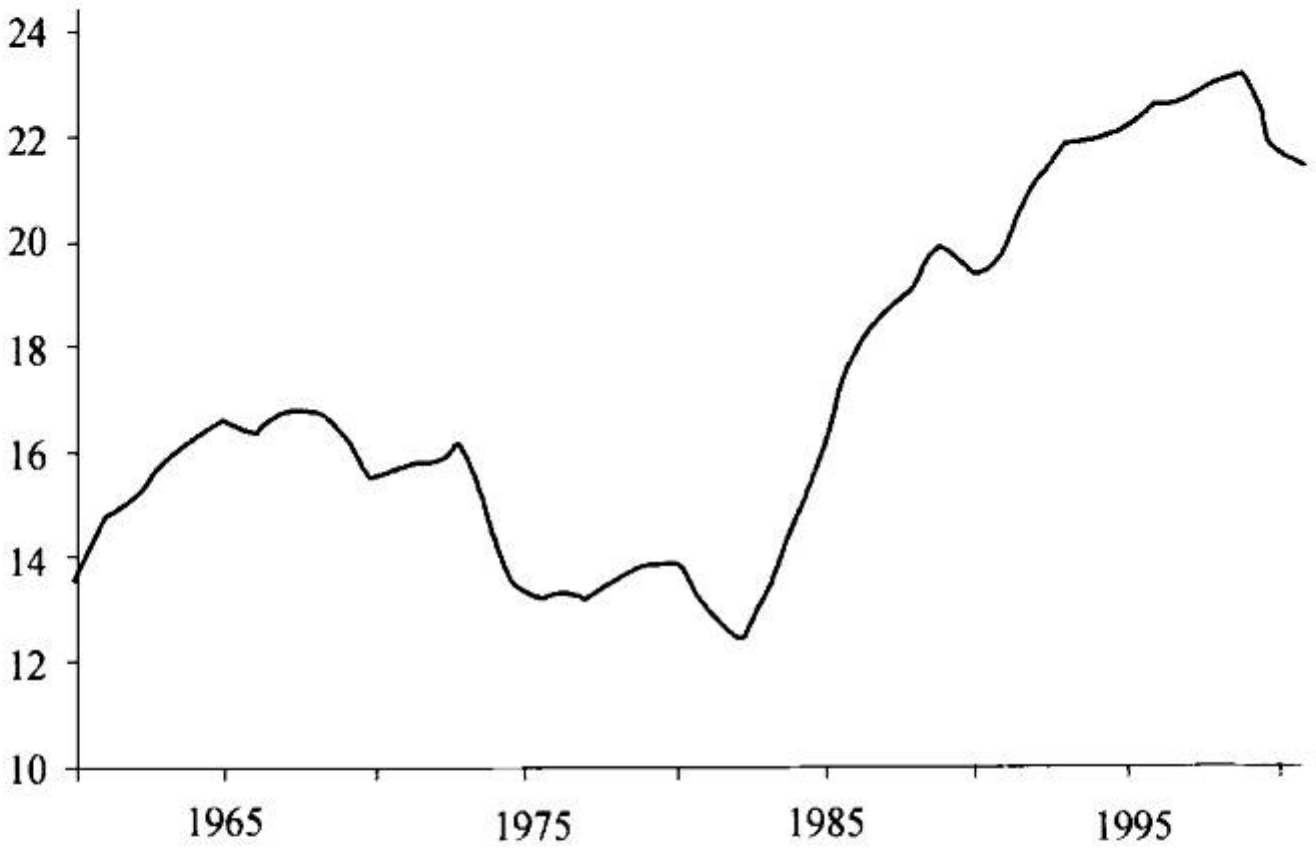
① G. Monbiot, ‘Punitive — and It Works’, *Guardian*, 11 Jan. 2005, online edition.

（通过努力学习、获得新教工作伦理、服从工作纪律和灵活性，等等）。简言之，不管出什么问题，都是因为缺乏竞争实力，或因为个人、文化、政治上的缺陷。这样的论述宣称，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里，只有适者才应该也能够生存。

当然，在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明显的重心转移，而这使新自由主义化看起来显得十分有活力。金融与金融服务的兴起，伴随着金融企业薪酬的明显改变（见图 6.2），并且大型企业（如通用汽车）开始倾向于结合上述两者。这些部门的就业岗位显著增加，但需要回答的严肃问题是：这些部门带来了多少生产性？相当多的金融企业事实上只关注金融，别的什么都不管。它们永远追逐投机获利，而且只要能够掌握力量的各种变化，这一逐利行为就不会停止。所谓的全球金融城市和指令型城市，已经变成醒目的财富和特权孤岛，拥有许多高耸的摩天大楼和成百上千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去容纳这些企业。在这些巍峨建筑内，楼层和楼层间进行的贸易创造出大量虚拟财富。而且，投机性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首要动力。曼哈顿、东京、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香港，如今还有上海，奇观异景正在这些城市的地平线上迅速升起。

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信息技术的膨胀。1970 年左右，这一领域的投资差不多是投入到生产和物质基础设施的各自资产的 25%；但是，到 2000 年，IT 投资占了总投资中的 45%左右，而生产投资和物质基础设施投资相对减少了。1990 年代期间，这被认为预示着将兴起一种新的信息经济。①实际上，这一现象表征的

① Henwood, *After the New Economy*; Duménil and Lévy, *Capital Resurgent*, fig.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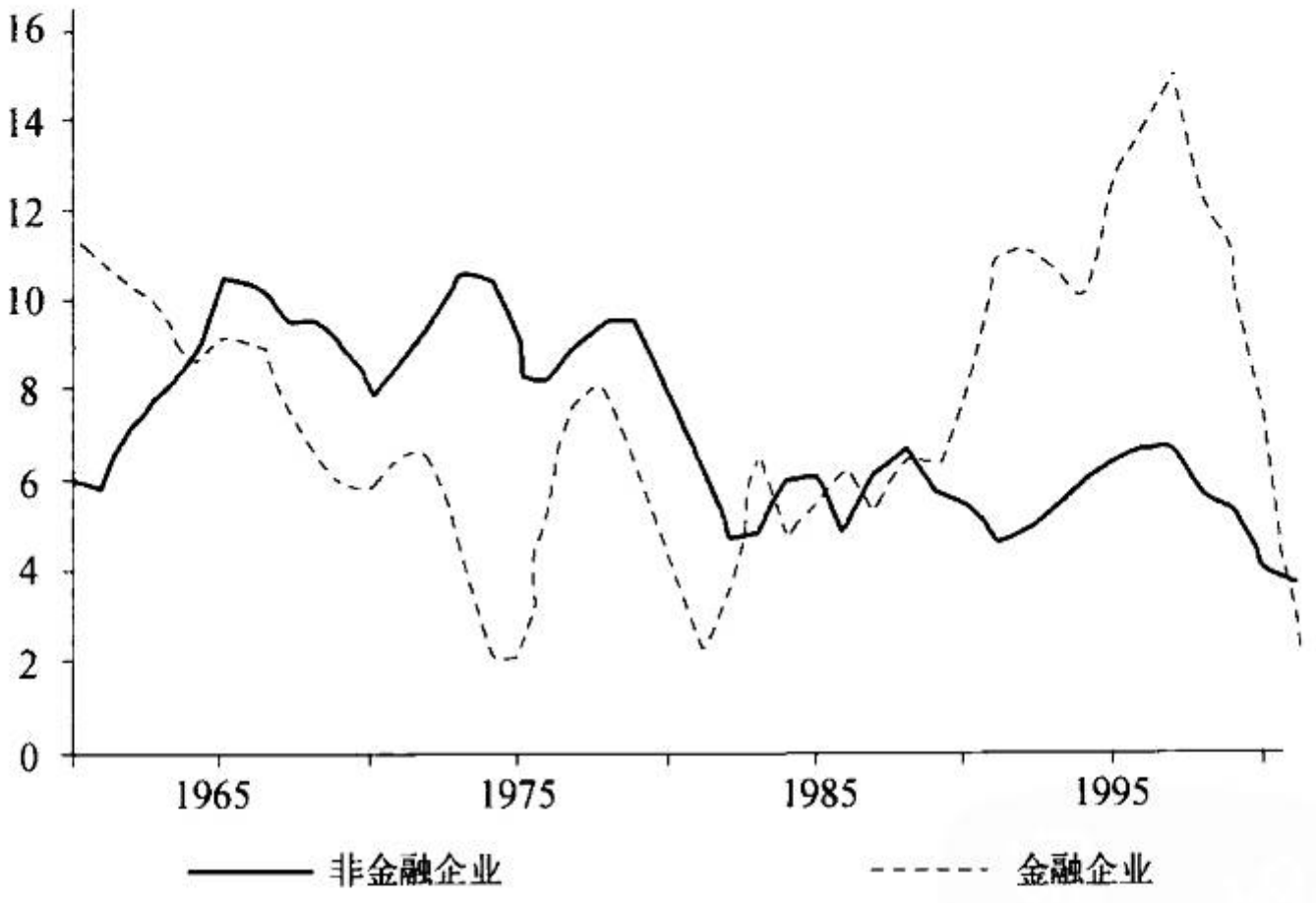


图 6.2：金融资本霸权：美国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资本净值和利润率，1960—2001

来源：杜梅内尔和列维：《资本的复苏》，111，134。承蒙哈佛大学出版社允许转引。

是不幸的偏见：技术性变革远离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入市场导向型金融化所要求的轨道，而这是新自由主义化的标志。信息 158
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权技术，它更适合用于投机行为和最大化 159
短期市场合同，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有趣的是，获益的主要生产领域都是一些新兴产业（电影、影视、电子游戏、音乐、广告、艺术展演），它们运用 IT 作为创新和推销新产品的平台。围绕这些新兴部门的大肆宣传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开了，使人们没有考虑到，基本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缺失了。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宣传大行其道，而它被认为代表着建立一种全然不同、彻底整合的全球经济。①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我在其他地方对于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机制进行过解释，将之称为“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②我用这一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称为“最初”积累或“原始”积累的行为，如今仍然在延续并且扩大了。这些机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强行驱逐农村人口（比较前文描述过的墨西哥和中国的事例，近些年来约有七千万农民离乡）；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有、集体、国家，等等）转化为排他性的私人产权（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镇压公共权利；劳动力商品化、压制替代性的（地方的）生产形式和消费形式；资产掠夺（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过程；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的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中延续）；高利贷、国债，以

① 关于全球化的文献有很多，我自己的观点见 Harvey, *Spaces of Hope*。
② Ibid., ch. 4.

及最致命的——利用信贷系统作为掠夺性积累的激进手段。国家利用其对暴力的垄断和对合法性的定义，非常关键地支持并推动上述过程的进行。我们现在可以在上述机制列表中加上大量技术，如从版权和知识产权中攫取“租金”、减少或消除各种形式的公共财产权(例如国家养老金、带薪休假、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这些财产权是通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例如，美国共和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将所有国家养老金权利私有化(智利专制政府是这方面先驱)。

掠夺性积累包含四个主要特征：

1. *私有化与商品化*。对于迄今为止的公有资产进行企业化、商品化、私有化，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一项标志性特征。其主要目的是为资本积累在下述领域开辟新天地，这些领域被认为迄今为止仍向盈利算计关闭大门。各种形式的公共设施(自来水、电信、交通)、社会福利供给(社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公共机构(大学、研究室、监狱)，甚至战争(正如伊拉克战争中，始终伴随武装力量左右的私人承包商“部队”)，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中和之外(例如在中国)被私有化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所谓知识产权协议(TRIPS)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规定基因材料、物种血浆，还有各种其他产品都属于私有财产。于是，人们就可以从大众那里攫取租金，而大众的实践活动在这些基因材料的发展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生物剽窃现象相当猖獗，而窃取世界遗传资源储备库的行为也很普遍，为的是满足一小撮大型制药企业的利益。全球环境共有物品(土地、空气、水)的损耗不断增加，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些都只为了农业生产的密集型资本积累模式，而上述过程也源自对一切自然形态的彻底商品化。对文化形式、历史、思想创造力的商品化(借助旅

游业实现），产生了大规模的掠夺（世人皆知音乐工业攫取了和剥夺市民文化和创造力）。就像过去一样，国家力量经常被用于推动这些过程发展，甚至不顾大众反对的意愿。管制框架的撤销带来权利的损失，而这些框架最初是为了保护劳工和环境免遭损害的。经年艰苦阶级斗争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国家养老金权利、福利权、国家医疗保障权）被恢复到私有领域，这是所有掠夺性政策中做得最出格的事情，而且经常不顾广大民众的政治意愿。所有上述过程，相当于把资产从公有和大众领域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领域。①

2. 金融化。1980 年以后开始的金融化强劲浪潮，呈现出投机和掠夺的姿态。国际市场的日均金融交易流通总量在 1983 年保持在二十三亿美元，而到 2001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千三百亿美元。2001 年一年的流通量达四十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支持国际贸易和生产投资流量所需只有约八千亿美元。②经济松绑使得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投机、掠夺、欺骗、偷窃，成为再分配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存货促销、庞氏骗局③、借助通胀进行的结构性资产破坏、通过合并与收购进行的资产倒卖、债务责任等级提升（甚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致使全体人民变成债务奴隶），更别提通过信贷和证券操纵所进行的企业欺骗和资产掠夺了（借助证券和企业破产来掠夺和撤销养老基金）——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核心特征。存在许多手段可以从金融体系内部剥除价值。

---

① M. Derthick and P. Quirk, *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W. Megginson and J. Netter, '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f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1), online.

② Dicken, *Global Shift*, ch. 13.

③ Ponzi scheme，因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得名，指的是骗人向虚设的企业投资，然后再用后来投资者的资金付盈利给之前的投资者，以此诱骗更多的人上当。——译者

由于经纪人们可以从每笔交易中捞取酬金，他们就可以通过频繁利用自己的账户进行最大程度牟利（这种活动被称为“炒单”），不管贸易本身是否能为账户增加价值。证券交易的高额流通量反映的恰恰是市场上的炒单行为，而不是市场信心。对证券价值的重视，来自把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管理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方式是为资本管理者提供优先认购股权的好处。我们现在知道，重视证券价值是为了操纵市场并给少数人带来大量财富，而其他许多人
162 则付出代价。安然公司惊人的破产，便象征着一个掠夺许多人生计与养老金权利的总过程。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对冲基金和其他主要金融资本机构实行的投机性掠夺，因为这些行为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掠夺性积累的真正前沿，哪怕人们认为它们提供了“分散风险”的正面利益。①

3. *危机的管理与操控*。投机和通常是欺骗的泡沫，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许多金融操控的特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过程，使得“债务陷阱”一跃成为掠夺性积累的首要方式。②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精心的再分配表演，将财富从贫穷国家转到富裕国家。我之前已经描述过沃尔克的利率提高政策对墨西哥造成的影响，美国虽然自称是高尚的领导人，要组织“经济援助”以保持全球资本积累正常运转，但它铺就的道路却是在劫掠墨西哥经济。这是美国财政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复合体在各地得心应手的事

---

① 关于金融衍生品不断扩散的危险和其占得领导地位的重要性，见 Panitch and Gindin,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S. Soederberg,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mposed Leadership and "Emerging Markets"',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175 - 192。

② Corbridge, *Debt and Development*; S. George, *A Fate Worse Than Deb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情。1990 年代，格林斯潘在美联储屡次运用了与沃尔克相同的计策。单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在 1960 年代并不常见，但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期间却变得屡见不鲜。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幸免，而在某些地方（如拉丁美洲），这类危机变成了地方流行病。这些债务危机被制造、管理、控制，既是为了将体系合理化，也是为了重新分配资产。自 1980 年代起，据计算有“超过五十项马歇尔计划（超过四点六万亿美元）由外围民众递交给他们在中心的债权人”。斯蒂格利茨感叹道：“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此外，新自由主义者称之为“强制性通货紧缩”的行为，不过是掠夺性积累。韦德（Wade）与维内罗索（Veneroso）在写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抓住了这一问题的本质：

> 金融危机总是会引起所有权和力量的转移，转移到那些保持自己资产不受损害的人手里，以及那些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里，亚洲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和日本的企业是大赢家……大规模货币贬值、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助的经济恢复，这三者的结合甚或将推动世界在过去五十年和平时期以来最大的资产转移，从国内所有者移向国外所有者；相比之下，发生在 1980 年代拉丁美洲，或发生在 1994 年后墨西哥的国内资产向美国所有者的转移，规模都要小得多。人们会想起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①的话：“在经济衰退时期，资产

① Andrew Mellon（1855—1937），企业家、银行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长。——译者

会回归到其正当的所有人手里。”①

类似地，确实存在着故意制造的失业现象，以便为进一步积累创造便利的剩余劳动力。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被弃而不用，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他们被闲置不用，直到流动的资本家选择为他们带来新的生命活力。可是危险在于，危机可能会失控并扩散到各地，或骚乱会演变为对于制造骚乱的系统的反抗。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设法在允许掠夺性积累发生的同时，避免引发总体性崩溃或大众骚乱（如发生在印尼和阿根廷的事件），从而控制危机和货币贬值。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所执行的结构性调整规划关注的是第一件事（掠夺性积累），而国家的买办性机构（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力量的军事协助）的任务是确保第二件事（总体性崩溃或大众骚乱）不会发生。但是，大众骚乱的迹象所在多有，比如墨西哥发生的萨帕塔起义，无数的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暴动，以及在西雅图、热那亚等地兴起的所谓“反全球化”运动。

4. **国家再分配。**国家一旦新自由主义化，就成为再分配政策的首要行动者，颠倒资金从上层阶级流向下层阶级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于镶嵌型自由主义时期。为实现这一颠倒，国家首
164 先实施私有化计划和削减社会工资的支出。虽然私有化看上去对下层阶级有利，但长远影响却是负面的。例如，初看起来，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社会住房计划似乎是赐给下层阶级的礼物，他们如今可以用相对低廉的价格从房屋租赁者变成房屋所有者，获得

① E. Toussaint,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The Tyranny of Global Finan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3);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225; Wade and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21.

一份有价值的资产并提升自己的财富。但是，一旦转移过程完成，房屋投机就开始兴盛，尤其是在主要的中心区域，最终诱使或强迫低收入人口迁到如伦敦等城市的边缘地带，并把过去工人阶级的住宅区变成高度奢华的中心。中心地区没有让人买得起的房子，造成有些人无家可归，而那些从事低收入服务行业的人只能赶长距离路程上下班。1990 年代期间，墨西哥合作农场的私有化也对墨西哥农民的未来造成了类似影响，迫使许多农村居民离开土地，到城市找工作。中国将资产移交批准给一小部分精英，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激起了许多最终遭到压制的抗议。如今有报告表明，为了老北京城的重建，多达三十五万户家庭(一百万人)被迫迁离，造成了与上述英国和墨西哥情况相类似的后果。在美国，税收窘迫的市镇如今经常运用征用权力迫使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的房产所有人离开他们居住的优质住宅，以便腾出土地给上层收入者和商业开发，从而提高税收基础(在纽约州，这样的例子超过六十起)。①

新自由主义国家还通过税法改革进行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以利于投资收益而不是工资收入，增加税法中的累减原则(如销售税)，强征使用费(如今在中国农村地区广为流行)，为企业提供一系列补贴和免税政策。美国的企业税率已逐步下降，布什连任总统受到企业领导人热烈欢迎，他们期待能够进一步免除税收义务。如今美国在联邦、州、地方层面的企业福利规划，相当于为 165
了企业利益而大规模重新调整公共资金(直接的如补助工农联合企业，间接的如军工部门的情况)，方式正如美国减免贷款税利率以

① J. Farah, 'Brute Tyranny in China', WorldNetDaily.com, posted 15 Mar. 2004; I. Peterson, 'As Land Goes To Revitalization, There Go the Old Neighbors', *New York Times*, 30 Jan. 2005, 29 and 32.

补助上层收入业主和建筑业。监督和治安的兴起，以及(例如在美国)将民众中的反抗分子监禁起来，表明高强度的社会控制将变得更加险恶。监狱—工业复合体是美国经济的兴盛部门(连同个人安全服务行业一起)。在发展中国家，反对掠夺性积累的声音更加强烈，新自由主义国家立即承担起积极镇压的角色，有时对抗议运动的镇压甚至达到小规模战争的程度(如今可以方便地为很多抗议运动贴上“毒品交易”或“恐怖分子”的标签，从而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例如在哥伦比亚)。其他运动——诸如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或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受到国家力量借助选举和边缘化的联合手段的遏制。①

把一切都商品化

假定市场和市场信号可以最好地决定一切资源配置决策，相当于假定任何事物原则上都可以被作为商品对待。商品化假定财产权的存在先于过程、事物、社会关系，假定价格可以加在这些事物上面，假定这些事物能够按照合法契约进行交易。市场被假定为一切人类行动的合适指引(一种伦理规范)。当然，实际上每个社会都会对商品化的起点和终点做出某些限制，争论焦点是界线何在。某些药物被规定为非法，色情服务买卖在美国多数州是违法的，虽然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行为可能被合法化、非刑事化，甚至作为一项产业而受到国家管理。淫秽制品作为一种符合美国
166 法律的言论自由形式而广泛受到保护，虽然在这里也有某些形式

① J. Holloway and E. Pelaez, *Zapatista: Reinventing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1998); J. Stedile, 'Brazil's Landless Battalions', in T. 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主要涉及儿童）被认为逾越了法律许可的范围。在美国，良知和荣誉被认为不可买卖，也有某种纠缠于“腐败”的奇怪偏好，似乎贪污腐败可以很容易与市场上一般的权力交易和赚钱行为区别开来。性、文化、历史、遗产的商品化；自然的商品化，将其作为奇观异景或休憩之所；从创造力、本真性、独特性攫取垄断性租金（例如著作或艺术的情况）——上述这些均相当于明码标价那些事实上从未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事物。①关于商品化的适当性，人们经常产生分歧（例如，关于将宗教事件和符号商品化），或者争论谁应该行使所有权并取得租金（例如，关于参观阿兹台克废墟或销售土著艺术）。

新自由主义化无疑取消了商品化限制，并极大地扩展了合法契约的范围。一般而言，新自由主义（就像很多后现代理论那样）歌颂转瞬即逝的事物和短期合同——例如，婚姻被理解为一项短期契约协议，而非神圣且牢不可破的纽带。新自由主义者与新保守主义者的分裂，部分反映了双方关于界线应该划在哪里的分歧。新保守主义者们一般会谴责“自由主义者”、“好莱坞”甚或“后现代主义者”，视之为社会秩序的瓦解和败坏，而不认为实际上是企业资本家（如默多克）在做坏事，把各种挑逗性事物（如果不是淫秽材料的话）偷偷塞给大家，并且不断向人夸耀自己在无止境地追求利润时，总是选择了短期而非长期买卖。

但是，比起区区设法通过货币计算和短期合同保护某些珍贵物品、保护社会生活的某种特殊惯例或首要地点（preferred corner），还有严重得多的事情。自由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

① D. Harvey,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93 - 110.

的核心是必须建构连贯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而正如卡尔·波兰尼指出，这些“显然都不是商品……对劳动力、
167 土地和货币的商品描述全然是虚构的”。虽然资本主义离开此类虚构就无法运作，但如果资本主义未能意识到它们背后的复杂现实，它就肯定会造成无数的破坏。波兰尼在其更著名的段落中做出如下解释：

> 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导，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因为“劳动力”这种所谓的商品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人的劳动力量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dislocation)。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最后，对购买力的市场控制将周期性地肃清扼杀商业企业，因为对后者而言，货币供给的涨落不定会产生如同洪水与干旱之于原始社会的巨大灾难。①

①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73. [引文根据冯刚、刘阳译文，前揭，63 页。略有改动。——译者]

虚拟资本的“洪水与干旱”在全球信贷系统内造成的破坏，如在印尼、阿根廷、墨西哥甚至美国，充分证明波兰尼的最后论断。但是，波兰尼关于劳动力和土地的论题值得作进一步分析。

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是带有个性的个人，是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且以种种方式社会化的个体，是可以用某些特征(如遗传特征和性别)辨别出的生理个体，是积累了不同技能(有时被称作“人力资本”)和品位(有时被称作“文化资本”)的个体，也是怀有梦想、欲望、雄心、希望、疑虑和恐惧的活生生的人。然而，对资本家来说，此类个体不过是一个生产要素，虽然不是无差别的要素——因为雇主需要劳动者具备某些性质以符合工作要求，例如身体强壮、有技术、灵活、听话，等等。工人凭合同受到聘用，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安排中，为了最大程度的灵活性，短期合同更受偏爱。历史上，雇主曾经利用劳动力市场中的种种差异进行区分和管理。分化的劳动力市场由此出现，而雇主们也常常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或明或暗地利用种种关于种族、族裔、性别、宗教的差异。反过来，工人也可以利用他们镶嵌其中的社会关系，获得进入某些工作岗位的特权渠道。他们一般会试图垄断技能，并通过集体行动和创造合适的机构，设法管理劳动力市场以保护自身利益。就此而言，他们只是在建构波兰尼所谓“文化制度的保护层”。

新自由主义化试图拆除镶嵌型自由主义允许并且不经意间培养起来的保护层。对劳工的总体打击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机构的力量在各自国家内受到限制或消除(必要时会采取暴力)，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被建立起来。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撤出并在技术上促使工作结构转变，从而使得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变得多余，实现了在工作环境中资本对劳工的主宰。于是，个体

化和相对无力的工人要面临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其中只提供为个体制定的(customized)短期合同。工期保障不复存在(例如，撒切尔夫人在大学里废除了终身制)，一种“个人责任体系”取代了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卫生、伤残保障)，后者以前是雇主和国家需要承担的义务。相反，个人如今在贩卖各类保障的市场中购买这些产品。个人安全因此成为个体选择的事情，依赖于个人能否支付包含在风险金融市场中的金融产品。

另一方面的打击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时空坐标发生了转变。虽然人们可以利用“竞次”(race to the bottom)①来获得最廉价和最顺从的劳动力，地理上的资本流动却使之能够统治全球劳动力，
169 而后者自身的地理流动性有限。由于移民受到限制，被虏获的劳动力数量相当多。为了避免这样的壁垒，只有借助非法移民(产生很容易剥削的劳动力)或短期合同；例如，短期合同允许墨西哥劳动者到加利福尼亚的农业综合企业工作，当他们因长期暴露于农药中而得病甚或死亡时，又被资本家不知羞耻地运返墨西哥。

在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任由摆布的工人”非常典型。②关于劳动者在全世界血汗工厂中的恶劣工作条件和非人待遇的描述，已经很多了。在中国，从农村地区来的年轻女性打工者的工作条件简直骇人听闻：“无法承受的长时间工作，很差的食物，拥挤的寝室，暴君般的管理者——他们会毒打女工，

① “竞次”指一国利用降低社会福利、破坏自然环境、剥削劳动人民等方式，来获取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译者

② K. Bales, *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M. Wright, 'The Dialectics of Still Life: Murder, Women and the Maquiladoras', *Public Culture*, 11 (1999), 453-474.

甚至进行性侵犯，工资要迟发好几个月，有时候甚至根本没有。”①在印尼，两位年轻女性叙述了她们为一个基于新加坡的李维斯(Levi-Strauss)牛仔裤转包商工作的经历：

> 当然，我们经常受到谩骂。老板生气时，他就把女性叫做狗、猪、荡妇，对此我们只能默默忍受，不能反抗。我们正式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每天工薪不到二美元)，但经常会有强制加班，有时候——特别是如果有紧急任务要赶的话——工作到晚上九点。不管我们多累，都不允许回家。我们可能会拿到额外的二百卢比(十美分)……我们从住处徒步走到工厂。工厂里非常闷热，房子是金属屋顶，而且没有那么大地方容纳所有工人。整个工厂非常拥挤。有超过二百人在里面工作，大部分是女性，但整个工厂只有一个厕所……我们下班回家后，都没有力气干别的，吃了就睡……②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墨西哥马圭拉工厂，还有位于洪都拉斯、南非、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由台湾人和韩国人运营的制造业工厂。健康伤害、暴露于大范围有害物质、工作猝死，这些都不受管理且不进行记录。在上海，一位台湾商人管理一个纺织品仓库，“一次火灾中，有多名工人死于密闭建筑内”，这位商人被判处“宽大的”两年缓刑，因为他“有悔改表现”且“火灾后协助处

① A. Ross, *Low Pay High Profile: The Global Push for Fair Labo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4), 124.

② J. 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 Scenes from a Developing World* (London: Verso, 1996), 103.

理相关事宜”。①

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有时候还要加上儿童)承受着此类不体面、吃力、危险的苦活负担。②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化造成的社会后果相当严重。掠夺性积累往往会摧毁女性曾经在家庭生产/销售系统和传统社会结构中具有的所有力量，并将一切重新安置于男性主导的商品和信贷市场中。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从传统父权制控制中求得解放的途径，要么是通过不体面的工厂劳动，要么是通过与性有关的交易——从家政服务和餐饮服务等值得尊敬的工作，到色情交易(当代所有行业中最赚钱的一种，也包含着大量的奴役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丧失，已经对下层阶级女性产生了尤其负面的影响，而在许多前苏联共产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女性权利的丧失几乎是灾难性的。

那么，在这个弹性劳动力市场和短期合同、周期性工作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经常令劳工疲惫不堪的世界里，任由摆布的工人(特别是女性)如何在社会上和情感上生存下来——毕竟他们已经没有曾经给予其些许尊严和支持的集体制度？对于有些人来说，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灵活是一种恩惠，哪怕有时候这并不带来实质性的收益，但可以相对容易地改换工作和免于传统社会父权制和家庭的束缚，这一简单的原则就是看不见的好处。对于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如鱼得水的人而言，似乎在一个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世界中有着大量报酬。可惜的是，不论这种文化多么壮观、

---

① J. Sommer, ‘A Dragon Let Loose on the Land: And Shanghai is at the Epicenter of China's Economic Boom’, *Japan Times*, 26 Oct. 1994, 3.

② C. K. 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C. Cartier, *Globalizing South Chin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1), particularly ch. 6.

灿烂、迷人，它最终也只是和欲望嬉戏，给人带来的满足从不超过购物中心的有限身份认同，以及(对女性而言)美貌或物质财富方面的身份焦虑。“我购物故我在”和占有性个人主义一起建构了一个伪满足的世界，表面上激动人心，内中空空如也。

可是，对于那些失去工作或一直不得不从事非正式就业(这些职业目前为世界上大多数任由摆布的劳动力提供了危险的栖身之所)的人们而言，事情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约二十亿人不得不以每天不到二美元过活，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居高临下，金融行业赚取巨额奖金，以及关于新自由主义化、私有化、个人责任的解放性潜力等等自娱自乐的争辩——这些必然像是一场残酷的玩笑。从中国贫穷的农村地区到富裕的美国，医疗保障的丧失以及各种形式的使用费的增加，都给穷人加上了十分沉重的经济负担。①

新自由主义化强调劳动力同样是一种商品，借此它已经改变了劳动力、女性和处于社会秩序中的当地群体的关系结构。由于失去了民主制度的有效保护层，并且受到形形色色社会混乱的威胁，一支任由摆布的劳动力大军不可避免地会转变为其他制度形式，借此建立社会团结并表达集体意愿。从小型团伙、毒品走私网络、黑手党、贫民区头目，经由社区、底层、非政府组织，到世俗性仪式和宗教团体，各种形式纷纷扩张。这些都是为填补社会空隙应运而生的替代性社会形式，因为国家力量、政治党派以及其他制度形式都被积极拆除，或干脆被当作集体努力和社会纽带的中心而扫除了。宗教信仰的明显抬头，也与此有关。关于这

① 关于全球影响的细致讨论，见 Navarr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Inequalities*; Navarro and Muntan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种趋势，只要看看中国荒凉的农村地区突然出现和传播开来的宗教团体就能知道。①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在混乱的非正规经济领域内迅速出现了福音派改宗现象，而复兴的(有时是新兴的)宗教部落主义(tribalism)和原教旨主义，也构成了非洲和中东许多地区的政治；这些都证明，人们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团结机制。美国原教旨主义的福音派基督教的发展，与越来越多的工
172 作不稳定有关，与丧失其他形式的社会团结有关，也与资本主义空洞的消费文化有关。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指出，堪萨斯州仅仅在1980年代末兴盛起宗教权利，发生于新自由主义重构和去工业化的十多年后。②照这样的说法，上述种种关系似乎言过其实了。但是，如果波兰尼是对的，并且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对待会导致社会混乱，那么努力重建不同的社会网络以抵御威胁，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环境破坏

强加于环境利用之上的短期合同逻辑，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所幸，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就此议题也产生了意见分歧。虽然里根根本不考虑环境，有一次指出树木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撒切尔夫人非常严肃地看待环境问题。她在《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谈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限制氯氟化碳(CFCs)的使用——它是造成南极洲臭氧层空洞不断增大的罪魁祸首。撒切尔夫人十分看重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所带

① J. Kahn, 'Violence Taints Religion's Solace for China's Poor', *New York Times*, 25 Nov. 2004, A1 and A24.

② Fran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来的全球变暖威胁；当然，她的环境保护努力并不完全是无私的，因为她可以部分依靠环境保护的理由，将关闭煤矿和破坏矿工联盟的行为正当化。

因此，新自由主义国家关于环境方面的政策呈现出地理上不均衡和时间上不稳定的特点(取决于谁掌控国家力量，里根政府和乔治·W·布什政府在这方面尤其倒行逆施)。此外，环境运动自1970年代起便有长足进展，经常发挥约束性影响，依时间和地点而定。在有些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发现，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环境之举可以并行不悖。尽管如此，关于新自由主义化造成的环境后果，其总体平衡表几乎肯定是负的。人们努力为人类幸福建立严格(虽然富有争议)的衡量指数，其中包括了环境破坏的代价——这表明自1970年左右以来环境破坏正有加剧趋势。已经有足够多的具体事例支持这一总体论断，表明无限制地推行新自由主义原则带来了环境损失。1970年以来日益加剧的热带雨林破坏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已经对气候改变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产生严重后果。新自由主义化的时代，也恰逢地球近期历史中最快速的大规模物种灭绝时代。①如果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全球环境(尤其是气候)急剧变化以致使地球不适于人类居住，那么进一步拥护新自由主义伦理和新自由主义化实践，将无异于自取灭亡。布什政府应对环境问题的方式经常是质疑科学证据，此外什么也不干(除了削减相关科学研究的经费)。但是，他自己的

① N. Myers, *Ultimate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New York: Norton, 1993); id., *The Primary Resource: Tropical Forests and Our Future/Updated for the 1990s* (New York: Norton, 1993); M. Novacek (ed.),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Losing What Counts* (New York: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2001).

研究团队报告指出，1970 年以后人类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全球变暖。五角大楼也指出，全球变暖最后会成为对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比恐怖主义还要严重。①有趣的是，过去这些年里在增加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两大罪人，恰恰是全球经济的动力来源——美国和中国(后者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 45%二氧化碳排放)。在美国，工业和住宅建造方面，能源利用率已经有了实质进展，能源挥霍很大程度上来自消费主义，它继续鼓励高度耗费能源的城市近郊和远郊扩张，并且鼓励购买耗油量大的 SUV 越野车而不是同样可以买到的能源节省型汽车。美国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石油，显然衍生出地缘政治结果。就中国而言，快速工业化和汽车拥有者的增加，使得能源消耗的压力翻倍；在 1980 年代末，中国已经从自给自足的石油生产国，转变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在此，随着中国在苏丹、亚洲中心、中东夺得获取石油供应的立足点，其地缘政治影响同样很普遍。但是，中国也拥有大量低品质的煤矿供应，含有很高的硫磺成分。将这些用于发电，
174 产生了主要的环境问题，尤其是造成全球变暖的问题。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电力短缺，经常发生灯火管制或电力中断，不存在任何激励因素可以促使地方政府遵照中央政府命令，关闭低效率且“肮脏”的发电厂。汽车拥有和使用方面的惊人增长——十年内，在北京等大城市，汽车基本替代了自行车——为中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世界上空气质量最差的二十

① Climate Change Science Program, 'Our Changing Planet: The US Climate Change Science Program for Fiscal Years 2004 and 2005', http://www.usgcrp.gov/usgcrp/Library/ocp2004-5; M. Townsend and P. Harris, 'Now the Pentagon Tells Bush: Climate Change Will Destroy Us', *Observer*, 22 Feb. 2004, online.

个城市中，有十六个是中国城市。①对全球变暖造成的类似影响也非常明显。就像快速工业化阶段中通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对环境后果不加考虑，正在给各地带来破坏性影响。河水严重污染，自来水供应充满危险的致癌化学物质，公共卫生供给薄弱（SARS 和禽流感的问题就暴露了这一点），土地资源快速转变为城市用地或创造大规模水力发电项目（如长江流域），这些都增加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中央政府现在才刚开始着手处理。中国在这一方面并不是孤例，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同样伴随着紧迫的环境改变，源于耗费扩大和日益严峻的自然资源开采压力。

当考虑到自然资源开采的问题时，新自由主义化的记录相当不堪。原因不难发现：对短期合同关系的偏爱给所有生产者造成压力，他们要在合同期内尽可能地攫取一切。虽然合同和条款可以延期，但总是存在着不确定性，因为有可能发现其他资源。自然资源开采最长的投资回报期相当于折现期（也就是二十五年左右），但大多数合同如今时间都要短得多。损耗通常被认为是线型损耗——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许多生态系统在碰到崩溃点之后便迅速瓦解，因为超过这个临界点它们的自然再生能力就无法发挥作用。鱼类资源——加利福尼亚的沙丁鱼、纽芬兰的鳕鱼、智利的黑鲈——是经典的例子，表明一种资源被按照“最优”速率开采的时候，可能会突然毫无征兆地消亡。②森林业的情况不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同样严峻。新自由主义坚持私有化，使得很难 175

① K. Bradsher, 'China's Boom Adds to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Times*, 22 Oct. 2003, A1 and A8; J. Yardley, 'Rivers Run Black, and Chinese Die of Cancer', *New York Times*, 12 Sept. 2004, A1 and A17; D. Murphy, 'Chinese Province: Stinking, Filthy, Rich', *Wall Street Journal*, 27 Oct. 2004, B2H.

② Petras and Veltmeyer, *System in Crisis*, ch. 6.

建立任何关于森林管理原则的全球协议，以保护珍贵的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尤其是在热带雨林地区。在更为贫穷但拥有大量森林资源的国家，增加出口并允许外资所有制和特许权的种种压力，意味着甚至最小程度的森林保护也被拆除了。智利私有化以后便过度砍伐森林资源，在此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结构性调整方案甚至造成了更糟糕的影响。强制节俭措施意味着贫穷国家将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森林管理，这些国家同时被迫将森林私有化，并将其开放给实行短期合同的外国木材公司。由于被迫依靠外汇来偿还债务，这些国家面临着大规模允许短期采伐以获取外汇的诱惑。更糟糕的是，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节俭措施和失业现象降临的时候，大量人口可能会靠土地寻求生计，并参与到肆意砍伐森林的活动中。由于人们喜欢采取的手段是焚烧，无地农民和伐木企业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规模破坏森林资源，正如在巴西、印尼和几个非洲国家发生的情况那样。①在1997—1998年印尼财政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有数百万人下岗)，苏门答腊发生了失控的森林大火(与苏哈托最富有的华裔商人之一的伐木企业有关)，造成了大量浓厚烟层，对整个东南亚地区产生数月影响。只有当国家和其他利益集团打算抵制新自由主义规则和支持这些规则的阶级利益集团之时(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稍微节制一些的环境利用才可能实现。

论 权 利

新自由主义化在自身内部繁衍出大规模的对抗性文化。然

① American Lands Alliance, 'IMF Policies Lead to Global Deforestation', http://americanlands.org/imfreport.htm.

而，这些对抗都倾向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对抗集中于国内矛盾，例如严肃对待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并且，不仅把个人权利和自由与权威主义相对立，还经常将其与政治、经济、阶级力量的专断相对立。这一对抗性文化认可新自由主义关于增加所有人幸福的说辞，并谴责新自由主义化过程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比如，看一下新自由主义精髓文件——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关键的第一段吧，目标是：

> 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逐步大幅增加实际收入和实际需求，扩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同时在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情况下允许最优利用世界资源，以求既能保护和维持生态环境，也能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和考虑的方式，改善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①

世界银行宣言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虔诚希望（“减少贫穷是我们的主要目标”）。这一切都与加强重建或创建阶级力量的实际行为不符，也与那些造成贫穷和环境破坏的结果不符。

1980 年以来，侵权方面的抗议明显增多。钱德勒（Chandler）指出，在此之前如《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杂志还没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人权。②1980 年以后，人权问题才变得引人注目。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坚持个人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这打开了通往个人权利激进主义的大门。但是，通过关注那些权

---

① D. Rodrik,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Development Really Mattere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1), 9.

② D.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89.

利，而不是关注创造或改造具有实质性的、开放的民主治理结构，抗议性文化培育的途径无法避免新自由主义设定的框架。新自由主义对于个人的关注，胜过任何社会民主制对于平等、民主和社会团结的关注。而且，经常诉诸法律行动等于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偏好——诉诸司法和行政力量，而不是议会力量。但是，
177 诉诸法律既耗时间又耗经费，而考虑到法官的典型阶级效忠，法院又无时无刻不严重偏袒统治阶级利益。法律决策往往将私有权和利率置于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权利之上。钱德勒总结说，正是“自由主义精英对于普通民众和政治进程的失望，才导致他们更多地关注有权有势的个体，把他们的案件交给倾听和做决定的法官”。①

由于大多数穷人缺乏资金以争取自身权利，表达这一理想的唯一途径只有借助于形成倡议团体。就像更一般的权利话语那样，倡议团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的兴起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向，并自1980年左右以来规模迅速扩大。非政府组织在很多情况下都介入到社会供给的真空领域，后者是国家从这类活动中撤出后留下的；这种行为相当于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私有化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家从社会供给领域的撤出。由此，非政府组织扮演的角色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②此外，非政府组织本身并非民主机构，它们往往是精英主义、不负责任(除了对其捐助者)、显然与它们设法保护或帮助

---

① D.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230.

② T. Wallace, 'NGO Dilemmas: Trojan Horses for Global Neoliber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2003), 202 - 219. For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role of NGOs see M. Edwards and D. Hulme (e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1995).

的人非常遥远，无论这些组织多么善意或进步。它们会经常隐藏自己的议事日程，更愿意与国家和阶级力量进行直接商谈或施加影响；它们经常控制自己的委托人而不是代表他们；它们宣称并假设为那些无法自我表达的群体发言，甚至规定那些它们为之发言者的利益(似乎人们自己无法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非政府组织的正当性身份始终值得怀疑。例如，当这些组织成功地以普遍人权为名，煽动禁止在生产过程中利用童工，它们可能摧毁了那样的经济体——其中童工对于家庭生存而言非常重要。如果经济上没有其他出路，儿童可能会被卖去从事色情行业(又该另一个倡议团体出面主张消灭此类事件了)。“权利话语”所预设的普遍性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倡议团体所致力的普遍原则，都与地方特殊性不符，也与处在商品化和新自由主义化压力下的日常政治和经济生活实践不相符合。①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这一特殊的对抗性文化在近些年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通过扩大工业和农业的雇佣劳动力，掠夺性积累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不同于积累的实践活动。扩大雇佣劳动力曾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主导过资本积累进程，孕育出一种对抗性文化(如镶嵌于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镶嵌型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掠夺是片断而特殊的——一会儿是私有化、一会儿是环境破坏、一会儿又是债务金融危机。如果不诉诸普遍性原则，很难反对所有此类具体性和特殊性。掠夺造成权利损失，因此人们求助于一种关于人权、尊严、可持续生态实践、环境权利等等的普遍性措辞，以作为统一的对抗性政

① L. Gill, *Teetering on the Ri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J. Cowan, M.-B. Dembour, and R. Wilson (eds.), *Culture and Right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治的基础。

诉诸权利普遍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做到用于实现心中的进步目标，我们无法把鲜明体现于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和其他组织的传统，当成仅仅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点缀而摒弃。整个人道主义的历史（既包括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也包括各种非西方人道主义）太过复杂了。但许多权利话语目标有限（就大赦国际而言，直到最近它一直只关注与经济权利相对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使之很容易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框架。普遍主义似乎特别适合于全球问题，如气候转变、臭氧层空洞、生态环境败坏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但是，普遍主义在人权领域的结果更为纠结，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实践。除此之外，人权问题太容易被用来作为“帝国利剑”（借用巴塞洛缪[Bartholomew]与布莱克斯皮尔[Breakspear]一针见血的描述①）。例如，美国所谓的“鹰派自由主义者”（liberal hawks）就
179 利用人权，证明在科索沃、东帝汶、海地以及（不要忘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帝国主义行干涉行径的合法性。他们“以保卫自由、人权、民主的名义”证明军事人道主义的合法性，“甚至这种行为可以由一个自封的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引者）单边进行”。②更广泛而言，很难不同意钱德勒的结论——“今天以人权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其根源是一种日益增加的共识：支持西方自1970年代以来不断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论辩的关键在于，认为“国际机构、国际和国内法庭、非政府组织或道德委员

① A. Bartholomew and J. Breakspear, 'Human Rights as Swords of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124 - 145.

② Ibid., 126.

会，比选举出的政府更能代表人民的需要。政府和选举出的代表被认为相当可疑，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所以，他们被理解为具有‘特殊’利益，与按照伦理原则行事正相反对”。①在国内，人道主义的影响同样险恶。其影响是“通过正当化发展中的司法决策角色、正当化非选举的特别工作小组和道德委员会，将公共政治辩论”减少。政治上的影响可能是衰弱的，“人权规范远远不能改变我们原子式社会的个人孤立和消极状态，只能将这些区分制度化”。更糟糕的是，“与任何精英理论一样，人权伦理话语所提供的社会败坏景象，帮助维持了统治阶级的自信”。②

这样的批评可能会诱使人们避免诉诸于任何普遍性的主张，认为它们有致命缺陷；并抛弃所有权利的说法，认为它们是强制推行抽象的、基于市场的伦理的无力说辞，是阶级力量重建的掩饰。虽然两个命题都值得严肃考虑，但我认为把权利领域拱手让给新自由主义霸权，并不是一件好事。需要争夺的战役不仅涉及在特殊情况下应该诉诸何种普遍性与何种权利，还涉及应该如何建立普遍性原则和权利概念。一方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政治—经济的特殊实践，另一方是日益诉诸某种普遍性权利以作为道德和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双方之间建立的关键联系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布雷默法令将某种权利概念强行塞给伊拉克，与此同时，这 180
些法令违背了伊拉克的自行决定权。马克思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两种权利之间，强力起决定作用。”③如果阶级重建造成强制推行一套独特的权利，那么对这一强制的抵抗就会产生争取

①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27, 218.
② Ibid., 235.
③ Marx, *Capital*, i. 225.

相当不同之权利的斗争。

例如，积极的正义感作为一项权利已经成为政治运动的强力推动：与不正义作斗争经常会激发社会改革运动——在美国，令人振奋的公民权运动史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问题是我们或许会诉诸五花八门的正义概念。但分析显示，某些主导性社会过程会突出和依赖于某些正义概念和权利概念，挑战这些特殊的权利就等于挑战包含着它们的社会过程。相反，也不可能从一种社会过程(如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资本积累)转变到另一种(如政治民主和集体行动)，而同时又不改变对某些权利概念和正义概念的忠诚。所有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理想主义规范，其问题就在于隐藏了上述联系。只有当这些理想主义规范脚踏实地，与某种社会过程发生关联时，它们才能找到其社会意义。①

思考新自由主义的事例：各种权利都围绕着主导性权力逻辑——领土国家的逻辑和资本逻辑。②不论我们多么盼望权利的普遍性，但推行权利的始终是国家。如果政治力量不愿意，那么权利观念仍只是一纸空文。所以，权利衍生于公民身份，也以公民身份为条件。领土权限(territoriality of jurisdiction)于是成为问题，关乎两个方面。由于存在无国籍者、非法移民等，就出现了很棘手的困难：谁是或谁不是“公民”成为严重问题，关乎界定国家领土内部的包容和排斥原则。国家在涉及权利问题上如何实施主权，这本身就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但诸多镶嵌于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之中的全球规则，对于主权也施加了种种限制(中国正在经历这一点)。尽管如此，民族国家以其对正当暴力手段的垄

① 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R. Scholar (ed.), *Divided Cities: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20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②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ch. 2.

断，可以用霍布斯式的方式界定一套自身的权利，并且不太受到国际规约的束缚。美国就是其中之一，它坚持自己有权不对国际 181
上规定的人道犯罪负责，同时坚称来自别处的战犯必须要交付法庭审判，但又否认这些同样的法庭可以审判美国公民。

生活在新自由主义之中，也意味着接受或服从一套为资本积累所需的权利。因此，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个体（记住，企业在法律上被规定为个体）不可剥夺的私有产权和盈利权，胜过任何你能想象到的其他不可剥夺的权利概念。这种权利制度的捍卫者善辩地说道，这将鼓励“资产阶级德性”，如果没有这种德性，世界上每个人都将饥寒交迫。这些德性包括个体责任和义务；独立于国家干预（这种权利制度通常被与国家内部界定的权利制度严格对立起来）；市场和法律面前机会平等；对积极性和创业努力的回报；关心自己和自己的东西；一个开放的市场，允许契约选择和交易选择的广泛自由。这一权利体系扩展到个人身体的私有权领域（强调个人有权自由签订契约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个人有权得到尊严和尊重，个人有权免遭奴役等肉体强迫），以及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利领域的时候，显得更加有说服力。这些派生性权利很吸引人，我们很多人都很信奉它们。但是，我们信奉这些权利，就好比乞丐靠富人餐桌上的残羹冷炙苟活。

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接受它，等于接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相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说明，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必定依靠如下手段而在地理上扩张至全球——通过暴力（如智利和伊拉克），通过帝国主义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182

行），必要时也通过原始积累（如中国和俄罗斯）。私有权和盈利权等不可剥夺的权利，将被不择手段地普遍建立起来。当布什说美国致力于将自由扩展到全球，他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然而，这些权利并不是我们仅能有的权利。甚至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由概念之中，还存在许多派生性权利，如言论自由、受教育权、经济保障权、结社权，等等。实施推行这些权利将给新自由主义带来严峻挑战；将这些派生性权利置于首位，而把私有权和盈利权等首要权利变成派生权，会在政治经济实践中引起意义重大的革命。还有许多完全不同的权利概念可供我们追求——例如全球共有物品的使用，或基本食物保障的供给。“平等的权利之间，强力起决定作用。”争夺真正的权利概念，甚至自由本身的概念的政治斗争，使核心问题变成了寻求替代性方案。

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

1935 年，罗斯福(Roosevelt)总统在向国会递交年度报告时明确表示，他认为 1930 年代的经济萧条和社会问题根本上在于过度的市场自由。他说，美国人“必须放弃那种获取财富的观念，它凭借过度利润形成了过分的个人权力”。穷人不是自由人。他指出，社会公正已经在各处成为一个确定的目标，而不是遥远的理想。国家及其市民社会的首要职责，是利用自身力量并配置资源，消除贫困饥饿，确保人民生活安全——保障他们不受生活中大变动的影响，保障他们过上体面的家庭生活。[①]免于短缺的自由，是罗斯福后来表述的四项核心自由之一，他把这四项自由作为其未来政治图景的基础。这些宏大的主题与狭隘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判若云泥，而布什总统则把新自由主义自由置于自己政治措辞的中心。布什说，应对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国家停止管制私人企业，国家撤出社会供给，国家推动市场自由和市场伦理的普遍化。新自由主义将自由概念降低为“仅仅是自由企业的鼓吹者”，只能意味着(如卡尔·波兰尼所说)“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②]

当代美国的公共话语极为贫乏(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而其中

让人惊讶之处在于,缺乏严肃的辩论探讨何种自由概念可能适合于
184 我们的时代。如果美国公众真的能被说服去支持任何打着自由旗号的事情,那么就应该对“自由”一词的意思进行最仔细的考察。可惜,当代人的贡献要么是采取纯粹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如政治评论家法瑞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声称要雄辩地证明:过分民主是个体自由和解放的主要威胁),要么紧跟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而见风使舵,以致提不出与新自由主义逻辑相抗衡的论述。很遗憾,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就是如此(他最终实至名归地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只是在长期霸占诺贝尔评委会的新自由主义银行家被迫下台之后)。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这是迄今关于近期历史的最敏锐讨论——令人遗憾地把重要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包裹在自由市场互动的外衣之中。③ 森似乎是说,离开了自由主义市场,其他自由都会失灵。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而言,他们似乎承认,布什及其共和党同僚所推崇的独特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就是全部了。我们被告知,这些自由值得人们为之在伊拉克牺牲生命,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有“义务”推动自由传播到各地。作为伊拉克新自由主义重建计划的设计师,保罗·布雷默被授予享受盛誉的总统自由勋章,足以说明这部分美国公众象征着什么。

依照当代标准,罗斯福完全合理的概念听起来相当激进,这很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前民主党没有利用这些概念对抗布什紧紧拽住

---

① 引自 Vicente Navarro 对 Sen 的尖锐批评:‘Development as Quality of Life: A Critique of Amartya Sen's *Development as Freedom*’, in Navarr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Inequalities* 13 – 26。

②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57.

③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1999).

的狭隘企业概念。罗斯福的视野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谱系。例如,卡尔·马克思同样持有相当激进的观点,认为挨饿并不能有益于自由。马克思写道:“只有劳动不再被必然性和平庸考虑决定的时候,自由王国才开始”;他还额外加一句说:因此自由王国“超越于实际物质生产的疆域”。马克思很清楚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我们与自然的代谢关系,也不可能摆脱我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起码可以渴望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那里,自由探索我们个体和物种的潜能成为真正可能之事。①依照马克思的自由标准,并且几乎肯定也依照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自由标准,新自由主义化无疑要被认为是巨大的失败。对于那些被市场体系抛弃的人来说(相当数量任由处置的人们,被剥夺了社会保障和支援性社会组织),他们从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只能盼来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他们仅剩的希望是千方百计进入市场体系,要么作为微不足道的商品生产者,作为非正规商贩(买卖物品或劳动力),作为乞丐小偷;要么争先恐后地抢食富人餐桌上的残羹冷炙,或参与大量非法走私交易——毒品、枪支、妇女,或其他任何非法但有需求的东西。这正是许多著作中描绘的受害者反遭谴责的马尔萨斯主义世界,如政治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影响深远的文章,讨论的是“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②卡普兰从未想过,新自由主义化和掠夺性积累正是造成他所描绘的状态的罪魁祸首。记录在案的无数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骚乱——更别说在结构性调整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席卷纽约市、墨西哥城、约翰内斯堡、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许多大城市的犯罪浪

185

① Marx, *Capital*, iii. 820.

② R.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Vintage, 2001).

潮——都应该使卡普兰警醒。①在财富天秤的另一端,那些被彻底整合进市场及其需求的无情逻辑之中的人们,发现很少有时间或空间探索解放的可能性,只能局限在被市场明码标价的“创造性”冒险、闲暇和景观之中。由于人们被迫作为市场和资本积累的附属品存在,而非自由表达的个体,于是在市场的可怕逻辑和空洞强度介入之前,自由王国就已经萎缩了。

正是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出现于市场体系内外的种种对抗性文化,它们或明或暗地拒绝市场伦理以及新自由主义化所强制推行的实践。例如,在美国内部就有愈演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努力推动替代性前景以更好地联系政治计划和生态计划。年轻人中间也有兴盛的无政府运动,其中的一翼(“原始主义者”)相信,人性的唯一希望在于回归到文明诞生以前的狩猎阶段,实际上是要重新开始人类历史。还有一些人受到思想犯罪(Crime Think)运动和德里克·詹森(Derrick Jensen)等作家影响,试图洗净自己身上一切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倾向。②另一些人试图(例如)凭借自己的“本地资金”,在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建立地方经济贸易体系(LETS),以寻求建立互帮互助的社会。这一世俗运动的宗教变体也很发达,遍布美国、巴西和中国农村地区,据报道这些地区的宗教团体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③而许多有组织的宗教团体——福音派基督徒(the evangelical Christians)、瓦哈比伊斯兰教徒(Wahabi Islam)、某些佛教和儒教的教徒——宣扬一种激烈反

① J. Walton, 'Urban Protest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IMF Riots', in M. Smith and J. Feagin (eds.), *The Capitalist City* (Oxford: Blackwell, 1987), 354 - 386.

② D. Jensen, *The Culture of Make Believe* (New York: Context Books, 2002); J. Zergan, *Future Primitive and Other Essays*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94).

③ Kahn, 'Violence Taints Religion's Solace for China's Poor'.

市场，特别是反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因此，所有这些社会运动都反抗新自由主义实践的种种具体表现，尤其是反抗掠夺性积累；这些运动或者抵制劫掠性新自由主义（如墨西哥的萨帕塔革命起义），或者寻求获取迄今不提供给他们的资源（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或阿根廷占领工厂的运动）。政治立场处于中间偏左的联盟（它们公开批评新自由主义化）已经接管政治权力，看来准备好在拉丁美洲地区全面加深和扩展它们的影响。在印度，国大党凭借左翼政策重新上台，这一惊人的成功很能说明问题。显然，人们相当渴望有一种取代新自由主义化的方案。①

甚至在统治政策派别内部，对于新自由主义命题和规定是否明智，也产生了不满的迹象。有些之前的热情拥护者（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参与者（如乔治·索罗斯）如今都转向批判立场，甚至建议某种程度上回到改良版的凯恩斯主义，或回到更为“制度性”的方式以解决全球问题——从全球治理的更佳管理结构，到对于金融家鲁莽投机进行更严密的监督，各种方案都被提出。②近些年

① B. Gills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T. 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P. 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 1993); J. Brecher, T. Costello, and B. Smith,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Power of Solidarity*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0).

②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and *The Roaring Nineties*; P. Krugman, *The Great Unravel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2003); G. Soros, *George Soros on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id., *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 Correcting the Misu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J. Sachs, 'New Global Consensus on Helping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Global Policy Forum Newsletter*, 18 Apr. 2000. 例如，Sachs 说：“我不信任由富裕国家进行的全球治理，不信任受到金钱左右的国际表决（如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我也不信任根深蒂固而不受外界阻挠的官僚制度的永久管制，不信任由富裕国家规定一套规章制度强加在极其贫穷的国家的做法。”

来,不仅存在全球治理改革的不断吁求,也存在一些主要的计划蓝图。①学界和体制上对于作为全球治理基础的世界主义伦理("伤害一人就是伤害所有人")也重新产生兴趣,虽然其太过简单的普遍主义或许存在问题,但并不是全然没有好处的。②众多国家首脑正是以这样的精神经常聚在一起(比如有189位首脑参与的2000年千禧年峰会[the Millennium Summit]),签署虔诚的宣言,集体努力在较短时间内消除贫穷、文盲、疾病。但是,就拿扫除文盲的例子来说,由于在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各地用于公共教育的国家产值比重都在持续且大幅下降,扫除文盲的努力听起来实在空洞得很。

如果不挑战新自由主义建立其上的根本力量——并且,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也极大地推动了这股力量——上述目标不可能实现。这不仅意味着恢复国家的社会供给,而且意味着对抗金融资本的强大力量。凯恩斯蔑视那些依靠股息和利息过活的"食利人"(coupon clippers)寄生虫,他期盼所谓"食利人的安乐死"不仅是实现一定程度经济公正的必要条件,也是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之破坏的必要条件。凯恩斯主义妥协的优点,以及1945年后建立的镶嵌型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某种程度上朝着实现这些目标努力。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化的降临却推崇食利者的角色,为富人减免税收,将股息和投机收益置于工资和薪金之上,并且释放了大量(虽然地理上规

---

① 我只引用了两项: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A Fair Globalization*。

② D. Held, *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Cambridge: Polity, 2004);对于世界主义伦理的某些应用困境,我做过评论,见 D. Harve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Banality of Geographical Evils', in J. Comaroff and J. Comaroff, *Millennial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Neoliber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1-310。

模有限)金融危机,给各国的就业和生活机遇造成毁灭性影响。实现上述虔诚目标的唯一方式,就是对抗金融力量并取消逐步建立起来的阶级特权。但是,各国都没有迹象表明做出任何此类努力。

然而,如我之前所述,布什政府在关于回归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比任何人都抢先一步,准备支持正螺旋上升的联邦赤字向未来无限延伸。但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规定相反,这一事例中的再分配是向上分配给大型企业、它们富裕的行政总裁们,以及它们的金融或法律顾问们,代价却是牺牲穷人、中产阶级,甚至普通的持股人(包括养老基金),更别提将来的后代了。但是,传统凯恩斯主义可以被任意删改并彻底颠倒,对于这一事实我们无需惊讶。正如我已经表明的,有大量证据显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修辞(尤其是关于自由和解放的政治修辞)的首要作用始终是掩饰种种关于维护、重构、恢复精英阶级力量的实践。所以,探索替代性方案就是跳脱出此一阶级力量和市场伦理所规定的参照系,同时冷静地立足于我们的当下现实。这些时间和地点的现实指向一种可能性,它将在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腹地引发重大危机。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新自由主义化在国内引起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只有通过金融危机才能遏制。迄今为止，这些金融危机被证明在当地破坏严重，但在全球范围内却可以得到控制。当然，可控性依靠的是相当程度上远离新自由主义理论。全球经济的两大动力源——美国和中国——完全依靠财政赤字筹措资金，无疑就是有力的迹象，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确保未来资本积累的可行理论指导，就算没有实际死亡，也陷入了重重困难。这并不影响新自由

主义理论继续被用来当作维持精英阶级力量之重建/创建的巧言辞令。但是，当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达到接近于1929年经济崩溃前的
189 高度时(比如今天这样)，长期的经济不平衡就会引发结构性危机。很可惜，种种积累制度很少(如果有过的话)风平浪静地解体。镶嵌型自由主义诞生于“二战”和经济大萧条的废墟，新自由主义化兴起于1970年代积累危机，发源于过气的镶嵌型自由主义，并且伴随着相当多的暴力——应验了马克思的观察：历史的助产婆无一例外地是暴力。新保守主义的权威主义方案如今正在美国出现，国外对伊拉克的暴力袭击和国内的监禁政策，表明美国统治精英新找到了一种决断，来依照自己的利益重新规定全球秩序和国内秩序。因此，我们理应仔细思考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危机究竟是否以及怎样展开。

在上层金融势力劫掠整个国家经济之前，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通常表现出长期的经济不平衡。典型迹象是不断高涨且无法控制的国内财政赤字、收支平衡危机、快速货币贬值、国内资产估价不稳定(例如在房产和金融市场)、通货膨胀上升、失业率上升而工资下降、资本逃逸。在这七项主要指标中，目前美国在前三项上指数很高，而第四项则受到严重关切。目前的“失业型经济复苏”和停滞的工资表明，第六项指标的问题正初露端倪。如果这些问题发生在其他地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肯定要插手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公开抱怨美国国内经济不平衡正在威胁全球稳定，比如前任联邦储备局主席沃尔克和现任主席格林斯潘都这样说过)。①但由于美国统治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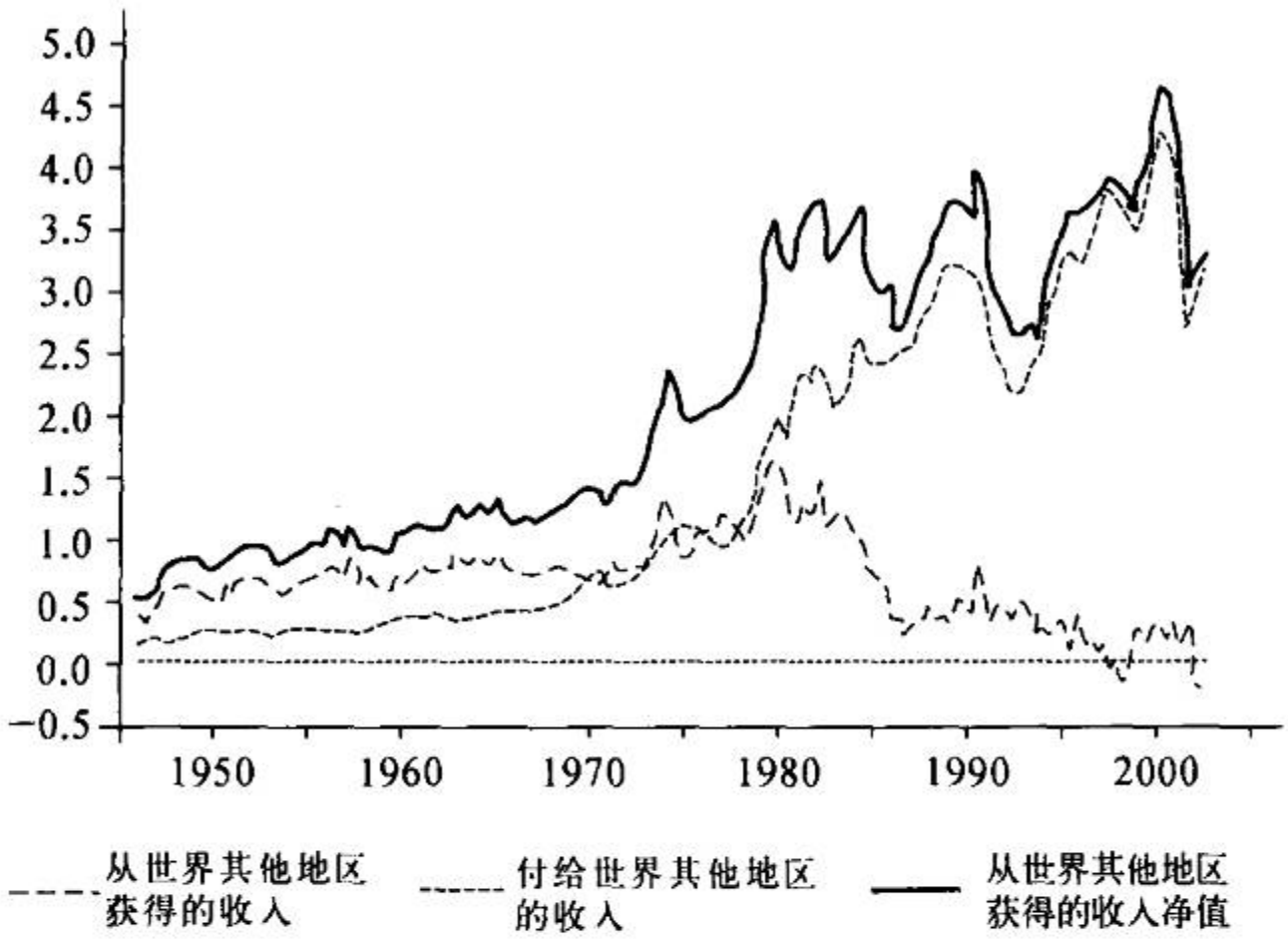
① 关于Volcker见Bond，‘US and Global Economic Volatility’；M. Muhleisen and C. Towe (eds.), *US Fiscal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for Long-Run Sustainability*, Occasional Paper 227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4)。

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干预，无非就意味着美国应该自我管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严重问题是：全球市场会进行管理吗（依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当然应该管理）？并且如果要管理的话，怎么管？后果是什么？

美国将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像2001年的阿根廷那样——这是不可思议的想法，但并非不可能。然而，其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不仅在美国国内如此，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差不多每一个属于各地资产阶级及其全球管理者的人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世界上其余地区目前便愿意（某些情况下是不情愿地）继续支持美国经济，用足够的贷款维持美国的挥霍无度。但是，流入美国的私人资本大幅减少（除了用于在美元贬值时收购廉价资产的资本），同样，世界上的主要银行家——尤其是在日本和中国——如今越来越多地拥有美国公司。要其他国家停止对美国的帮助，对它们自己的经济而言将是毁灭性打击，因为美国仍然是它们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但是，这一体系的进展有一个限度。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华尔街证券资产和将近一半的美国国债为外国人所有，而如今流向外国所有者的股息和利息等同于（如果不是超过的话）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从海外攫取的贡金（图7.1）。美国借得越多，其利益平衡就越呈负面，而美国目前向海外借贷速率接近每天二十亿美元。此外，如果美国利率上升（在某个时刻它们必然会上升），那么1979年沃尔克利率上调后墨西哥所发生的情况，就开始变成一个现实的问题。美国将很快付出比引进的资本多得多的资本，偿付其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债务。[①]这种将财富抽离美国的行为将不会受到国内欢迎。由债务资助的消费主义

190

① Duménil and Lévy, 'Neoliberal Dynamics'.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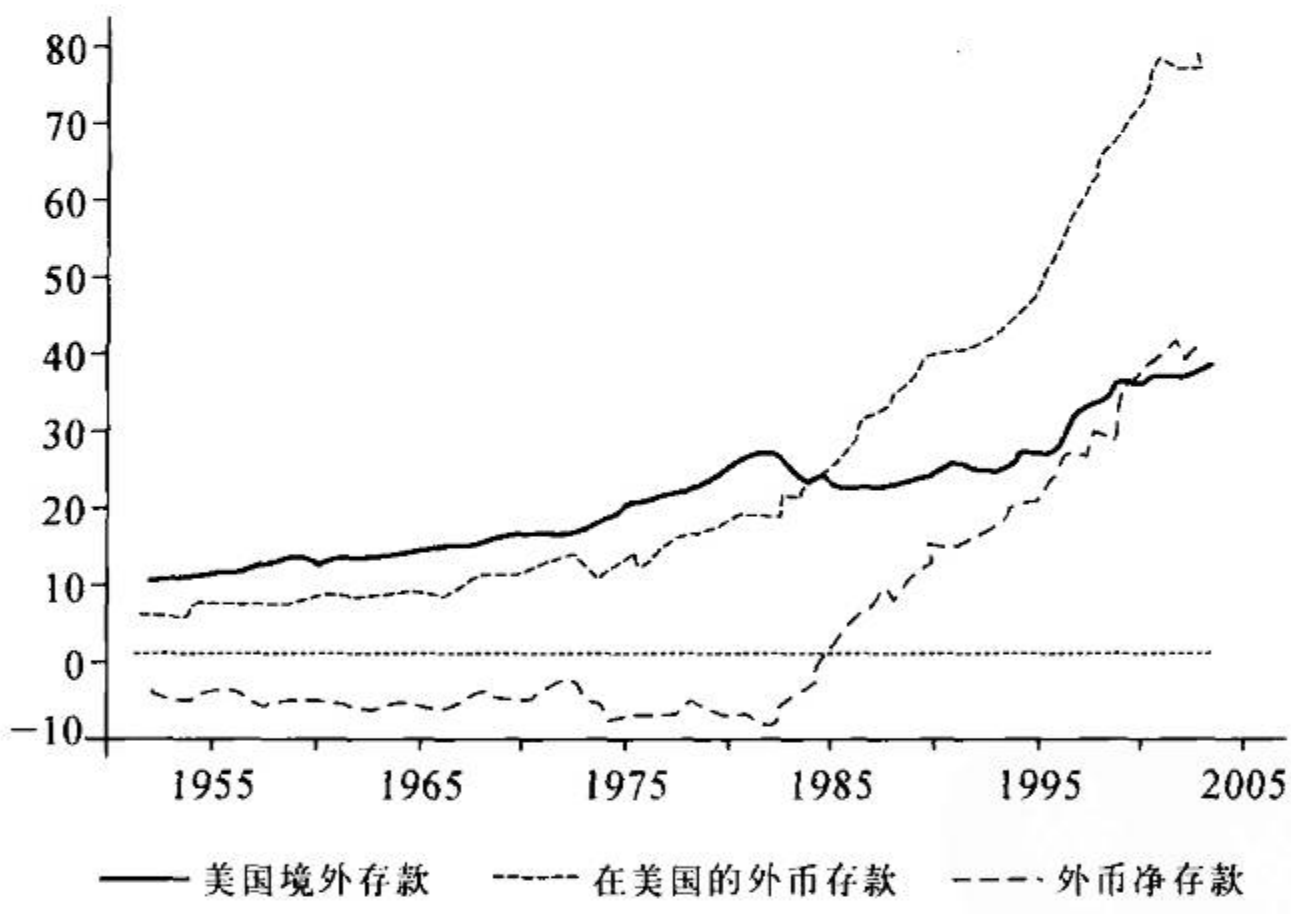


图 7.1：美国在全球资本和所有权流动上的衰退地位，1960—2002：美国投资的流入和流出（上图）和外资所有所占份额（下图）

来源：杜梅内尔和列维：《美帝国主义的经济》

不断增加，已经成为自1945年以来维持美国社会和平的基础，但这种消费主义将不得不停止。

经济不平衡似乎没有困扰布什政府，它武断地宣称贸易逆差的影响(如果这算是问题的话)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让人民购买美国货而得以解决(似乎这样的商品唾手可得又十分便宜，似乎美国制造的商品不包含绝大的外国进口成分)。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华尔街就将破产。布什说，财政赤字可以通过限制国内规划项目而轻松解决，同时又不会增加税收(似乎还有大型预算项目有待取消)。副总统切尼说“里根教导我们，预算赤字无关大局”，这种观点令人担忧，因为里根还教导说：迅速增加的赤字会强迫缩减公共开支，而打击人民大众生活标准却让富人酒足饭饱，这种情况最可能发生于金融混乱和危机的时候。此外，如果我们问一个总的问题：“1970年代以来，在许多次波及各个国家并带来一浪接一浪的灾难性通货紧缩、通货膨胀、资本逃逸和结构性调整的金融危机中，究竟是谁得益了？”那么，目前美国政府虽然面临许多警告迹象，但仍不愿意努力阻止财政危机，其原因就很好理解了。在金融崩溃之后，统治精英有望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美国经济或许可以设法解决目前的不平衡(正如其1945年后所做的那样)，并摆脱种种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障碍。存在某些微弱的迹象表明美国在这方面的动向。然而，目前的政策似乎至多是基于米考伯原则(Micawber principle)①——好事情准要来了。毕竟，在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安然等公司破产之前，许多美国企业领导还安逸地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这可能也会是美国公司的

① Micawber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虽然穷得叮当响，但生活积极乐观，“会好起来的(something will turn up)”是其口头禅。——译者

命运，所有关心国家利益的人都会对领导们目前梦呓般的声明感到担忧。也有可能美国统治精英经过算计认为它可以完好地度过全球财政危机，并利用危机来完成自身的国内统治总计划。但是，这样一种算计可能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危机的结果或许会推动霸权转移到其他区域经济手中(最有可能是亚洲)，同时削弱统治精英在国内外两方面的主宰能力。

最直接的问题是，何种危机能最好地帮助美国应对自身境遇——因为此项选择事实上内在于政策方案领域之中。要实施这些方案，重要的是记住美国还未能免受过去二十年内金融困难的影响。1987 年证券市场的崩溃使资产价值损失了 30%，而在崩溃达到谷底之后，紧接着 1990 年代末新一轮经济泡沫破裂，在经济还未恢复到先前水平时，就有超过八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丧失。1987 年，银行和储贷损失导致花费近二千亿美元补救，那一年事态如此糟糕，以至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威廉·伊萨克(William Isaacs)警告说“美国正在朝着银行业新自由主义化迈进”。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及其他投机并赔本的机构纷纷破产，接着几家大型企业在 2001—2002 年惊人的账务流失中垮掉，不仅花去大量公共资金，而且证明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已经变得脆弱和虚拟化。当然，这种脆弱决不仅限于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正在面临金融动荡和不确定性。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 1980 年的五千八百亿美元上升到 2002 年的二点四万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是无法偿还的。2002 年，偿还这笔债务的净利支出达三千四百亿美元；相比之下，海外发展援助则是三百七十亿美元”。①在某些情况下，债务偿还

① Harvey,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69.

超出了出口收入，而阿根廷等国家呈现出对其债权人的强烈反抗，也在情理之中。

接下来，让我们站在美国的出发点考虑一下两种最糟糕的情况。迅速的高通胀可以提供一条解决巨幅国际债务和消费债务的途径，事实上，美国或许会用大面积贬值的美元偿付其对日本、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债务。此类通胀性征用(inflationary confiscation)或许不能被世界其他地区接受(虽然后者对此也无能为力，毕竟不可能把炮艇开到波托马克河[①]去)。高通胀也会对美国国内的储蓄、养老金等等造成破坏；它将导致扭转沃尔克和格林斯潘广泛采用的货币主义方针。然而，一旦出现偏离货币主义的苗头(实际上是宣告新自由主义破产)，各地的中央银行家们几乎肯定会挤兑美元并因此过早地促成资本逃逸危机，而仅仅依靠美国金融机构是无法管理事态的。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将失去信用度，无法在将来获得主导性金融力量的好处(例如货币铸造税——印刷货币的权力)。这件外衣或者将被欧洲或东亚夺去，或者被后两者共同夺去(世界上的中央银行家们已经表现出更愿 194
意将收支余额放在欧洲的倾向)。也有可能采取较为温和的通胀手段，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通货膨胀决不是如货币主义者描述的那样，本身即是一种恶；相对温和地放宽货币目标是可行的(如撒切尔夫人在决定迈向新自由主义化时所采取的更为实用主义的步骤)。

美国的另一种方案是接受一段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就像日本自 1989 年以来经历的那样。这将引起许多严重的全球问题，除非其他经济体——打头阵的显然是中国，可能还要加上印度——能

① Potomac，美国东部重要河流，经过华盛顿。——译者

够肩负起重新推动经济的任务。但我们已经看到，将中国视为方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成问题。中国国内不平衡非常严重，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从过剩的机场到过剩的汽车工厂，不胜枚举。如果美国消费者市场长期停滞，那么这种产能过剩将变得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量债务（表现为不良银行贷款）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中国面临的政治危险和经济危险一样多。但是，亚洲经济复合体内部的惊人动力，或许足以推动资本积累迈向未来——虽然几乎肯定会对环境质量造成明显的恶劣影响，并且也会明显影响到美国作为全球秩序霸主的传统地位。美国是否会乖乖让出其霸主地位还悬而未决，但就算美国在其他重要的政治经济国家地带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它也几乎肯定会维持其军事统治力。美国是否会像对待伊拉克那样诉诸其军事优势以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届时将根本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国内动力。

美国要想靠内部消化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将会十分困难。如果要解决联邦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债务问题，同时又不威胁到精英阶级的财富，那么阿根廷所经历的那种“强制性通货紧缩”（与新
195 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将成为唯一选择（1980 年代末美国储贷危机时，就可以发现这方面端倪，当时许多存款人无法兑现自己的货币）。那些仍然存在的重要公共规划（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养老金权利、资产价值（尤其是房产和储蓄）可能会是最先的受害者，在这样的状况下民众几乎肯定会发生大规模骚乱。因此，重要的问题便是广泛而激动的不满情绪究竟会达到何种程度，又该如何来应对它？

于是，巩固新保守主义式的权威主义，就浮现为一种潜在应对方案。我在第三章中指出，新保守主义保持了建立不对称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动力，但通过转而依靠权威主义、等级制，甚

至军事手段来维持法律和秩序，从而将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面相凸显出来。我在《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一书中考察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命题——国内外军国主义必然会走到一起——并下结论认为，“9·11”袭击后长期策划和正当化的新保守主义国际冒险主义，既是为了控制美国国内的骚乱和相当分裂的政治体，也是为了通过控制石油资源而实施地缘政治策略，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国内外的恐惧与不安非常容易就被操纵来为政治目的服务（比如这次美国换届大选）。①

但是，新保守主义也主张一种更高的道德目标，其核心是诉诸民族主义——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看到，这种民族主义长期以来就与新自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美国民族主义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它预设：上帝赐予（在宗教祈求方面做得很周密）美国的必然命运就是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如果不是在一切事情上——从棒球比赛到奥运会——都名列第一的话），并且，作为自由、解放、进步的灯塔而受到全世界的不断膜拜和效仿。据说，每个人都渴望生活在美国，或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因此，美国慷慨仁慈地将其资源、价值和文化无偿赐予世界上其他地区，为的是将美国价值和美国化的好处带向全世界。但是，美 196
国民族主义也有其阴暗的一面，偏执狂式地惧怕来自外部敌人和邪恶势力的威胁。这一恐惧针对外国人、移民、外部煽动者，当然现在是针对“恐怖分子”。这经常导致国内严防死守、中止公民的自由和解放——比如1920年代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害时期，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对抗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的时期，

① H. Arendt,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novich, 1968 edn.);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12-17.

理查德·尼克松偏执狂式地对待越南战争中的对手，而自“9·11”以来美国倾向于将所有批评政府政策的人都视作敌人的帮凶。这种民族主义很容易掺进种族主义(尤其是目前针对阿拉伯人)、约束公民自由(爱国法案)、限制言论自由(监禁没有公布新闻来源的记者)、支持以囚禁和死刑来惩罚不法行为。在国外，这种民族主义导致的是采取隐秘行动(如今是采取先发制人战争)铲除一切貌似威胁到美国价值霸权地位和美国利益集团统治的最细微苗头。在历史上，以上两股民族主义总是相互并存。①它们有时候会处于公开的相互对立状态(例如，关于如何应对1980年代中美洲革命，就产生了意见分歧)。

1945年后，美国将前一种民族主义假设传播到全世界(例如1945年后，马歇尔计划帮助被战争摧毁的欧洲经济重新恢复)，而同时在国内实施麦卡锡主义；但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一切。世界其他地区不再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并几乎在一切事情上都从美国统治中摆脱出来。美国从未受到世界其他地区如此的孤立，既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如今甚至也是在军事上。而这种孤立状态并不像以前那样是因为美国从世界事务中退出，而是美国过度和单边的干预主义后果；除此之外，当美国经济比以前更深入地卷入全球生产和金融网络之中时，这种孤立也会发生。结果造成了两种民族主义危险的融合。通过在被认为威胁极大的全球反恐战
197 争中，对外国采取“先发打击”的措施，美国公众可以想象自己正在努力慷慨地为各地带去自由和民主(尤其是带去伊拉克)，同时也对某些未知且隐匿的敌人——他们正威胁到美国人的生

① D. King, *The Liberty of Strangers: Making the American 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存——表现出最深的恐惧。布什政府和新保守主义者的修辞便围绕上述两个主题喋喋不休，这很好地帮助了布什成功连任。

我在《新帝国主义》中指出，有很多迹象表明美国霸权正摇摇欲坠。美国在1970年代期间失去了全球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而1990年代美国在全球金融业中的力量也开始降低。美国技术领导的角色正受到挑战，而其文化和道德领导的霸权地位也在迅速式微，只剩下军事力量作为统治全球的唯一明确武器。甚至美国的军事强力也仅限于遥控三万英尺上空的高科技破坏力量，伊拉克战争已证明美国在地面作战方面的局限。全球资本主义中某种新型霸权结构的转变，为美国设置了一道选择题：要么和平地完成转变，要么通过灾变。①美国统治精英们目前的姿态更倾向于采取后一种方案。美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很容易被下述观念拉拢：高度通货膨胀或长时期通货紧缩等经济困难要由其他人负责，比如中国和东亚，或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阿拉伯国家，它们未能以合适的方式满足美国庞大的能源需求。“先发打击”的教条已经准备妥当，而毁灭性力量也蓄势待发。这一论述继续认为，受到围攻和明显威胁的美国有义务在必要时依靠军事手段保卫自身、自身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这种灾难性的、在我看来是自杀式的考虑，并不超出目前美国领导班子的能力之外。这个领导班子已经证明自己喜欢镇压国内异议，并以此笼络了相当多的民众支持。毕竟，相当部分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的《权利法案》是受共产主义鼓动的文件，而另一些人——事实上是少部分人——欢迎任何具有末日大决战(Armageddon)色彩的事情。反恐怖主义法、在关塔

198

① G. Arrighi and B.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9)；亦见平装版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后记。

那摩监狱放弃《日内瓦公约》、随时准备给任何反对势力贴上“恐怖主义”标签——凡此种种，都是预兆迹象。

幸运的是，美国国内可以（某种程度上已经）调动大量抗议声音，反对此类灾难性和自杀式倾向。不幸的是，这种抗议往往零散、群龙无首、缺乏统一的组织，就像目前这个样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我伤害导致的结果，这种自我伤害发生于劳工运动内部、广泛包含身份政治的运动内部，也发生于所有后现代知识潮流的内部——这些潮流不自知地与白宫走到一起，认为真理既是由社会建构的，同时也仅仅是话语效果。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批判利奥塔（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 Condition*），认为在这本书里“真理、权威和修辞骗局没有区别；巧舌如簧或善于讲故事的人掌握着权力”，这样的批判值得记取。我认为，比起我在1989年的引用，这些批评更适合于我们目前的时代。①如果我们要找到逃离目前困境的出口，就必须反驳并停止白宫编造的故事和英国唐宁街编织的舆论导向。有一种真实就存在在那里，并正在快速把我们虏获。但我们应该奋力去向哪里？如果我们能驾驭自由这匹好马，我们该骑着它去向何方？

替代性方案

人们喜欢讨论替代性方案，似乎这是在描述未来社会的蓝图，以及勾勒出到达那里的路线。这样的活动或许能获益颇多，但我们首先要开启一个政治进程，使得我们能够识别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和真正的可能性。主要有两条路可走： 我们可以参与到众

① 引自 Harvey,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68－170。

多实际存在着的抗议运动之中，并试图从这些运动的激进主义中提取出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对抗性方案的精髓。我们也可以诉诸理论和实践分析，探讨我们目前的状况（如我在此做的工作）并设法依靠批判分析推导出替代性方案。采取后一种方式，决不是假定现有的抗议运动是错误的或理解有误的。同样，抗议运动不能够假定分析性探究与它们的事业毫不相干。我们的任务是要开启两种方式之间的对话，并借此加深集体理解，制定更充分的行动方针。

新自由主义化在自身内外都激起了广泛抗议运动，这些运动中有许多和1980年前以工人为基础的主导性运动截然不同。①我说“许多”而非“所有”，因为以工人为基础的传统运动绝没有消亡，甚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消亡，虽然在那里工人运动力量因新自由主义的打击而受到相当程度削弱。1980年代期间，韩国和南非的劳工运动非常兴盛，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工人阶级政党就算没有执政，也相当强势。在印尼，一场具有巨大潜在重要性的初生劳工运动，正在争取自己的声音。中国潜在的劳工骚动虽然无法预言，但力量也相当强大。同样不清楚的是，美国的工人群众是否会永远被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诡计固定在下述政治之中——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工人经常自愿投票反对自己的物质利益，为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宗教、道德价值等理由。考虑到变动的局势，没有理由排除美国可能在未来数年内出现大众社会民主的、甚或民粹主义的反新自由主义政治。

但是，反抗掠夺性积累的斗争正在相当不同的战线上激起社

① S. Amin, ‘Social Movements at the Periphery’, in 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76－100.

会和政治斗争。①部分是由于产生自不同的条件，这些运动的政治定位和组织模式明显不同于典型的社会民主政治。例如，墨西哥恰帕斯州(Chiapas)发生的萨帕塔起义并不寻求夺取国家力量或完成政治革命；相反，它寻求的是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其理念是：通过整个市民社会，用一种更开放和流动的方式寻找替代性
200 方案，以便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需要，并使这些群体都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组织上，这一运动倾向于避免先锋主义，拒绝采取政治党派的形式；相反，它更愿意保持国内社会运动的形式，试图形成一种以本地文化为中心(而不是处于边缘)的政治力量集团。很多环境保护运动——如那些寻求环境正义的运动——采取的也是相同的道路。

此类运动的结果是将政治组织的区域从传统的政治党派和劳工组织，转向不那么集中的政治动力——后者属于贯穿整个市民社会的社会行动。这类运动不那么集中，但它们直接与特殊的问题与支持者发生关联；它们依靠镶嵌于日常生活细节和斗争细节而获得力量，但也正是如此，它们经常发现自己很难脱离地方性和特殊性，去理解新自由主义掠夺性积累及其过去和现在与重建阶级力量之关系背后的大政治。

这些斗争简直样式繁多，以至于人们有时很难想象它们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斗争都属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并一直

---

① W. 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2002); Bello, Bullard, and Malhotra (eds.), *Global Finance*; S. George,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IF . . .* (London: Verso, 2003); W. Fisher and T. Ponniah (ed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Popular Alternatives to Globalization at the World Social Forum* (London: Zed Books, 2003); P. Bond, *Talk Left Walk Right: South Africa's Frustrated Global Reforms* (Scottsvill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04); Mertes,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Gill, *Teetering on the Rim*; Brecher, Costello, and Smith,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吸引人们眼球的抗议运动，这些运动形成一种不稳定的混合局面。这些运动和骚乱有时遭到残酷镇压——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权力以“秩序和稳定”为名采取镇压行动。在其他地方，随着掠夺性积累产生出剧烈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对抗，这些运动就沦为种族间的暴力和国内战争。统治精英的“分而治之”计策，或对抗势力之间的竞争（例如，法国利益集团和美国利益集团在某些非洲国家的竞争），经常是这些斗争的核心内容。由于受到军事支援，或有些情况下拥有受过主要军事机器（美国领衔，英国和法国其次）训练的特种部队，许多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附属国，通常会带头以镇压和整肃系统无情扼杀那些挑战掠夺性积累的激进主义运动。

这些运动自身已经产生出大量有关替代性方案的理念。有些运动试图完全或部分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另一些（如“五十年足矣［Fifty Years Is Enough］运动”）则试图通过改革或解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强大组织，实现全球社会和环境正义（虽然有趣的是，美国财政部的核心力量从来未被提及）；还有一些（特别是“绿色和平”之类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则强调“收回共有物”的主题，借此表明与既往斗争有着根深蒂固的连续性，也与贯穿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残酷历史的各种斗争有着深层的连续性。有些人（如哈特［Hardt］与内格里［Negri］）设想一种流动的诸众，或一种全球市民社会内的运动，以此对抗新自由主义秩序（被阐释为“帝国”）的分散和去中心的权力，另一些人更温和地指望地方关于新型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的试验（如地方交易系统［LETS］），推动此类试验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实践。还有人相信更传统的政治党派结构（例如，巴西的工人党或印度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国大党），目标是夺取国家力量以作为迈向全球经济秩序改革的步骤。如今，

上述不同的潮流都在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上汇聚到一起，试图界定它们的共同之处，并建立一种组织化力量以对抗各种版本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已经有大量文献认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世界各地都在进行着有时试图概括、有时试图综合各种社会运动所包含的差异性理念的努力。这一切令人钦佩，也令人鼓舞。

但是，我们能从这里所进行的分析中得出什么结论？首先，镶嵌型自由主义和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向的整个历史都表明，不管是遏制还是恢复精英阶级力量，阶级斗争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虽然阶级斗争被有效地遮掩起来，但我们还是经历了一代人时间的复杂斗争：统治精英谋求重建、增加，或者(如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一种压倒性的阶级力量。进一步的新保守主义转向表明，经济精英及其准备用以保持自身力量的权威主义策略，将走到何种地步。这一切发生于工人阶级体制式微的数十年里，也是在同一时期内，许多改革论者越来越相信，“阶级”是个无意义的范畴，或至少是早就不适用的范畴。在这一过程中，各色改革论者似乎都屈从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首要虚构之一，就是认为“阶级”是一个虚构范畴，只存在于社会主义者和隐秘的共产主义者的想象中。特别是在美国，“阶级战争”的表达如今只有在右翼媒体中能听到(例如《华尔街日报》)，用于诋毁所有威胁到所谓统一和连贯的国家目标(也就是重建上层阶级力量！)的批评。因此，我们必须记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事情看上去像是阶级斗争，其行为方式像阶级战争，那么我们就该大方地称之为“阶级斗争”。大众要么让自己听命于由压制性的、日益增强的上层阶级力量所规定的历史和地理轨道，要么在阶级的层面对此做出回应。

这样说并不是乡愁般地缅怀某个失落的黄金时代——在那时，如“无产阶级”等虚构范畴正积极发挥作用；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存在着那种简单的阶级概念，我们可以将它作为改变历史的首要的（且不说是唯一的）代理人。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无产阶级乌托邦领域，可以供我们依靠。指出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不是说阶级构成的途径是既定的，或者甚至是可以提前决定的。大众阶级和精英阶级的运动创造自身，虽然从来不是以自己选择的条件创造自身。那些条件充满种种复杂性——种族、性别、族裔等区分，与阶级身份密切交织在一起。新自由主义化的显著特征，体现为下层阶级高度种族化，以及贫穷人口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新保守主义的道德秩序建立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家庭观念基础上，而新保守主义对女性权利和生育权利的打击（有趣的是，这一现象发生于1970年代末，当时新自由主义正初露锋芒），则是这种道德秩序的关键因素。

分析还显示，目前的大众运动如何以及为何分为两部分。一 203
方面，许多运动围绕着我所谓的“扩大再生产”方面展开，其中核心议题是工资劳动剥削和规定社会工资的诸种条件。另一方面，许多运动是针对掠夺性积累的，这些运动包括抵制原始积累的经典形式（如强迫农民离开土地）；抵制国家从所有社会义务领域（除了监督和治安）突然撤出；抵制破坏文化、历史和环境的实践；抵制由当今金融资本联手国家进行的“强制性”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找到这些不同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一项紧迫的理论和实践任务。但我们的分析也表明，要完成这项任务，只能通过追踪资本积累过程的动力，这一积累过程的特征是动荡不定且不断加深的不均衡地理发展。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这种不均

衡性通过国家间的竞争而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化传播。对于复兴的阶级政治而言，其任务之一就是将这种不均衡地理发展转变为一项资产，而不是一项债务。统治阶级精英的“分而治之”政治必然会受到联合势力的对抗：左翼政治联合其同情的地方自决力量之复兴。

但是，分析也强调利用新自由主义规划和新保守主义规划之中的矛盾。修辞(有利于所有人)和现实(有利于一小撮统治阶级)之间的鸿沟如今昭然若揭，“市场就是竞争和公正”的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各种事实所否定：企业和金融力量的过分垄断、集中化和国际化。阶级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令人乍舌，既发生在国家内部(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也发生在国家之间，所带来的严重政治问题无法再用什么美好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渡期”为名而打发。越是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一项失败的乌托邦修辞，掩盖的是统治阶级力量的成功重建计划，就越能为大
204 众运动的复兴铺下道路，倡导平等的政治要求并寻求经济公正、公平贸易，以及更多经济保障。

权利话语的兴起(我们在之前一章已经讨论过)，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问题。甚至诉诸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念也可以形成一把有力的“抵抗之剑”，借以批判新保守主义式的权威主义——特别是考虑到“反恐战争”在各地(从美国到中国、再到车臣)都已经被用来作为减少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借口。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承认伊拉克自决和自治的权利，这就是遏制美国在伊拉克的帝国主义花招的强力武器。但是，我们也可以界定另外的替代性权利。对于作为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主导性进程——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批判，需要同时批判那些奠定了新自由主义基础的特殊权利(反之亦然)：个人私有产权和盈利权。我在其他地方罗列

过一系列全然不同的权利，包括生活机遇权、政治联合权和“良善的”治理权，支持由生产者直接管理生产过程、人身不可侵犯和人身完整(integrity)的权利、从事批判而不必害怕报复的权利、适宜而健康的生存环境的权利、公共财产资源的集体控制权、空间生产权、差异权，还有包含于我们作为类存在的身份之中的种种权利。①但是，提出与新自由主义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相区别的权利，就有责任去实现一种替代性的社会过程，以便这些替代性权利能在其中得到落实。

对于新保守主义为自身权威和正当性所主张的道德高地，我们也可以针锋相对地进行类似的论辩。道德共同体和道德经济的理念，对历史上的改革运动而言并不陌生。其中许多反对掠夺性积累的运动(例如萨帕塔起义)，正在以道德经济的方式积极表达对于替代性社会关系的渴望。并非只有媒体霸权所调动的反动宗教右翼才能定义道德，也并非只有通过企业富人势力主导的政治进程才能表达道德。我们必须对抗在混乱的道德论辩底下进行的统治阶级力量重建，不能认为所谓“文化战”转移了人们对阶级政治的注意力而放弃它们，哪怕其中有一些或曾混淆视听。事实上，新保守主义者中兴起的道德论辩，不仅证明人们害怕个体化的新自由主义会带来社会解体，而且证明广泛的道德对抗已经存在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实践所带来的异化、混乱、排斥、边缘化和环境破坏。这种针对纯粹市场伦理的道德对抗，如何转变为文化抵抗甚至政治抵抗，是我们时代中需要正确读解的符号，而不应将其弃之一旁。此类文化斗争与争取击退统治阶级坚不可摧的力量的斗争之间的联系，要

① Harvey, *Spaces of Hope*, 248 - 252.

求我们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察。

然而，受到新保守主义者的权威主义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反民主性质，无疑应该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焦点。如今，名义上“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在民主方面的缺陷非常严重。①在这些国家，政治代表向金钱势力低头，并被后者腐蚀，更不用说非常容易就被操控和腐化的选举体系了。基础制度安排有着严重偏袒；来自人口数量不到全国20%的二十六个州的议员却握有超过半数的投票，可以决定国会立法的议事日程。此外，明目张胆地重新划分选区以利于当政者，此举却被司法系统视为合宪——这个司法系统越来越多地充斥着新保守主义笼络的政客。拥有巨大权力的机构（如联邦储备局）自外于任何民主控制之外。国际上的情况甚至更糟糕，因为对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来说，无所谓什么义务，更别提什么民主影响了；而无政府组织在没有民主意涵或民主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运作，无论其行为意图多么好。这并不是说民主制度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新自由主义理论担心特殊利益集团会对立法过程产生不
206 当影响，这种担忧最充分地体现于企业说客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上——确保美国国会（还有美国州立法机构）满足金融界的利益，并且仅仅满足金融界的利益。

恢复民主统治的诉求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平等与正义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回归某个黄金时代。在每一种情况中，意义都需要被重新发明出来，以应对当今的种种条件和潜能。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我们今天所必须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毫无关系，我们要面临

①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

五花八门的环境——圣保罗、约翰内斯堡、上海、马尼拉、旧金山、利兹、斯德哥尔摩，还有拉各斯①。令人惊喜的是，全球各地——从中国、巴西、阿根廷、韩国、台湾地区，到南非、伊朗、印度、埃及——在中东那些正在斗争的国家，也在当今资本主义的腹地，正活跃着许多群体和社会运动，它们正共同推动着表达某些民主价值的种种改革。②

凭借相当多的国内民众支持，美国领导人们带给世界的理念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价值是普遍且优越的，这些价值值得人们为之牺牲。世界已经准备好拒绝这种帝国主义姿态，并向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资本主义腹地注入一套截然相反的价值：这些价值属于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正义。罗斯福的论辩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美国内部必须建立一种联合以重新获得对国家机器的大众控制，并借此推动深化民主实践和民主价值，而不是用市场力量的铁蹄践踏它们。

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

---

① Lagos，尼日利亚首都。——译者

② 汪晖在他的书 *China's New Order* 中分析中国时经常提到这一论述。

参考文献

Press Comment and Web Sources

Alvarez, L., 'Britain Says U.S. Planned to Seize Oil in '73 Crisis', *New York Times*, 4 Jan. 2004, A6.

American Lands Alliance, 'IMF Policies Lead to Global Deforestation', http://americanlands.org/imfreport.htm.

Arnold, W., 'BHP Billiton Remains Upbeat Over Bet on China's Growth', *New York Times*, 8 June 2004, W1 and W7.

Barboza, D., 'An Unknown Giant Flexes its Muscles', *New York Times*, 4 Dec. 2004, C1 and C3.

Belson, J., 'Japanese Capital and Jobs Flowing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17 Feb. 2004, C1 and C4.

Bradsher, K., 'Big China Trade Brings Port Wa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7 Jan. 2003, 12.

—— 'China Announces New Bailout of Big Banks', *New York Times*, 7 Jan. 2004, C1.

—— 'China Reports Economic Growth of 9.1% in 2003', *New York Times*, 20 Feb. 2004, W1 and W7.

—— 'China's Boom Adds to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Times*, 22 Oct. 2003, A1 and A8.

—— 'China's Factories Aim to Fill Garages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2 Nov. 2003, International Section, 8.

—— 'China's Strange Hybrid Economy', *New York Times*, 21 Dec. 2003, C5.

—— 'Chinese Automaker Plans Assembly Line in Malaysia', *New York Times*, 19 Oct. 2004, W1 and W7.

—— 'Chinese Builders Buy Abroad', *New York Times*, 2 Dec. 2003, W1 and W7.

—— 'Chinese Provinces Form Regional Power Bloc', *New York Times*, 2 June 2004, W1 and W7.

—— 'G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An Annual Goal of 1.3 Million Cars', *New York Times*, 8 June 2004, W1 and W7.

—— 'A Heated Chinese Economy Piles up Debt', *New York Times*, 4 Sept. 2003, A1 and C4.

Bradsher, K., 'Is China the Next Bubble?' *New York Times*, 18 Jan. 2004, sect. 3, 1 and 4.

—— 'Now, a Great Leap Forward in Luxury', *New York Times*, 10 June 2004, C1 and C6.

—— 'Taiwan Watches its Economy Slip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13 Dec. 2004, C7.

Brooke, K., 'Korea Feeling Pressure as China Grows', *New York Times*, 8 Jan 2003, W1 and W7.

Brooks, R., 'Maggie's Man: We Were Wrong', *Observer*, 21 June 1992, 15.

Buckley, C., 'Let a Thousand Ideas Flower: China Is a New Hotbed of Research', *New York Times*, 13 Sept. 2004, C1 and C4.

—— 'Rapid Growth of China's Huawei Has its High-Tech Rivals on Guard,' *New York Times*, 6 Oct. 2003, C1 and C3.

Bush, G. W.,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13 Apr.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l3-20.html.

——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 2002, A33.

Cheng, A., 'Labor Unrest is Grow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nline*, 27 Oct. 2004.

China Labor Watch, 'Mainland China Jobless Situation Grim, Minister Says', http://www.chinalaborwatch.org/en/web/article.php?article_id=50043 (18 Nov. 2004).

Climate Change Science Program, 'Our Changing Planet: The US Climate Change Science Program for Fiscal Years 2004 and 2005', http://www.usgcrp.gov/usgcrp/Library/ocp2004-5.

Cody, E., 'Workers in China Shed Passivity: Spate of Walkouts Shakes Factories', *Washington Post*, 27 Nov. 2004, A01.

Crampton, T., 'Iraqi Official Urges Caution on Imposing Free Market', *New York Times*, 14 Oct. 2003, C5.

Farah, J., 'Brute Tyranny in China' WorldNetDaily.com, posted 15 Mar. 2004.

Fishman, T.,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4 July 2004, 24–51.

Forero, J., 'As China Gallops, Mexico Sees Factory Jobs Slip Away', *New York Times*, 3 Sept. 2003, A3.

French, H., 'New Boomtowns Change Path of China's Growth', *New York Times*, 28 July 2004, A1 and A8.

Global Policy Forum, *Newsletter* 'China's Privatization', http:www.globalpolicy.org.socecon/ffd/fdi/2003/1112chinaprivatization.

Hout, T., and Lebretton, J., 'The Real Contest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Line*, 16 Sept. 2003.

Huang, Y. 'Is China Playing by the Rule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92403/huang.php.

Kahn, J., and Yardley, J., 'Amid China's Boom, No Helping Hand for Young Qingming, *New York Times*, 1 Aug. 2004, A1 and A6.
——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13 Jan. 2003, A1 and A8.
—— 'Violence Taints Religion's Solace for China's Poor', *New York Times*, 25 Nov. 2004, A1 and A24.
Kirkpatrick, D., 'Club of the Most Powerful Gathers in Strictest Privacy', *New York Times*, 28 Aug. 2004, A10.
Klein, N., 'Of Course the White House Fears Free Elections in Iraq', *Guardian*, 24 Jan. 2004, 18.
Landler, M., 'Hungary Eager and Uneasy Over New Status', *New York Times*, 5 Mar. 2004, W1 and W7.
Liu, H., 'China: Banking on Bank Reform, *Asia Times Online*, atimes.com, 1 June 2002.
Liu Shi, 'Current Conditions of China's Working Class', *China Study Group*, 3 Nov. 2003, http://www.chinastudygroup.org/index.php?action=article&type.
Lohr, S., 'IBM Sought a China Partnership, Not Just a Sale', *New York Times*, 13 Dec. 2004, C1 and C6.
—— 'IBM's Sale of PC Unit Is a Bridge Between Companies and Cultures', *New York Times*, 8 Dec. 2004, A1 and C4.
Malkin, E., 'A Boom Along the Border', *New York Times*, 26 Aug. 2004, W1 and W7.
Monbiot, G., 'Punitive—and It Works', *Guardian*, 11 Jan. 2005, online edition.
Montpelerin website, http://www.montpelerin.org/aboutmps.html.
Murphy, D., 'Chinese Province: Stinking, Filthy, Rich', *Wall Street Journal*, 27 Oct. 2004, B2H.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website: www.whitehouse.gov/nsc/nss.
Peterson, I., 'As Land Goes To Revitalization, There Go the Old Neighbors', *New York Times*, 30 Jan. 2005, 29 and 32.
Rosenthal, E.,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litancy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10 Mar. 2003, A8.
Salerno, J., 'Confiscatory Deflation: The Case of Argentina', Ludwig von Mise Institute, http://www.mises.org?fullstory.aspx?control=890.
Sharapura, S., 'What Happened in Argentina?', *Chicago Business Online*, 28 May 2002, http://www.chibus.com/news/2002/05/28/Worldview.
Sharma, S., 'Stability Amidst Turmoil: China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sia Quarterly* (Winter 2000), www.fas.harvard.edu/~asiactr/haq/2000001/0001a006.htm.
Shi, L., 'Current Conditions of China's Working Class', *China Study Group*, 3 Nov. 2003, http://www.chinastudygroup.org/index.php?action=article&type.

Sommer, J., 'A Dragon Let Loose on the Land: And Shanghai is at the Epicenter of China's Economic Boom', *Japan Times*, 26 Oct. 1994, 3.

Stevenson, C., *Reform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ast Lessons for Current Problems*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http:www.gwu.edu/~ylowrey/stevensonc.html.

Townsend, M., and Harris, P., 'Now the Pentagon Tells Bush: Climate Change Will Destroy Us', *Observer*, 22 Feb. 2004, online.

Treanor, P., 'Neoliberalism: Origins, Theory, Definition', http://web.inter.nl.net/users/Paul.Treanor/neoliberalism.html.

Warner, J., 'Why the World's Economy Is Stuck on a Fast Boat to China', *Independent*, 24 Jan. 2004, 23.

Yardley, J., 'Chinese Appeal to Beijing to Resolve Local Complaints', *New York Times*, 8 Mar. 2004, A3.

—— 'Farmers Being Moved Aside by China's Real Estate Boom', *New York Times*, 8 Dec. 2004, A1 and A16.

—— 'In a Tidal Wave, China's Masses Pour from Farm to City', *New York Times*, 12 Sept. 2004, 'Week in Review', 6.

—— 'Rivers Run Black, and Chinese Die of Cancer', *New York Times*, 12 Sept. 2004, A1 and A17.

Yasheng, H., and Khanna, T.,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China Now Magazine*, 3 Apr. 2004, www.chinanowmag.com/business/business.htm.

Books and Journal Articles

Amin, S., 'Social Movements at the Periphery', in P. 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 1993), 76–100.

Angell, M., *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 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Arendt, H.,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novich, 1968).

Armstrong, A., Glynn, A., and Harrison, J.,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Long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Arrighi, G., and Silver, B.,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9).

Bales, K., *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Bartholomew, A., and Breakspear, J., 'Human Rights as Swords of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124–45.

Bello, W.,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2002).

—— Bullard, N., and Malhotra, K. (eds.), *Global Finance: New Thinking on Regulating Speculative Markets* (London: Zed Books, 2000).

Benn, T., *The Benn Diaries, 1940–1990*, ed. R. Winstone (London: Arrow, 1996).

Blyth, M.,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oddy, M., and Fudge, C. (eds.), *Local Socialism? Labour Councils and New Left Alternatives* (London: Macmillan, 1984).

Bond, P., *Against Global Apartheid: South Africa Meets the World Bank, the IMF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London: Zed Books, 2003)

—— *Elite Transition: From Apartheid to Neoliberalism in South Africa*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 *Talk Left Walk Right: South Africa's Frustrated Global Reforms* (Scottsvill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04).

—— 'US and Global Economic Volatility: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mpire Seminar, York University, November 2004.

Brecher, J., Costello, T., and Smith, B.,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Power of Solidarity*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0).

Brenner, 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Cao, L., 'Chinese Privatization: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3/13 (2000), 13–62.

Cartier, C., *Globalizing South Chin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1).

—— 'Symbolic City/Regions and Gendered Identity Formation in South China', *Provincial China*, 8/1 (2003), 60–77.

—— 'Zone Fever. The Arable Land Debate and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China's Evolving Land Use Regime and its Geographical Contradic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2001), 455–69.

Chambers, S., and Kymlicka, W. (eds.),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ndler, D., *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Chang, H.-J., *Globalis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London: Zed Books, 2003).

Chibber, V.,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ua, 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Clarke, S. (ed.), *The State Debate* (London: Macmillan, 1991).

Corbridge, S., *Debt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3).

Court, J., *Corporateering: How Corporate Power Steals your Personal Freedom* (New York: J. P. Tarcher/Putnam, 2003).

Cowan, J., Dembour, M.-B., and Wilson, R. (eds.), *Culture and Right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Dahl, R., and Lindblom, C., *Politics, Economy and Welfare: Planning and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es* (New York: Harper, 1953).

Davis, D., *Urban Leviathan: Mexico C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Derthick, M., and Quirk, P., *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Dicken, P.,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ed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3).

Dixit, A., *Lawlessness and Economics: 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Drury, S.,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Duménil, G., and Lévy, D.,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trans. D. Jeff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The Economics of US Imperi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1/4 (2004), 657–76.

—— —— 'Neoliberal Dynamics: Towards A New Phase?', in K. van der Pijl, L. Assassi, and D. Wigan (eds.), *Global Regulation: Managing Crises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1–63.

—— —— 'Neoliberal Income Trends: Wealth, Class and Ownership in the USA', *New Left Review*, 30 (2004), 105–33.

Edsall, T.,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Norton, 1985).

Edwards, M., and Hulme, D. (e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1995).

Eley, G.,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vans, P.,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Fisher, W., and Ponniah, T. (ed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Popular Alternatives to Globalization at the World Social Forum* (London: Zed Books, 2003).

Fishman, T., *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Scribner, 2005).

Fourcade-Gourinchas, M., and Babb, S.,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Paths to Neoliberalism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2002), 533–79.

Frank, T., *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New York: Doubleday, 2000).

——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s of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Freeman, J., *Working Class New York: Life and Labor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George, 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IF . .* (London: Verso, 2003).
—— *A Fate Worse Than Deb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Twenty Years of Elite Economics a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for Structural Change', in W. Bello, N. Bullard, and K. Malhotra (eds.), *Global Finance: New Thinking on Regulating Capital Markets* (London: Zed Books, 2000) 27–35.
Gill, L., *Teetering on the Ri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Gills, B.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Gowan, P.,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Gray, J. *False Dawn: The Il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Press, 1998).
Greenberg, M., 'The Limits of Branding: The World Trade Center, Fiscal Crisis and the Marketing of Reco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7 (2003), 386–416.
Haggard, S., and Kaufman, R. (ed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Distributive Conflicts and th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Hale, D., and Hale, L.,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82/6 (2003), 36–53.
Hall, P.,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Hall, S.,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New York: Norton, 1988).
Harloe, M., Pickvance, C., and Urry, J. (eds.), *Place, Policy and Politics: Do Localities Matter?*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Hart-Landsberg, M., and Burkett, P.,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2004; = *Monthly Review*, 56/3).
Harvey, D.,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93–110.
——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Banality of Geographical Evils', in J. Comaroff and J. Comaroff, *Millennial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Neoliber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1–310.
——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in id., *Spaces of Capit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16.
——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R. Scholar (ed.), *Divided Cities: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20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yter, T., and Harvey, D. (eds.), *The Factory in the City* (Brighton: Mansell, 1995).
Healy, D., *Let Them Eat Prozac: The Unhealth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Depre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4).
Held, D., *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Cambridge: Polity, 2004).
Henderson, J., 'Uneven Crises: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ast Asian Turmoil', *Economy and Society*, 28/3 (1999), 327–68.
Henwood, D., *After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Hofstadter, 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Holloway, J., and Pelaez, E., *Zapatista: Reinventing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1998).
Jensen, D., *The Culture of Make Believe* (New York: Context Books, 2002).
Jessop, B., 'Liberalism, Neoliberalism, and Urban Governance: A State-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tipode*, 34/3 (2002), 452–72.
Juhasz, A., 'Ambitions of Empi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Plan for Iraq (and Beyond)', *Left Turn Magazine*, 12 (Feb./Mar. 2004), 27–32.
Kaldor, M.,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1999).
Kaplan, R.,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Vintage, 2001).
King, D., *The Liberty of Strangers: Making the American 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Koolhaas, R., *Delirious New York* (New York: Monacelli Press, 1994).
Krasner, S.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Krugman, P., *The Great Unravel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2003).
Lardy, N.,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8).
Lee, C. K.,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Lee, S. K., 'Made In China: Labor as a Political Force?', panel statement, 2004 Mansfield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ontana, Missoula, 18–2 Apr. 2004.
Li, S.-M., and Tang, W.-S.,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Lomnitz-Adler, C., 'The Depreciation of Life During Mexico City's Transition into "The Crisis" ', in J. Schneider and I. Susser (eds.), *Wounded Cities* (New York: Berg, 2004) 47–70.

Lu, M., Fan, J., Liu, S., and Yan, Y., '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Monthly Labor Review*, 128/8 (2002), 25–31.

Luders, R.,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Divestiture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ase of Chil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93), 98–121.

Lyotard, J.-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McCartney, P., and Stren, R., *Governance on the Ground: Innovation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the Citi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Prince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3).

MacLeod, D., *Downsizing the State: Privatization and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Reform in Mexico*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nn, J., *The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New York: Viking Books, 2004).

Martin, 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Daily Lif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x, K., *Capital*, vols. i and ii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t. 2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9).

Megginson, W., and Netter, J., '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f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1), online.

Mertes, T.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Miliband, R.,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Mittelman, J.,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Muhleisen, M., and Towe, C. (eds.), *US Fiscal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for Long-Run Sustainability*, Occasional Paper 227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4).

Myers, N., *The Primary Resource: Tropical Forests and Our Future/Updated for the 1990s* (New York: Norton, 1993).

—— *Ultimate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New York: Norton, 1993).

Nash, J., *Mayan Visions: The Quest for Autonom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Navarro, V. (ed.), 'Development as Quality of Life: A Critique of Amartya Sen's *Development as Freedom*', in id.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Inequalities* 13–26.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Inequalities: Consequences for Health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mityville, NY: Baywood, 2002).

—— and Muntaner, 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pulation Health and Well-Being* (Amityville, NY: Baywood, 2004).

Novacek, M. (ed.),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Losing What Counts* (New York: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2001).
Nozick, M.,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Ohmae, K.,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Touchstone Press, 1996).
Panitch, L., and Gindin, S.,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in *The Empire Reloaded: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London: Merlin Press, 2005) 46–81.
Peck, J.,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3 (2004), 392–405.
—— and Tickell, A.,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3 (2002), 380–404.
Petras, J., and Veltmeyer, H., *System in Crisis: The Dynamics of Free Market Capitalism* (London: Zed Books, 2003).
Piketty, T., and Saez, E.,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2003), 1–39.
Piore, M., and Sable, C.,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Pollin, R., *Contours of Descent* (London: Verso, 2003).
Poulantzas, N., *State Power Socialism*, trans. P. Camiller (London: Verso, 1978).
Prasad, E. (ed.), *China's Growth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Occasional Paper 232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4).
Rapley, J.,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Neoliberalism's Downward Spiral* (Boulder, Col.: Lynne Reiner, 2004).
Rees, G., and Lambert, J., *Cities in Crisi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Robinson, W.,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drik, D.,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Development Really Mattere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1).
Rosenblum, N., and Post, R. (eds.),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ss, A., *Low Pay High Profile: The Global Push for Fair Labo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4).
Roy, A.,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Sachs, J., 'New Global Consensus on Helping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Global Policy Forum Newsletter*, 18 Apr. 2000.
Seabrook, J.,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 Scenes from a Developing World* (London: Verso, 1996).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1999).

Smith, N.,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The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Soederberg, S., *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 Debt, Class, and the New Common Sense in Managing Globalis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mposed Leadership and "Emerging Markets"',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175–92.
Soros, G., *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 Correcting the Misu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 *George Soros on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Stedile, J., 'Brazil's Landless Battalions', in T. 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Stiglitz, J.,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 *The Roaring Nineties* (New York: Norton, 2003).
Tabb, W., *The Long Default: New York City and the Urban Fisc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Toussaint, E.,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The Tyranny of Global Finan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Valdez, J., *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Vasquez, I., 'The Brady Plan and Market-Based Solutions to Debt Crises', *The Cato Journal*, 16/2 (online).
Wade, R., *Governing the Mark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and Veneroso, F.,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
Wallace, T., 'NGO Dilemmas: Trojan Horses for Global Neoliber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2003), 202–19.
Walton, J., 'Urban Protest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IMF Riots', in M. Smith and J. Feagin (eds.), *The Capitalist City* (Oxford: Blackwell, 1987) 354–86.
Wang, H.,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Wei, L.,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0).

Weisbrot, M., Baker, D., Kraev, E., and Chen, J., 'The Scorecard on Globalization 1980–2000: Its Consequenc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V. Navarro and C. Muntan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pulation Health and Well-Being* (Amityville, NY: Baywood, 2004) 91–114.

Wignaraja, P.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 1993).

Williams, R.,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8), 118.

Woo-Cummings, M.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outh Korean Anti-Americanism*,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93 (July 2003).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4).

Wright, M., 'The Dialectics of Still Life: Murder, Women and the Maquiladoras', *Public Culture*, 11 (1999), 453–74.

Wu, X., and Perloff, J.,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Over Time: Reasons for Rising Inequality*, CUDARE Working Papers 97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04).

Yergin, D., and Stanislaw, J.,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Yew, L. K.,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9).

Zakaria, F.,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Norton, 1998).

Zergan, J., *Future Primitive and Other Essays*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94).

Zevin, R., 'New York City Crisis: First Act in a New Age of Reaction', in R. Alcalay and D. Mermelstein (eds.), *The Fiscal Crisis of American Citie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Ame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ew Yor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11–29.

Zhang, Z. 'Mediating Time: The "Rice Bowl of Youth" in Fin-de-Siècle Urban China', *Public Culture*, 12/1 (2000), 93–113.

——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索　引

（译名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u Dhabi 阿布扎比 27

accountability, lack of 责任，缺乏责任 69，160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掠夺性积累 154，178－179

　crisis management 危机管理 162－163

　financialization see financial system 金融化，见金融体系

　state redistributions 国家再分配 159，160，163－165

　struggles against 与之斗争 199－200，203，204

　see also commodification; privatization 亦见商品化；私有化

advocacy groups 倡议团体 177－178

Africa 非洲 11，142，206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40，56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4，171，175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95，109，116，117，118

Allende, S. 阿连德 7，8，28

anarchy, danger of 无政府，无政府的危险 82，186

Arab states see Middle East 阿拉伯国家，见中东

Arab-Israeli war 阿拉伯—以色列战争 12

Arendt, H. 阿伦特 195

Argentina 阿根廷 15，39，139，140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5，186，206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5，79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3，154，163，167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1，94，95，96，104－106，118

US comparison with 与美国比较 189，193，194

Arnold，M. 阿诺德 6

Asia 亚洲

crisis（197－1998）危机 96－97，105，162－163

see also East Asia；India；South East Asia 亦见东亚；印度；东南亚

austerity programme 节俭计划 10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35，96，139，140

authoritarianism 权威主义 28

and market economy combined see China 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见中国

of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权威主义 79－80，82，86

US alliance with see Chile 与美国结盟，见智利

see also neoconservatism 亦见新保守主义

Bacon，F. 培根 69

Baker，J. 巴克尔 73，99

balance of payments 收支平衡 58，141－142，189

Balkans 巴尔干 94，178

banks see financial system 银行，见金融体系

Bartholomew，A. 巴塞洛缪 178－179

Beijing 北京 131，132，133，142，147

Berlinguer，E. 贝林格 12

Biafra 比夫拉 56

Blair，A. C. L. 布莱尔 13，62－63，93

Blyth，M. 布莱思 11，115

Botswana 博茨瓦纳 88

Brady Plan 布雷迪计划 75，103

Brazil 巴西 139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6，201，206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5，79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65，175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1，94，95，96，105，106

Breakspear，J. 布莱克斯皮尔 178－179

Bremer，P. 布雷默 6－7，9，179，184

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体系 10，121，141

Britain 英国 1，2，120

consent，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39，40，55－63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9，11，12，13，17，22－23，27，31，32，35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200，206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6，67，71－76 各处，79－82，86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6，157，164，168，172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93 各处，109，115，116，118

see also London；Thatcher 亦见伦敦；撒切尔

Buchanan，J. 布坎南 54

Budd，A. 巴德 59

Bush，G. W. 布什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5－6，37－38，39，208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4，188，190，197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1，77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2，164，172，173，182

Business Roundtable（US）（美国）商业圆桌会议 43

Canada 加拿大 66，140

capital 资本

capitalist class see elites；financial system 资产阶级，见精英；金融体系

mobility 流动性 66, 92, 193

see also debt; FDI 亦见债务；境外直接投资

car ownership 汽车拥有 173 - 174

Carrillo, S. 卡里略 12

Carter, J. E. 卡特 22, 23, 24

Carvallo, D. 卡瓦罗 105

casual labour 临时工 100, 112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27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96, 198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5, 117, 118

see also Mexico 亦见墨西哥

central planning, transition from 中央计划，转变 2, 71 - 72

see also China;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Russia; socialism/communism 亦见中国；东欧与中欧；俄罗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UK) (英国)政策研究中心 57

CEO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行政总裁 43

salary and power 薪资与权力 16 - 18, 32, 33 - 34

chaebols 综合企业集团 107 - 111 各处

Chandler, D. 钱德勒 176 - 177

Cheney, R. B. 切尼 77, 190

Chile 智利 120, 139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39, 40, 46, 54, 63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7 - 9, 15 - 16, 28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5, 74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60, 174 - 175, 181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1, 94, 95, 115, 116 - 118

China 中国 1, 2, 3, 120 - 151

class power restored 阶级力量重建 142 - 151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9, 17, 19
external relations 对外关系 135－142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6, 188, 190, 193, 194, 197－206 各处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内部转型 121－155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2, 76, 81, 83, 85, 86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2, 154, 156－160 各处, 164, 168－176 各处, 180, 182
SOEs and TVEs 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 125－130, 134－135, 136, 138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7, 91, 97, 103, 106, 108－109, 115
Chinese in Indonesia 印尼华侨 32, 34
Christianity 基督教 49－51, 186
circumscribed neoliberalism 限制型新自由主义 115
CIS 独联体 17
cities see urban areas 城市，见城市地区
civil rights 公民权利 42, 84, 196
class and class power 阶级与阶级力量 57
bias 偏见 78
China 中国 122, 142－151
compromise 妥协 10
formation 建立 72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31－36
restored 重建 74, 82, 84, 122, 142－151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 156
struggle 斗争 201－203
see also elites; labour; middle class 亦见精英；劳动力；中产阶级
classical economics 古典主义经济学 20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172, 173, 174
Clinton, W. J. 克林顿 13, 84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51, 53－54, 62－63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2, 93, 103, 110

Coca Cola 可口可乐 80

coercion/force 强迫/强力

legitimation of 合法化 77, 159, 180－181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4, 70, 82－83

see also financial system; military; power; war 亦见金融体系；军事；权力；战争

Cold War 冷战 5, 10, 88, 107, 118

end of 终结 3, 9, 32, 87, 94, 110－111, 176, 196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70, 153, 157, 160－161, 164－172

common sense 常识 39, 41

commons/natural resources/environment exploited 共有物/自然资源/环境的开采 8－9, 70, 122, 194

degradation/pollution 破坏/污染 67－68, 100, 161, 172－175

movements to protect 保护行动 186, 200－201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64, 174－175

tragedy of disappearing 消退的悲剧 65, 146－147, 159, 160, 201, 204

communism see socialism 共产主义，见社会主义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竞争，国际 70, 80

increased 加剧 87－89, 101, 103, 106, 108－109

as virtue 作为德性 65, 66

confiscatory deflation 强制性通货紧缩 162

Confucianism 儒教 86, 186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39－63, 80

Britain 英国 39, 40, 55－63

United States 美国 39－58 各处，62－63

Conservatives 保守党 113－114

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义 81－85

see also Thatcher 亦见撒切尔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 62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矛盾 67－70, 79－81

control see planning and control 控制，见计划与控制

Coors, J. 科尔斯 44

corporations, power of 企业，企业权力 12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42, 48－49, 50, 54－55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92, 203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7－78, 80, 84－85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2, 157, 160, 164－165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0, 99

see also financial system 亦见金融体系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US)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 31

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 (US) 美国政策委员会 51

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毁灭 3

crime 犯罪 47－48, 100, 185

crisis management 危机管理 162－163

culture 文化 85

values 价值 39, 40－42

wars 战争 205

currency 货币 68, 189, 193

exchange rates 汇率 10, 12, 123－124, 141

Daewoo 大宇 107, 111

Dahl, R. 达尔 10

De la Madrid, H. M. 德·拉·马德里 99－100

De la Rua, F. 德拉鲁阿 105

deb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9, 29, 162, 193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3－75

uneven development and crises 不均衡发展与危机 94－96, 99, 104, 108

decadence of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的颓废 85－86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化 55－56

deficit financing 赤字资助 188

deflation 通货紧缩 162, 194－195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业化 26, 53, 59

democracy 民主

demand for 需求 110

excess of 过度 184

as luxury 作为奢侈 66

meaning of 意义 206

Democrats (US) 美国民主党 49, 51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51, 53－54, 62－63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2, 93, 103, 110

see also Clinton; Roosevelt 亦见克林顿；罗斯福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1－2, 120－125 各处, 135－136, 168

deregulation 松绑 3, 22, 26, 65, 67, 114, 161

derivative rights 派生性权利 182

devaluation 贬值 103, 105, 135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中国家 71－74

see also Africa; Asia; debt; inequalities; Latin America; uneven development

亦见非洲；亚洲；债务；不平等；拉丁美洲；不均衡发展

Dicken, P. 迪肯 91, 102, 109, 131

dignity, human 尊严，人的尊严 5

see also freedom 亦见自由

dirigisme 统制 10

disposable commodity, labour as 受处置的商品，劳动力作为受处置的商品 70,

153, 157, 164, 167 - 171
dispossession see accumulation 掠夺，见积累
dissident movements 异议运动 5
see also student movements 亦见学生运动
Dongguan 东莞 132, 147, 149
Duhalde, E. 杜阿尔德 105 - 106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16 - 17, 18, 24, 26, 30, 33
Eagleton, T. 伊格尔顿 198
earnings see income/wages 薪资，见收入/工资
East Asia 东亚
and China 与中国 122, 141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59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10, 11, 23, 35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90, 193 - 194, 197, 199, 206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 66, 72, 85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4, 156, 169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7 - 94 各处, 96, 97, 106 - 112, 115, 116, 118
see also China; Hong Kong; Japan; South East Asia; South Korea; Taiwan 亦见中国；香港；日本；东南亚；韩国；台湾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东欧与中欧 5, 17, 71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4, 170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4, 117
ecosystems see commons 生态系统，见共有物
Ecuador 厄瓜多尔 95
Edsall, T. 爱德索 48, 49, 51, 54 - 55
egalitarianism 平均主义 203 - 204
elites and restoration of power 精英与阶级力量重建

China 中国 123, 145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39, 42－45, 51, 52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15－19, 23, 26, 29－30, 31－38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97, 203－204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6, 69, 84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2, 153, 156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0－93, 96－99, 103－106, 108, 112, 114, 117, 119

see also financial system 亦见金融体系

embedded liberalism 镶嵌型自由主义 11－12

employment see labour 就业，见劳工

Enron 安然 32, 77, 162

entrepreneurialism 企业精神 23, 31

environment see commons 环境，见共有物

equality 平等 120

see also inequalities 亦见不平等

ERM 汇率机制 98

ethnicity 族裔 85

Europe 欧洲 109, 157

European Union 欧盟 79, 89, 91－92, 93, 114－115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11－15, 17, 19, 24, 27－28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93－194, 200, 206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1－92, 93, 114

see also Britain;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France; Germany; Italy; Sweden 亦见英国；东欧与中欧；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

excess capacity 产能过剩 194

exchange as ethic 交易作为伦理 3, 13

exchange rates 汇率 10, 12, 123－124, 141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开采 8－9, 159, 164, 174－175

export-led growth 出口导向型增长 107

China 中国 128, 130, 135－137

see also East Asia; FDI; market economy; South East Asia 亦见东亚；境外直接投资；市场经济；东南亚

failure of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154－156

see also neoliberalism on trial 亦见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Falklands/Malvinas war 福克兰/马岛战争 79, 86

Falwell, J. 法维尔 49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境外直接投资 6, 7, 23, 28－30

China 中国 21, 123, 125, 126, 129, 133－134, 141, 147

decline 减弱 190, 191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0－94 各处, 98, 100, 101, 103, 105, 109, 117－118

see also debt; financial system 亦见债务；金融体系

Federal Reserve (US) see Volcker 美国联邦储备局，见沃克尔

financial system and power 金融体系与权力 40, 62

China and state-owned banks 中国与国有银行 123, 125, 126, 129, 133－134, 141, 147

crises 危机 12, 44－48, 68, 189, 193－194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4－97, 104－105

see also debt; deflation; inflation 亦见债务；通货紧缩；通货膨胀

decline 减弱 190

financialization 金融化 161－162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1－75, 78, 80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7, 158, 161－162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93, 94－99, 104－105, 108, 114, 119

see also corporations; currency; elites; FDI; IMF; income; Treasury; World

Bank 亦见企业，货币；精英，境外直接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入；财政部；世界银行

flexible accumulation 弹性积累 75－76

flexible labour 弹性劳动力 112

force see coercion/force 力量，见强迫/强力

Ford, G. 福特 4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ee FDI 境外直接投资，见 FDI

Fortune 500 财富 500 强 44

four modernizations (China)（中国）四个现代化 120

Fox, V. 福克斯 98

France 法国 41, 157, 200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5, 11, 13, 15, 17, 19, 24, 27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6, 84, 85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1, 115, 117

Frank, T. 弗兰克 172

free trade/market see market economy 自由贸易/市场，见市场经济

freedom, concept of 自由，自由的概念 5－38

as catchword 作为口号 39, 41－42

class power 阶级力量 31－36

definitions 定义 36－37

divergent concepts 不同概念 183－184

four cardinal 四个核心 183, 206

neoliberal theory, rise of 新自由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 19－31

neoliberal turn, reasons for 新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理由 9－19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36－38, 186－206

end to neoliberalism, possible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可能性 188－198

neoliberalism, alternatives to 新自由主义，替代性方案 198－206

Freeman, J. 弗里曼 46

Friedman, M. 弗里德曼 8, 20, 22, 44

future see freedom's prospect 未来，见自由的前景

G7/G8 countries 七国/八国集团 33, 66, 94

Gang of Four see 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四小龙，见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

GATT 关贸总协定 100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 130, 134, 135, 157

Geneva Conventions 日内瓦公约 6, 198

Germany 德国 66, 87, 91, 157

West 西德 24, 41, 88－89, 90

Gilder, G. 吉尔德 54

Giuliani, R. 朱利亚尼 48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 172, 173, 174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70, 80, 159, 163

see also market economy; WTO 亦见市场经济；世界贸易组织

Glynn, A. 格林 208

Goldwater, B. 高华德 2

Gramsci, A. 葛兰西 39, 78

Gray, J. 格雷 152－153

Guangdong 广东 121, 128, 135, 136, 137

Hainan Island 海南岛 131

Hayek, F. von 哈耶克 20, 21, 22, 37, 40, 57

health, poor 健康，贫穷 154

hedging 对冲 97－98

hegemony see power 霸权，见权力

Hofstadter, R. 霍夫斯塔特 82－83

Hong Kong 香港 2, 89, 96, 157

and China 与中国 121, 123, 128, 130, 132, 136, 138, 141, 147

Huang, Y. 黄亚生 124

Huawei 华为 134 - 135

human rights see rights 人权，见权利

hyper-inflation 高通胀 193

Hyundai 现代 107, 111

IBM 13, 146

ideologies see neoliberalism; values 意识形态，见新自由主义；价值

illiteracy 文盲 156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

China 中国 122, 141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40, 54, 58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8, 10, 12, 24, 30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5, 189, 201, 205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9, 72, 73, 75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2, 154, 162 - 163, 175, 182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2 - 99 各处, 103, 105 - 106, 111, 116 - 118

imperialism see neocolonialism 帝国主义，见新帝国主义

imports 进口 139 - 140

cheap 廉价

substitution 替代 8, 98

income/wages 收入/工资

China 中国 126 - 127, 136, 138, 143 - 144, 148

falling 降低 18

individual 个人 176 - 177

inequalities 不平等 15 - 19, 88, 92, 100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4, 156

policies 政策 12

and productivity 与生产力 25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 92, 100, 114

India 印度 9, 134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6, 194, 202, 206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6, 85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4, 156, 174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23, 42, 57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5 - 66, 78 - 79, 82, 85 - 86

see also freedom 亦见自由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199

and China 与中国 138, 139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31 - 32, 34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6, 85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3, 163, 167, 168, 175, 178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1, 96 - 97, 108 - 109, 117, 118

inequalities 不平等

China 中国 142 - 151

income 收入 15 - 19, 88, 92, 100

increased 增大 89 - 90, 118

see also class; developing countries; power; uneven development 亦见阶级；发展中国家；权力；不均衡发展

inflation 通货膨胀 1, 135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51, 59

control as only success 控制通胀作为仅有的成绩 156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12, 14, 22, 23 - 25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9, 193

stagflation 滞胀 12, 22, 23, 24 - 25, 57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 93, 10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3－4, 34, 157, 159

innovation see technology, new 创新，见技术，新技术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UK) 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 22, 57

institutions 机构 40, 64, 75

see also IMF; World Bank; WTO 亦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知识产权 64, 68, 160

interest rates 利率 23－24, 51, 59, 99, 162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国际协议 6, 92, 198

see also IMF; WTO 亦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intervention 干预 20－21, 79

lack of 不干预 69

see also pre-emptive action 亦见先发制人行动

investment see FDI 投资，见境外直接投资

Iran 伊朗 28, 85, 139, 206

Iraq 伊拉克 179－180, 181, 204

reconstruction 重建 184

War 战争 6－7, 9, 35, 39, 153, 160, 184, 197

Isaacs, W. 伊萨克 193

Islam 伊斯兰 83, 186

see also Middle East 亦见中东

Israel 以色列 12

Italy 意大利 66, 96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11, 12, 13, 15

Japan 日本 2, 59, 156

and China 与中国 123, 134, 136, 138－140, 142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10, 11, 23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90, 193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6, 85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7－94 各处, 107

Jensen, D. 詹森 186

Jevons, W. S. 杰文斯 20

joint ventures/alliances 共同冒险/联盟 121, 124, 128

see also FDI 亦见境外直接投资

Joseph, K. 约瑟夫 57, 62

justice 正义 41－42, 180

Kaldor, M. 卡尔多 84

Kaplan, R. 卡普兰 185

Keynes, J. M./Keynesianism 凯恩斯/凯恩斯主义 56

China 中国 132, 141, 142, 152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8, 10, 11, 13, 20－24 各处, 29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6, 187, 188

paradox 悖论 152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 93

King, R. 金 83

Kirchner, N. 基尔希纳 106

Kissinger, H. 基辛格 7

Koolhaas, R. 库哈斯 47

Kristol, I. 克里斯托 50

Krugman, P. 克鲁格曼 186

Kuwait 科威特 27

Labour Party (UK) 英国工党 55, 58, 61

labour/employment/working class 劳工/就业/工人阶级 70

China 中国 123, 130, 138, 141, 148－150

as commodity 作为商品 70, 153, 157, 164, 167－171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 建立赞同 47－48, 50

as disposable commodity 作为受处置的商品 153, 157, 164, 167 - 171

flexible/casual 弹性/临时性 100, 112

full 充分 10

see also income/wages; unemployment; unions 亦见收入/工资；失业；工会

Laffer, A. 拉弗尔 54

land tenure 土地占有 101, 103, 159

Lange, O. 兰格 21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199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 108, 109

see also Central America; South America 亦见中美洲；南美洲

law/regulation 法律/管制 159

coercive legislation 强制立法 77

judiciary 司法 78

legitimacy 正当性 80, 180 - 181

rolled back 撤销 161

rule of 统治 64, 66 - 67

Lay, K. 雷 77

Lee, S. K. 李静君 148

left see socialism/communism 左翼，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legislation see law 立法，见法律

Leigh, General G. 雷将军 8

Lenovo 联想 146

LETS (local economic trading systems) 本地经济贸易体系 186, 201

Lévy, D. 列维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16 - 17, 18, 24, 26, 30, 33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8

Liaoyang 辽阳 148 - 149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1 - 12

life expectancy decline 预期寿命下降 154

Lindblom, C. 林伯隆 10

London 伦敦 55, 75, 157

City of 伦敦市 56, 59, 62

Lucas, R. 卢卡斯 54

Lyotard, J.-F. 利奥塔 4, 198

Maastricht agreemen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89, 93

McCarthy, J. R. 麦卡锡 22, 196

Madrid, H. M. de la 马德里 99－100

Malaysia 马来西亚 31－32, 86, 169

and China 与中国 138, 139, 140－141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7, 108

Mao Zedong/Maoist 毛泽东/毛主义者 120, 135, 137, 149－150

maquila programme (Mexico) 墨西哥马圭拉规划 98, 101, 102, 103

market economy and free trade 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 7, 8, 10, 29

and authoritarianism see China 与权威主义，见中国

exchange as ethic 交易作为伦理 3, 13

as main 'freedom' 作为主要的“自由” 183, 184－185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4, 71, 79

see also globalization; IMF; neoliberalism; World Bank; WTO 亦见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自由主义；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Marshall, A. 马歇尔 20

Martin, R. 马丁 33

Marx, K./Marxism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59, 148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20, 21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4－185, 189, 202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9, 180

media 媒体 40, 56, 80, 115, 156, 159

Mellon, A. 梅隆 163

Menem, C. 梅内姆 104

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 79

Mexico 墨西哥 138, 139, 150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41, 53, 54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5, 15, 17, 29, 34, 36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5, 186, 190, 199, 204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3, 75, 76, 84－85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9, 162－165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4, 95, 98－104, 115, 116, 118

see also PRI 亦见革命制度党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25, 61－62, 181

Middle East 中东 12, 94, 109, 139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97, 206

Islam 伊斯兰 83, 186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1, 83, 85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71, 173

see also Iraq; Islam 亦见伊拉克；伊斯兰

migration 移民 127, 129, 169－170

military 军事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39, 40

-industrial complex 军工复合体 83

Keynesianism 凯恩斯主义 88

militarization 军事化 82－83, 101, 107, 195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3, 179

see also war 亦见战争

Millennium Summit 千禧年峰会 187

Mises, L. von 米塞斯 20

Monday Club 星期一俱乐部 8
monetarism 货币主义 24－25
China 中国 123－124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51, 54, 59
Friedman 弗里德曼 8, 20, 22, 44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3
monopoly 垄断 67, 80
Mont Pelerin Society 朝圣山学社 20, 21, 22, 36
Montreal Protocol 蒙特利尔议定书 172
morality 道德
moral majority 道德多数 49－51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82, 83－84, 211
see also religion 亦见宗教
Morrison, H. 莫里森 55
Mosaddeq, M. 穆萨迪克 28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40, 116, 117, 118
multinationals 跨国公司 7, 35－36, 80
Murdoch, R. 默多克 34, 35－36, 38, 166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79, 93, 101, 103, 138
nation/national 民族/国家
'interest' "利益" 66
monopoly on violence 垄断暴力 180－181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79, 85, 195－196, 197
and state separate 与国家分裂 84－85
nationalization 国有化 55, 57－58, 99
NATO 北约 56
natural resources see commons 自然资源，见共有物
neoclassical economics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20

neocolonialism/imperialism 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 27－28, 56, 159, 181－182, 197

see also United States 亦见美国

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义 50, 81－85, 166

return of 回归 195－197, 201－202, 204－205

see also authoritarianism 亦见权威主义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2, 64－88, 161

circumscribed see Sweden 限制性，见瑞典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7－11, 20－21

intervention 干预 20－21, 79

see also Keynes 亦见凯恩斯

and nation separate 与民族分裂 84－85

neoconservative answer 新保守主义方案 81－85

practice 实践 70－81

redistributions 再分配 159, 160, 163－165

ten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张力与矛盾 67－70, 79－81

theoretical aims 理论目标 64－67

see also welfare, public 亦见福利，公共福利

neoliberal theory 新自由主义理论

and pragmatics distinct 与实用主义特征 21－22

rise of 兴起 19－31

state 国家 64－67

turn, reasons for 转向，理由 9－19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2

defined 界定 2－3

see also China; consent; freedom; freedom's prospect; neoliberal state; neoliberalism on trial; uneven development 亦见中国；赞同；自由；自由的前景；新自由主义国家；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不均衡发展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2－182

achievements 成就 154－165

environment degraded 环境破坏 67－68，172－175

see also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commodification；rights 亦见掠夺性积累；商品化；权利

Netherlands/Holland 尼德兰/荷兰 27

New York City 纽约市 52，63，157

finance/banks 财政/银行 27，28－29，44－48，73，97－98，100

New Zealand 新西兰 3，96，140

NGO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 78，177，205

Nicaragua 尼加拉瓜 27，117

'9/11' attack "9·11"袭击 5，83，195

Nixon，R. 尼克松 13，43，45，196

non-interference see deregulation 不干预，见松绑

non-intervention 不干预 69

OECD *countries* 经合组织国家 17，110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US）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局 52

oil 石油 173

OPEC 石油输出组织(欧佩克)12，27，197

oligarchy，Russian 寡头制，俄罗斯 32

oppositional culture 对抗性文化 175－176

order，need for 秩序，需求 82－83

PACs（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政治行动委员会 49

paranoia 偏执狂 82－83，196

Park Chung Hee 朴正熙 107，108

PATCO（US）美国航运管理组织 25，59

Pearl River Delta 珠江三角洲 87，131，132

Perkins，J. 帕金斯 28

Perloff, J. 佩罗夫 143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个人责任 168－169

Petras, J. 佩特拉斯 106

Philippines 菲律宾 31－32, 40, 206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4, 95, 96, 117

Pinochet, A. 皮诺切特 7, 8

planning and control 计划与控制 12, 75, 103, 156

as denial of freedom 作为对自由的否定 37

see also central planning 亦见中央计划

Podhoretz, N. 波德雷兹 50

Poland 波兰 94, 95, 154

politics 政治 69－70, 205

oppositional 对抗性政治 78

see also Conservatives; Democrats; Republicans 亦见保守党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

see also socialism/communism 亦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Pollin, R. 波林 25

pollution 污染 67－68, 100, 161, 172－175

Polyani, K. 波兰尼 183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36－37, 38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0, 80－81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66－167, 168, 172, 219

Popper, K. 波普尔 20

pornography 淫秽制品 165－166, 170

Portillo, L. 波提洛 99

Portugal 葡萄牙 12, 13, 15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4, 42, 47, 198

poverty, increasing 贫穷，加剧 76, 96, 98

see also debt 亦见债务
Powell, L. 鲍威尔 43, 44
power 权力
international hegemon see United States 国际霸主，见美国
regional hegemon see China 区域霸主，见中国
see also class; coercion/force; corporations; elites; financial system 亦见阶级；强迫/强力；企业；精英；金融体系
pragmatics and neoliberalism distinct 实用与新自由主义特征 21－22
Prasad, E. 普拉萨德 128
PRI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革命制度党 84－85, 98－101, 150
see also Mexico 亦见墨西哥
prices, controlled 价格，价格控制 12
private property 私有财产 7
see also commons 亦见共有物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3, 129
avoided in China 中国的避免 122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60－61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6, 8, 17, 23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5, 71, 76－77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4, 159－161, 163－164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 99－101, 103, 104, 114
productivity and wages 生产力与工资 25
propaganda 宣传 70, 80, 113
property rights 财产权 64
public assets 公共财产
taken over see privatization 接管，见私有化
see also nationalization; neoliberal state; welfare 亦见国有化；新自由主义；福利

public choice 公共选择 54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公私合营 76－78

Putin, V. 普金 86

quality of life concept 生活质量概念 156

rational expectations 理性预期 54

Reagan, R. 里根 1－2, 88, 172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39, 40, 44, 48, 49, 51－52, 54, 59, 62－63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9, 24－26, 29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90, 192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3, 84

recession 衰退 23, 57, 152

regulation see law 管制，见法律

Rehn-Meidner Plan 雷恩-梅德纳计划 112

religion 宗教 81, 85, 171－172, 195

Christianity 基督教 49－51, 186

Islam 伊斯兰教 83, 186

see also morality 亦见道德

rent seeking 寻租 68

Republicans (US) 美国共和党人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43, 45, 48－51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5－6, 13, 37－38, 39, 208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4, 188, 190, 196, 197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1, 77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2, 160, 164, 172, 173, 182

see also Bush; Nixon; Reagan 亦见布什；尼克松；里根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与发展 134

see also technology 亦见技术

resources, natural see commons 资源，自然资源，见共有物
retail trade 零售业 34, 38, 137, 190
Ricardo, D. 李嘉图 20
richest people 最富裕人口 103－104
see also elites 亦见精英
rights and abuse of 权利及其滥用 42, 196, 197－198, 204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4, 68, 78, 84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60－165, 175－182
Rockefeller, J. D. 洛克菲勒 21
Roderick, J. 罗德里克 32
Rohatyn, F. 罗哈廷 46, 51
Roosevelt, F. D. 罗斯福 183, 184, 206
Rua, F. de la 德拉鲁阿 105
rural areas 农村地区 159
urban areas different 与城市地区差异 125, 126－127, 142－147
Russia 俄罗斯 96, 105, 122, 139, 156, 182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17, 19, 32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201, 202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6, 76, 86
see also Soviet Union 亦见苏联
Sachs, J. 萨克斯 186
Salim Group 斯里姆集团 34, 35－36
Salinas, C. 萨利纳斯 100－101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27, 104, 139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12－13
see also Sweden 亦见瑞典
Schwab, K. 施瓦布 81
Sen, A. 森 184

Shanghai 上海 88, 127, 128, 131 - 133 各处, 136, 147 - 148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57, 160

Shenzhen 深圳 131, 133, 134, 136, 147

shock therapy 休克疗法 71

short-term contracts 短期合同 166, 168

Simon, W. 西蒙 46, 49

Singapore 新加坡 2, 169

and China 与中国 120, 138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1, 81, 85 - 86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1, 96, 97, 116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159

Slim, C. 斯里姆 17, 34, 35 - 36, 104

Smadja, C. 斯马亚 81

Smith, A. 斯密 20, 185

Smith, N. 史密斯 27

social justice 社会正义 41 - 42

socialism/communism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2, 12 - 13, 15, 86

consent 赞同 41 - 43

fight against 敌对 28

see also Cold War 亦见冷战

see also central planning; China; Marx; Soviet Union 亦见中央计划；中国；马克思；苏联

SO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hina) 国有企业(中国) 125 - 126, 128, 129, 130, 132, 138, 144, 145

solidarity, social 团结，社会团结 80 - 81

Soros, G. 索罗斯 31, 34, 97 - 98, 186

South Africa 南非 3, 169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5, 199, 203, 206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1, 108, 116, 118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120, 139, 140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39, 40, 46, 54, 63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7－9, 11, 15－16, 28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5, 186, 201, 206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5, 74, 75, 79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3, 154, 160, 163, 165, 167, 174－175, 181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1, 94－96, 104－106, 109, 115－118
US comparison with 与美国比较 189, 193, 194
see also Argentina; Brazil; Chile 亦见阿根廷；巴西；智利
South East Asia 东南亚 2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79
and China 与中国 120, 122, 130, 138－141 各处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40, 41, 53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5, 19, 31－32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1, 76, 81, 85－86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3, 154, 156, 163, 167－169, 175, 178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1, 94, 96－97, 108－109, 116, 117, 118
see also crisis under Asia; Indonesia; Malaysia; Singapore; Thailand 亦见亚洲危机；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
South Korea 韩国 2, 35, 169
and China 与中国 120, 123, 134, 136, 138－140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99, 206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2, 85
uneven development 89－91 各处, 94, 96, 97, 106－112, 115, 116, 118

sovereignty 自治 7

Soviet Union 前苏联 117, 154

collapse of 崩溃 3, 32, 87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5, 10, 22, 32

see also Russia 亦见俄罗斯

Spain 西班牙 12, 15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hina) (中国)经济特区 130

sport 体育 85, 132, 164

stagflation see under inflation 滞胀，见通货膨胀词条

Stanislaw, J. 斯塔尼斯拉夫 51

state 国家

authoritarianism and market economy 权威主义与市场经济

combined see China 结合，见中国

crony capitalism 裙带资本主义 97

monopoly 垄断 98

-owned enterprises see SOEs 国有企业，见 SOEs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112, 115

see also neoliberal state; welfare 亦见新自由主义国家；福利

Stiglitz, J. 斯蒂格利茨 29, 51, 74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6, 221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3, 98, 111, 118

Strauss, L. 施特劳斯 92

strikes see unions 罢工，见工会

structural adjustment 结构调整 163, 188－189

student movements 学生运动 99, 100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41, 42, 44

Sudan 苏丹 139, 173

Suez venture (UK) (英国)苏伊士运河危机 55－56

Suharto, T. N. J. 苏哈托 34, 175
supply-side see monetarism 供给学派，见货币主义
surplus, extraction of see FDI 剩余，榨取剩余，见境外直接投资
surveillance 监督 77, 105
Sweden 瑞典 3, 71, 156, 206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9, 15, 22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0, 112－115, 116
Tabb, W. 泰伯 48, 210
Taiwan 台湾 2, 72, 169, 206
  and China 与中国大陆 120, 130, 136, 138, 140, 141, 142, 146, 149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7, 89, 90, 94, 96, 97
tariffs 关税 71, 100
tax 税收 5, 60
  cuts 减免 17, 23, 26, 54, 152
technology, new 技术，新技术 68－69, 89, 92
  China 中国 121, 134－135, 138
  information 信息 3－4, 34, 157, 159
tensions see contradictions 张力，见矛盾
terrorism, US fear of 恐怖主义，美国的恐惧 198, 204
'9/11' attack "9·11 袭击" 5, 83, 195
Thailand 泰国 5, 41, 169
  and China 与中国 138, 139, 140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4, 96, 97, 108, 118
Thatcher, M. 撒切尔 1－2, 88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39, 40, 57－63 各处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9, 22－23, 31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71, 76, 79, 80, 82, 86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64, 168, 172

think tanks 智囊团 40, 44, 54, 115

time-space compression 时空压缩 4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see TVEs 乡镇与乡村，见乡镇企业

trade, free and international 贸易，自由贸易与国际贸易 98

see also export-led; imports; market economy; WTO 亦见出口导向型；进口；市场经济；世界贸易组织

Trades Union Congress (UK) 英国工会联盟 59

traditions see values 传统，见价值

transitional nature of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过渡性质 79－81

transnationals 跨国企业 7, 35－36, 80

transport 运输 92, 131－132

Treasury (US) 美国财政部 74－45, 141, 162－163, 190, 201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2, 99, 111, 117

trickle down 扩散效应 64－65

TRIPS agreement 知识产权协议 160

Tullock, G. 塔洛克 54

TVE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China) 乡镇企业(乡镇与乡村企业，中国)125－129, 130, 136, 138, 144

unemployment 失业 1, 12, 14, 163, 189

China 中国 130, 144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52－54, 57, 59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 96, 101－106 各处, 111

uneven development, geographically 不均衡发展，地理 87－119

Argentina 阿根廷 104－106

changes since 1970 1970 年以来的变化 87－98

forces and fluxes 力量与波动 115－119

Mexico 墨西哥 98－104

South Korea 韩国 106－112

Sweden 瑞士 90, 112 - 115, 116

see also inequalities 亦见不平等

unions (and strikes) 工会(与罢工)11 - 12, 168, 199

China 中国 130, 148 - 149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 建立赞同 52, 55, 57 - 59

increased power 扩大的权力 15

restricted freedom 受限制的自由 6, 23, 25, 75, 77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9, 90, 100 - 101, 110 - 116 各处

see also labour 亦见劳工

United Kingdom see Britain 联合王国, 见英国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10, 54, 182

United States 美国 1, 2, 23 - 24

and China 与中国 120, 134, 136, 138 - 142 各处, 150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 建立赞同 39 - 58 各处, 62 - 63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5 - 8, 9 - 18 各处, 21 - 34, 37 - 38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3 - 186, 188 - 206 各处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5 - 69 各处, 73 - 84 各处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2 - 153, 156 - 182 各处

'9/11' attack "9 · 11" 袭击 5, 83, 195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7 - 98 各处, 101, 104, 107 - 111 各处, 116 - 118

see also FDI; New York 亦见境外直接投资; 纽约

universities 大学 54

see also student movements 亦见学生运动

urban areas 城市地区 59 - 60, 173

rapid development 快速发展 131 - 133, 146 - 147

rural areas different 与农村地区差异 125, 126 - 127, 142 - 147

unrest 骚乱 44 - 48

see also student movements 亦见学生运动

see also Beijing; London; New York 亦见北京；伦敦；纽约

Uruguay Round 乌拉圭回合 108

US Steel (later USX) 美国钢铁(后来是美国钢铁联合公司)32

utopianism 乌托邦主义 19, 37

failed 挫败 203－204

values and ideologies 价值与意识形态 39, 40－42

see also neoliberalism 亦见新自由主义

Veltmeyer, H. 维特梅尔 106

Veneroso, F. 维内罗索 162－163

victim-blaming 谴责受害者 76, 185

Vietnam 越南 138, 140

War 战争 42, 118, 196

violence see coercion/force 暴力，见强迫/强力

Volcker, P. (and Federal Reserve) 沃克尔(与联邦储备局)1－2, 51, 69

freedom concept 自由的概念 23－25, 29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189, 190, 193, 205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3, 162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9, 103

Wade, R. 韦德 162－163

wages see income/wages 工资，见收入/工资

Wall Street see financial system 华尔街，见金融体系

Wal-Mart 缅因街 34, 38, 137, 190

Walras, L. 瓦尔拉斯 20

Wang, H. 汪晖 81, 123－124, 142－143, 146, 215, 222

war 战争 79, 86, 160, 189

Vietnam 越南 42, 118, 196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 37－38, 121

wealth see elites 财富，见精英
welfare, public 财富，公共财富 11, 12－13, 125, 195
consent, construction of 赞同，建立赞同 53－57 各处, 61
cuts/decline 削减/降低 3, 8, 23, 76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3, 160, 165, 168, 171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88, 92, 100－101, 113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53, 160－161, 165, 168, 171
West Bank 西岸地区 54, 176, 182
working class see labour 工人阶级，见劳工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3, 10, 29, 73, 121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201, 205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2, 93, 99－100, 116, 117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经济论坛 36
World Social Forum 世界社会论坛 201
World Trade Center attacked 受攻击的世界贸易中心 83, 19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ee WTO 世界贸易组织，见 WTO
Wriston, W. 里斯顿 27, 45, 46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3
China 中国 123, 137, 141
freedom's prospect 自由的前景 201, 205
neoliberal state 新自由主义国家 66, 72, 78, 80
neoliberalism on trial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60, 176, 180－182
uneven development 不均衡发展 92, 93, 106
Wu, X. 吴喜明 142
Yergin, D. 尤金 51
Zakaria, F. 扎卡里亚 184
Zapata, E. 萨帕塔 103
Zevin, Z. 泽文 45－46

译后记

“新自由主义”一词在国内并不陌生，相反，随着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从学院到媒体的各个话语领域都开始关注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为代表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而且，2009年爆发的最近一次金融危机，可以说也与新自由主义有直接关系。但是任何学说一旦被扩展到耳熟能详的地步，都难免发生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和本质化，以至于人们在讨论时更关注像“中国要不要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这样的问题，而不太关心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在这个意义上，哈维的这本小书，如果不说是起到“正本清源”之效的话，起码也可以为目前和今后有关“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扫清一些知识上的盲目和偏见。

作者大卫·哈维的名字早已在国内学界闻名遐迩。他的《后现代的状况》、《希望的空间》、《新帝国主义》和《巴黎城记》也已相继译成中文，由他所提出的“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也对国内的文化研究、城市研究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考察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兴起和意义”（见本书导论）。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通过建构一个保障市场自由的制度性框架，人民的幸福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而在这种制度框架内，政府干预行为应该降到最低的程度，原因是各种强

大的利益集团有可能借此从中牟利，而政府与市场信号的信息不对称也注定政府干预将会以失败告终。——凡此种种，国人或许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哈维并不是要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们展开论争；相反，他恰恰要通过对历史上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分析，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解决全球矛盾和问题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另辟替代性道路。

因此，在本书的第一章，哈维便通过分析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在智利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等等案例，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不过是美国又一次在外围进行实验，然后将其作为内部改革的样本。“二战”以后，各国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安排，出台了多项福利政策，由此也导致了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但是，始于196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各国引起失业率上升和滞胀现象，使得战后保持稳定增长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在“把饼做大”的前景破灭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调整经济政策，而这次结构性调整才使“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浮出水面。然而正像哈维所说，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其说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幸福，不如说是源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上层阶级和商业精英为了恢复自己的经济力量所做的打算。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展开，其根本特点也浮现出来：“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如兰迪·马丁所说——日常生活。”（见本书第一章）那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是如何得到一般民众支持的呢？作者在第二章中通过美国和英国的例子来说明新自由主义政治是如何“建立共识”的。我们从中了解到，美国的企业家同时支持两个政党，但由于民主党在“平权运动”中承认了社会上各个身份团体的权利，而

又无法将其统一成一股力量，再加上民主党自身无法与商业势力摆脱干系，注定在政治角逐中无法站稳脚跟。相比之下，共和党不仅拥有雄厚财力，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与右翼保守派相结合，积极建立起稳固的民众基础，最终为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打下基础。此处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新自由主义提倡个人自由、个性解放，这一点可以和“后现代文化”并行不悖；另一方面，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向的共和党，在价值取向上又和右翼保守传统拧在一起。这里的政治—文化问题错综复杂，但作者引用葛兰西的理论却非常重要：一旦政治问题披上了文化的外衣，仿佛就不可解决了。在英国的例子中，哈维指出，由于工党政府无法满足允诺给工人阶级的诸项有利措施，而又想不出很好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最终让位于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但是，分析美国和英国的例子并不是为了对新自由主义转向给出“一般条件”，而是试图说明，“一旦新自由主义深深扎根于英语世界中，它就不能否认其对于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总体运转具有重要意义”（见本书第二章）。

在分析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大的新自由主义“个案”之后，哈维着手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裂入手，剖析各种打着经济复苏和谋求人民幸福旗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怎么一来就和种种诱人的标语口号相悖，而且首先就是实践和理论的脱节。哈维指出，由于害怕群众性组织最终会建立起强大的力量破坏新自由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就不得不为个人自由设下许多限制，这带来的后果是：“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的统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诸如联邦储备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关键

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见本书第三章）另一方面，哈维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践，试图表明：重建或建立阶级力量的冲动在很多情况下歪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以适合于统治精英们的利益打算。虽然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不应该插手经济行为——即国家应扮演“守夜人”角色——但在保护金融机构免遭经济损失方面，国家又必须插手干预，并从贫穷的国家榨取利润。对此，哈维在书中引用了斯蒂格利茨的话：“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一方面被要求“不作为”，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良好的商业环境，而后一方面进一步表现为要求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发挥一个实体的角色。因此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涉及民族主义、个人自由、企业垄断，等等。对此，哈维认为，新保守主义对社会秩序和价值的强调，成为解决个人利益混乱局面的方案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是一丘之貉：“在建构或重建主导阶级的力量方面，新保守主义并没有悖离新自由主义的议事日程。”但是，新保守主义却可能引发各个国家之间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进行你争我夺，从而产生比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更严重的后果。

如果说哈维在前三章从理论和个案出发，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给出了总体分析，那么第四章可以视作从“不均衡地理发展”的角度考察各个国家如何由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因素原因，在采纳新自由主义道路时经历不同的过程。作者指出，在1997 金融风暴之前，日本、韩国、西德等国未按照新自由主义正统教条发展经济，反倒取得了长足的经济进步，让人觉得新自由主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案（如果它能算个方案的

话)。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更开放的金融化过程、更快速的资本流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复合体的威逼利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传播——上述各个方面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日本和欧洲被施加压力采取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因而，“美国成功的真正秘密是它现在可以从其驻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和企业机构(同时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额收益。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贡金，铸就了美国1990年代的大量财富”。(见本书第四章)通过进一步分析墨西哥、阿根廷、韩国、瑞典等国的具体事例，哈维试图表明，造成新自由主义不均衡地理发展轨迹的因素包括美国等霸权力量的强制、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但阶级力量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最后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并且，虽然不均衡地理发展因时因地而异，却有一点共同的现象：财富和力量都集中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资金大量地从世界各地流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金融中心。对于有些人或天真或故意地把这一现象理解为“副作用”，或如某些国内论者所说的过渡期“阵痛”，哈维朴实但尖锐地说：“这一切或许是(仅仅或许是)新自由主义化的核心。”有趣的是，哈维在分析了上述几个代表性国家之后，专辟一章论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道路(哈维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私有化道路”；作者认为，这一过程既提高了大部分人民生活质量，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社会不平等”，以及“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见本书第五章)。通过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国有资产私有化、城市大规模工程项目等等现象后，哈维下结论说：“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这样的结论是否可靠，就要留待读者考察了。

或许有人会辩称，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固然有种种弊端，但那属于某些特定的人“在其位不谋其政”，只顾着为自己的私人利益着想而造成了目前很多难以收拾的局面；但这并不等于说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论辩本身有问题。退一万步讲，哪怕新自由主义学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思想(作者指名道姓地把这一观点归诸自由派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那也不能说它必然就是错的。的确，在理论考察或哲学论辩的层面上，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而如前所述，哈维的这本简史也并没有打算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哈维告诉我们：“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 接受它，等于接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见本书第六章)然而，虽然作者再三声称理论和实践并不是分开进行的活动，不能只关注理论声明而不看到它所遮蔽的赤裸裸的现实活动，但我们的确可以挑出一些作者未充分讨论的问题。例如，哈维始终在用类似“新自由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教条”、“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等说法，似乎哈耶克、弗里德曼、波普尔等名字都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笔名；并且，我们无法从本书中仔细区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流行话语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具体论辩之间有何等距离——固然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根本上”没有差别，但这一观点所需要的充分论辩(argument)，却在这本简史中付诸阙如。另外，哈维也没有具体讨论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想与新自由主义学说之间的学理冲突；相反，“新保守主义”更多情况下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道德补充或矫正，而没有受到仔细的考察——这从书中非常细微的一点就可以看出： 作者所列出的涉及列奥·施特劳斯(他被

广泛认作“新保守主义”思想之父)的仅有参考书目是来自自由主义阵营的 Shadia Drury 的《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一书(中译本见刘擎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作者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回答如下问题： 为什么新保守主义者严厉批评自由主义，但却能在经济政策方面与后者并行不悖？新保守主义者与坚持“道德多数”的传统价值的原教旨主义者是一回事吗？新自由主义者(如作者提到多次的哈耶克)对价值和伦理的主张，与新保守主义有什么关系？并且，和“新自由主义者”一词一样，“新保守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把这些都简单地处理成“重建统治阶级力量”的托词或借口(例如，作者在书中反复使用“修辞”一语，让人感到这些理论家的论辩都不过是花言巧语)，未免有些阴谋论的嫌疑。何况，倘若施特劳斯归根结底能与哈耶克算到同一个阵营里(比如，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Perry Anderson 就是这么做的)，可能就预先把这些思想家的学说当成了“修辞”的花招。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更恰当的名字或许是“新自由主义话语”简史或“新自由主义政策”简史。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的教导——“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尽管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世界现状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这本小书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同时，恰恰因为这本书只是“简史”，并不求面面俱到，它就能够为我们打开讨论问题的许多扇门，而不是把门关上。

本书的翻译得到罗岗老师和倪文尖老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特别表示感谢。朱康、林凌等好友对译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编辑张吉人先生为我寄来样书；陈似岚、饶青欣、王小莉等

友人通读了部分或全部译稿；对于上述各位，在此一并致谢。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父母全力承担了操持生活方面的事务，提前完成这项译事将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上述感谢绝不意味着推卸译者在译文上的责任；虽小心谨慎，但恐怕译文讹误依然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